



戚文 陈宁宁 / 著

三国人物论

三国的时间跨度自公元184年至280年。

评述的人物有张角、张鲁、曹操、袁绍、

董卓、吕布、刘表、荀彧、

程昱、钟繇、董昭、郭嘉、贾诩、

刘晔、蒋济、田畴、

田丰、许攸、司马懿、

曹爽、孙权、鲁肃、周瑜、吕蒙、陆逊、

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赵云、

刘阿斗、马谡、王平、魏延、姜维、

孙夫人等四十余人。

三国时期，

是中国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

战乱频仍，英雄辈出。

毛泽东对三国历史关注颇多。

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

对三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都做过评价。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曾经是作者努力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指针。

本书就是以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为指导写就的……



上架建议: 历史

ISBN 978-7-5473-0612-3



9 787547 306123 >

定价: 38.00元

三国人物论

戚文 陈宁宁/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人物论/戚文、陈宁宁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0

ISBN 978 - 7 - 5473 - 0612 - 3

I. ①三… II. ①戚… ②陈…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K82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561 号

三国人物论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21.5 插页 2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612 - 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序

戚文先生与陈宁宁女士合著的《三国人物论》专著，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可读性强；而其内容也很新颖。其中有若干分析和论断是很精辟的，就是某些不够妥当的分析和论断，因问题的提法和分析的新颖，也会使细心的读者得到有益的启发。

第一篇《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浓笔重墨，生动地描绘了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把张角和张鲁作为英雄人物予以分析和评价。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黄巾起义，“既是对东汉旧的腐败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的否定，给三国鼎立创立了前提，也是达到新的统一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的历史是黄巾开创的。”无疑，这是一个正确的深刻的判断。无论编年史家把哪一年算作三国时期的开始，而历史的转换，确是从黄巾大起义开始的；是黄巾起义实际上结束了东汉王朝的寿命。旧的一套统治制度、统治办法、统治思想不行了，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另辟途径，转换统治机制；事实上不仅地方武装割据，而且中央政权也很快落到了曹操集团手里，刘家的皇帝已经是虚有其名了。正是黄巾起义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章。在中国，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民思想，不了解农民起义，就不了解历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发展史。还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确立过程中的战国，就有农家许行学派主张君主“与民并耕而食”，反对“厉民而食”，并在滕国几个村庄实行平均主义的试验。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确立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

起义，结束了秦朝的寿命。此后，就是在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农民战争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下行阶段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是由农民战争摧毁，而后由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改变统治政策建立起新的王朝。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的。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农民战争第三次大浪潮，它是三国历史的序幕；戚著把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作为“三国人物论”的开篇之作，这是非常得体的。

这部“三国人物论”，对鼎立三方的主要军政人物，都用比较详尽的史料进行了勾画叙述和分析评论。勾画叙述扼要，分析评论有据。依笔者看来，写得最好的是“刘备论”（《从平民崛起的皇帝刘备》）与“孙权论”（《生子当如孙仲谋》）。很多人认为刘备、孙权不过是平庸之辈，这固然同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有关的传记材料没有认真研究，没有“更上一层楼”，站在更高的角度评价作为君主的领导人物。作者把刘备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组织家来看待，刘备善于团结和使用人材，他宽容大度，善于同将领谋士推心置腹、建立友谊；并且信任到底，从不猜疑。所以跟刘备一齐起事的以及后来招致和任用的文官武将，除了个别的例外（如刘封、糜芳），都是终生忠于刘备集团的政治事业，为之用尽力量。就说刘备对待诸葛亮吧：以赫赫有名的刘皇叔（虽在困难时期）而虚心向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介书生诸葛亮至诚求教，“三顾茅庐”，言听计从，给以军政、大权而不疑。这是卓越的政治家的大手笔、大才干。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杰出的，刘备能欣然接受、付诸施行也是杰出的——前者的杰出，是作为战略思想家的杰出；后者的杰出，是作为政治家、政治领导人的杰出。对于刘备的缺陷，作者也作了分析，主要是不谙军事，晚年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大举伐吴，深入敌境、连营百里，被陆逊一把火烧得大败而逃，使蜀汉元气大伤。作者对于孙权也是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前人已经指出：“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待，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江东也”（胡三省）；“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孙盛）《三国人物论》的作者运用具体的资料进

行分析论证；并且分析了他的晚年，指出：“晚年的孙权，虽然有近小人、远君子的昏聩行为。但只要真正明白自己的过失以后，还是能与臣属推诚相待，不自护其短。”作为一个封建君主，特别是坐稳了君主宝座的封建君主，能够不护己短，确是难能可贵的。——刘备、孙权的政治领导的本领，是应该加以扬弃，古为今用，吸收到领导学中去的。

对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对魏延（《魏延的悲惨命运》），对曹操（《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以及《曹操、刘备、孙权在赤壁的角逐》等四篇），对鲁肃（《大政治家鲁肃》）以及陆逊（《夷陵之战中的陆逊》）等军政人物的分析、评述也是比较好的。多数评论，以人物的性格作为一个集中点进行分析，接触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特色。对于诸葛亮一生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都作了若干引人入胜的分析。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就诸葛亮的《隆中对》，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隐居乡间，过着耕读生活的诸葛亮，能为当时亲自参加政治、军事斗争实践的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战略对策呢？这难道不违背认识依赖社会实践的基本观点吗？”问题提得好，提得尖锐。正确地提出问题，就为正确的回答问题开辟了道路。作者从接受间接经验和接受前人来自社会实践的书本知识、理论知识进行了分析，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如果能够进一步从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进行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以实践为基础、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过程的认识论及其同经验主义的对立的角度进行分析，就更好了，就更能帮助人们提高思想了。对于曹操，关于他的乘机平定李傕、郭汜之乱、迁都许昌而掌握中央政权，对于他平定北方，特别是官渡之战都作了比较好的分析，对曹操在赤壁之战的错误也从军事上乃至曹操的性格上作了分析。缺点是对曹操赤壁之战这个大战略错误的后果估计不足，实际上“赤壁之战”使曹操失去了统一天下的一个大好机会；接着他又失去另一个统一天下的机会——没有抢在刘备前头进军汉中巴蜀，于是三国鼎立成了定局，难以在短时期内实行统一了。掌握政权的领袖人物影响历史可以如此之大，

这并不违背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规律是有弹性的，并不是像精制钟表的时针那样。历史唯物论是辩证的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对抗和战胜非历史决定论的。戚著对其他若干三国英雄人物也都作了评述，其中不乏独到之见，不必在此一一评介了。

从总体上看这本《三国人物论》的美中不足有二：一是有若干比较重要的人物，如蜀汉的马超及其他蜀中新秀，如孙吴的阚泽和薛综，如曹魏的夏侯渊、曹仁、张郃，又如魏蜀吴三国的文人名士等等，都没有或没有专题论述，这些人在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重要作用。二是缺少“三国人物总观”，如果把个别人物的分析光聚集起来，当可更清晰地照明这段历史。譬如，如果有一篇《三国魏蜀吴武将谋士综录》、《三国魏蜀吴文人名士综录》（对他们的著作也略作分析），就立即可以看出曹操占据的中原人才济济，文化发达，而蜀吴则大为落后，由此更可证明曹操本有统一天下的优越条件，只是由于两次战略性大错误，终于失掉了统一天下的机会；由此也可以证明诸葛亮北伐，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战略进军，是绝然没有胜利的可能的。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利用曹魏内部不稳的机会轻兵奇袭，占领长安，再图东进，所以魏延以二千人偷越子午谷奇袭长安的建议，是有取得胜利的可能的。经过对若干有关人物（虽然就其作用说来可能是次一等的）的分析，之后写“再论曹操”、“再论诸葛亮……”也就能更加深入和全面了。——希望作者再写一本续篇，那会在《三国人物论》的总体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人类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研究历史当然必然研究人、研究人的行为及其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有一条基本原理叫作“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群众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群众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固然在群众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自己的领袖），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与品德对于历史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固然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品德也受历史的群众觉悟水平的制约）；当然，领袖和杰出人物脱离了人民群众也就终止

其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终止其创造历史的作用。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研究领袖和杰出人物,即英雄人物,从研究英雄人物中发现具体的历史辩证法,从而阐明历史,并丰富历史唯物论。戚君这本书,如果对三国英雄人物的研究或其他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的研究有所推动,那也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古 棣

作者的话

本书是一部评述三国人物的书。其时间跨度自公元 184 年至 280 年，共九十六年。评述的人物有：张角、张鲁、曹操、袁绍、董卓、吕布、刘表、荀彧、程昱、荀攸、钟繇、董昭、郭嘉、贾诩、刘晔、蒋济、田畴、田丰、许攸、司马懿、曹爽、孙权、鲁肃、周瑜、吕蒙、陆逊、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刘阿斗、马谡、王平、魏延、姜维、卞后、吴夫人、孙夫人等四十余人，本书中有部分文稿是与陈宁宁女士合作撰写的。

这部历史人物评述是作者六部历史人物评述之一，另外五部为：《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晋唐宋元人物论》、《明清人物论》。这六



赤壁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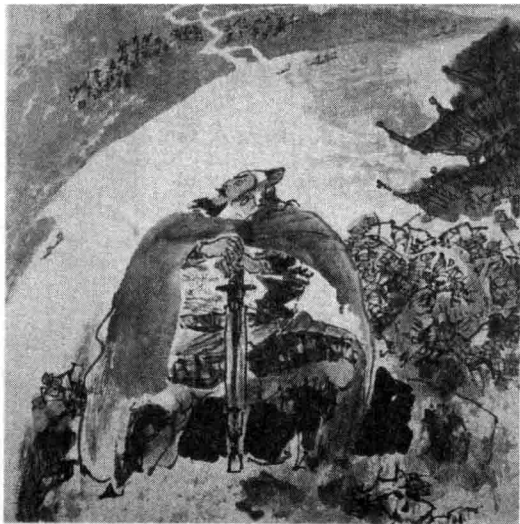
曹操观沧海

1986年在秦城时写的,当时手中没有多少参考资料,主要是根据过去读书的记忆追叙的。出秦城后,找来参考资料做了整理。还有一部分则是近年来补写的。其中一部分曾在199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以《青梅煮酒论英雄》书名出版,这次又增加了董卓、吕布、袁绍、刘表、田畴、吕蒙、黄忠等许多人物,篇幅增加近一半。

作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原理,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它是正

部历史人物评述,从黄帝、大禹写到洪秀全、孙中山,总共写了两百多个历史人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000多年到公元1912年,约五千年。

三国时期,是中国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英雄辈出(有农民英雄,亦有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本书写到的人物有四十多人。这些评述少数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的,一部分是1968年至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确的。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像一团团疑云迷雾,使人无法看清历史的真正面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像光明的灯塔,为人们照亮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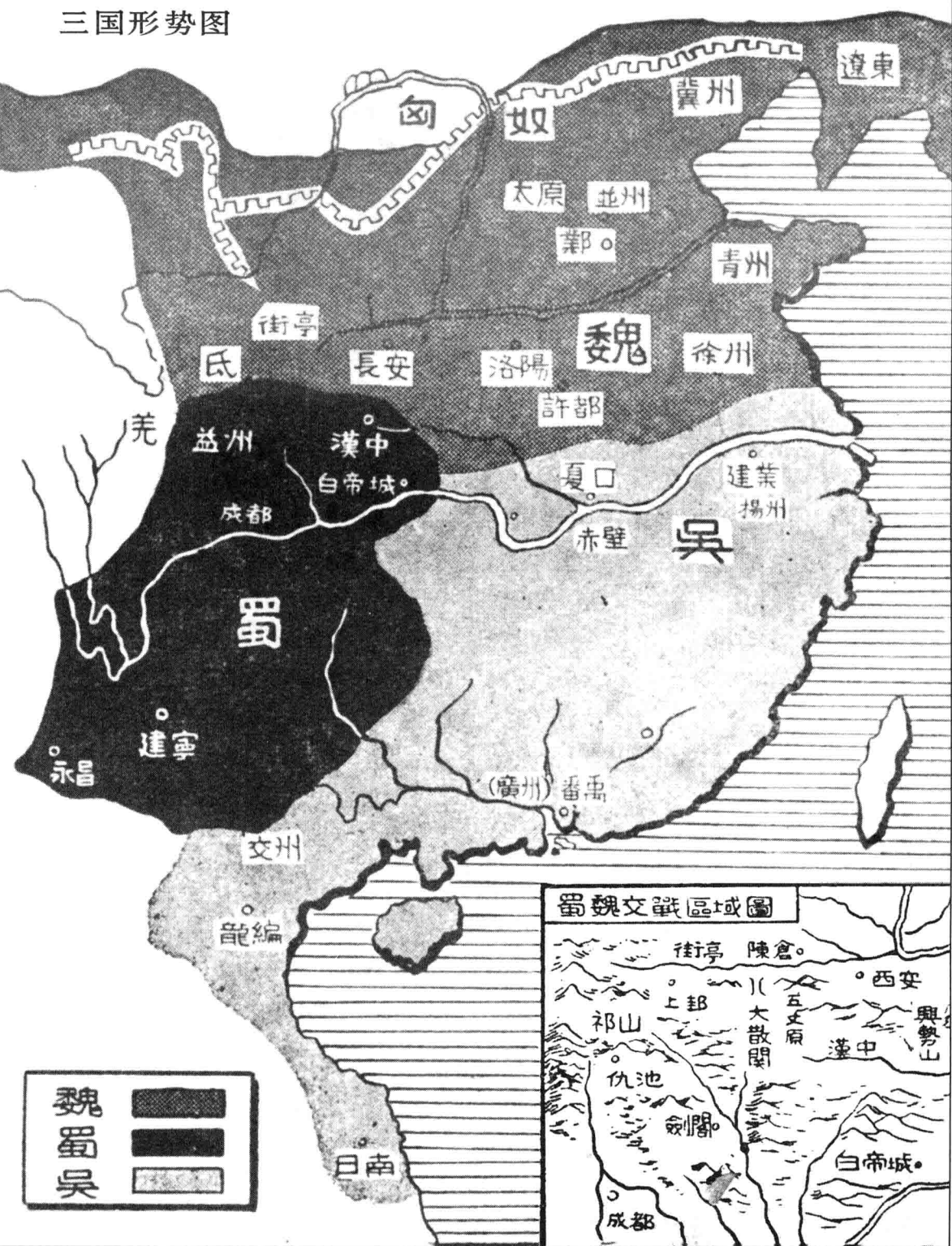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尽管作者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原理去正确评述历史人物的愿望,但由于各种原因,却未能达到很好评述历史人物的目的。因此,作者欢迎听到专家和读者的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相信唯有通过磋商和论争,才能达到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述。



张飞长坂坡据水断桥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三国历史关注颇多。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对三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都作过评价。作者同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过的同志一样,曾经虔诚地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曾经是作者努力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指针。本书就是以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为指导写就的。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评述,除了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评价部分,其他部分只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如有理解错误之处,应由作者本人负责。

三国形势图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總成空
 青山依舊在
 滿眼夕陽紅

白髮漁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在付笑談中

罗贯中 三国演义 第一回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总成空；青山依旧在，满眼夕阳红。
 白发渔翁樵江渚，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付笑谈中。

CONTENTS | 目 录

序(古棣)	001
作者的话	001
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	001
张角和太平道 / 002	
张鲁和天师道 / 006	
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 / 010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	014
曹操与农民起义军 / 017	
曹操与汉献帝 / 020	
曹操与人才群 / 023	
鲁迅、毛泽东评曹操 / 026	
曹操出身小考 / 028	
官渡对垒话袁、曹	031
官渡战前的北方局势 / 031	
官渡对垒的进程 / 034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的历史根据 / 042	

官渡之战反映出的几个战争规律性问题 / 045

毛泽东谈官渡之战 / 051

曹操和他的智囊团 052

曹魏集团的生命线 / 054

曹操智囊团的历史贡献 / 056

曹操怎样领导智囊团 / 062

三国时期的民间英雄田畴 073

田畴在乱世中为山中人建立了一方人间乐土 / 073

田畴帮助曹操平定乌丸 / 074

田畴因辞封而引起弹劾 / 077

三国时期的民间英雄 / 078

董卓与吕布——东汉末年两个又黑又厚的大军阀 079

董卓残暴狠毒,被民众点了“天灯” / 080

吕布民心丧尽,终遭枭首命运 / 082

多端寡要的袁绍与虚有其表的刘表 085

多端寡要的袁绍 / 085

虚有其表的刘表 / 088

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角逐 092

赤壁战前的全国形势 / 093

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 096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水上战斗 / 100

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 103

曹操在战争指导上的错误 / 107

孙刘的政治、军事联盟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 / 109

青年统帅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 / 110

“生子当如孙仲谋”	113
内忧·外患——鼎峙江东不易 / 115	
开拓·进取——谋求恢弘王业 / 118	
人才·谋略——成功奥秘所在 / 122	
猜忌·杀戮——晚年性格变态 / 125	
大政治家鲁肃	128
智勇双全 / 128	
吴中献策 / 129	
联刘抗曹 / 130	
化干戈为玉帛 / 132	
东吴名将吕蒙	136
毛泽东要高级将领读《吕蒙传》 / 136	
吕蒙由战将型军事人才向统帅型军事人才的转变 / 138	
先示弱以弱，然后白衣渡江，一举战胜不可一世的骄傲将军 / 139	
夷陵之战中的陆逊	142
荆州战役后，吴蜀矛盾的尖锐化 / 142	
夷陵之战发展的三个阶段 / 145	
吴蜀两军统帅战争指导能力优劣的比较 / 150	
夷陵战后 / 153	
从平民中崛起的皇帝刘备	154
出身、机遇、辅佐之臣不是刘备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 154	
奥秘之一：团结人才 任用人才 以诚待人 / 156	
奥秘之二：对武装力量这个基点始终抓得很紧 / 159	
奥秘之三：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 / 160	
奥秘之四：注意争取民心，获取声誉 / 161	

奥秘之五：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 163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背景 / 166

刘阿斗是低能儿吗 168

有关刘阿斗的身世传说 / 168

白帝城托孤之后 / 170

昏庸的晚年 / 171

安乐公的苦衷 / 174

只能如此 / 175

诸葛大名垂宇宙 176

他的早期生活和“隆中对” / 178

“隆中对”方针的实施和挫折 / 183

他的南征北伐及其政治、军事意义 / 188

他受到人们的怀念 / 194

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小考 / 196

关羽散论 202

为什么一个才能平凡的武将，成了超越时代的伟大英雄 / 202

他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却不是一位明智的统帅 / 203

关羽的惨痛经历，对于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是一面镜子 / 205

教训之一：不执行正确的政治方针，必然两面受敌，孤立自己 / 205

教训之二：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起码的军事戒备 / 207

教训之三：搞不好上下团结，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 209

关羽骄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与领导者的责任 / 210

三国斗将中的两个高手：张飞与赵云 213

粗中有细论张飞 / 213

智勇双全话赵云 / 217

老将黄忠	220
马谡与王平	224
两个出身、教养、性格、作风迥然不同的人物 / 224	
马谡实在不应该在形势如此险要的有利阵地打败仗 / 225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检讨 / 227	
马谡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于缺乏自知之明 / 228	
不识几个大字的王平是怎样成为名将的 / 230	
魏延的悲剧命运	231
小说与历史 / 231	
魏延与杨仪 / 233	
魏延与诸葛亮 / 235	
魏延悲剧命运的性格因素 / 236	
话说姜维	237
怎样看待姜维北伐 / 237	
怎样评价姜维 / 240	
蜀汉灭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241	
司马懿的事业与性格	244
一世之雄栽倒在小秘书手里 / 244	
司马懿春风得意 / 246	
司马取代曹魏 / 249	
三国时期的几位巾帼英豪	252
曹操的影子卞后 / 252	
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夫人 / 254	
常使刘备惴惴不安的孙夫人 / 255	

两个“丑小鸭” / 257

辛宪英未卜先知 / 259

三国时期的“智斗” 261

漫谈“连环计” / 261

李孚的“以假乱真”和“金蝉脱壳” / 263

张辽镇定应变 / 264

蒋干的策反活动和黄盖的诈降计 / 265

蒋济的“虚张声势”战术 / 269

周瑜的“美人计” / 269

刘备智取益州 / 272

贾诩的“离”字计 / 274

吕蒙的“瞒天过海”计 / 275

吕蒙的“白衣渡江”计 / 276

诸葛亮计斩孟达 / 280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 / 281

诸葛亮的“空城计”和文聘的卧床却敌 / 283

吴、魏石亭之战中“智斗” / 284

孙权和曹叡的情报与反情报斗争 / 287

孙权在“智斗”中遇到劲敌 / 289

陆逊的“将计就计” / 290

陆逊用“反间计”赶跑了魏国的江夏太守 / 291

司马昭用奇计瓦解寿春守敌 / 292

孙权和王基怎样应付敌人的伪降 / 294

姜维复国密谋的失败 / 296

陆抗的“移花接木”计 / 297

三国大事记 299

后记 319

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有两种英雄。

一种是代表被压迫生灵的杰出人物，如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一种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如历代的开明君主及其有所作为的臣属。

东汉末年农民运动的领袖张角属于前一种，倡导五斗米道的张鲁也曾属于这一种；曹操、刘备、孙权则属后一种。

两种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尽相同，前一种人是真正的英雄，虽然他们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错误，但他们是历史前进车轮的推动者；后一种人的历史作用复杂些，他们往往一身具有进步和反动的双重作用。而且由于历史地位的限制，他们的进步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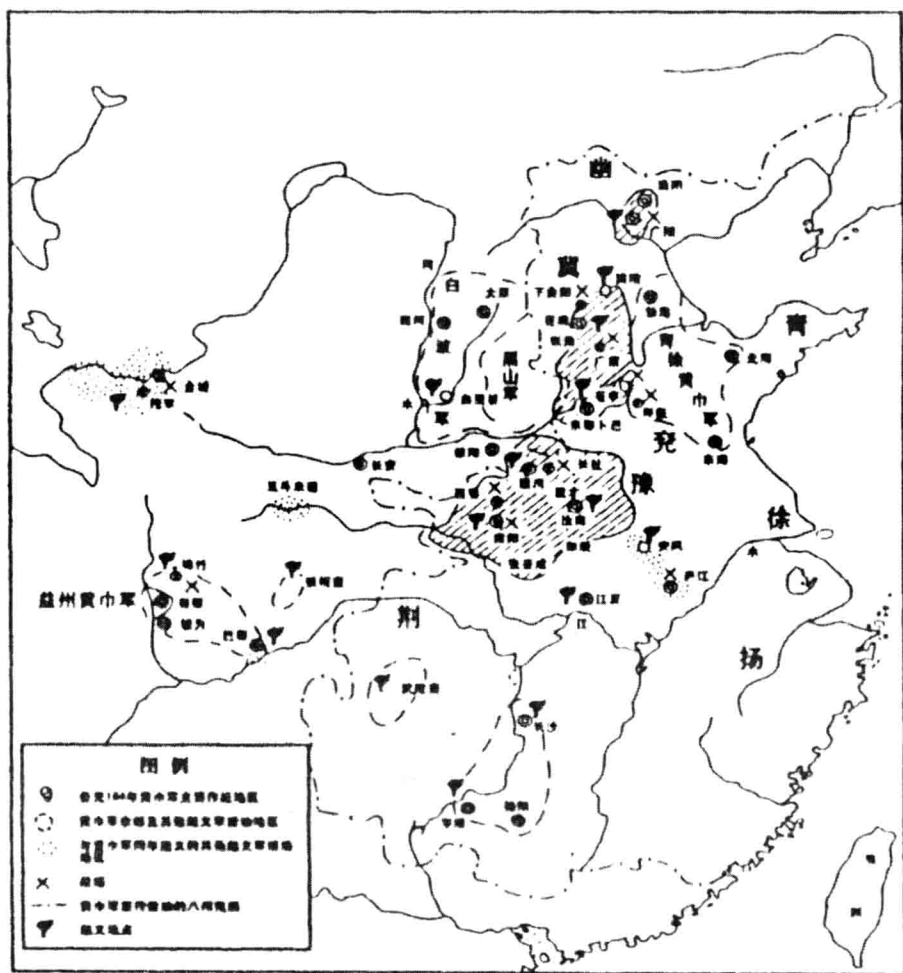
张角是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太平道的首领。他组织发动的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他是受尽凌辱压迫的广大农民反封建大潮的先行者。

张角组织发动的黄巾起义，在宗教的旗帜下聚集了大批为理想而战的农民，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尽管最后被东汉统治者纠集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但起义运动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力量，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土崩瓦解。倡导五斗米道的张鲁也是早期道教首领。张鲁没有参加和发动黄巾起义，但他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是黄巾起义追求的太平社会理想在中国土地上的一种试验。尽管凭美好愿望建立起来的乌托邦理想最终破灭了，但这一和封建统治阶级抗争达三十年之久的太平社会的存在和实践，

表现了农民阶级对崇高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尽管他们在历史天幕上如耀眼的流星一闪而过,但其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张角和太平道

张角作为黄巾起义领袖和封建统治秩序的破坏者,官修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其光辉是掩盖不住的。我们在《后汉书》和《三



黄巾起义形势图

《三国志》的有关篇章中，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张角创立太平道和发动黄巾起义的一些基本情况。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等有关记载，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太平道属于早期道教，主要是民间巫术和黄老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太平经》是其早期经典。张角以大贤良师的身分，“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持九节杖”，教病人“跪拜首过”，用“符水咒语以疗病”。病人饮符水，“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尽管这种用请祷、饮符水的治病办法只能起心理治疗的作用，但对于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民众，这种心理疗法也是一种精神安慰。太平道以这种方式吸收了大批的信徒。

为下层民众解除病痛、消灾免祸，不是太平道的最终目的。张角创立太平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去乱世、致太平”的理想。为此，他派了大弟子云游四方传道，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汉书》说：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由此可见，仅十余年的时间，太平道吸收的信徒已达数十万，其势力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八大州郡。在这基础上，张角把四方数十万人编组成为三十六方，每一方都是军事、政治、宗教合一的单位，各方都有首领，并接受张角统一领导。张角还在起义前夕，传播各种神秘的预言，以加强起义者的信心。

一切准备就绪，原定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京师内外起义军同时并起，但由于起义军叛徒唐周告密，起义被迫提前在二月举行。“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一时间“遐迩动摇，八州并起”，参加起义者就有三十六万人之多。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率领下，“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

面对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东汉统治阶级惊恐万分，赶紧“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并解除党禁，纠集一切可动员的武装力量对各路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军起事仓促，分散作战，加之缺乏军事装备和武装斗争经验，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公元184年秋天，以张角兄弟为代表的河北黄巾军主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被训练有素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张角兄弟先后死亡。起义军战死者八万人，被杀戮者十万人。张角也被“剖棺戮尸，传首京师”，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惨无人道的疯狂报复。

黄巾起义军的主力部队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其余部仍在各地此起彼伏，连绵有十余年之久。直到三国时期，各地还有黄巾军的余部在活动。如青州、冀州等地的黄巾军坚持斗争达二十年之久，青州黄巾军后来为曹操收容和改编。

黄巾大起义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农民革命运动。早期道教在起义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组织起义过程中，宗教活动是联系民众的纽带，张角利用传教布道的方式，在下层社会做组织联络的工作，不断招收信徒，不断发动群众，终于在十余年时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造反力量。

第二，在起义发动阶段，宗教理想是鼓舞人们犯上作乱的精神支柱。宗

教的神秘预言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胜利信心。

第三，在起义遭受困难的时候，宗教信仰是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坚持斗争的精神力量。虔诚的道教徒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顽强，许多人以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与敌人作拼死斗争。

当然，早期道教在农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作用并不是宗教教义中所固有的。毋宁说，这种革命作用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在实际的反抗斗争中给予宗教的。但是，早期道教之所以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旗帜，能吸引大批下层民众前仆后继地投入阶级大搏斗中，说明早期道教教义中有符合下层民众的愿望和要求的東西。从张角等人信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内容来看，确实有不少反映农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的思想。

“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太平经合校》）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太平经合校》）

“不肯加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太平经合校》）

《太平经》甚至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领导，说皇帝“少内之钱财”非应为皇帝一人所有，“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得衣食与是也”（《太平经合校》）。这就是说，财产是天地所产，应为“万户”所有，而现实生活中“富人囤积居奇，穷人贫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把这些教义和农民要求财产共有，反对剥削压迫的主张结合起来，并通过教主向教徒们传达，那就可以在感情共鸣的基础上，结合成为一种冲决旧社会罗网的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持续而不可遏止的。对旧的统治秩序有极大的破坏力。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汉行已尽，黄家当立”，黄巾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东汉王朝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从起义的结果来看，革命目标没有达到。但我们根据《太平经》的教义，并参照张鲁在汉中建立起来的太平社会的实践，不难看出起义农民试图建立的农民政权的某些特征：第一，财产共有，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第二，周穷救急，一人有难众人支援；第三，

废除酷刑,以教育悔改办法维持社会秩序。应当说,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用这些办法是实现不了财产公有、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的。但这并没有影响起义农民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尽管起义的目的没有达到,但黄巾军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的过程中摧毁了旧的王朝。存在于东汉后期的“拥有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豪族地主遭到了致命打击,原来就在各地聚结宗族和宾客的新兴势力,乘东汉王朝岌岌可危之际,或割据一方为霸主,或图谋自保,在自己领地改善同部曲、宾客、佃农的互为依存关系,从而在黄巾起义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武装割据、分土争雄的局面。这个局面既是对东汉旧的腐败社会结构的否定,也是达到新的统一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的历史是黄巾开创的。张角作为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其功不可没。他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英雄。

张鲁和天师道



张 鲁

张鲁和张角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他是早期道教天师道的首领。早期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其宗教性质和太平道基本相同,也是以尊奉黄老、用符水治病、教病人叩头思过等宗教活动为特征。但具体的规则更为复杂一些。如在治病过程中要“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司,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典略》)。

关于张鲁和早期天师道的活动,《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有如下记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

从以上所引可知，张鲁不是天师道的创始人。他的祖父张陵在鹤鸣山创立了天师道之后，传给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张鲁。张鲁是张陵的孙子，是天师道的第三代传人。

关于这个谱系，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三张（陵、衡、鲁）只是血缘关系而非传道世系”（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从宗教谱系上看，是张陵羽化后传于弟子张修，张修又传于张鲁。张陵、张修、张鲁才是真正的传道关系。

由于家谱和教谱的不一致，史书上有把张修和张衡混为一人的说法。如裴松之注引《典略》时说：“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既然张修是张鲁之父，父业子传，天经地义，张鲁又何必杀修“夺其众”？这是说不通的。

但是不管怎样，张鲁取代了张修，成为天师道历史上第三代传人。和前两任不同，到张鲁取得教权的时候，他是又有教权又有地盘的实力派。他利用宗教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汉中政权。东汉朝廷“力不能征”，无法使其归顺，只好封他为汉宁太守，以兹羁縻。

张鲁政权的形态及管理制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也有记载：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踞巴、汉垂三十年。

张鲁政权的基本形态是政教合一。首领本人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进行统一领导，下面不设地方行政长官，而用各教区的头领“祭酒”来代替。祭

酒除了掌管各教区的教务，还要管理这一区域的行政。“祭酒”一般由受业较深、德高望重的信徒担任。

张鲁政权采用的管理方式也和世俗社会不同：

1. 设立义舍，解决穷苦百姓吃饭问题。每个人道的人都要交米五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个教区组织都设有义舍，其中放着义米肉，任人量腹食用无人过问。这样的管理方式还颇见成效，没有什么人因此变得更贪婪，因为有鬼神在管理，“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2. 用教化的办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平时对人民加强诚信的道德教育。当人生了病，便让人叩头思过，强化对诚信原则的认识；当人犯了过失，“治道百步，则罪除”，即把劳动改造作为所犯过失的处罚；当人犯了法，则要“三原，然后乃行刑”，即要经过三次教育仍然无效时，才给上刑。这种以自我反省、启发觉悟，重在教化的管理方式，深受民众的欢迎。《水经·沔水注》中就有“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的记载。

由于张鲁政权成功地解决了社会治安问题和穷苦百姓的吃饭问题，于是“民夷便乐之”。汉中周围的汉族或少数民族闻讯都举家迁移而来。史书记载的“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只是其中一例。在中原大地兵荒马乱之际，汉中成了饱受离乱之苦的人们的世外桃源。

张鲁政权采取的管理方式，可以在《太平经》中找到其思想依据。

沿路设置义舍，本于《太平经》卷六十七：“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供养人也，此家但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思食，此大仓大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

“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本于《太平经》卷九十六：“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诚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之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纯不相信，故上下纯以相欺为事，故上古人举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纯不中，故危亡。”

对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本于《太平经》卷一百十中说的“闻人之过，助其自悔”。目的在于“化之以渐”，让犯法者对自己的过错有所认识而自新。

所以张鲁本人虽然没有参加黄巾起义,但他建立的汉中政权表明他继承了黄巾起义未竟的事业,并把黄巾起义的社会理想付诸实施。

张鲁在汉中的政权维持了三十年(公元184~215年),直到曹操平定北方以后亲自带兵来攻,才宣告结束。关于张鲁同曹操的战争及其结果,《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有以下的记载: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顙归降,(阎)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茂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

同为早期道教首领,同为农民运动领袖,张角、张鲁两人的遭遇和命运却大不相同。张角是死了之后还要被“剖棺戮尸,传首京师”。而张鲁却先领“汉宁太守”,后拜“镇南将军”,始终享受荣华富贵。而他领导的五斗米道也没遭受覆没的命运,而是随着张鲁北迁在各地传播。关于其中的原委,后来不乏探求者。

陈樱宁在《道教与养生》中说:“张鲁和张角受到待遇不同,原因在于他们的志愿不同,张角领导数十万黄巾起义军要想推翻汉朝统治,而张鲁的希望是在当时全国混乱之中维持局部的安全。”

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却认为,正是因为五斗米道“变得平和自守,可以加以容忍”,因此才没有遭受到太平道那样的厄运。

以上猜测,已经涉及农民运动的本质问题。张鲁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我们不知道他将建立的政权的具体形态,但从张鲁政权的消亡过程看,农民运动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局限性,他们夺取政权以后总是或快或慢趋向于保守和分化。尽管如此,张鲁的汉中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和自由平等的要求,其存在时间虽然不过三十年,但

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

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评论，是对张角、张鲁和黄巾农民革命运动的最好总结：

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3页）

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

张角和张鲁是农民运动领袖，又是早期道教派别的首领。他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运用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在宗教的旗帜下把广大受压迫的民众组织起来，从而产生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农民的要求。鉴于早期道教在农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早期道教的产生、发展作一些考察。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源远流长，它是吸收和融会了我们这个古老而复杂的华夏民族文化中许多成分而构成的一种宗教。早在殷周易文化诞生之际，道教思想就已孕育其中。无怪后代道教徒总要把《易经》八卦奉为经典。但道教真正成为宗教是在东汉末年。一般认为，完整的宗教必须具备组织团体、教义经典、规范礼仪、教主信徒、派别系统等方面的内容，张角开创的太平道和汉中兴盛的五斗米道，标志着早期道教的诞生。

早期道教在东汉末年的产生和兴盛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是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从东汉中期以来，东汉政权就面临着政

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危机。政治上,由于外戚和宦官相继把持朝政,争权夺利,东汉统治集团在这种权利争夺中一天天腐烂下去。两次党锢之祸,使大批正直、清廉的官吏惨遭迫害,加深了东汉的政治危机。同时,黑暗的政治局面加深了人们的痛苦,社会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形成了“百姓之冤,无所告诉”的政治局面。经济上,由于土地兼并剧烈,赋税剥削苛重,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一面是“膏田满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一面是“被穿帔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昌言·损益篇》)。再加上天灾,瘟疫流行,结果导致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处于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处于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民众,精神总要寻求寄托。早期道教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但是,道教能否担负起慰藉被压迫生灵的任务,除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以外,还取决于道教思想本身能否适应人们的现实要求。从早期道教表现的两大特征来看,它是能满足民众的现实需要的。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属于符箓派。符箓派是一种民间道教流派,与以追求仙术炼丹为特征的丹鼎派有区别,其主要特征为冥通符咒,即用符咒、神水等民间巫术为民众治病。丹鼎派道教主要在上层社会发展,符箓派道教则流行在下层社会。这是因为丹鼎派从事的炼丹术,要有钱、有闲,这不是下层民众可以问津的。而符箓派道教采用的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等方式,尽管也只是在精神上给人以慰藉,不一定能产生实际的治病效果,但还是受到处于缺医少药、贫病交加的下层民众的欢迎,因此得以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并为民众所信奉。

从早期道教的宗教追求来看,它是要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社会——财产共有共用、没有剥削压迫。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反映出来的理想社会,表述了深受剥削和压迫、处于极端困苦中的下层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寻求精神出路的愿望和追求,因此,张角才能在道教的旗帜下汇集一大批为理想而战的农民,张鲁政教合一的政权才能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早期道教是在历史必然的土壤上产生的,但它一旦产生,则又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表现为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宗教的旗帜下团聚起来,形成动摇和摧毁现存政权的历史大潮。

由于农民运动领袖利用道教组织来动员、组织民众，使道教变成了威胁现存政权的破坏力量，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统治的利益出发，就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一包含革命性的道教派别压制下去。声势浩大的太平道组织就是在反动武装力量的通力围攻下，随同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和其他统治者不同，对早期道教徒和黄巾起义军，曹操不是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而是采取镇压、攻灭和改造、利用并行的两面政策。

曹操对青州黄巾军，就采取了改造、利用的手段。他把一支持有武装又有宗教信仰的太平道徒众，改编成青州兵，成了替他个人打天下的劲旅；

曹操对张鲁的天师道及其部众，采取的是武力胁迫和爵禄引诱相结合的政策。占领汉中以后，曹操对天师道的首领们封爵行赏，以高官厚禄加以拉拢。张鲁就被“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

天师道的首领降魏是早期道教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在黄巾主力被镇压，青、徐黄巾军被招抚以后，太平道的组织形式实际已不复存在。而天师道，虽然在张鲁北归以后处于涣散状态，但由于道徒们的四处迁徙而把天师道的信仰带到了全国各地。随同张鲁北迁的天师道徒众和避乱于江南的天师道徒众，分别在南北方传播天师道，所以到西晋统一中国以后，整个道教便统归天师道。

天师道转化为官方宗教是在魏晋之际。当时，一批受当权派压制的士族上层人物，由于精神苦闷，想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因而加入了天师道的行列。这些上层人物的兴趣和追求同下层民众迥异，他们加入天师道行列，导致了这一民间宗教在组织结构和信仰内容上的变化。

在信仰内容上，他们广泛吸取儒家、佛教、玄学和神仙思想，并加以融合，改造了天师道原信仰中不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内容。

在组织结构上，他们依附权贵、积极谋求官方的支持，建立了系统的新宗教管理制度。

经过士族上层人物的改造，早期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革命性的民间宗教，转化成为保守落后的官方宗教。

从以上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道教的发展没有脱离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对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和作用作过这样的理论分析：“早期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

动”，“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起义和中世纪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的狂热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几乎用不着做太多的改动，这些理论分析就可以应用于早期道教的发展历史。东西方尽管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系统，但在宗教问题上却有惊人的一致。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也是对道教本质的揭示：“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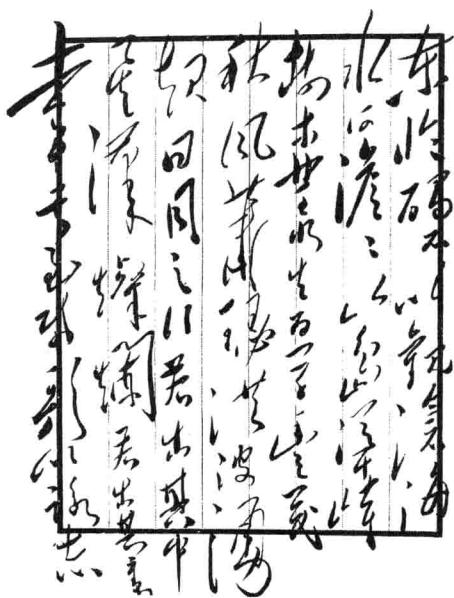
我们曾为早期道教首领、农民运动的领袖张角和张鲁的不同遭遇感到困惑，也为早期道教的革命冲刺精神与和平保守状态合一的矛盾现象感到不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分析，为我们的困惑和不解指出了理解的方向。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

兴亡几变沧桑，何处觅当年旧战场？纵壮时犹记，捉刀横槊，老来不讳，卖履分香。折戟沉沙，曲终人散，铜雀台荒伴夕阳。生平事，任村夫俗子，信口雌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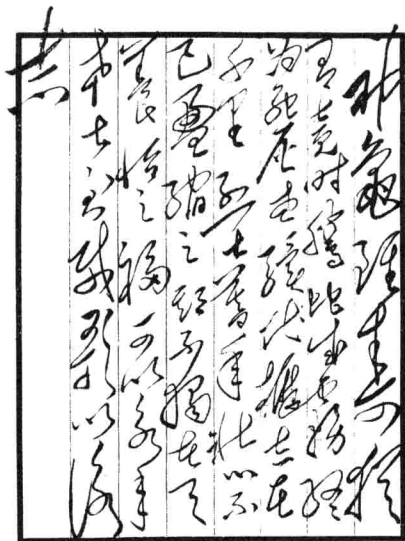
——燕垒生：《沁园春·读〈武帝纪〉》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在中国，曹操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但长期以来无论在小说或戏曲中，曹操都是作为奸佞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大致是北宋以后逐步形成的。苏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小儿尚且如此，何况大人。然而，真实的曹操并不是一个奸佞之辈，小说、戏曲都把他丑化了。其实在东汉末年豪杰蜂起、群雄割据的时代，一个能够突兀而起成为威慑四方的中原霸主的人，决非寻常之辈。一个奸佞之辈也许能短时间蒙蔽一批人，但不会有一大批人长时间地为他鞍前马后拼死效命，也不会有一大批人长时间地为他军前帐后出谋献策。从曹操周围云集的大批第一流猛将谋士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如果曹操只会搞阴谋权术而没有卓越才智，他是绝不会取得成功的。曹操的性格中确实有奸诈诡秘的成分，但也同时具备了足以让天下英雄服膺的雄才大略。正是这种由雄才大略形成的凝聚力，才造成了曹氏集团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的局面。许劭评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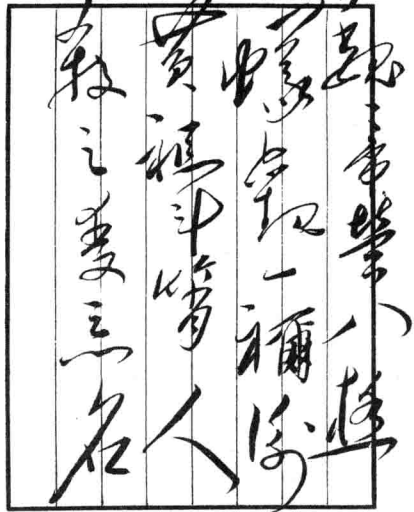
曹操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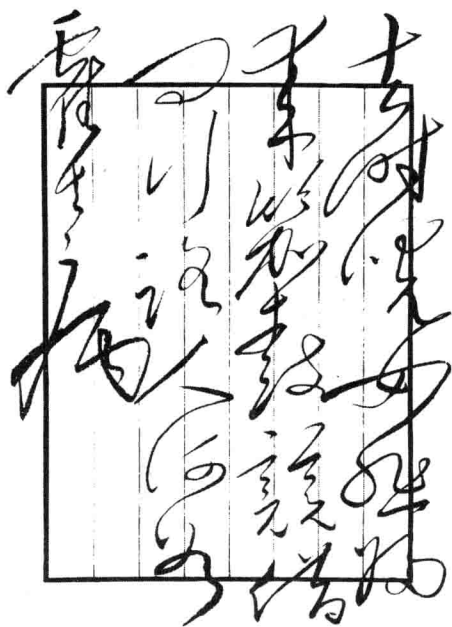
曹操 龟虽寿(之三)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李白 望鸚鵡洲怀祢衡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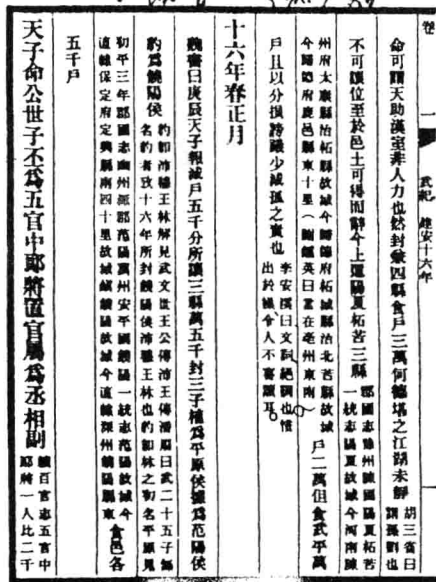
曹景宗 光华殿侍宴赋克病韵(三幅之一)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人，何如霍去病。

评价倒是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为了纠正这一历史成见,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曾展开一次为曹操翻案的讨论。这次讨论,从历史功绩的角度重新评价了曹操,应当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有人因此而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只需看他们的历史功业,从而在肯定曹操的历史业绩时,以他的雄才大略掩盖其性格中存在的奸诈诡秘,颇有点隐恶扬善的味道,这就矫枉过正了。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出发,既不能以其性格或道德的缺陷而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能以其历史功绩而掩盖他的性格或道德的缺陷。而是应当充分顾及他的功过、是非、善恶等各个方面。只有这样,人物的形象才能是真实的,人物的历史评价才能是比较全面而完整的。

曹操的性格是双重的,集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于一身。这是历史上大人物的一种典型性格,因而很值得探究。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出身官僚阶层,但并非名门望族。由于他的父亲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不被世家大族所重视。就是这么一个生于乱世的宦官之后,后来竟力挫群雄而成为叱咤风云的中原霸主。究其原因,他的性格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虽然我们不赞成这种片面的性格决定论,但性格在一定条件下,特别在关系到一个人今后命运的关键性选择时是起重要作用的。从这个观点看,正是曹操的性格影响了他一生中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正是这几次关键性的选择影响了曹操一生的命运。这可以从曹操一生中几次重大的决策来说明。



毛泽东评点《魏武帝纪》手迹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衿衡。”此为近之。

曹操与农民起义军

曹操是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军阀，但他又是靠黄巾起义军发迹的。在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前，曹操只是个世人尚“未之奇”的地方割据势力。但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后，他凭借着数以万计的青州精兵的军事实力和屯田民众的经济实力，而在政治舞台上突然崛起。在他和黄巾起义军的关系中，在收编、安置起义队伍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曹操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政治远见和高人一筹的权术谋略。

青州黄巾军是张角黄巾大起义失败之后的一支黄巾军主力，公元190年，他们乘袁绍与董卓混战之际，在东方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当时的情况是“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曹丕《典论自叙》）。到公元192年曹操与黄巾军交战于寿张（今山东阳谷西南）时，起义军有主力部队三十多万人，“数乘胜，兵皆精悍”，而曹操只有几千人，“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兵皆惧”。在双方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青州黄巾军怎么反而会去接受曹操的收编呢？

主要原因是曹操和当时参加攻灭黄巾军的其他军阀不同，他不是着眼于从肉体上消灭起义军，而是力争把起义军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即把革命的武装改变成为他个人打天下的军事力量。为此，他采取了武装威慑和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手段，频频向起义军发动和平攻势。

开始交战时，曹操“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后来经过曹操“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王沈《魏书》），黄巾军才被打退。黄巾军败退后，向曹操发出檄书，指出“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希望他们不要违背“天之大运”。而曹操却趁此机会一面“设奇伏，昼夜会战”，一面互通书信，开展“示降”攻势。到“战辄擒获”时，黄巾军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这支青州兵就成为曹操转战南北、统一北方的主力军。

降卒之精锐编为军队，其余人员和百余万口的老弱妇孺该怎么安排？

曹操真不愧为有卓识远见的大政治家。他看到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民足食”（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王沈《魏书》）。为此，他没有把编余人员和老弱妇孺看成包袱遣散了之，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力安置在许都等地的荒芜土地上屯田生产。这样，一方面编余人员和收编人员的家属得到了安排，使军队解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军队需要的粮草也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曹操之所以能“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实得益于这一屯田政策。

曹操从收编黄巾起义军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数以万计的归降队伍成了为他个人效力打天下的基本武装；编余人员和军人家属则转化为农业生产力量，变成其军队强大的经济后盾。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作出最佳的历史选择的。曹操作出的这一最佳历史选择表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的维系、生存和发展都是由这一力量决定的。然而农民的力量如同水的力量一样，在它碧波粼粼的时候，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力量，一旦出现了惊涛骇浪，人们就能从“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现实，看到它不容忽视的存在。曹操就是通过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和要求。

尽管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不可能全心全意为农民谋利益，但他与那些醉生梦死，只顾自己享乐安逸的大人物不同，他认识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引自《抑兼并令》，下同）。认识到“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一旦民不聊生，下民就会“兴兵作乱”。因此想要长治久安，必须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曹操在他掌握了东汉末年朝廷的实际权力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税赋的法令。特别是他打败袁绍之后，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是一个大规模减免农民负担的法令，深得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曾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的措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确实这些做法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曹操下令惩办触犯法令的豪族

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曹操改变了农民队伍的性质，把农民起义的革命武装改变成为他私人谋取利益的军事力量。但农民起义的本身则改变了曹操本人的思维模式，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去迎合农民的要求，从而使农民起义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偿。所以有人说曹操在历史上实际扮演了一个黄巾起义农民的遗嘱执行人角色，这一说法是有其特别意味的。虽然黄巾起义时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目标未能达到，但广大农民深切企求的耕者有其田和生活有保障的愿望，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当然广大农民的这一愿望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新的生产方式尚未从封建社会的躯壳中萌芽生成以前，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实现的，而且受传统生产方式束缚的农民，也是很难摆脱自身的局限。从历史上看，起义农民一旦掌握政权，也很难长期保持农民的本色。从起义战争中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久以后仍然要两极分化，新生的地主阶级仍然要将旧的封建枷锁套在农民的脖子上。因此，改朝换代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农民究竟能从这历史大变动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曹操的屯田制，虽然使农民失去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总算有了比较固定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又减轻了沉重的税赋负担，比起东汉末年的“户有饥色，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境遇毕竟好多了。更何况，曹操掌握政权以后颁布的一系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法令也符合人民的安居乐业的愿望。所以不管曹操是真心

巩固政权也好，假意安抚人心也罢，其客观效果就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起义农民生存斗争的需要。

曹操与汉献帝

如果说收编黄巾起义部队使曹操得到了称雄北方的军事力量，那么利用汉献帝的旗号以号召天下，则是曹操称雄北方的政治资本。在这以前，他同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等人一样，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其势力甚至还不如他们。但在这以后，他受封大将军，然后利用天子的名义收河南，抚关中，败袁术，灭吕布，接着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转折。从某种意义上可说，他正是利用了汉献帝这座阶梯，才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

曹操和汉献帝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汉献帝前后不同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他的“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

在封建社会，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东汉末年，经过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汉室相当软弱，汉献帝除了身上一件褴褛的皇袍已所剩无几。一些地方割据势力自己还想当皇帝。例如公元195年，盘踞江淮一带的袁术就公然假造图谶符命，以“应天顺命”的名义自立为皇帝。失败后，又将帝号归之占有青、冀、幽、并四州的兄长袁绍。“绍阴然之”（《三国志·魏书·袁术传》引文）。其实在这以前，袁绍已在暗地使人散布“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的政治谣言，并私刻玉玺，企图登上皇帝宝座（《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曹操却采取了同这些人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以尊奉王室的面目出现，把皇帝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利用皇帝的名义去与天下争雄。这就是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最早是由曹操的谋士毛玠等人提出来的。毛玠等人在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军的时候即跟从曹操，当时他曾向曹操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汉献帝还在长安的时候，他就多次通使长安，加强与汉献帝的联系。以后汉献帝被杨奉、韩暹劫持到洛阳时，

曹操毅然决策亲率军队急赴洛阳，把汉献帝抢到手，以后又在董昭等人的策划下把汉献帝转移到他管辖的许（今河南许昌东），并以许为都城，从而把汉献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则以辅佐皇室的身分，用汉王朝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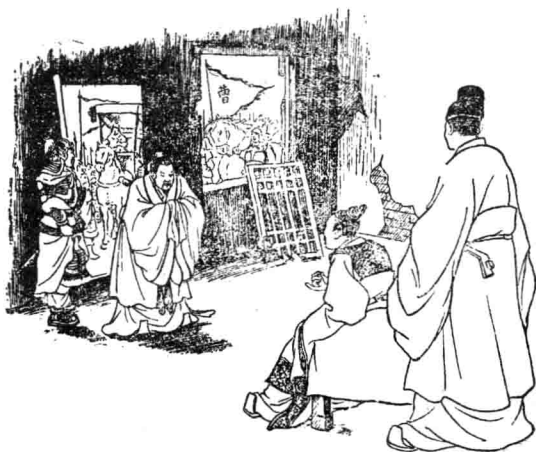
由于采取了这一策略，曹操在同自己的军事对手的争雄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汉献帝虽然在军阀混战中被迫东流西徙，无法安定，但他毕竟是皇室最高权力的象征，正如袁绍的谋士沮授指出的：“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曹操拉上天子的虎皮，就可以把不肯俯首听命于他的地方割据势力称之为“忤逆”，然后兴兵讨伐。



曹操招兵买马讨伐董卓

曹操还利用了士大夫阶层对于汉廷的传统感情，广泛招纳天下贤士豪杰，以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表明曹操政治眼光的远大。在当时与曹操集团对立的其他集团中，也有人提出相同的政治主张，但却得不到采纳和贯彻。例如袁绍集团的谋士沮授在汉献帝流亡期间就向袁绍献计，建议他迅速决策把这个宝贝天子抢到手，但袁绍却不肯听从，他只想到若把汉献帝迎到身边，“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因此，还是自己当皇帝更方



曹操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献帝

便,这种打算表现了袁绍的目光短浅、头脑简单。

曹操在处理同汉献帝的关系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能从曹魏集团的全局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实行不称帝的政策。曹操能够完成统一北方大业,是同他坚持这一政策分不开的。

曹操和那些日思夜想一心想当皇帝的地方军阀不

同,他胸有韬略,即使在权势遮天、炙手可热的情况下也能照顾全局、权衡利弊,坚持不称帝的策略。史书记载,公元220年孙权袭杀关羽之后曾上书曹操,歌功颂德,劝他称帝,曹操读罢此信说:“是儿欲据吾着炉火上邪!”(《魏略》)他不听孙权的。当时文武大臣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也劝曹操称帝:“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命,复何疑哉!”曹操还是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这就是说,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当皇帝,要把帝位留给自己的儿子。

曹操坚持不称帝,是不是真的不想当皇帝呢? 他不当皇帝并不能说明他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不逊之志”。他之所以不称帝乃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以不当皇帝比当皇帝更有利于曹魏集团。董卓叛乱,袁术称帝,袁绍刻玉玺,都遭到了全国各地军阀的声讨,成为众矢之的。自己一旦称帝,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打着天子的旗号,既可纠集匡复汉室的力量,为扫清政治上的障碍和平定天下打基础,又可避免政敌们制造口实。所以他不称帝是从统一中国、实现霸业的更大目标考虑的。他不是从一时的、局部的利益考虑问题,而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这说明他与那些狗苟蝇营、追逐一时成功的庸常之辈有着天渊之别。

曹操的迎奉天子与他坚持不称帝的做法充分说明了他的雄才大略,而

他的挟持与控制汉献帝的行为却又清楚地反映了他奸诈诡秘的性格。

很显然，曹操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的目的绝不是他所声称的为了匡复汉室，而是为了曹魏集团的利益，为了谋取天下霸主的地位。因此，称不称帝只是问题的表面，实际上他仍要独揽朝政大权，让文武百官全部臣服于他。为此目的，他要用各种手段来营建个人的绝对权威。

汉献帝虽然软弱，但毕竟是天子，忠心汉室的大有人在。因此汉献帝既是他争雄天下师出有名的旗号，也是他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障碍。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决不允许在汉献帝周围聚集起任何胆敢反对他的势力。即使是皇帝的后妃触犯了他，他也要严惩不贷。伏皇后就是因为反对他而被诛杀的。戮杀皇后，除了有向皇权挑战的意义之外，还有着杀一儆百的意思。即便是皇帝的妻室家小反对了曹操，也得不到赦免，那么谁还敢谋反作乱、不听命于他！汉献帝贵为天子，竟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室家小，这样的皇帝又是多么可怜！所以曹操这顶奸臣的帽子从此死扣在汉献帝这道环上，永远解脱不了。无论他怎样转战南北，餐风宿露，为统一大业付出多大的辛劳，封建时代的人们却不大会原谅他。曹操被历代文人唾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汉献帝的擅权专断和虐杀皇后这些因素而造成的。

曹操与人才群

三国时期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人才较量。当时每一个较大的政治军事集团里都云集着众多的战将和谋臣。每一次战争，与其说是战略战术的角斗，不如说是文武人才的较量。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没有事业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重视罗致人才，打开局面以后，仍然千方百计征集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人才都网罗进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政治家特有的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节取人的传统标准，而主张不拘一格，“惟才是举”。只要是真正有本领的人，不管其出身和品行如何，都要广泛收罗。著名的《八月令》居然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和封建道德作为选才标准的一次猛烈冲击。连宋代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司马光对他的“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以后还有个如何使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其独特的方针，这就是赵翼在《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一文中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所谓“权术相驭”，赵翼有一个很好的说明：“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札记·卷七》）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盛情待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的人才极尽礼遇之能事。曹操厚待刘备、关羽是



曹操还注意到地方上的水利兴修工程

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厚待遇远远在刘、关之上，受其恩惠的人感其知遇之恩，对他矢志不二。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计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宏气度。

例如官渡之战打扫战场

发现书信一束，皆“许下及军中”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官渡之战前曾为袁绍起草讨曹操文，攻击曹操是“赘阉遗丑”，骂了他祖宗三代。归附曹操以后，曹操告诉他：“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吓得连忙“谢罪”。此后曹操依然重用他，从未对他施加报复。这种气度，无论中外古今都是少有的。

再如张绣，同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之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同他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又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人才的恩惠、友谊、礼遇、宽大都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笼络人才，让人才为他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所用的人才对他产生了异心，那么，他非但不施恩惠，反而要加以翦除，不予宽假。

曹操智囊团的重要人物荀彧的遭遇最能说明问题。据《后汉书》记载，荀彧本是名臣之后，于汉末乱世为“以存易亡，蒙耻期全”之计，不惜自堕清誉，娶宦官之女为妻。这说明了荀彧为人颇有智术。他“弃绍从操”以后，在政治上给了曹操以重大的支持。为此，曹操与荀彧颇为相投，甚至称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的礼法教育，毕竟心属汉室，他“见汉崩乱，每怀匡佑之义”。为曹操出谋献策的目的就是为了依靠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功绩日高，权势日极，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了曹操的忌恨。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但到后来却不得不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理由，自动上表交付兵权，申请退休（《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而贾诩，“自以为非太祖明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

疑”，因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三国志·魏书·贾诩传》）。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无辱”（《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曹操对人才又使用又猜忌的态度，说明他在人才问题上实际奉行的是实用主义的用人政策。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礼遇人才，这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宏大度；但为了维护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他在处理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这一面。

曹操的实用主义的用人政策，使他在人才的识别和任用上受到了局限。如益州张松投奔刘备以前是准备归附曹操的，但当时曹操平定了北方，又得到了荆州，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对这个千里来投靠的貌不惊人的才士，既未虚心接纳，也未能存录备用。“松以此怨，归，劝刘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资治通鉴·汉纪》）。对曹操这种因骄矜而失去人才，从而失去统一益州良好时机的教训，后人给予了深刻的批评：“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

“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是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对曹操的评论。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曹操身上，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是同时并存的。

鲁迅、毛泽东评曹操

曹操是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他从公元189年起兵讨董卓，到公元220年病死洛阳，三十年间，一直为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奋斗。他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这一使命，但是他削平了北方的军阀割据；同时屯田兴农，修治水利，减征赋税，打击豪强，恢复了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他还倡导文学,发展文化事业,为“建安文学”新时代的出现作出了贡献。曹操镇压过农民起义,在军阀混战中屠过城,坑杀过降卒,还错杀过人,搞过冤案(至少被他杀害的吕伯奢全家、被他“借头平乱”的粮官、被他梦中刺杀的近侍等,都是无辜者)。对他的暴虐奸诈应当给予揭露,但却不该因此而全盘否定他。从曹操全部历史活动看,他功大于过。

在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为曹操平反的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他在1927年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

此论一出,惊世骇俗,但响应者寥寥。而毛泽东读了鲁迅这篇文章,却用粗重的笔在这段话上画了红线,表示了他的赞赏。后来毛泽东在读史中,又在曹操传记部分作了圈点和批注,主张对曹操要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西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土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读史》第60~65页,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注中对曹操有很多指责。对此,毛泽东又作了如下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视一衿衡’。此为近之。”(同上)

1975年毛泽东又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打下的基础。”（《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第313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毛泽东对曹操的文学才能亦非常欣赏。他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毛泽东尤喜爱曹操的诗，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读史》）。

鲁迅和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虽然仍然无法使人们对于曹操的看法“定于一尊”。但他们的评价，对于千百年来笼罩在道德阴影中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历史上，像曹操这样集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于一身的性格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帝王如李世民、朱元璋等，也同样具有这种性格。因此正确评价曹操，也许是正确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曹操出身小考

陈琳是三国时期一位鼎鼎大名的文人。他原来在袁绍那里做秘书，曾经奉命替袁绍起草讨曹檄文，攻击曹操是“赘阉遗丑”，骂了他祖宗三代。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赘阉是指曹嵩赘入阉官家中做儿子，遗丑指的当然就是曹操了。这个攻击应当说是恶毒的。当时已位至公侯的曹操看了这样的檄文，其愤怒是可以想见的。官渡战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批评他：“你替袁绍写檄文，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惶恐，伏地谢罪。可佩服的是曹操非但没有为此对他进行任何报复（当时曹操要报复他，那是太容易了，连开庭审判的程序都不要，即可处他死刑），反而把他收为心腹，委之以典文的重任。陈琳写出好文章，曹操就表扬他，甚至说他的文章能治愈他的头风病。这种坦荡胸怀，不要说古人中难得，就是现代社会，也是凤毛麟角，很难寻觅了。

但是陈琳对曹操“赘阉遗丑”的骂名，却千百年地传了下来，人们一想起曹操，就想到这句话；甚至一些肯定曹操的人，也为他不光彩的出身而惋惜。

于是有人就以“不唯成分论”的方法，为之辩护。前些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曹操集译注》第49页，就有这么一段文字：“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争权。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计划诛杀宦官失败，被宦官曹节等所杀。曹节是曹操的曾祖父。到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议郎后，就上书朝廷，申诉窦武、陈蕃被杀的冤屈。这说明曹操那时就已背离了他祖上所从属的最腐朽的太监集团，站在反太监的一边。这跟他初做洛阳北部尉时，就杀死太监蹇硕的叔父一样，显示出曹操年轻时已有革新政治的思想。”

其实曹操上书抨击的曹节并不是他的曾祖父，因此也不存在背离祖上（即大义灭亲）的问题。

《续汉书》是说过“腾父曹节”，但这个曹节字元伟，是个处士，沛国譙人。“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而曹操上书说的曹节，乃汉灵帝时的大宦官。此人是南阳新野人，字汉丰，因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窦武、陈蕃而执掌中枢大权者。他的年纪比曹操的祖父还小，怎么可能是曹操祖父的父亲呢？曹操的祖父处士曹节与宦官曹节两人姓名相同，但年龄、籍贯、字号、经历都不相同。他们根本就是两个人，不能因为曹操上书申诉窦武、陈蕃的冤案，而说曹操大义灭亲，背弃祖上。

处士曹节与宦官曹节是两个人，前人已有辨别。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官本考证》卢明楷云：“宦官有曹节，曹腾之父亦名节，名同耳！”《三国志》注者梁章钜，还引《艺文类聚》卷九十四，谓曹腾父萌，节、萌字形相近，因而误作。总之曹操之曾祖绝非大宦官曹节。

曹操祖父曹腾虽是宦官，但为人尚好，并非贪暴之辈。

唯一有争议的事件是汉质帝死后的立嗣问题。当时的清流主张迎立清河王刘蒜，曹腾却与大将军梁冀主张迎立蠡吾王刘志，他就是后来的汉桓帝。但当时是梁太后临朝，立汉桓帝是经她同意的，这与后来的宦官阴谋篡夺权力，不是一回事。

《后汉书·曹腾传》说：“腾用事省闕（内宫）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

川堂溪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延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本来宦官就有好有坏，勃貂救文公、景监荐商君，史游写《急就》、司马著《史记》，这些都是好宦官。曹腾的为人，虽然不及他们，但也没有做过让其子孙抬不起头的事情。

曹操的儿孙建立魏国后，追尊曹腾为高皇帝，他们似乎没有以这样的先祖为耻辱。

曹操之父曹嵩，原出夏侯氏。夏侯氏为世家大族，他们为什么把曹嵩过继给曹腾，史书无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续汉书》说：“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但《后汉书》说：曹嵩，“灵帝时贷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至太尉”。曹丕称帝时，追尊曹嵩为太皇帝。

这就是曹操上三代的情况。他的曾祖曹节(或曹萌)是个平头百姓。祖父曹腾和父亲曹嵩均属封建统治阶级成员，而且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官做得挺大。但三代人均无大恶，门第虽然没有四世三公的袁绍显赫，却也不比他们低卑多少。这三代人，曹节为人忠厚，曹腾为人温谨，曹嵩虽然有纳钱买官的行为，但他本人不是宦官，也没有参与当时宦官们的为非作歹活动。把这样的家庭出身，称之为“赘阉遗丑”，纯属政治斗争中的攻击诬蔑，不足为训。

官渡对垒话袁、曹

公元 199 至 200 年，发生在现今河南中牟县东北的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也是这个“一世之雄”一生事业中的得意之笔。这次战争为结束当时北方军阀混战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至弱对至强”，而终了却是至弱胜至强的著名战役，在军事上具有显著特色。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和一些讲话中常常提到。本文拟对曹操、袁绍官渡对垒的过程，曹、袁两人领导风格对战争的影响及其胜利、失败的历史根据和经验作一些分析。

官渡战前的北方局势

腐败的东汉政权压迫得农民无法活下去了。黄巾的英雄们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农民大起义。从公元 184 年起，前仆后继地进行了二十多年的顽强斗争，统治者对这些“叛逆者”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农民英雄同一部分压迫他们的封建官员和地主老爷同归于尽了。他们以自己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为自己阶级的尚存者争得了较好的生存条件。

宦官和外戚交替擅权的黑暗政治，在这次农民起义中被摧毁了，但同时，东汉的中央政权也变成了没有力量的空架子。从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

的封建军阀，乘中央政权衰败的时机，各自依靠自己手中的兵力，割据地方，中国又由封建统一的局面转入分裂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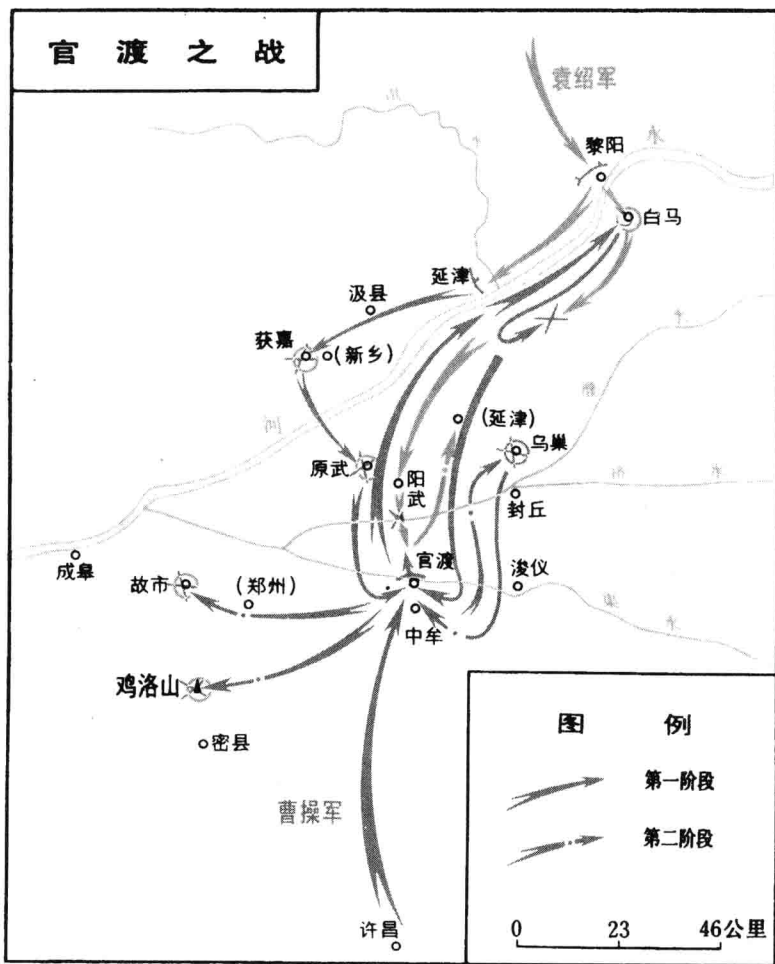
到公元2世纪末，封建军阀割据中国的情况，大体如下：

公孙度，割据辽东(今辽宁东部地区)

公孙瓒，割据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地区)

吕布，割据徐州(今山东南部及苏北、淮北等地区)

袁绍，割据冀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并州(今山西大部及陕西北部等地区)、青州(今山东东北部地区)



袁术，割据扬州北部（今长江、淮河下游地区）

张绣，割据宛城地区（今河南南阳一带）

曹操，割据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北部地区），公元196年迎汉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扩大了割据地区

刘表，割据荆州（今河南南部和湖南、湖北等地区）

刘焉，割据益州（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

孙策，割据扬州南部，含江南吴、会稽等六郡（今江苏、安徽南部及浙江、江西地区）

马超、韩遂，割据凉州（今甘肃、宁夏、青海各一部分地区）

张鲁，割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这些割据的军阀中除了暴发的武夫如吕布、张绣等人以外，大多数都是豪强地主。

公元198年曹操擒杀吕布，占徐州；199年破袁术、张绣，占据扬州大部及宛城地区。同年袁绍破公孙瓒占幽州。

这样，到官渡之战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包括淮河流域）基本上只剩下曹操和袁绍两大封建集团，这两大集团为争夺北方地区的统治权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争斗。

曹操在这场争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 他占领的地区比袁绍小。袁绍占据的是现今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的大部和山东、河南的一部分；曹操占领的主要是现今河南、陕西及山东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新近得到的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

2. 人力、物力资源比袁绍少。特别是粮食供应，袁绍要比曹操好。

3. 军队数量比袁绍少。袁绍



曹军利用空闲时间开垦荒地

的军队十多万人；曹操的军队一万多人，是绝对劣势。^①

但是，曹操也有优越于袁绍的地方：

1. 他的军队组成比较精锐，其主力是由青州农民起义军改编的精壮农民，曹操对他们态度较好，这些人打起仗来很勇敢；而袁绍的军队还是那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官方部队，老一套作风，衰朽腐败，缺乏战斗力。

2. 曹操的手中有一个傀儡天子。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汉天子在当时全国各级政权中，包括袁绍割据的地区，都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3. 曹操的内部——包括统帅与智囊团，统帅与军事将领之间，团结情况较好；袁绍的内部则离心离德。

官渡对垒的进程

官渡之战的进程，可以分为四个段落：

成功的两面作战

战争从公元199年开始，袁绍在吞并幽州以后立即组织十万大军南下讨伐曹操，曹操在官渡组织抵抗。双方尚未正式开战，曹操的阵线就出现了麻烦。麻烦不是出在正面战场，而是出在侧翼。

原来曹操击破袁术以后，袁术曾想率领残部北上同袁绍会合。曹操让当时依附他的刘备带领兵马前去伏击，刘备就乘这个机会占领了徐州，举兵反曹，并派人同袁绍联系。与此同时，临时首都发生董承等组织衣带密诏图谋反曹的活动，也同刘备有关。曹操派猛将刘岱、王忠前去打刘备，却被刘

^① 曹操官渡之战时的兵力，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篇的记载，是“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但是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确。他说曹操初起兵时“已有众五千”，后来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虽然在历次征战中有所损伤，可是在官渡之战时仍然不会减少到不满万人。

裴松之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固然曹操并没有把黄巾的“三十万降卒”全部改编为自己的部队，但是改编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说，曹操征讨吕布时，兵力已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虽然是荀彧夸张自己力量的一种说法，但是它表明曹操当时的兵力已经不小，据此，官渡之战时，曹操的兵力肯定不止万人。

又据近人从各种资料推算，官渡之战时曹操的兵力大致为四万人，毛泽东也认为官渡之战时曹操兵力为四万。这个数字或许较为符合实际。按这个数字，在袁、曹兵力对比上，曹操仍然处于劣势。本文有关官渡之战战局进程的分析，主要是根据《武帝纪》写的，所以关于各次作战兵力的数目，仍采用《武帝纪》的说法。

备打败。由于刘备占据了徐州，曹操在官渡战场就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

公元200年，即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杀了董承以后，就同部下计议东征刘备。因为两面作战是兵家所忌，他的部将都不赞成。他们说：“现在与我们争天下的是袁绍，袁绍南下，我们却去东征，他要是抄我们的后路，怎么办？”曹操说：“刘备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现在不乘他站立未稳的时候击破他，将来必定后患无穷。袁绍虽然野心很大，但是此人遇事迟钝，行动缓慢，在我们东征期间，他不会袭击我们。”曹操的谋士郭嘉赞同曹操的意见。

处于劣势的军队，两面分兵作战，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曹操摸准了袁绍遇事迟钝、行动缓慢的特点，迅速从官渡战场抽调兵力东征刘备。这一次，他的两面作战却行得通了。他只用了一个月功夫，就打败了刘备，拿获了刘备的家属，刘备逃到了袁绍那里。接着，曹操又向关羽驻守的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进攻，俘虏了关羽。东线战罢，回师官渡，袁绍还懵懵懂懂地待在自己的家里，根本没打算去抄袭他的后路。触犯兵家所忌的两面作战竟在曹操手中变成了兵家所利，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次东征的胜利，使曹操巩固了自己的右翼战线，为顺利地进行官渡之战，清除了障碍。

解白马之围

公元200年，即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要名士陈琳写了讨曹檄文，传布天下。接着，派大将颜良等向曹操的东郡太守刘延驻守的白马（在今河南滑县东）进攻。刘延一面抵抗，一面向曹操告急。

四月，袁绍亲率大军为颜良后援。他沿黄河北岸向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进发。黎阳位于黄河白马津渡口的北岸，袁绍兵抵黎阳后，打算从这里渡过黄河，去同颜良会师。

白马的形势危急。为解救白马，曹操也亲率大军沿黄河南岸向白马前进。

军事的态势对曹操不利。袁绍加颜良的兵力与曹操相比是绝对优势。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同敌人作战，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怎样减杀敌人的优势，以求战争的胜利呢？曹操同他的智囊团的谋士荀攸等人计议，决定采取制造假象的办法把袁绍的兵力引开。引开了袁绍的兵力，敌人的拳头就合拢不起来了，优势也就没有了。

曹操把自己的军队领到延津（今河南延津东北），这个地方是古代行军



曹操诱敌上钩，命骑兵卸下马鞍放马，又将辎重车辆杂乱地停放在路上

作战常常要经过的重要渡口，位置在袁绍所在黎阳以西。然后，做出要在这里渡河，以向袁绍军队的后方实行袭击的姿态，其目的是引动袁绍的军队西向，离开白马战场，以利于曹操集中自己的兵力去攻打围攻白马的颜良。

曹操这个声东击西（其实是声西击东）的巧妙计策果然成功。袁绍一听曹操要在他西面渡河袭击他的后路，就决定分兵西向，在袁绍慢腾腾地分兵西向的时候，曹操却立即引军急趋白马。曹操的奇兵突然出现在白马战场，使颜良大为吃惊，他急忙出来迎战。曹操使张辽、关羽为先锋向颜良发动进攻，关羽率军奔向颜良的麾盖，策马直趋颜良，于万军丛中，斩下了颜良的首级。张辽驱兵掩杀，击破了袁军。白马之围解除。

白马之围解除以后，曹操引军沿黄河南岸西还。上了当的袁绍气坏了，就指挥大军渡过黄河来追赶曹操。曹操又在延津南面的南阪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漂亮的后卫战。他用辎重去引诱敌人的追击部队，在敌人的追击部队乱抢东西的时候，突然纵使骑兵上马向敌群发动袭击，把袁绍的追击部队打得大败，袁军著名骑兵将领文丑在这次战斗中丧生。

曹操在白马之役中，两次大败敌人，斩颜良、诛文丑，威风大振。

进还是退？困难的抉择

白马之役以后，曹操还军官渡，袁绍进驻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八月，袁绍的军队向前推进，东西连营数十里，不断向曹军发动袭击。

曹操分兵抵御，仗打得不好。当时，因为几次战争的消耗，曹操的兵力已不到一万，其中的伤员又占百分之二三十，形势很困难。袁绍利用曹操的困难，集中自己的兵力，再次进军至官渡，向曹操军队营垒发动进攻。

曹军坚守营垒，袁绍就在曹军的营垒前筑土山，挖地洞，曹操也在营垒内采取相应的抵御措施。袁绍叫士兵不断向曹军的营垒内放箭，箭矢如雨点般地下来，连走路都得蒙着盾甲。最困难的是粮食日渐减少，军粮供应紧张，战士中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群情动荡。由于军队粮食供应紧张，曹操只好在管辖区内加重赋税，老百姓负担不了，不少人逃到袁绍一边去了。

曹操愁极了，同他的谋士们商议，想撤回许都，谋士贾诩等人鼓励他坚决同袁绍作战，但是他仍然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是进？还是退？总是定不下来。这真是一个困难的抉择。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曹操写信给他驻守许都的谋士荀彧征求意见。为了进退的考虑，他听了身边智囊团的意见还不够，还要长途寄书向远方的一个谋士求教。这件事，除了说明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苦斗时进退抉择的困难以外，也说明了曹操在考虑重大决策时，善于集中自己集团中一切优秀头脑的智慧的良好作风。这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所以能避免犯错误，并最终夺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彧没有辜负最高统帅的期望。他回信曹操说：“袁绍集中了人马要去官渡与公决一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如果不能想法打败他，就必然要被他打败。现在到了历史决定性的关头了，不能动摇退缩。况且，袁绍不过是个庸人中的雄杰，他能聚合人众，但不会使用。以公的神武明哲而又名正言顺，怎么会对付不了他呢？”

曹操从荀彧的回信中，看清了形势和前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他知道自己与袁绍已经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刻，除了决战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一切犹豫都无济于事了，他决心克服困难，斗争到底，不再退缩不前。

这个决心下定之后，曹操改变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以求转变自己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当时袁绍数千辆运粮车到达官渡地区，曹操采纳谋士荀攸的计策，派将军徐晃等乘其轻敌无备，轻骑偷袭，烧毁了袁绍的运粮车，大获胜利。这样

又打了好久,虽然每战都有收获,但是兵少粮竭的矛盾仍然不能解决,士兵疲乏不堪,各方面的困难逐渐加大。一次,曹操看到运粮人员劳顿困累的样子,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再辛苦半个月吧,那时打败了袁绍,就不再劳累你们了。这个话反映了曹操已经知道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在近期内击破敌人,否则光粮食问题也能把部队拖垮,可是在兵力这么少的情况下,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袁绍呢?

许攸献计被采纳,决战中的一往无前

在曹操困难的时候,袁绍方面也处在困难之中。

首先,从曹操改变消极防御方针以来,他的军队不断地打败仗,这就使他本来已经离心离德、缺乏战斗力的军队战斗意志更加消沉。

其次,他的后勤供应也有困难。他的军队是一支十万多人的庞大队伍,粮草衣被的需要量浩大,而他的后方却比曹操还远,长途运输比曹操方面更加费力。特别是不久以前,他的运输大队遭到徐晃的袭击,数千辆运粮车被烧毁,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操的困难增大的时候,袁绍的困难也在增大,所以曹操仍有在战争中战胜袁绍的可能。只要曹操再坚持努力一下,只要他能给战争以正确的指导,或者多打几个胜仗,或者打一个关键性的胜仗,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就会发生急遽变化,曹操的被动即可化为主动,劣势即可化为优势,战争的胜利就可以赢得。

曹操的真正困难是不了解敌方的确实情况。军事的主动权是从正确的军事部署中产生的,而正确的军事部署来源于正确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不了解敌方情况,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军事部署,也就夺取不了军事的主动权。他上次的计议撤退许都,就是因为他只看到了自己的困难,而看不到敌人的困难。撤退是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军队为恢复自己的主动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总是有效的方法。尤其在袁绍集中全部兵力,倾国远来、势在必斗的情况下,曹操军队的撤退工作组织得稍差一点,就会一败涂地,甚至全军覆没。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彧之所以坚决不让他撤退,道理就在这里。

在昏沉的黑夜中,一道胜利的光芒,突然射进了曹操的军营。

十月的一天,从袁绍的沉船上跑出来一只“老鼠”。这只“老鼠”叫许攸,

原是袁绍智囊团中的人物，是一个参与袁绍军机大事、十分了解袁绍底细的人。袁绍既不能用他，又不能满足他十分爱财、贪得无厌的要求。他对袁绍不满，又看出了袁绍军队败亡的征象，加上因为自己家属犯法被收押，于是就在深夜离开袁绍，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许攸深夜来投，大为高兴，光着脚跑出门来迎接。果然，这只“老鼠”帮助曹操了解了袁绍军内的一切情况，许攸向曹操进献了一个连夜袭击袁绍粮队的重要计策。

关于许攸夜奔曹营的事，《三国演义》的作者写了许攸问粮一章。这是一段被人广泛引用的故事。说的是许攸在投奔曹操以前，在袁绍军中看到了一件报告曹操军粮已尽的紧急文书，因此到了曹营就故意问曹操“军粮尚有几何”，曹操说“可支一年”，再问时，又说“可支半年”，三问时，说“可支三个月”，四问时，说只能应付一个月了。于是许攸大声说：“休得瞒我，你们营中粮已尽矣！”等等。这个故事，虽然在《曹瞒传》中有些片断记叙，但多半还是小说家言。许攸是了解袁军情况的，但他对曹军的底细未必很清楚。像他这样



曹操迎许攸

急功近利的人，要是知道曹操粮尽，未必就肯来投。但是，许攸献计，建议曹操袭击袁军粮队，这是历史事实。曹操经过许攸的情况介绍了解了袁军的情况，从而在战争的种种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中找出了条理、光明和准确性，这也是历史事实。总之，许攸的夜奔曹营，对官渡之战起的作用很大，他确实为曹操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打开了大门。

许攸说，袁绍为解决军队的粮食困难，正在派人运粮，现在有一万辆辎重车已经到达大营北面四十里的故市、鸟巢，有淳于琼等五个将领率军一万余人护卫，但防守不严密。他献计曹操即用轻兵急击勿失。

曹操左右有人害怕上当，对这个建议表示疑惑。曹操同他的智囊荀攸、贾诩等人研究了许攸的谈话，他们认为许攸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建议是可行的。于是，曹操当机立断，决定抓住这个极有利的战机，立即出兵袭击袁

绍的粮队。

曹操知道这是一个关系战争全局成败的战斗。因为只要打赢这一仗，歼灭了淳于琼的军队，袁绍粮食无着，袁军就会全军慌乱，他就可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打垮袁绍。他紧急动员了步骑五千人，亲自率领他们连夜向袁绍大营北面的故市、乌巢急奔而去。

五千步骑同敌人的一万多护粮部队比较，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除了必要的留守部队和伤病员外，这是他所能动员的最大力量了。

胜利是有把握的。

第一，这是出于敌人意料之外的奇袭，有战斗准备的部队出其不意地向无战斗准备的部队进攻，本身就占据了优势。

第二，敌人的运粮大队在行进中无法建立坚固的防守阵地。

第三，敌人虽有一万多人，但因为要防守粮食，实际能战斗的人数不那么多。五千步骑集中起来打击一个庞大的运粮队，是指到哪打到哪，而护粮部队却首尾不能相顾。这种态势对实行袭击的曹军非常有利。袭击是能够成功的。

第四，淳于琼的军队在白马战役中曾被曹操的军队打败过，曹军对于他们有一种威慑力量。

第五，曹军有徐晃等袭击敌人运粮队的作战经验。

第六，袁绍大营离运粮队有四十里，从他们得到运粮队遭袭击的消息，到组织轻骑相救，至少也得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援兵不能及时赶到。

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天明的时刻，曹操的轻骑部队突然出现在淳于琼的面前。许攸所提供的情报果然不假，淳于琼的护粮部队是有一万多人。他们看见曹操带领的人马不多，就跑出营门迎战。曹操指挥人马向敌人猛烈袭击，淳于琼抵挡不住，又退回营地死守。曹操指挥



曹操亲自率领骑兵，打着袁军旗号，向袁绍的粮囤——乌巢进发

人马继续猛攻。袁绍得了消息，派遣轻骑救援，曹操的左右说，敌人的援兵快来了，应当分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曹操大怒，斥责道：等敌人到了背后再来报告。军队为自己统帅一往无前的精神所鼓舞，奋勇同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没等袁绍的援军到达，护粮部队的营地就被攻破，淳于琼被斩，曹操大获全胜。

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他的运粮队的消息后，除了急派轻骑奔往援救处，还派张郃、高览等率主力部队去攻打曹操的老营。他同他儿子袁谭说：“他来打我们的运粮队，我们去打他的营地，使他无家可归。”他这个计划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战局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淳于琼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张郃、高览军中，袁军军心动摇，同袁绍矛盾重重的将领不愿继续同曹操作战，便率军投降。结果袁绍的计划两头都落了空。

张郃、高览率领袁军主力的来降，使曹操喜出望外。淳于琼军队的覆没，必然会引起袁军的连锁反应，促进战争胜利的到来，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反应来得这样大、胜利来得这样快，这大概是曹操所没有想到的。他马上决定乘胜向袁军大营进攻。袁绍的人众听说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投降，皆无心战斗，纷纷逃散。袁绍父子也心慌意乱，他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即抛弃了大营中的一切，仓皇渡过黄河，向北方逃命。曹操闻说袁绍父子逃命，就派人急追，但没能追上。

曹操俘获了袁绍的人马，收拾了袁绍丢下的粮草辎重、图书文册、珍宝玩物。冀州的一些郡县听说袁绍兵败，也纷纷向曹操投降。官渡之战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在收缴的图书文册中有一部分是他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方面的书信，这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时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活动的见证。出人意料的是曹操竟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他这样做，对他和他的集团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官渡决战以前，曹操方面的困难大极了，深谙人情世故并对统治阶层人物本质极为了解的曹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阵营中一部分人动摇，甚至谋叛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胜利了，若不宽大为怀，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这些人由于害怕报复、追究，必然四处逃亡，这对他和他的集团是很不利的。

果然，他把这些书信当众焚烧以后，人心安定，政治效果很好。有人说，像曹操这种人，得到一批这样的文书，不先看过就烧掉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很难确切考证，也许他事先看了一下，也许他后来的无端杀人，就同这批书信有关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当众焚烧这批书信，作为一种安定人心的政治措施，对他和他的集团仍然是正确的。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的历史根据

官渡之战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统治权力的争斗。曹操和袁绍都是由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袁绍是四世三公的大地主，曹操也是家财富饶的官宦之后，但是他的社会地位远不及袁绍。黄巾英雄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者。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起义失败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却在农民革命斗争中受到了重创。他们收拾残局以后，无法再按照过去的统治办法继续统治农民了。许多残酷剥削农民的豪强地主和封建官吏被起义的农民扫荡了，农民也死亡惨重，因此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土地无人经营和劳力匮乏的情况。《三国志·魏书》说，战乱之后，人民流离，土地荒芜，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水生植物和蚌螺），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这种情况，也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学到了一点东西，他们初步认识到，即使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剥削收入，也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他们愿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农民达成新的协议，以提高农民对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曹操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根据汉高祖刘邦“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思想，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从公元196年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实行屯田办法，他指示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魏书》）他实行的屯田办法是让农民耕种官田，收入按六四或五五分成，即借官牛的农民，收入按官六、民四分，不借官牛的农民，收入官民各半。这些办法对于农民当然仍然是剥削，但比起以前豪强地主无限制地盘剥农民的徒附制度却是好得多了，农民欢迎这个新办法，劳动积极性增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屯田的当年，曹操就在临时首都附近的

许下地区得到谷米百万斛。官渡之战时，尽管由于军粮紧张，加重了赋税，而弄得“四方瓦解，远近观望”，但是实行了三年多屯田制度的颍川郡（今河南省许昌、登封、尉氏、临颖、舞阳、郟县等市县地，是曹操统治地区的中心）的农民仍然“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努力支持曹操。

与此相反的是豪强地主中的保守者，他们在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之后，被自己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能从这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中学到任何一点东西，他们愚蠢地以为既然农民起义失败了，那么一切都可以照旧统治下去。袁绍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曹操打败袁绍以后，曾经以“河北罹袁氏之难”，下令免河北地区一年租赋。他在《免租令》中攻击袁绍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徭鬻家财，不足应命。”这里说的情况，符合袁绍统治地区的实际。

对于这两种代表不同倾向的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农民并不是抱无所谓的态度。尽管曹操和袁绍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尽管他们的争斗属于老爷们的内部事务，但是农民对于争斗的双方的态度仍有好恶之分。

形象地说是这样：

失败了了的农民革命给他们的死对头曹操、袁绍等人留下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说，必须要给我们的同志以较好的生存条件，否则我们仍要拼死斗争，打击你们！

曹操说，好，好吧，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吧，对土地的收获，我们两家四六分成或者对半分成，怎么样？

袁绍说，不，不行，一切照旧，我是胜利者，土地的绝大部分收获都得归我，你们的生活我不管，否则我就要杀人！

那么农民是愿意听谁的呢？在他们不得不回到原来生活道路的时候，他们愿意到哪一家去呢？在这两大封建集团的斗争中，他们愿意支持谁呢？

千百年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生活真理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听曹操的吧，到他家去干活吧，支持他一下吧。事实也正是这样。这也就是曹操能收拢起青州农民起义军，并以此为基础，从一个地方小军阀慢慢发展壮大，终于翦灭群雄、平定北方的根本原因。

其次，还有一个战乱问题。黄巾起义打击了东汉的中央政权，使它名存实亡，但是农民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哪怕是刘邦式的向封建统治阶级转化的新政权也没能建立起来。于是，大小军阀们为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互相争夺起来，战祸连年，特别是黄河流域竟然成了军阀们屠杀人民的大屠场。惨遭杀害的人民有十万余口，关中地区在董卓余部的混战中，人民死亡殆尽，两汉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财富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民迫切要求结束这种残暴的战乱局面。怎样结束呢？只有谋求统一，特别是战祸最烈的北方，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更大。而当时有力量统一北方的只有袁绍和曹操，农民既然觉得曹操比袁绍好一点，就愿意支持他来统一北方的使命。

在这种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即在能使人民获得较好生产、生活条件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曹胜、袁败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的根据，其根本原因，也要从这个历史条件中去考察。

单纯从军事态势、兵力对比的情况看，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并不具备夺取战争胜利的条件。但是曹操最后毕竟胜利了，其根据何在呢？根据就是上面说的，在这场战争中，人民比较支持曹操，不支持袁绍。

人民的这种意志，曲折地表现为战场上士兵的士气。袁绍的十万人打不过曹操的一万多人，其原因就是他的军队士气不振。老一套的军队、老一套的作风，这些大多数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为什么要去努力作战呢？而在曹操那里，那些从青州起义农民改编而成的主力部队，尽管没有起义时那样兴高采烈了，但是总还是剩下一点改善生活的希望。当然，这点改善生活的希望实际上是农民自己，特别是那些死去的农民革命者斗争、牺牲的结果，而不是哪个英雄豪杰的恩赐和让步，但总还是一种希望。为了这点改善生活的希望不被四世三公的袁绍夺走，他们愿意积极同袁绍作战。为什么在官渡之战中袁绍的军队一打就散呢？为什么曹操的军队不易打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这一个。

旧的史书总是说曹操和他的将领、谋士们在官渡之战中是怎样英明、机智、勇敢，我们不否认曹操和他的将领、谋士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人民的支持、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仅是战争胜利的现实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还要有战争的指挥者、组织者的努力，曹操和他的将领、谋士们就是这种战争的指挥者、组织者，没有他们的组织、指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赞成片面夸大这种作用。我们认为在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占第一位的因素，还是战争双方数量广大的士兵，还是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只要有了人民和士兵的积极性，就有了战争胜利的现实可能性，战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今天没有，明天还会有，这里没有，那里还会有；但是要是缺少了人民和士兵的积极性，要是没有了战争胜利的现实可能性，那么无论多大的天才军事家，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我们从以后的赤壁之战中就可以看到，同样的统帅，同样的将领，同样的谋士，在人民所不支持、士兵不积极的战争中，竟然个个被打得像落汤鸡，他们的英明、机智和勇敢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就是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方面尽管其战争指挥有错误，但他们的一些将领作战还是非常勇敢的，颜良、文丑、淳于琼都是战斗到最后而死的，但是独木不能支撑大厦，没有了士兵的积极性，他们的仗总是打不好。由此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人在一场大的战争中起的作用总归是有限的。战争是人群集体的肉搏，人民和士兵是战争行动的主体，他们才是战争命运最后的、真正的决定者。只有在这个条件大体具备的基础上，军事统帅、将领和谋士才能在战争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他们精彩的节目。

官渡之战反映出的几个战争规律性问题

官渡之战通过其复杂、曲折的战争进程，揭示了几个战争规律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军事学上是有探讨价值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是古代兵家孙子总结的一条重要战争规律。我们在官渡之战中又一次地通过战争的实例，看到了这条军事科学真理的威力。

官渡之战，曹操之所以能以“至弱对至强”，而终于取胜，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民态度和士兵积极性的基础性条件外，主要是由于战争指挥的正确，而



战争指挥所以正确，是由于这种指挥符合了双方的客观实际。东征刘备，他把兵家所忌的两面作战变成了兵家所利，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主要一条就是抓住了袁绍遇事迟钝、行动迟缓的特点；白马之役，他声东击西，分散了敌人的优势，也是由于掌握了袁绍胆小怕事的特点，袁绍如果分秒必争地强渡黄河，同颜良会师，曹操未必能在白马之役中打胜仗。特别在最后的决战中，由于许攸的到来，曹操摸清了袁绍的底牌，看准了袁绍的薄弱环节，才能作出一举战胜袁军的决策，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孙子总结的这条战争规律的真理。

这条战争规律的真理。

战争力量优势和劣势的变化同兵力的运用关系极大

战争力量的优势与劣势不仅表现为兵力的大小和军队素质的高低，它也表现为兵力的如何运用。兵力的大小和军队素质的高低，固然是战争力量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但是，优势的力量不会运用，便不成其为优势，相反的，劣势力量而善于运用，也可以逐渐转变其劣势地位。

善于运用兵力的人，一个兵能当两三个用；不善于运用兵力的人，一个兵顶不了半个用。以资金的使用为比喻，一个人把一万元钱在一年内周转了十次，等于有了十万元钱；另一个人把十万元钱在一年内周转了十分之一次，只等于有一万元钱。兵力运用的道理同这个相仿，善于运用兵力的人，兵少而实多；不善于运用兵力的人，兵多而实少。当然，军队是活动的人群，它有一个疲劳问题，因此在两战之间，善于抓紧时间休整部队，也是兵力运用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官渡之战中，我们看到了曹操善于充分运用自己兵力的许多好例。他的一万人马，在东征中，既打了刘备，又防卫了袁绍。一个兵当了两三个用；白马之役中，他的人马先用来在延津诱敌，接着又急趋白马作战，在返回的路上又打了文丑，也是一个兵当了两三个用；在最后决战中，五千人马，北打淳于琼的护粮部队，南打袁军大营，也是一个兵当了两三个用。而袁绍

呢？在曹操东征、后路空虚的情况下，他的十万人马基本没动窝，一个兵顶不了半个用；白马之役中，上当受骗，被敌人牵住鼻子来回折腾，形同疲劳游行，后头打了一个追击战还失败了，也是一个兵没顶半个用；最后决战中，他的主力部队放弃了曹操的主力不去打，等于没起作用。荀彧说，袁绍是庸人中的雄杰，只会集聚人众，而不会运用。这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

决战的时刻要一往无前，绝不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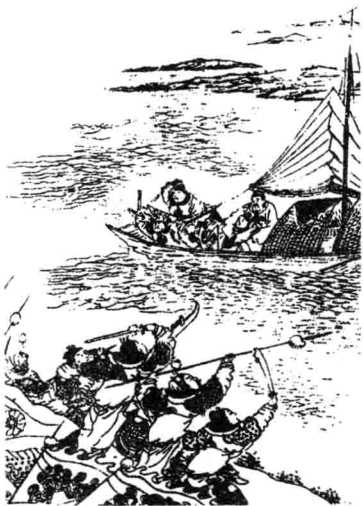
我们在历代史书和有关文艺作品中，常常看到曹操性格犹疑的说法。说这个人疑心多、反复多，处理事情犹犹豫豫，同个老狐狸差不多。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至少我们在官渡之战中看到的魏武，并不是这种面貌。

官渡之战中的曹操是多谋的，但同时，他又是善断的。有时在决策战略的大问题上表现得很犹豫，但是确定之后，却又很果敢。在官渡之战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甚至看到了他一往无前毫无犹疑的性格。这时他一点也不反复，一点也不退缩。在决战的进行中，他的左右害怕袁绍的援军到来，要求分兵抵御。这个建议受到了他严厉的斥责。为什么？因为战斗已经到了生死的紧要关头了，曹操的士兵不比淳于琼的多，分兵势必减弱进攻能力、拖延解决战斗的时间，弄不好，甚至会全盘失败。这种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关键，只要尽快打垮淳于琼，就是袁绍的援兵来了，也没有关系；而拖延时间，打不下淳于琼，敌人的援兵一到，两面夹击，就是分兵抵御也很困难。而且根据一般推算，从曹操向淳于琼发起攻击到袁绍的援兵来临，有一个时辰的间隔，敌人援兵未到跟前就分兵，等于白白浪费自己的战斗力，减少自己战斗胜利的可能性。

王沈在《魏书》中，对于曹操的评论，满纸都是溢美之词，叫人看了生厌。但是他说曹操平时作战，“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及到决战时机，却“气势盈溢”，一往无前，务期必克。这个说法，倒是反映了曹操战斗作风上的一个特点。

是的，在决战的关头，胜利就有了一切，失败就失去了一切。这时候必须一往无前，一点犹疑不得，一点退缩不得。曹操性格的这一方面，是任何一个想夺取战争胜利的军事统帅和指挥员所必须具有的。到决战的关头了，你还犹犹豫豫、动动摇摇，前怕狼后怕虎，那怎么行？决战的时刻，必须

坚决、彻底、迅猛、果敢。要像过河卒子那样，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切都要豁出去，拼命地决死战斗。只有这样，才能有胜利的希望。历史上有多少军事家、多少战斗部队在兵力相当甚至还占优势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结果却失败了。究其原因，常常是因为他们在决战中缺少殊死战斗、一往无前的精神。



军队的后勤供应特别是粮食问题的尖锐性

官渡之战双方的困难都尖锐地表现在粮食供应问题上，这个情况再一次说明了一个古老的军事原理的正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徐晃对袁绍运粮队的第一次轻袭是曹军由相持中的被动转入主动的开始，曹操对袁绍运粮队的第二次轻袭则引起了袁军全军的混乱，直接导致了袁绍集团的全面崩溃。粮食问题作为影响全军成败的因素，在官渡之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智囊团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多谋善断问题

战争是一种生死存亡的斗争，由于斗争的严酷性，它的参加者必然要在斗争中发挥其最大的能动性，所以战争从它诞生之时起，就成了人类本身各种活动中最复杂的一种活动。

这里面有欺骗，有假象，有隐秘，有伪装，有阴谋，有诡计，有丑恶，有污秽……它错综复杂，混乱不堪，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难捉摸，更难体察，更难认识，更难对付。在人类还没有可能消灭战争这个怪物之前，这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不管战争这个怪物多么混乱、多么复杂，它总还是世界上的一种物质运动，只要是物质运动，它总是有规律可循。就说复杂吧，它有复杂的现象，混乱吧，它有混乱的规律。还有头绪，有征兆，有前后事件，有左右联系……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加以比较、思索，它还是可以认识的，还是可以对付的。

问题是要有艰苦的调查研究，要有艰苦的思维活动，要发挥极大的主观

能动力。

战争是面对面地武力搏斗,但是这种武力搏斗是在很高级的思维活动的指导下进行的,有形的、以武力斗争形式出现的战争,总是从无形的、以非武力形式出现的智力斗争开始。而这种无形的、非武力形式的智力斗争常常不是军事统帅或军事指挥员一个人可以胜任的。一个人的本事无论多么大,天分无论多么高,他的智力总是有限的。要认识复杂的斗争现象,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需要集中众人的智慧,特别是需要集中自己队伍中一切优秀人才的智慧。在古代,集中自己队伍中优秀人才智慧的办法是运用智囊团,就是运用组织在军事统帅或军事指挥者周围的谋士集团。战争的指导者能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达到胜利的彼岸,往往同能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智囊团有直接的关系。

正确运用智囊团的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比较各种不同的战斗方案。既听取正面的意见,考虑正面的方案;也听取反面的意见,考虑反面的方案。既听取同于自己的意见,考虑同于自己的方案;也听取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考虑不同于自己的方案。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考虑不同于自己的方案,以纠正自己的错误,或补充自己的不足。

但是仅仅多谋还不行,还要善断。一个军事统帅或一个军事指挥者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比较了各种不同方案之后,还要善于迅速作出正确决断。不谋而断、少谋而断不行,但是谋而不断、断而不善也不行。战争是世间一种发展速度迅快的事物。慢慢腾腾,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作不了决断是无法适应战争本身需要的。主观臆断,一意孤行,要打败仗;拖延迟缓,优柔寡断,也要打败仗。

官渡之战的胜利者曹操所以能打胜仗就是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智囊团,在战争问题的处理上能够做到多谋善断。他的多谋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一些重要决策,几乎没有一条不是与自己的智囊团反复商量的结果,尤其在进行最困难的进退抉择时,他不仅同身边的谋士商量,还要长途寄书去同远方的荀彧商量,尽量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次进退的抉择,若不是荀彧长途回书,坚定他的胜利信心,他就有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但他又是善断的,在决定战争命运的关键时刻,他都能毅然决然地及时下决心,作出果断

的决定。从战争开始的决策东征，到许攸献计，最后决战，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这种善于决断的能力。

官渡之战的失败者袁绍呢？他阵营中足智多谋的人才很多，例如沮授、田丰都是当时谋士中第一流的人才，但是他不能用。各种好的意见也不少，但是他不能听。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矜忌自恃，有的谋士甚至因为意见



袁绍没有接受田丰的意见，田丰气得连连说：“真是可惜呀！”

不合，还被他囚禁、赶跑。有时他似乎也能听取各种意见，却又比较不出哪种意见正确，慢条斯理，犹犹豫豫，顾虑这、顾虑那，抓不住主要问题，不能及时作出果敢的决定。

在官渡之战的全过程中，几乎在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上，他的部下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但是袁绍没有采纳一条。

公元199年，袁绍决定南征曹操时，沮授、田丰不同意立即发兵，他们认为袁绍方面“师出历年，百姓疲敝”，当务之急，是内修农战，以稳固自己的占领地区，同时，分遣精骑，乘虚迭出，扰乱曹操统治地区，使曹操疲于奔命，不得安宁。

他们认为采用这种持久作战的方针，两三年内即可战胜曹操。但袁绍不听。

公元200年春，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力劝袁绍迅速出兵袭击曹操后路，袁绍却以小儿子生病为理由，犹犹豫豫地不肯发兵。田丰气得用手杖击地，叹息说：“因一个小孩的疾病，而放弃大好的战斗时机，真是可惜呵！”

袁绍派遣颜良攻打白马，沮授说：“颜良性格褊狭，不能独任大事。”袁绍不听。曹操斩颜良以后回师官渡，沮授又说：“曹操兵少粮缺，利在急战”，建议袁绍采取持久战的方针以破之，袁绍又不听。袁绍派遣淳于琼护送粮队时，沮授又建议袁绍另派蒋奇为奇兵，以防备曹操来袭击淳于琼，袁绍还是不听。曹操按许攸的建议，奇袭淳于琼的粮队后，张郃说，淳于琼的粮队，关系战争的胜败，建议袁绍集中兵力去急救淳于琼，而不要分兵去攻打壁垒坚

固的曹营，袁绍还是不肯听。

毛泽东谈官渡之战

1959年，毛泽东有一次讲起袁绍的故事，要大家引以为戒。他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

毛泽东接着分析曹胜袁败的原因，他比较曹操和袁绍的作风，认为曹操能够多谋善断，既能广泛听取自己谋士的意见，又能作出果断的决策；而袁绍却是少谋武断，既不能听取自己谋士的意见，又没有果断的决策，这是曹胜袁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毛泽东还要大家去看《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他说：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他要求我们从这一场历史斗争中吸取袁绍失败的经验教训，遇事要多谋，又要善断。

曹操和他的智囊团

曹操和袁绍起兵反抗董卓时，两人曾经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

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

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中原社会动荡、雄豪并起的时代，怎样出而与天下争锋？袁绍的方针是依靠天下的险固；曹操的方针是依靠天下的智力。后来依靠天下智力的曹操战胜了依靠天下险固的袁绍。

曹操所说的“天下之智力”，当然不是人民群众，他作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能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但是他能看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能动作用，能看到在历史活动中，具有聪明才智的文官武将比起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更为重要，这是应该给予肯定评价的。

在实际的历史活动中，曹操也确实按照他的“任天下之智力”的方针去做的。他所收罗的文官武将和各方面人才，在三国时期各大军事、政治集团中，数量是最大的，质量是最高的。他的队伍，真可以说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他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三国时期不断战胜各种对手，最后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其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的这些人才发挥了作用。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秋草，铜雀荒凉隔暮云。
今日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温庭筠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秋草，铜雀荒凉隔暮云。
今日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温庭筠 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秋[春]草，铜雀荒凉隔[对]暮云。今日[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曹魏集团的生命线

在曹操的人才队伍里，最可宝贵的是那些帮助他策划各种军政大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所以也可以称为谋士集团或智囊团。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定形组织，但是它的参加者却大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工作效率很高。这个智囊团是曹操须臾不能离开的，是他的生命线。



荀彧

这个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前后大致有荀彧、程昱、荀攸、钟繇、董昭、郭嘉、贾诩、刘晔、蒋济、司马懿等十几个人。

1. 荀彧(公元 163~212 年)，字文若，颍川郡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士族出身，是跟随曹操最早的知识分子。这个人成名较早，青少年时代即有“王佐之才”的称誉。初平二年(公元 191 年)袁绍占据冀州，用上宾之礼来招揽他，他认为袁绍不能成大事，不肯依从，反而去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市西南)投奔势力较小的曹操。曹操听说他来了，喜出望外，高兴地说：“此吾子房也。”他在曹操那里先当司马，后来官拜尚书令，参与策划曹氏集团的所有的军政大事，是曹操智囊团早、中期的核心人物。

2. 程昱(约公元 142~221 年)，字仲德，东郡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初平三年(公元 192 年)应兖州牧曹操的征聘出任，在曹操与吕布等人的战争中，为曹操坚守鄄城、范城、东阿(均在今山东省)三座孤城，大得曹操信任。此后或参谋中枢，或出守外郡，对曹操帮助很大。

3. 荀攸(公元 157~214 年)，字公达，是荀彧的同里同族。东汉末年以海内名士的声望被朝廷征召到首都，任黄门侍郎，后来因为参与谋刺董卓案系狱。建安三年(公元 198 年)归曹操，被任命为军师，经常跟从曹操南征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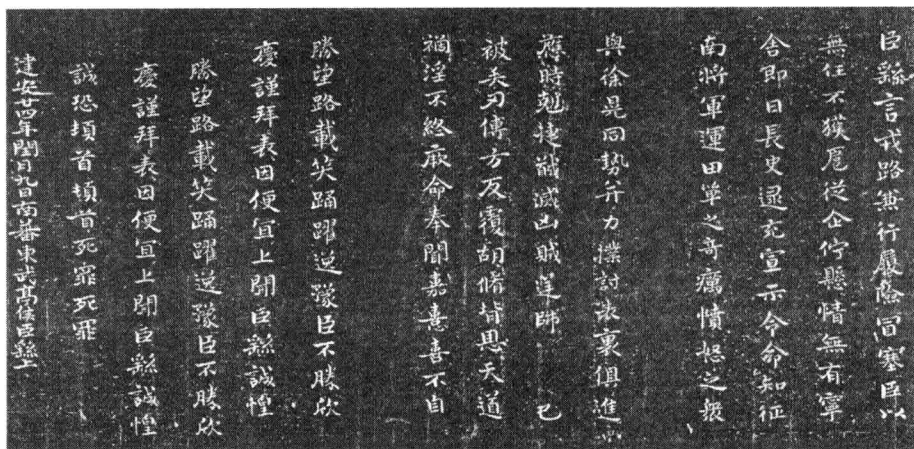
战，“谋谟帷幄”，屡建奇功。

4.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郡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东汉末年任黄门侍郎，他曾用自己在朝廷中的有利地位，帮助曹操控制中央政权机构，所以很得曹操的信任。他原来在曹操身边参与机要，后来出守关中，招纳流散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功绩很大。曹操征讨关中时，他是曹操的前军师。

5. 董昭(公元150~232年)，字公仁，济阴郡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原来是袁绍的部下，袁绍听信谗言猜忌他，他就离袁归曹。以后，或跟随曹操出征，或出守地方，在政治上、军事上提出过很多建议，是曹操很信任的人。



荀攸



钟繇是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

6. 郭嘉(公元170~227年)，字奉孝，颍川郡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原来在袁绍那里，后来看到袁绍才干不济，又离开了袁绍。曹操在他甚为器重的谋士戏志才死后，感到身边的谋士太少，要荀彧给他推荐汝、颍奇士，荀彧推荐了郭嘉。曹操接见郭嘉，两个人谈论天下大事，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竟不谋而合，曹操大为高兴，从此郭嘉成为曹操言听计从的重要谋士。

7. 贾诩(公元147~223年),字文和,武威郡姑臧(今甘肃武威)人。青年时代有“良平之奇”的称誉。他原来在董卓的军队里任职,后来给张绣当军师。官渡之战时,劝说张绣归降曹操,得到曹操的重用,要他参谋军事,是曹操智囊团中、后期的重要人物。

8. 刘晔(公元?~234年),字子扬,淮南成德(今安徽合肥西北)人。此人系扬州名士,有“佐世之才”。曹操征伐淮南时,归曹操。曹操把他留在身边当顾问,碰到疑难问题就找他询问,刘晔是个大军师,水平很高,有时曹操一夜要找他好多次。他是曹操智囊团中、后期的重要人物。

9. 蒋济(公元?~249年),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凤台东北)人,也是扬州名士,同刘晔同时归曹操。开始时在地方工作,后来任丞相主簿西曹属,是曹操智囊团后期的重要人物。

10. 司马懿(公元179~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名门士族出身。多智谋、善权变,当过曹操的主簿,是曹操智囊团后期的重要人物。

除此以外,担任过曹操幕僚或者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参与过曹操军政大事谋划的人员还有戏志才、高柔、华歆、刘放、陈群、王粲、陈琳、崔琰、毛玠等许多人。

曹操智囊团的历史贡献

曹操的智囊团是一个以高强度脑力活动为主要形式的集团性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的威力在于:一方面,它对全国政治、军事的基本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能有明确的分析;另一方面,它对瞬时间变化万端的各种现实问题,又能有机动灵活的反馈能力。曹操集团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决策,都是在这个集团性研究机构积极参与之下作出来的。没有这个集团性研究机构的努力,曹操是不可能在那样短时间里迅速统一北方,成为“一世之雄”的。

以下历史事实,是这个智囊团在曹操争雄天下的事业中所起作用的一些说明。

北方军阀混战初期改变了曹操的动摇态度

在北方军阀混战的初期，曹操为争夺徐、兖地区，同陶谦、吕布反复作战，仗打得很苦，军队损耗很大。后来，曹操的地盘大部分都失掉了，粮食来源也发生了问题，这时，雄踞冀州的袁绍派人来联系，企图让曹操依附他，并要他把家属送到冀州为人质。曹操知道这是一个关系他今后命运的重大问题，但是迫于当时的困难局面，特别是威胁他全军生存的粮食问题，一度想答应下来算了。曹操的这种动摇态度，受到他智囊团的坚决抵制，程昱尖锐地批评他说：

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曹操听了程昱的话，改变了动摇态度，回绝了袁绍的要求，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被几个小军阀劫持到了洛阳，曹操敏锐地看到汉献帝对于他争雄天下的事业很有用，就想带兵到洛阳去争夺汉献帝，但是曹操的将军们对他的这个想法有怀疑。这时他智囊团的成员荀彧、程昱等人极力支持他。后来，曹操终于在荀、程等人的支持下，说服了自己的将军，迅速带兵到洛阳，把汉献帝抢到了手。以后，他又在董昭等人的策划下，把汉献帝迁移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从此，曹操在政治上取得了别人所没有的以中枢代表身分发号施令的地位，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利用汉献帝的名义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很快把关中、河南大片地区收归己有。盘踞河北地区的袁绍，原先也有过把汉献帝接到冀州的打算，但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这时，看到了好处，就想让汉献帝到冀州去，被曹操一口拒绝。

全歼吕布的战斗

吕布是曹操初起时的强敌，有一次吕、曹两军对垒，曹操的军队被吕布打

得大败，曹操本人也差一点在战斗中丧生。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曹两军又在徐州地区会战，这次吕布打了败仗，退至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固守。此时，曹操的军队也因为连续作战，将士十分疲劳，几次攻城都攻不下来，曹操对战斗的胜利失去了信心，想引军退回许县。但是他的智囊团不同意。他的谋士郭嘉、荀攸认为吕布的军队由于接连打败仗，锐气已经衰败，此时曹军虽然困难，但是吕军的困难更大，这正是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只要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可以到来。曹操听从自己智囊团的意见，改变了撤军的主意，布置部队坚决攻城，终于全歼了敌人，擒获了吕布，根除了自己的东方大敌。

官渡之战的决策

曹操南征张绣失利，袁绍来信挑衅。曹操对袁绍的挑衅既忍受不了，又不敢轻易发作，因此脾气变得很坏。他周围的人感到奇怪，都以为曹操脾气变坏的原因是由于同张绣作战失利引起的。钟繇为此事询问荀彧，荀彧说，曹操这个人很聪明，知道往者不可追，不会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而如此失态，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于是，荀彧就跑去询问曹操，曹操拿出袁绍的来信。荀彧看了袁绍的信，替曹操分析天下大势。他认为，袁绍虽然貌似强大，但还是可以被打败的。曹操说，怕的是袁绍连络关中、荆州、汉中等地一起来反对我们，要那样，我们就得以兖、豫之地，抗天下六分之五了。荀彧又替他分析关中的形势，建议派钟繇去安抚和镇守关中。以后，孔融又提出一大堆理由，说袁绍强大，不宜同他对抗。荀彧一一反驳了孔融的诘难，坚定了曹操斗争胜利的信心。郭嘉、荀攸、贾诩等也坚定地支持曹操同袁绍战斗。这样，曹操才下定决心同袁绍对抗到底。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同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拉开了战幕，仗打得很激烈。曹操的军队本来就少，战斗中又伤亡了十分之二三，而且军粮也发生了困难，情况很严重。这时，虽然有智囊团的支持，但是曹操仍然感到难以坚持。他打算放弃官渡，把部队撤回许县。在这个紧要关头，曹操给荀彧写信，告诉他准备从官渡撤退时，荀彧给他写了一封带有决定性的回信。荀彧说：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

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是的，当时曹操同袁绍已经到了决定胜败的最后关头，在这种关键时刻是不能稍有动摇的，轻率地撤退势必引起全面的崩溃。出路只能是坚定胜利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并用奇兵去夺取胜利。荀彧对形势的透彻分析，清醒了曹操被困惑的头脑，他决定硬着头皮同袁绍打下去。

正当曹操同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深夜投向曹营，建议曹操出奇兵袭击袁绍的运粮大队。由于这次行动关系战争的全局，许多人表示犹豫。这时曹操的智囊团又发挥了作用。荀攸、贾诩分析情况，劝说曹操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曹操接受智囊团的意见，亲自率领步骑主力连夜出击，终于夺取了官渡之战的全胜。

平定河北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打算把用兵方向转向南方。荀彧说，袁绍新败，众叛亲离，这是继续向河北进军、夺取更大胜利的时候，否则，袁绍乘我军向南用兵的机会，重整旗鼓，从背后打击我们，就不好办了。曹操听取了荀彧的意见，再次进军河北，又取得了重大的战果。袁绍死后，曹操又根据郭嘉的建议，撤走军队以为袁绍的两个继承人袁谭、袁尚互相争斗创造条件。然后，根据荀攸的建议，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的办法，分别击破了袁谭、袁尚的军队，平定了冀州等地。

北征乌丸

袁尚兵败以后，率残部逃入乌丸。乌丸是当时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的



郭嘉

统治者经常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侵入内地抢劫财富、掳掠人口。仅幽州一地被掳掠的民众就有十余万户。这次乌丸又与袁尚残部结合，势必给北方几个郡带来灾难。为了消除这个隐患，曹操想向乌丸用兵。但是，乌丸远离内地，曹操部下对这次军事行动多不积极。有人还提出用兵乌丸时，南方的刘表可能出兵袭击后方。这时，曹操智囊团成员郭嘉出来支持他。郭嘉说，正因为乌丸远离内地，以为我们不会去打他们，所以不会有严密的戒备，我们只要出奇兵给他们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至于刘表，不过是一个好清谈的人，他是不会出兵袭击我们后方的。后来，曹操按照郭嘉的建议，率领轻骑兵秘密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直指乌丸单于驻地，终于取得了北征乌丸的大捷。

南征荆州的决策

曹操南征荆州的决策，也是在他的智囊团的参谋下制订的，荆州之役的胜利，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至于赤壁之战的失败，不能过多责备他的智囊团。当时荀彧不在，郭嘉已死，贾诩在曹操夺取了荆州，企图顺流东向时，已经看到了局势中出现了不利因素，他劝说曹操先行安抚荆州，暂时停止向东吴用兵。但是，曹操那时已经头脑发胀，不肯听从贾诩的意见了。

关中之役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率领大军去关中地区同西北军阀马超、韩遂等作战，在潼关渡河时，遭到敌人轻骑兵的袭击，几乎遭难。后来，曹操向贾诩询问战胜马、韩的计策，贾诩说“离之而已”，曹操说“懂了”。于是，他运用临阵言谈、伪造文书等办法，巧妙地在马、韩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弄得马、韩两军互相猜忌。以后，又利用马、韩两军内部闹矛盾的时机，指挥自己的军队同马、韩进行决战，终于一战而定关中。

西征张鲁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在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受阻，由于山岭险峻难登，“攻之不能拔”。曹操不想打了，下令撤退。他的谋士刘晔却建议利用敌军在曹军撤退后的松懈情绪，再次发动进攻。曹操接受刘晔的建议，秘密回军，乘夜袭击，终于攻克阳平关，大破张鲁。大破张鲁后，刘晔认为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建议曹操再打四川。曹操犹豫不决，未能作出决定。后来事实证明刘晔的建议正确，曹操后悔不已。

樊襄之役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征伐刘备失利。同年,刘备的大将关羽发动樊襄战役,从荆州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北上,围攻曹仁。曹操派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去救,结果于禁被俘、庞德被斩,七军皆被汉水淹没。消息传来,上下震动。许都离樊襄很近,为了避开关羽的凌厉攻势,曹操打算迁移首都。他的智囊团的谋士蒋济、司马懿都不同意。他们说: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蹶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曹操听从了智囊团的意见,派人同孙权联络。孙权得到曹操的支持,决计出兵攻打关羽的后路,并叫人把战斗方案秘密报告曹操。曹操又听从谋士董昭的意见,把孙权的秘密报告透露给关羽,以扩大吴蜀双方的矛盾。后来,孙权果然派吕蒙率领吴军白衣渡江,偷袭关羽的后方,曹操的大将徐晃乘机在樊襄战线发起反攻,樊襄之围因之而解。

接班人问题

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才能出众的人。两人各有党羽,互相争夺接班人的位置。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曹操感到困惑,下不了决心。有一次他召来智囊团的贾诩,并屏除左右,向贾诩虚心求教,贾诩默然不答。曹操不高兴了,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交锋:

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

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

太祖曰:“何思?”

诩曰:“思袁本初(绍)、刘景升(表)父子也。”

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三国志·魏

书·贾诩传》)



贾诩

这个问题的确定，对于曹魏集团政治上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曹操在基本上完成北方的统一事业以后，认为他起兵“诛暴乱”，不断取得胜利，并不都是他的功劳，而是“贤士大夫之力也”（《丁酉令》）。把这段话结合他对荀彧、荀攸、郭嘉等人历史活动的评价来看，他说的“贤士大夫”，首先指的是他智囊团的谋士。从历史事实看，曹操的智囊团在他争雄天下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

曹操怎样领导智囊团

曹操的智囊团之所以能在历史活动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是与曹操本人对这个班子的有效领导分不开的。

曹操在组建和领导自己身边的智囊团时，显示了大组织家的才干。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惟才是举的方针

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材料是史学家经常引述的曹操的《求贤令》（建安十五年）：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注：此为《论语》言，意鲁国贤人孟公绰可以胜任赵、魏这样大国的高级官员，却做不了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还有《乙未令》（建安十九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书·武

帝纪》)

又,《八月令》(建安二十二年):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文)

这是否意味着曹操对于人才只重视才干,不重视德行呢?从以上几个文件的内容看,是有这种倾向。事实上,曹操也确实用过一些贪污受贿、行为不端的人,这些做法,以今天的眼光看,是有其片面性的。

曹操在人才问题上的片面性,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就是贪婪、虚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这不仅决定着这个阶级的成员要依靠剥削、欺骗为生,而且决定着他们不能真正把自己剥削、欺骗行为限制在他们的阶级或集团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就是说,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廉正、无私。个别的例外是有的,一般的要求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东汉末年那样大动乱的时代,要是拿廉正、无私的标准去选择人才,则无疑是缘木求鱼,其结果只能是无人可用。曹操是个把社会道德规范看得透底的人,当然不肯用那些虚伪的道德说教来捆绑自己的手脚。

但是,曹操所以强调“惟才是举”的方针,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长期推行举孝廉的用人制度,造成了豪门大族把持用人权,士子文人讲究虚伪道德的恶劣风气,假仁假义、不学无术的伪君子充斥于朝。相反,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在某一个问题上被抓住了小辫子,就永世不得翻身。不突破这种恶劣风气,就找不到真正具有“治国用兵”能力的人才。曹操“惟才是举”的方针,正是为了补救这种社会积弊而提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它是有积极意义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不要因为一个人有缺点而埋没他的才干，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犯错误而永远不给他出路。在这一点上，曹操“惟才是举”的方针，尚有可取的地方。

其次，也应当看到，曹操“惟才是举”的方针，并不意味着他就根本不讲德行。尽管当时曹操所讲的德行只能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伦理标准的德行。如袁谭的部下王脩是一个道德君子，名气很大，曹操平定冀州，抄了他的家，发现他家中除了谷十斛、书数百卷以外，没有其他财产。曹操感叹地说，王脩这个人才是“士不妄有名”。这说明，虽然在用人方针上，曹操是重才轻德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讲德行。

尤其是在用人的政治标准上，曹操从来都是不马虎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标准，也只能是以曹操的那个政治集团的最高利益为准则的。不管曹操怎样爱才，怎样强调“惟才是举”，他却从来不爱、不举那些黄巾起义中造他反的卓越领袖，就是对他本阶级中的人，只要哪个“人才”是反对他的，或者对他持有异心的，他也是不爱、不举的。除非这个人肯回心转意不再反对他，否则他就要打击迫害，甚至关押杀戮。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才干大、影响大的人，他越是不能容忍，才干小、影响小一点的人，他有时还可以宽容。才华杰出的孔融的被杀就是一例。孔融常常在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上顶撞曹操，曹操虽然恼火，却总是容忍了，但当孔融在赤壁之战前向孙权的大使诽谤曹操时，曹操不再容忍了。为什么？因为用曹操的政治标准看，这是“里通外国”的问题，属于坚决铲除之列。崔琰原来也是曹操智囊团里的人物，为人正直，威望很高，曹操原来对他也很器重。后来，只因为他在审读歌颂曹操的奏章时说了一句“时乎，时乎，会有变时”的话，结果被曹操视为异己，惨遭杀戮。所以，如果把曹操“惟才是举”的方针，看做是曹操用人不讲政治标准，那就要上古人之当了。从古至今，没有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在用人问题上是可以不讲政治标准的。曹操的“惟才是举”，是有阶级性的“惟才是举”，是在承认政治标准前提下的“惟才是举”，这是不应有误解的。

人才的收罗和选拔

有了“惟才是举”的方针，不一定就能把人才抓到手。为了贯彻这个方针，还得有收罗和选拔人才的组织措施。

为了把人才抓到手，曹操对于社会上有名望的才能之士，或者别人荐举的优秀人才，简直是千方百计地搜罗。为了招揽人才，他什么办法都用上

了。高官厚禄，名誉地位，征辟礼聘，文学优游……总之一切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办法他都采取。对于那些一再拒绝礼遇的人才，必要时，他还要采用威逼办法，有时甚至以斧钺相加。他北征乌丸时，发现了一个人才叫田畴，他一定要田畴跟他办事，田畴却一再托辞不干。曹操没办法，就叫人同他谈话，暗示他再不出来为曹操办事，就要以“狷介违道”、不履行社会责任的罪名给他加刑。司马懿起先也是不愿出来做事，他用假装瘫痪的办法拒绝曹操的征召。曹操派人把刀子按在他的脖子上，看他能不能动弹，后来又一再以性命相威胁，司马懿害怕了，这才出来工作。

曹操智囊团的人都是参与他核心机要的，这是一些关系他事业成败的人，他必须亲自选拔。从曹操亲自选拔智囊团人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人才问题上，眼光是非常敏锐的。

曹操对郭嘉的赏识，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郭嘉同荀彧、程昱这些人不同。当时，荀彧、程昱都是社会名流，郭嘉只是个藏名匿迹、“不与俗接”的青年人，除了少数几个朋友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说，在和曹操初次见面时，他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只一席话，曹操就发现这个人是个大人才，他高兴地对别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来，郭嘉果然成为曹操“平定天下，谋功最高”（曹操语）的人物。

曹操初见荀攸的时候，情况也相仿。仅谈了一次话，就知道“公达（荀攸），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曹操用兵淮南，收罗了一批扬州名士。他经常找这批人谈论军政大事，一谈就是大半夜。在谈论中，他发现刘晔不好讲话，就把刘晔留下来单独谈话。在单独谈话中，刘晔的讲话仍然不多，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却每每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曹操立即把这个人吸收到他的智囊团，授之以“心腹之任”。刘晔后来在曹操的东征西讨中作出过很多贡献。

解决感情协调问题

人才抓到了手，还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否则有了人才等于没有。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就要想办法使人才从内心产生强烈的积极工作的愿望，这是人才使用中最复杂、最微妙的方面。它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信任、尊重、了解、责任、谅解、友谊以至思想交流、批评教育、表扬处罚等等。

但是，在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还是领导和被领导者的感情协调问题。

曹操是一个义利兼施、王霸并用的人，他懂得他可以运用权力、威势和利害攸关的各种办法把人才罗致到自己的集团里来，但是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仅仅依靠这些办法是不行的。特别是对待智囊团里的那些透顶聪明的人物，若要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曹魏集团服务，还要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同他们建立感情协调的友谊关系。

曹操礼遇和厚待三国名将关羽的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实际上，他对待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待他智囊团谋士的礼遇和厚待，要比对关羽高得多。但是曹操在对待有才干知识分子上的可取之处，主要还不表现在对他们的礼遇和厚待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他和他们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友谊上。

他和程昱的关系就是一例。

程昱这个人不大懂关系学，脾气又很坏，私下里得罪了很多人，别人就向曹操控告他谋反。由于曹操对程昱有深刻的了解和信任，根本不相信这种控告。他认为程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都不肯抛弃他，怎么到后来还会谋反呢？他非但没有因为这样的控告而怀疑和冷淡程昱，反而对程昱更加友好。

曹操对荀攸、郭嘉的了解、信任和友谊就更加深厚了。

他屡次表扬荀攸，说荀攸是“人之师表”，要自己的儿子曹丕“尽礼敬之”。荀攸死后，曹操提起他时常掉眼泪。郭嘉死在北征乌丸的回师途中，曹操哀痛至极。他在给郭嘉的好友荀彧的信中说：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引文）

赤壁之战失败以后，曹操在撤军途中又想起郭嘉，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叹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有人说：“这些都是一代奸雄收买人心的奸诈权术，不足为据。”曹操当

然是一个懂得而且也很会玩弄奸诈权术的人，但是在与人的相互交往中，奸诈权术只能是一种暂时起作用的东西。不能设想，一个单纯依靠奸诈权术的人，能够长时间地获得其他人真挚的感情。曹操智囊团的谋士，都是一些智慧过人的人。不能设想这些人就不懂得什么是虚伪，什么是真诚。郭嘉身体多病，不适应南方气候，他常说，我要是到南方，就不能生还了。但是北征乌丸大捷以后，曹操问他今后的用兵方向，他从曹操集团的全局利益出发，还是说要先定荆州。曹操对郭嘉如果没有真心实意，是不能赢得郭嘉这般真挚情谊的。

曹操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但是一般还能准许反对过他的人改变立场。特别是对待一些确有才干但又反对过他的人，他能克制自己的感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恢宏大度，这就不能不使人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他所用。

曹操智囊团的贾诩原来是董卓的人，董卓死后他曾经鼓动董卓的军队为董卓复仇。以后，又为张绣出谋划策，把曹操打得狼狈不堪。但是官渡之战时，贾诩劝说张绣归附了曹操，从此曹操把贾诩视为亲信，既往一概不咎。后来，又吸收贾诩参谋他的军政大计，给予充分的信任。贾诩也兢兢业业，为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琳曾经为袁绍起草过声讨曹操的檄文，攻击曹操是“赘阉遗丑”，骂了他的祖宗三代。曹操恼火极了，但是陈琳归降以后，曹操除了批评他骂人不该上及父祖以外，并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报复。以后，曹操委任陈琳为自己的幕僚，负责文件起草工作。在工作中曹操也没有给陈琳小鞋穿。相反，陈琳写了好文章，他还大加表扬，说这篇文章能治疗他的头痛病，并厚加赏赐。

当代美学家朱光潜在他的《谈美》一文中说，曹操“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业对于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他的《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他那种“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使悠悠过去的漆黑天空散布出几点星光。

是的，曹操的《短歌行》，实在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好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

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之所以能强烈地震撼各个时代人们的心弦，除了它的艺术感染力以外，不正是因为这首诗反映了曹操同帮助他完成统一北方事业的英才贤士的真实友谊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多么的深沉悲凉，但是他从中引出的却不是消极悲伤，而是珍惜人才，渴望人才，希望与天下有才能的人一起及时建立历史功业的雄伟抱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表现了他与自己身边英才贤士的深情。“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愿意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广泛地延揽更多的杰出人才，以实现他“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曹操同他智囊团的人士如果没有比较协调一致的情感，能够咏出这样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吗？

多谋善断

郭嘉在评论曹操、袁绍优劣时说过：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曹操“策得辄行，应变无穷”。

荀彧的评论是：袁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无方”。

贾诩则说曹操在“决机”问题上远远胜过袁绍。

曹操智囊团对曹、袁的这些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曹操同袁绍比较，一个是“多谋善断”，一个是“好谋无决”。

“多谋善断”就是对待问题能在多种谋划的基础上，果断而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决定。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多谋善断”的好处、“好谋无决”的害处，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但是，历史上能够做到“多谋善断”的人并不多。相反，“好谋无决”以致“寡谋武断”的却大有人在。什么原因呢？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多，也就是说，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限制了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使他们难以按照客观的实际情况办事，因而无法做到“多谋善断”。但是也有一

些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尽管世界观、方法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在处理某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却能采取现实的、灵活的态度,这些人在“多谋善断”问题上,就能做得好一些。

曹操同袁绍一类人比较,是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比较少的人,他在考虑军国大计时,能够较好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能从各种不同意见中,选择最优的方案,及时地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是他能够较好地做到“多谋善断”的主要原因。

他还能意识到由于自己地位的特殊,很容易造成部下的“面从”,从而使自己听不到不同意见,于是就想各种办法鼓励别人向自己提意见。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十月,他在《乙亥令》里说: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诚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文)

这里是说,即便是反对他的意见,只要有合理因素,他也表示愿意听取。他还采用物质奖励的办法,征求批评。例如,他决策北征乌丸时,很多人不赞成。征乌丸取得大捷以后,他叫人调查原先不赞成北征乌丸的人都是哪些人,有人以为曹操要算老账了,心中惶惶然,哪知道他是要给不赞成北征乌丸的人发“奖金”。为什么北征乌丸打了胜仗,还要给原先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发“奖金”呢?他说:这次征讨乌丸是一次冒险行动,虽然打了胜仗却不可以为常法,原先不赞成征讨乌丸的人,他们的意见本身有合理的方面,所以要奖赏他们,这样才可以鼓励人们今后大胆地讲不同意见。你看,这个“一世之雄”是多么懂得领导艺术。

一般来说,曹操并不固执己见。在他认识所及的范围内,他发现自己的意见同别人的意见相形见绌或者根本错误时,他能勇敢地抛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别人的意见。这也是他能较好地做到“多谋善断”的一个原因。在战吕布、战袁绍、平定冀州、西征张鲁时,他都有过不高明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但一经智囊团谋士的分析辨正,他就能毫不勉强地抛弃自己的已成

之见而采纳别人的主张。

权衡利弊，“算其多者”是曹操在处理情况复杂、意见纷纭的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是董昭提出来的。曹操率兵到洛阳去争夺汉献帝时，董昭建议他把首都迁到自己的统辖区许县。曹操顾虑迁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对，特别是这项决定很可能遭到当时拥有一部分精兵的军阀杨奉的反抗，因而犹豫不定。这时，董昭向他说，迁都的决定是会引起两方面的结果，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逢事要权衡利弊，“算其多者”。曹操听取了董昭的意见，一方面积极迁都，一方面对杨奉的可能反抗作了多种准备，终于把中央权力机构稳妥地掌握到自己手中。

权衡利弊，“算其多者”符合现代辩证法中抓主要矛盾的法则。这是在处理各种情况复杂、意见纷纭的问题能不能做到“多谋善断”的关键所在。谁能抓住主要矛盾，谁就能及时地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断。谁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只能犹犹豫豫，“谋而无决”。

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

曹操在同自己的智囊团商讨各种问题时，也经常犯错误，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是能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智囊团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来说，曹操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还是好的。凡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错误，他一般还能采取认账的态度。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在兖州打了败仗，想去依附袁绍，被程昱制止了。对于这个几乎导致他丧失独立自主地位的重大失误，他始终记在心中。北方统一以后，他坦率地对程昱说，兖州打败仗的时候，我要是不听你的话，哪能有今天的局面？应当说，这话不仅是对程昱功绩的承认，而且也是他的自我批评。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南征张绣。荀攸说，张绣与刘表相持为强，但是互相又有矛盾。如果我们打急了，他们势必互相救援。曹操没有采纳荀攸的意见，出兵急攻张绣，刘表果然来援，结果仗打得很不顺手，最后只好撤退。事后，曹操公开向荀攸承认错误，说这是不听取他的意见的结果。

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荀彧帮助曹操纠正了对于决战的软弱态度，后来又帮助他纠正用兵方向的错误，对于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失策，曹操也是采取认账态度的。他在给皇帝的表章中说：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或议，或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复取其众。此或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征刘表。或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或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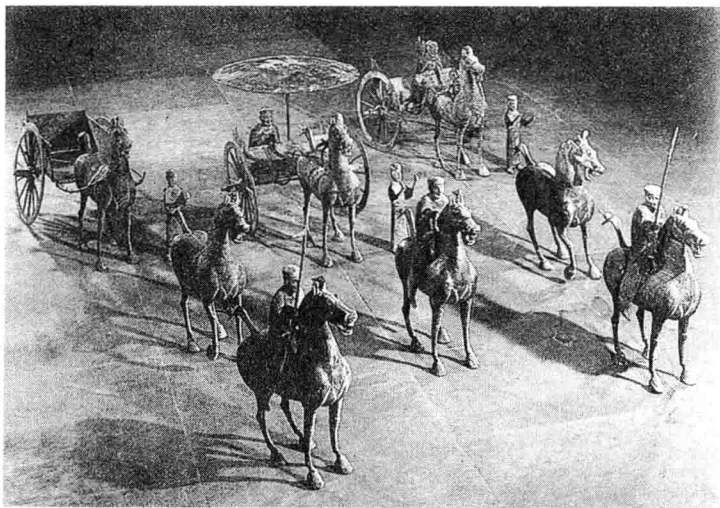
把曹操这个表章同袁绍对待自己在官渡之战中的错误比较一下，是颇有意味的。

袁绍的谋士田丰不赞成袁绍官渡之战的方针。袁绍非但不肯采纳田丰的意见，反而把田丰关押起来。后来，战争的实践证明田丰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时袁绍非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因为害怕在田丰面前丢脸，而把田丰杀了。

曹操犯了错误不仅能公开承认错误，而且还能承认别人比自己高明。

袁绍犯了错误非但不肯承认错误，而且还要把批评他错误的人杀头。

历史的结果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不但没有因此而丧失威信，反而更好地团结了自己的部下。



忌讳自己错误的人，不但没有因此而保住自己的脸面，反而把自己的脑袋也丢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历史评论中对曹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他在《读通鉴论》中却对曹操和他的智囊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

这段话对曹操和他的智囊团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三国时期的民间英雄田畴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歌颂过三国时期的一位归耕于徐无山中的隐士田畴：

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
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
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诗中说，诗人愿意驾着车离家远行，去寻访平生向往的无终山。他此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经商，也不是为了从军，而是为了凭吊士林中的英雄田子泰（即田畴）。这位节义英雄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故里乡间依然保持他的遗风。目睹生前享有高世美名，死后还能流芳百年的斯人风采，诗人不禁感慨万千，他要以此为楷模，在浊世保持个人的高风亮节。

这位受到大诗人景仰的英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田畴。

田畴在乱世中为山中人 建立了一方人间乐土

田畴字子泰，东汉时人，居于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年轻时好读书，善

击剑，见义勇为，名扬一方，他曾在幽州牧刘虞手下为官，后来才遁入徐无山成为隐士。

隐士是封建社会士人群体的一种。孔子曾经给士人设计了两种生活方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即士人在天下有道的时候应该出来建功立业，但在天下无道的时候可以采取隐居方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田畴是为了逃避灾祸而隐居的。

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帝到长安，有人提出另立皇族后裔幽州牧刘虞为帝。刘虞不愿意，为了向朝廷表明心迹，他派了田畴去长安悬辞。

从幽州到长安，往返几千里，当田畴风尘仆仆从长安归来复命时，刘虞却在军阀混战中被公孙瓒杀害了。公孙瓒是个非常残暴的人，他杀了刘虞，对其旧臣幕僚也不放过，田畴为了逃避迫害，只好率领宗族家人数百人逃到徐无山。

徐无山原是渺无人迹的荒山，田畴等一行人在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不久就有逃避战乱的百姓闻讯前来归附，数年之后山中人口增至五千余家。

与一般远祸全身的隐士不同，田畴隐居山林，不完全是为了保全生命，还有一点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目的。群龙无首就是一盘散沙，他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将徐无山的居民团结起来，凭借有利的地形优势，把徐无山建成一个外来势力难以侵扰的堡垒。为此，他召集山中居民谈话：“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郡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众人一致推举田畴为徐无山之主。于是，田畴以山主的身分制定了约束杀伤、犯盗、争讼的法律，颁布了婚姻嫁娶的礼仪，兴办了授业传道的学校。在田畴的领导下，人民生活安定，经济自给自足，成为人们近悦远来，争相投靠的一方人间乐土。

田畴帮助曹操平定乌丸

徐无山的人们渴望安居乐业，但在现实生活是不可能有一个世外

桃源的，徐无山无法真正脱离尘世，自它成为避难人群的庇护所之后，就不断受到外界的干扰。

首先是受到军阀割据势力的征辟。在汉末群雄割据争霸天下的时代，这样一个经济独立、人口众多又拥有一支自卫武装力量的社会组织无疑是各路军阀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田畴不断受到军阀们的征辟延请。当时迫害田畴的公孙瓒已死，徐无山所在地的州牧袁绍父子多次遣使招命，又授将军印，但田畴没有接受。

此外他们还受到少数民族乌丸的骚扰。乌丸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汉初被匈奴所灭，余者逃到乌丸山，因以为号。汉末中国动乱，乌丸趁机进攻中原，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仅幽州一带被俘虏的民众就有十余万户，其势力之大，连统辖青、徐、幽、冀四州的大军阀袁绍都要以和亲的方式求得太平，徐无山与乌丸为邻，故深受其害，田畴“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

尽管徐无山一度保持了独立，但最终无法抗拒强大的外来势力。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丸，遣使把田畴请来。曹操率军征伐乌丸是有其战略目的的。曹操在官渡歼灭了袁绍的主力之后，袁绍的儿子袁尚及其余部逃到乌丸。为了防止袁氏势力卷土重来，保持中国北方的统一和安全，曹操必须征伐乌丸，打垮这股日益强盛的军事力量。但乌丸的部队强悍骁勇，不可轻敌，更何况，当时正值夏天，通往乌丸单于驻地的道路已被滂沱大雨淹没了。曹军进不得进，退又不能退，陷入了困境，这时如果找不到熟悉地形的人及时帮助曹军摆脱困境，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田畴一改与其他军事势力保持距离的惯例，他不但立即应征赶到曹营，而且积极为曹操攻打乌丸出谋献策。当时田畴的朋友不理解，问他：“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



田畴命令战士们一齐动手，逢山开路

使一来而君恐弗及者，何也？”田畴回答：“此非君所识也。”裴松之认为，田畴没有听从袁绍父子的命令出来做官，是因为“其非正也”，即占据一方地盘的袁绍并非汉室正统。但从田畴后来坚决辞让朝廷封爵的事实说明，田畴不接受各路军阀竞相延请却为曹操出谋划策，实质上是为了借助曹操的力量消灭乌丸，以保全徐无山不受干扰。

田畴率领五百名徐无山居民做向导，从另一条敌人疏于防范的小路偷袭乌丸。“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当曹军到达乌丸驻地柳城不远，乌丸单于还浑然不觉，结果趁其不备一举打败了以强悍骁勇著称的乌丸部队。

征伐乌丸是曹操平定北方的最后一次重要战役，田畴在此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曹操在平定北方取得胜利以后，给汉献帝上了《表论田畴功》，对田畴的杰出贡献给予表彰：

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三国志·魏书·田畴传》引文）

通篇表论功充满了对田畴“文雅优备，忠武又著，清静隐约，耕而后食”的赞美之词，似乎在表彰山林隐士的高风亮节。然而细究行文不难看出，田畴被表彰的真正原因是“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是因为他在统一中国北方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朝廷听从曹操的意见封田畴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坚辞封爵不肯接受。

田畴因辞封而引起弹劾

田畴并非曹操集团的谋士武将，他的身分只是一个游离于凡俗的隐士。汉末天下大乱，为了避难远祸，归隐山林的士人不少。很多有本事的人宁为布衣而不愿做官，诸葛亮躬耕南阳，司马懿装病在家，就连一代雄杰曹操，也有过类似隐居的经历。归隐山林，拒入仕途，可说是汉魏时尚。

按照田畴的愿望，借助曹操的力量平定乌丸之后，徐无山不再有乌丸骚扰，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独立王国，过来自由自在的生活。

起初，曹操迁就了他，下了《听田畴谢封令》，准备放他回去：“昔伯成弃国，夏后不夺，将欲使高尚之士，优贤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听畴所执。”意思是古代的伯成放弃诸侯的职位，夏禹没有强迫他改变志愿，高尚的人和贤明的君主不止出现在一个时代，就听从田畴不受封爵吧。

后来，曹操想到田畴在平定乌丸中的功劳，认为听任他让封是成就一人清高的美名，而违反论功行赏的规定。于是又下了《爵封田畴令》，再一次表彰了田畴的高尚志向和特殊功勋。并认为自己听任田畴谢封是不对的，“此为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仍将前爵封畴，但田畴还是坚辞不受。

如此再三，朝中有人弹劾田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为此，曹操郑重其事地写了《决议田畴让官教》一文，让世子和大臣博议此事。

《决议田畴让官教》称：古代伯夷、叔齐放弃爵位，又讥讽武王伐纣，可谓愚暗，孔子还认为他们是“求仁得仁”。田畴守志不受封爵，虽然不合常规，但只是想表现清高罢了。假如天下人都像田畴那样，就要回到墨翟兼爱尚同、老聃使民结绳的社会了。

大臣们就田畴不受封爵一事纷纷发表了意见。

世子曹丕认为，田畴辞让封爵是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同样性质，是清高的行为，有“激浊世，励贪夫”的作用，所以不应夺其志而该优其节，对田畴请求归隐采取“免官加刑”的处罚太重了。

尚书令荀彧认为，隐居或出仕都是君子之道，田畴辞让封爵是人各有

志，因此不必勉强。“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

司隶校尉钟繇则认为田畴辞让封爵与原思辞粟、子路拒牛一样，可以激清励浊，但不宜提倡。他同意曹丕或荀彧的意见，田畴行为“虽不合大义，有益推让之风，宜如世子议”。

尽管大臣博议的结果是听任田畴本人意愿，由他辞让封爵重回徐无山。但堪称一世之雄的曹操怎会将胸有文韬武略，又有武装实力的田畴放回徐无山呢！正当曹操雄心勃勃准备统一中国的时候，他怎么能让徐无山作为独立王国存在呢！

曹操知道夏侯淳素与田畴友善，便让夏侯淳去探听田畴不愿封爵的真实想法。“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还是田畴本人的一番话打消了曹操的疑虑：“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了解到田畴真的只是为了名节而不愿封官受赏，曹操这才放下心来。但最终还是没让他再回徐无山，给了个议郎的闲职让他留在朝廷，并把他数以百计的宗族门人迁到邺城。

田畴逝世时年仅四十六岁，他带着未竟的理想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三国时期的民间英雄

田畴的遭遇令人感动。毫无疑问，田畴和徐无山的事迹给诗人陶渊明构造理想社会的蓝图以启示和灵感。诗人生活的东晋时代充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不愿投身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官场，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那么他只能选择默默无闻，从此销声匿迹地生活。

田畴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不仅在于攻打乌丸的战争中建立了功绩，更多的是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了人间乐土。徐无山曾经收留过数以千计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民，让他们能过上躬耕自足的生活，它是陷于战争苦难中的人们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田畴作为那个时代的民间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董卓与吕布

——东汉末年两个又黑又厚的大军阀

黄巾大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统治的基础以后，中原地区出现大小军阀争夺权力、互相混战的局面，董卓和吕布就是在这场混乱中臭名昭著的两大军阀。这是东汉末年两个残暴不仁、心肠狠毒，什么坏事都能做，又加厚颜无耻、道德沦丧，什么道理都不讲的大军阀。

从古代的兵家、法家、纵横家到现代的权谋学者都试图总结历史上奴隶主与封建主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脸皮厚、心肠黑的厚黑哲学是一切成功者的不二法门。16世纪意大利的学者马基雅维利也说过：君主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的观点，作为对历史上统治者“恶”的本质的揭露，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但是后来许多人竟相把这种哲学或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则是错误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些暴发户奉厚黑哲学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为圭臬，厚黑政治、厚黑军事、厚黑商业、厚黑人生以及讲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书刊层出不穷，如今厚黑文化竟形成了一道时髦的文化风景线，这真是可悲。

是不是奉行厚黑哲学或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呢？东汉末年这两个又黑又厚、为人处世不择手段的大军阀的兴衰史，或许可以给人们一点历史的启示。

董卓残暴狠毒，被民众点了“天灯”

董卓，是第一个填补东汉王朝权力真空的大军阀，他是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青少年时以孔武有力、擅长驰射，入选羽林郎，后来以屡建军功升为中郎将。



董卓

由于他打了几次胜仗，上级奖给他九千匹丝绸，他很讲义气，把全部丝绸都分给了部下。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孔武有力、屡建军功的英雄，就栽倒在农民起义军的手里。公元184年，他与黄巾主力张角部交战，被黄巾打得惨败，本来要处死，后以过去的军功抵罪，罢职归家。

公元185年，他运气来了，朝廷又征调他去讨伐凉州的韩遂，这时他招纳了谋士贾诩，行军打仗，都讲究方略。当时，兵出陇西的有六支军队，五支都打了败仗，唯独董卓稳扎稳打，胜利回师。因此被提升为破虏将军。这是他起家之始。

这时的董卓实力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已经懂得了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他视兵权如命，不惜以各种办法拉拢部下。他成为一个方面军的将军之后，宦官控制的朝廷几次要更换他的军事指挥权，其中两次朝廷愿以少府或并州牧的高官来换取他的军队，让他把指挥权交给皇甫嵩，他都抗命不从。他的抗命书写得不亢不卑，什么“士卒大小，相狎弥久”，什么“恋恩念报，各遮臣车”，什么“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云云。总之，不论中央的高官或地方的州牧，他都不要，他只要军队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中央和地方文官武将的水平要高得多。

他抗命之后没多久，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东汉王朝内部发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双方互相残杀，董卓与外戚何进联手，率领所部直奔首都，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害，他入京后诛杀宦官，接收何进的部曲，又收买京城禁军首领丁原的亲信吕布，让吕布杀丁原，进而收编了京城禁军。接着废少

帝、杀何太后、立献帝，自任太尉、相国，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这时的董卓遂由一个地方军阀成为“人莫予毒”的全国最高统治者。新皇帝只不过是手中的傀儡天子。

这个超级暴发户依靠军事暴力篡夺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他大概以为依靠军事暴力亦可以保持他的最高权力。所以他在控制朝廷以后，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和缓和军事暴力以及这种暴力所造成的生产破坏和社会的不稳定，反而变本加厉地施行暴力式的残忍统治。他把“贵戚宅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的



洛阳当做当年分发部下的九千匹丝绸，放纵士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甚至放任部下“奸乱宫人公主”，夺取“国家珍宝”，“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顿时首都秩序大乱，家家自危，人不自保。

公元190年春，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群众举行传统的社祭活动，董卓竟派军队包围人民，“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轜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下同）。

董卓的残暴统治，引起天怨人怒。关东各州组织了讨伐董卓的义军，向洛阳进军，董卓一面用斩杀义军亲属的办法进行镇压，一面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又把俘获的义军将士涂上猪油活活烧死。有一次他还在宴席间与公卿百官把俘虏“断舌”、“凿眼”、“斩手足”、“镬煮之”，把出席者吓得胆战心惊，“亡失匕箸”，董卓却“饮食自若”。

董卓以为这样狠毒的手段定可以使公卿百官和民众听命于他，却不料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

是不是没有人劝过他呢？不，有名的大臣杨彪就告诉他“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否则“必麀沸蚁聚以致扰乱”。董卓竟不屑一顾地

说：“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官听了这话，“皆恐怖失色”（《续后汉书》）。

丧尽民心的董卓终于得到了报应。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用董卓收买吕布的办法，收买了当时已成为董卓义子的吕布，让吕布率亲兵在未央殿前刺杀了董卓。在这以前，董卓为了自家的安全曾在长安以西的郿城筑造了一座“高丈余，周一里”的行宫式堡垒——郿坞，其中囤积了可以吃三十年的粮谷，又藏“金二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财宝“积如丘山”，但是这么坚固、富庶的城堡也没能挽救他的灭亡。

早在董卓死前，长安人就用童谣咒骂他：“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董卓死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后汉书·董卓传》）他们在董卓那吸尽民脂民膏的巨腹中插上火炷，点了天灯，“光明达曙，如是积日”。然后把他的尸灰“扬之于路”。

吕布民心丧尽，终遭枭首命运

吕布是继董卓而起的另一个大军阀。



吕 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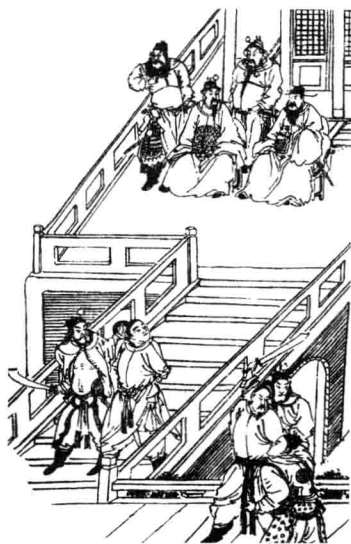
他是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人，因弓马骁武成为京城执金吾丁原的亲信，后来被董卓收买，卖主求荣，成为董卓的义子。

《三国演义》写吕布骑赤兔马、持方天戟，虎牢关前一人迎战关羽、张飞、刘备，好不英雄。这虽然都是小说家言，但吕布骁勇善战、武艺高强倒也是事实。你看，横蛮强悍、“膂力少比”的董卓，他敢与之决斗。袁术遣三万步骑来攻刘备，他敢率千余步骑驰往救援。临场，辕门射戟，一箭而退强敌。他所以能在东汉末年的群雄并起中享

有“飞将”的盛名，所以能在民间得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曹瞒传》）的流誉都不是偶然的。可惜他“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陈寿评语）。他没有忠诚的谋士，唯有一个陈宫，刚直烈壮，智谋过人，但“为吕布划策，吕布每不从其计”（鱼氏《典略》）。他没有忠诚的将士，唯有一个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将众整齐，每战必克”。“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名为‘陷阵营’。”“吕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高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事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引自《英雄记》等）好谋士，他不能听，好将士，他不能用，最后剩下孤家寡人，即便是力能扛鼎，又有什么大用呢？



他爱美女，爱得不顾一切。谋士可以不听，将士可以不用，唯独美女却不可一日无之。《三国演义》说，司徒王允以美女貂蝉行连环计，离间了他与董卓的父子关系，这当然也是小说家言，但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以及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吕）布”却是见诸《三国志·魏书·吕布传》的，小说家言，当亦有所本。吕布不仅私通他老爹的侍婢，还勾引他部下的妻妾。他被俘以后，曹操问他，为什么打败仗？他说，他待诸



将很好，可是诸将临急却背叛了他。曹操当面揭露他“爱诸将妻”的丑闻，并质问他，这算是对诸将好吗？他只好“默言不语”。吕布一生的事业、他的兴衰成败，大抵都与女人有关。他下决心杀董卓，与女人（董卓的侍婢）有关，他的降曹被杀，也与女人有关。他与曹操决战时，本来决定由陈宫、高顺守城，他则率精兵出城去断曹军粮道，这未尝不是一条好计，但是他的妻子魏氏以儿女之情扯他的后腿，使他放弃了这唯一可能的自救之道，终至城破被杀，玉石俱焚。

吕布在公元192年四月杀董卓，六月被

董卓的旧部赶出长安，以后南求袁术、北请袁绍，再走河内，又去兖州，奔刘备，取下邳，战曹操，直到199年兵败被杀。这六年半时间，他跑遍北方大地（流动的地区含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地盘。他以反董卓起家，打的是官军的旗帜，实际上比流寇还不如。《英雄记》说他的军队“所过虏掠”，可见他是靠抢劫百姓生活的，《后汉书》说他南求袁术的时候，“袁术待之甚厚”，但“吕布自恃杀（董）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钞掠”。袁术只好赶他跑。连到了人家的地盘去求人家，还改不了掳掠的习惯，可见这个军阀平时“黑”到了什么程度。这“黑”的结果是民心丧尽，谁也不拥护他，这样的军阀除了灭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吕布的一生，叛丁原、叛董卓、叛袁术、叛袁绍、叛刘备……虽然他不讲任何道德，也没有任何人格，早已为天下人所不齿，但他在被曹操俘虏后，却仍然厚颜无耻地要求曹操放了他，让他带领骑兵去给曹操打天下。毕竟吕布是一员骁勇无比的虎将，曹操有些犹豫，这时坐在旁边的刘备发话了：“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曹操领悟了，这才将吕布枭首送许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读史至此，评道：

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

若夫倏彼倏此，惟其意之可怒发，旦暮狂驰而不能自信，惟吕布独也。而有骁劲之力以助其恶，嗾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触之斯闕矣，蹂躪于中夏而糜所底止。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乱人不亡，乱靡有定。（《读通鉴论》，卷九）

尽管吕布之叛董卓，在客观上对当时人民有利，但他后来打着官军旗号，掳掠残暴，戕害百姓，已成为民众痛恨的对象，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王夫之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少一个残杀成性、以掳掠为生的大军阀，对人民是有好处的。

多端寡要的袁绍与 虚有其表的刘表

这是三国初期两个地盘最大、实力最强、名声最显赫的地方军阀。但是后来都被曹操打败了。毛泽东读史时，对他们的评语甚多，“多端寡要”和“虚有其表”是毛泽东对袁绍和刘表最具概括性的评定。“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贞观政要》）袁绍和刘表是三国历史上两面既可使他人知兴替，又可使他人知得失的镜子。

多端寡要的袁绍

袁绍的出身、兴起和失败，我们已在论述官渡之战的文章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评述，这里再结合历史事件，对袁绍使用人才上的失误作一些分析。

袁绍是东汉末年名声最大的高干子弟。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本人又“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名誉极好，所以“士我多附之”，他曾是大将军何进的亲信，官至司隶。董卓进京，倒行逆施，关东各州组织讨伐董卓的联军，共推袁绍为盟主。当时的曹操不过是这支联军的一支小部队的首领，根本无法同袁绍抗衡。

董卓垮台以后，袁绍领冀州牧，后来击破公孙瓒



袁 绍

等，占据幽州、青州、并州，聚兵数十万，成为北方最大的军阀，当时的曹操只占据兖州、关中和许都附近的河南之地。这些地区经董卓及其余党的破坏，城市残破，农村凋敝，遍地饿殍，远不及袁绍的地区安定，当时曹操的兵力只有四万，尚不及袁绍的一半。

但是袁、曹两军决战，地盘大、兵力财力充足的袁绍却被地盘小、兵力财力不足的曹操打败了。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的失误，应是主要的。

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的失误又与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性迟而多疑”（郭嘉对袁绍的评语）的性格缺陷有关。这个问题在《官渡对话袁、曹》一文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袁绍“多端寡要”、“性迟多疑”的性格所造成的使用人才的失误，实是造成他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

毋庸置疑，政治、经济或军事集团的成败，与人才优劣关系极大。好的决策与好的决策的实施，都离不开优秀人才。

袁绍那里没有优秀人才？或者他拥有的优秀人才没有曹操的多吗？否，当时袁绍集团不仅有优秀人才，而且其数量和质量都比曹操集团要多、要好。

人们熟知的沮授、田丰、荀谏、审配、逢纪等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就是曹营的重要谋士郭嘉、许攸原来也都是袁绍的人。

那么，为什么具有人才优势的袁绍竞争不过远不及他的曹操呢？

关键是能不能用人，会不会用人。有了人才不能用，或者能用而不会用，则人才再多再好也没用。相反，人才虽然少一点，但能用、会用，仍然可以夺取胜利。

我们看袁绍对他智囊团里两个谋士沮授和田丰的态度，就可以明白，袁绍“多端寡要”、“性迟多疑”的性格在人才问题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危害！

沮授和田丰是袁绍智囊团中智商最高的人才，他们的智力比之同时代的郭嘉、诸葛亮和鲁肃略不逊色。

袁绍起兵之初，沮授曾与袁绍对话于冀州。《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述：

沮授说(袁)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协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袁)绍喜曰：“此吾心也。”

这次冀州对话，沮授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其卓绝的见识不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或鲁肃的“吴中对”之下，但这样一个大人才，袁绍竟不会用。

对袁曹之争，沮授的战略是打运动战，打持久战。在袁绍意欲挥师南下时，沮授谏曰：

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做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后汉书·袁绍传》）

这样好的战略建议，袁绍不听，他偏偏要在内部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带领大军与曹操对峙于官渡。

在决战之际，沮授建议袁绍出重兵防备曹操袭击鸟巢的粮队，袁绍还是不听。结果曹操果然率精兵夜袭鸟巢，并进而扩大战果，打垮了袁绍。

袁绍兵败，沮授被擒，曹操对沮授说：“本初(袁绍)无谋，不用君计”，劝说沮授归顺。还说：“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沮授不肯降，被杀。这样一个连敌人都承认其才干的智谋之士，而且是那样的忠诚，却得到了如此的下场，真是令人叹息。

田丰也是个大人才。袁绍决定率领大军南下时，他同沮授持相同的意见。他劝袁绍说：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这样好的方略，袁绍就是不听，田丰恳切地再谏，袁绍竟勃然大怒，把田丰关押起来。袁绍兵败，有人向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答：“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这个聪明透顶的人说对了，袁绍逃回来以后，对人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急忙把田丰杀了。陈寿修史至此，写道：“（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假如袁绍的性格不是这样忌善多疑，兵败以后仍能重用田丰，袁曹之争也不见得就此打上句号。就是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也还说过“向使（袁）绍用田别驾计，（胜负）尚未可知也”。（《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引《先贤行状》）

官渡兵败，沮授死于敌人手里，命运够惨了，但田丰却死于自己人的手里，命运更惨。西晋史家孙盛说：“观田丰、沮授之谋，虽（张）良、（陈）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闇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人们不应当从这段凄惨的历史故事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吗？

虚有其表的刘表

再谈刘表。

刘表（公元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是皇族旁系。这个人好读书，讲礼节，年轻时即很有名气。他长相蛮好（史书上说“身高八尺，姿貌甚伟”）。当时儒林中有“八俊”（即八个名士）的称号。他是“八俊”之一。

黄巾起义以后，荆州出现混乱局面。袁术、孙坚、地方宗族势力都在拉队伍、争地盘，刘表做过东汉王朝大将军的参谋，又有很大的名望，朝廷委任他以代理荆州刺史的名义去安抚一方。

这时候的刘表颇有一点锐气。他单马入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与荆州的地方实力派蒯、蔡两大家族结合，用计谋杀了宗族势力的头目，射杀了袁术的前锋孙坚，团结董卓的余部张绣，又陆续收复南方的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成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荆州之霸，风雨飘摇中的东汉王朝承认了他的统治，命他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武成侯，假节。



刘表

拜将封侯的刘表，这时昏了头，陶然沉醉于独霸一方的成就中，不思进步，只想过过土皇帝的瘾。

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通鉴》：

（刘）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

《后汉书·孔融传》亦说：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提升乘舆。

郊祀天地，是当时皇帝的特权，居处服用“多行僭伪”，是说刘表违反封建礼数，在生活上使用皇帝才能使用的东西。这在封建社会里都是逆上的大罪。所以毛泽东批评他“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当时，曹操已把汉献帝迎到许都，刘表虽然奉表贡献，但并不附曹，而且仍然与曹操的宿敌袁绍通好。袁、曹争雄官渡，袁绍派人向他求助，他答应了，但并不出兵，曹操要他反袁，他也不理会，他在袁、曹之间采取“保江汉，

观天下变”的中立立场。他的部下蒯越、邓义、韩嵩、刘先一致反对他的中立立场。他们说：

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刘表听了这些意见狐疑起来，但仍不能作出果断的决定。他派韩嵩到曹操那里探听虚实。韩嵩回来，说曹操能打败袁绍，劝刘表附曹反袁，刘表又怀疑韩嵩被曹操收买，要杀韩嵩。他和袁绍一样，也是个“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的人。

这时反曹的刘备兵败来投，刘表给以厚待，却也不重用他。曹操北伐袁尚、袁谭时，刘备建议刘表迅速出兵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都，刘表听了觉得有道理，但也不肯发兵。曹操回师后，刘表又懊悔丧失了一个打败曹操的良机。他向刘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

刘表在袁、曹争雄关键时刻的两面派表现，触怒了曹操，曹操平定北方后不久，即挥师南下，荆州只好投降。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袁绍、刘表传》的总评中说：“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终至失败。这两人确实是两个可以观“兴替”知“得失”的好教员。

中

卷六 評表
 袁世祖等實書者自述而至于三百有餘人... (text continues with a detailed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mentioned in the text)

毛泽东评点《刘表传》手迹“中”

Handwritten annotations in cursive script (草书) are placed over the printed text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annotations are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text of the document is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s. The annotations appear to be critical or explanatory note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events described.

毛泽东评点《刘表传》手迹

“虚有其表”

毛泽东评点《刘表传》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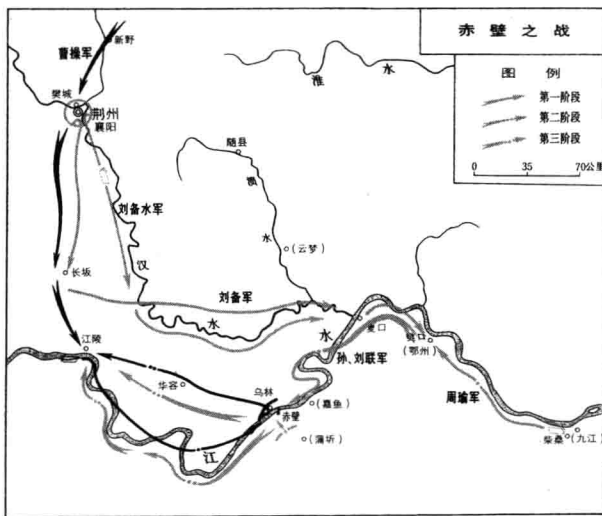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角逐

每当我们从江汉平原跨越长江天堑的时候，面对那烟雾苍茫、气势磅礴的大江，一千八百年前赤壁大战的景象，总是不断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像江中的波涛，拍击着我们的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那个时代三雄争霸的一场生死决斗。这场战争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对于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军事史上，它又是一次以弱小之军打破强大之军的有名大战，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过这个战役，它的经验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这场发生在三国时期的著名战争，还从各个方面为后来一切处于社会大动荡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重要启示。这一点，甚至得到了今天国际社会的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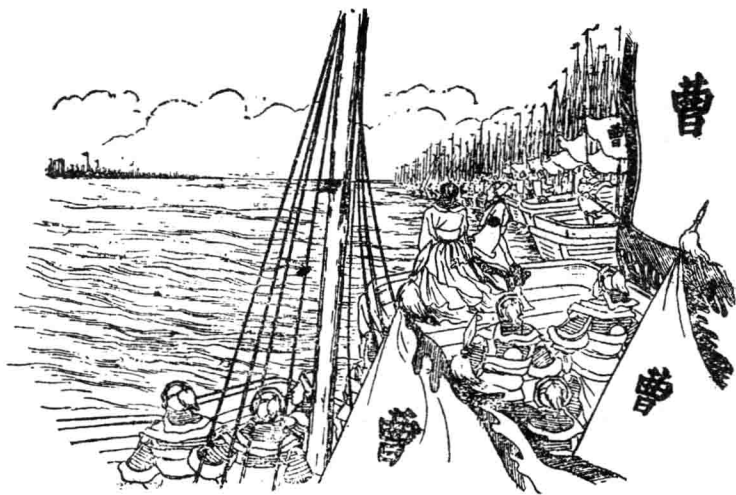
日本评论家尾崎秀树为日译本《三国志》的出版写道：“现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向着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中，要求独立自主的趋势强烈，而产生在三国时代的人们的智慧和行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赤壁战前的全国形势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起关中、东至大海、北抵幽燕、南达江淮的广大地区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只有中南荆州地区（今湖北、湖南省大部，广西、广东、贵州、河南等省区一部分）属刘表；江南东吴各郡（今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省大部分）属孙权；西南益州地区（今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部，云南、贵州等省一部分）属刘璋；西北关西、汉中地区（今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大部及陕西省西南部等）属马超、韩遂、张鲁等。

曹操为什么不在官渡之战后，乘军事胜利的声威进行两级跳跃，一举拿下荆州、东吴呢？这除了当时袁绍的残余势力袁尚、袁谭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乌丸牵制了他的力量以外，还有经济力量的不足。

经济力量，表面上看似没有武装力量威风，但实际上，它是军队活力的基础。南下荆、吴的战争，其规模远比官渡战争要大，除了要征集几十万大军，还要征集军粮、草料等物资，而曹操当时统治的黄淮流域原是十年农民起义的主要地区，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大小军阀连年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凋敝。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民暂时还没有力量满足这样庞大的战争需要。官渡之战中，因为军粮供应的困难而几乎招致失败的教训，对于曹操记忆



双方隔着长江，对面相望

犹新。不是曹操缺乏统一中国的雄心大志，而是力量不足。

经济力量这个无形的教员教会曹操懂得了许多事情。这个军阀中的佼佼者，知道他必须在统治者和老百姓这两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采取一些适应新情况的对策。他不得不承认农民是历史上的一种活跃的力量，没有他们的积极性，他是既得不到兵力，又得不到粮草。为了调动这种积极性，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他不得不和这个不久前还在起义战争中表现了其强劲力量的农民达成新的协议，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调整双方关系的对策。不久前，他在河南一些地方实行的同农民六四分成、对半分成的屯田政策得到了成功，这些经验需要在整个新统治地区推广。他需要一个休整和积蓄进攻力量的时间。这就是官渡之战后曹操没有马上实行两级跳跃，向荆、吴地区进军的主要原因。

到公元 208 年，北方地区已经初步安定，生产情况也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曹操认为他已经有了发动南下战争的力量。这年七月，曹操听说荆州牧刘表病重，就开始考虑南征行动。八月刘表病卒，曹操马上抓住这个大好战机，亲率十五六万大军急速向荆州地区进军。

曹操之所以要这样急促地向荆州进军，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第一，荆州地区在东汉末年局面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卷入北方军阀的

混战中去。北方的士族地主移居此地的不少，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有力量的。这个地区的军政首长刘表虽然懦弱，但是他是有名的“八俊”之一，在荆州地区有一定威信，深得当地士族地主的拥戴，贸然向他发动进攻也有一定的困难。现在刘表死了，继任者是他软弱无能的小儿子刘琮，整个地区失去政治上的中心，这正是加紧进行军事吞并的好机会。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荆州地区还有一个刘备问题。官渡之战时，刘备坚决反对曹操，带了一部分人马逃往荆州依附刘表。他因为同当地的士族地主缺乏联系，多年来也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公元207年，他以极端热忱的态度，亲自去隆中，请出了在当地知识分子中威望颇高的诸葛亮做自己的助手，荆州士族地主对他的观感也为之一变。刘表死后，刘备很快即会成为荆州的新主人。曹操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对刘备了解得太多了。公元196年刘备同吕布争夺徐州失败，前来投奔曹操，曹操曾在饮宴间同他谈论天下英雄。曹操问刘备，天下英雄是谁？刘备装傻，说了一大堆名人。曹操说，都不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那时候，孙权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娃娃，曹操对他了解不多，所以他的英雄名单中只有刘备与他自己。什么叫“英雄”？大野心家呀！刘备一听，就知道曹操看透了他，吓得发抖，连手里拿的匙箸都掉落了。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呆在天下的形胜要地荆州，怎么得了！只要他动手稍微晚一点，高材捷足的刘备就会登上荆州牧的宝座。那时近十万的荆州水陆大军就会落到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为羽翼的刘备之手，他再想啃这块硬骨头，就困难了。

紧靠荆州的孙吴集团也看清了这个形势。远见卓识绝不亚于诸葛亮的大政治家鲁肃，在刘表刚死的时候，就对孙权说：“荆州与我国接壤，那个地方江山险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是个极重要的去处。现在刘表刚去世，他两个儿子不和睦，军中诸将各有打算，刘备是天下的枭雄，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妒忌他的才能，不愿意用他。我们应该去那里看看，假若刘备现在能同刘表的儿子同心协力，上下齐同，政权稳定，我们就同他们加强联系，结为盟好；如果他们那里上下离心，混乱不堪了，我们也可以乘机下手据而有之，否则曹操一定先下手了。”于是，孙权便派鲁肃以吊丧名义出使荆州，探听虚实。

但是，他来迟了。

老谋深算的曹操真是“兵贵神速”。鲁肃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到夏口(今湖北武汉)的途中听说曹操正在向荆州进军,于是,昼夜兼程往荆州进发,但是这个不辞辛劳的大使,还是落到了曹操十几万大军的后头,在他到达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的时候,新上任的荆州牧刘琮已经投降了曹操。

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北)听到刘琮投降曹操的消息,急忙率领所部向南撤退,曹操恐怕刘备占据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西北),当即派出轻骑五千,以一天三百里的快速,昼夜兼程地向南追击。刘备被迫得抛弃了妻儿辎重,只带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少数人狼狈逃命,直到得到关羽水军的接济,才转危为安。其窘态大概不亚于其远祖刘邦的彭城之败。

公元208年十月,鲁肃在刘备向南逃奔的路上与刘备相遇,这个大使沉着地向刘备转达了孙权的问候。然后,问刘备准备到哪里去,刘备茫然无措地随口应付说:“准备到苍梧(郡名,在今湖南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治所在今广西梧州)投奔老朋友、苍梧太守吴巨。”鲁肃看到荆州形势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原来的设想,知道曹操取得荆州以后,必定要进一步发动吞并江南的战役,就毅然说服刘备同孙权联盟,一起抗击曹操。

鲁肃以诚挚的态度向刘备说:“吴巨是个平庸的人,远居边区,眼看就要被别人吞并了,怎么靠得住呢?孙将军现在据有江南六郡,兵精粮广,他为人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南英豪都归附了他,这是个足以成事的人,你不如派人同孙将军结盟,共济破曹大计。”鲁肃又以诸葛亮哥哥诸葛瑾(孙权的长史)好友的身分去说服诸葛亮。其实,鲁肃提出的孙刘联盟的主张也正是诸葛亮的一贯主张,这两个不同集团的卓越政治家互相发现自己同对方持有相同的政治见解,很是高兴,遂互相定交。随后,刘备驻兵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诸葛亮向刘备请命出使东吴,随鲁肃一起来到柴桑。

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荆州战场的初步胜利,使曹操的头脑膨胀起来。这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想乘胜去迫降孙权。在这个五十多岁、身经百战的疆场老将军眼里,年方

二十六岁，没有经过什么大场面的孙权，只不过是个同刘琮差不多的黄须小儿，他以为只要他一吓唬，这个小儿郎就会乖乖地向他低头求饶的。

在没有打垮刘备之前，曹操本应该给孙权送去一封敦睦友好的书信，以稳定和麻痹孙权，并防止刘备去同孙权联合。但是这个头脑发热的老家伙给孙权送去的竟是一封趾高气扬、令人难堪的挑战书，这封挑战书倒是写得言简意赅，颇有气势：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

“奉辞伐罪”是奉皇帝旨意讨伐有罪的人，“会猎”原意是大规模的狩猎，用在这里是含蓄地表示要同你孙权会战的意思。不明言战争，以会猎作比喻，为的是给孙权一个遣使请降的余地。

曹操在这里犯了一个不算是很小的错误。他既不了解东吴的国情，也不了解年轻将军孙权的性格。他不知道在荆州战场的战事尚未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资本以胜利者自居，更没有权力向未来战场的对手发出胜利者的叱咤声。他高兴得太早了。这正像古人说的：“曹瞒老来不介事，误认孙郎作阿琮。”是的，一个军事统帅的高兴是应该有严格时间限制的。他有权利高兴的时间只能是在整个战役胜利结束的时候，而不能在此之前。无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哪怕这胜利是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他都不能提前表示自己的高兴，原因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情况还可能有意外的变化。

正在密切关注荆州战场形势变化的孙权，为这封傲慢的挑战书激怒了。他还不知道曹操的真实兵力，也不了解荆州战场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但是已经不甘心这样耻辱地屈服于人。他已经倾向于把战争的砝码投进曹刘之战的天平。

这时，他的特派大使鲁肃带着刘备的使节诸葛亮回来了。这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政治家诸葛亮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显露其锋芒的时刻，那时他才二十七岁。

诸葛亮同孙权的谈话内容是尖锐的。在谈话中，他根据孙权的性格，使

用了反激法,但基本态度还是诚恳的。并不像小说家描写的那样玄虚。

诸葛亮说:“现在天下大乱,将军起兵于江东,刘豫州(备)坚持在汉南,共与曹操争夺天下。现今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又攻破了荆州,威震四海,难以抗拒,所以刘豫州才打了败仗。将军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一下,如果自信能够以吴越之众同他抗衡,就早下决心同他决裂。如果不能,就收兵束甲,放下武器,解除武备,向他投降。现在将军表面上假托服从的样子,内心里却犹豫不决,事情这样急迫还不作决断,恐怕祸患就要来了。”

孙权说:“要是像你说的,那刘豫州怎么不快去投降呢?”

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尚能守义不辱。刘豫州是王室的后裔,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他像江河之归大海。如果打不过曹操,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怎么能去投降呢?”

听到这里,孙权勃然而怒了:“我不能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他人。我已决心抵抗。现在能对曹操采取坚决抵抗态度的人只有刘豫州,但是刘豫州新败之后,怎么能有力量再当此难呢?”

诸葛亮说:“刘豫州虽然新败,但是归来的战士加上关羽的水军尚有精兵一万,刘琦和江夏的战士也有一万。曹操的兵马远来疲惫,他追赶刘豫州的时候,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这正像常言说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为用兵所忌。兵法说的‘必蹶上将军’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降服曹操,也是被迫于他的武力,并非出于心服。现在将军只要指派猛将率精兵数万同刘豫州齐心协力,共同抗曹,就一定能打败曹军。曹军失败,曹操北还,那时荆、吴就可以同曹操鼎足而三了。”

诸葛亮的这番话分析了曹操政治上、军事上的弱点,说明了刘备方面的兵力情况及其实战能力;指出了只要孙刘两家齐心合力就能打败曹操。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孙权听了大为高兴。

接着,孙权召集大臣开会,讨论和平与战争大计,并把曹操送来的挑战书交给大家看。

大臣们讨论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曹操的挑战书所吹嘘的八十万人马吓住了,投降主和的意见在会议上占了上风。

长史张昭说:“曹操挟天子以征伐四方,动不动拿朝廷的名义压人,我们要是抗拒他,就变成了叛逆朝廷,在道理上讲不过他。再说,我们可以拿来

抗拒曹操的只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领了荆州，得了刘表的水军，数以千计的战船都被他掌握了，沿江摆开，再加上步兵，水陆俱下，我们怎么能抵挡得了？我看不如迎顺他吧！”其他一些大臣，也附和张昭的意见。

鲁肃一言不发。他在孙权起身更衣的时候，追出去找孙权，孙权拉住他的手，问他要说什么，鲁肃说：“我感到众人的议论要误将军的大事。今天，我鲁肃可以迎顺曹操，可是将军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迎顺曹操，曹操还会给我官做，将军迎顺曹操，出路在哪里呢？愿将军下决心早定大计，不要听众人的议论。”

孙权听了鲁肃的话叹息道：“诸人的议论，真使孤家失望，卿家的宏伟见识，才合我的心意。”

是的，真理不总是在多数人的手里，这在古代也是如此。鲁肃又劝孙权召回另一位大臣周瑜问计，这人是孙权哥哥孙策生前的亲密战友，当时任前部大都督。

周瑜（公元175～210年）是个主战派。他回来后，坚决反对大臣们投降主和的意见。他向孙权说：“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应当横行天下，怎么能去投降曹操呢？曹操的北方并未完全平服，马超、韩遂还在关西为他的后患，他却舍弃鞍马，持仗舟楫来与我们争锋。在地冻天寒的冬天，马无藁草，他却驱赶中原的官兵，长途跋涉来到江湖水边。官兵水土不服，疾病丛生。这些都是用兵所忌，曹操都犯了，现在正是将军擒拿他的时候，为什么倒去迎顺他呢？我愿意领精兵数万，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击破此贼！”

雄姿英发的大都督对于主和派意见的驳斥，是带有决定性的。他虽然还只有三十三岁，但是在江东士族地主阶层中名望很高。他是孙策临危时的托命大臣，又是前方的军事首脑，在东吴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被曹操视为“黄须小儿”的孙权，听了周瑜的话高兴极了。他要发挥他的至上权威了。他拔刀砍掉了奏案的一角说：“孤与曹操老贼势不两立，现



周瑜

已决定迎击！诸将吏敢再说迎顺的话，与此案同命运！”大臣会议宣告结束。

孙权这种果敢的决断，是符合古代的民主集中制的，大计未决之前，自由讨论；大计一决，不许再有动摇。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曾怀念起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

这“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话本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叹息。

在孙权决策迎击曹操的当天夜里，周瑜再见孙权，商量战争方略。周瑜说：“诸人被曹操书信上说的八十万大军威慑住了，不去想想他说的是虚是实，就主张迎降，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根据我核实的材料，曹操所率领的北方官兵，不过十五六万人，已经疲劳不堪。他在荆州得到的刘表的人众，也不过七八万人，这些人对曹操还心怀狐疑。曹操驱使疫病的士卒和狐疑的人众来同我们作战，人数虽然多，却不足为惧。我能得精兵五万，就可以制服他。将军不要多虑。”孙权抚摸着周瑜的肩膀亲切地说：“子布（张昭的字）这些人各顾妻儿，只考虑自己，叫人非常失望，只有你和子敬（鲁肃的字）与我同心。五万人众难以一下子选齐，我现在已经选调了三万人，船粮战具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和子敬、程公（普）先出发，我当继续调拨人众、粮秣为君后援，你要是能速战速决打败曹操最好，万一不如意，就向我靠拢，我当与曹操决一死战！”

于是，孙权下令，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兵立赴前敌，同刘备协同抗曹。

在任命周瑜担任抗敌主帅的时候，还发生了老将程普等人不服的问题。但是孙权坚决支持了他心爱的青年将军。毛泽东后来在评论此事时，肯定了孙权大胆任用青年人的做法，并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向大家介绍。毛泽东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水上战斗

公元208年末，周瑜在樊口与刘备会面以后，即共同赴敌。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水上战斗，在现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的赤壁山下展开，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

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赤壁下的小战。

这是赤壁之战的序幕。目的是争夺长江南岸赤壁山下的滩头阵地。由于当时曹操的士兵已经染上疫疾，首次交战失利，曹军退回长江北岸。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至关重要。它鼓舞了孙刘联军战斗士气，打破了曹操在江南建立作战基地的企图，造成了孙刘联军同曹军隔江相持的有利态势。

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水上战斗。

这是赤壁之战的主要部分。在赤壁之战中，周瑜采取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一般应采取持久作战方针。即避免自己的主力在不利于自己的兵力对比情况下同敌人决战。要诱敌深入，拉长敌人的战线，疲劳敌人，减杀其优势，然后寻找有利时机、有利地点击破敌人。周瑜为什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的却是速战速决的方针呢？这是因为：

1. 曹操为抓紧刘表死去的时机夺取荆州，昼夜行军、作战，轻骑一日一夜三百里，战线已经拉长，军队已经疲劳。特别是北方战士不习南方水土，军中疫病流行。在这种情况下，敌军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而孙刘联军人数虽然比曹军相对少一些（二十三万比五万），但士气较高。这正是决战的好时机。

2. 荆州新近依附曹操的水、步军七八万人，军心不稳，战斗力不强。但是时间一长，曹操会在这部分人众中加强组织工作，那时这部分人众将由曹操的消极力量变为积极力量。特别是荆州原来的水军，一旦为曹操完全控制，将变成孙刘联军的大敌。所以，必须在曹操还没有能完全控制荆州新近依附的力量的时机，同曹操进行决战。

怎样同曹操进行决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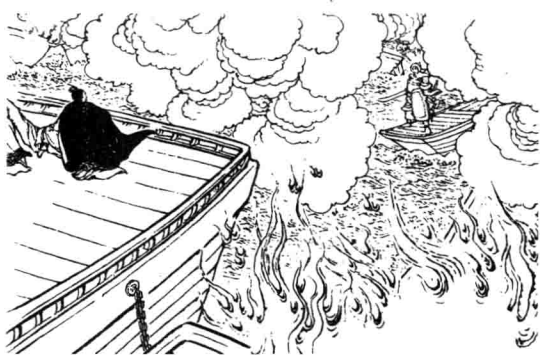
当时，曹操的水军有数以千计的大小舰船，为了防止风浪颠簸，这些船分别用铁环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像一座水上长城。以一般的水战方法向这样庞大的水上堡垒发动攻击是难以取胜的。

劣势战胜优势、弱军战胜强军的重要方法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战争灵活性,以自己的强点向敌人的弱点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周瑜正是这样做的。

他的战斗方案是利用水面、气候以及敌人舰船连结在一起,既集中又行动不便的特点,向敌人发动突如其来的火攻,先烧毁曹操的船只,造成敌人的慌乱被动,然后乘机掩杀。

他选择东南季风到达长江水面的有利时间,叫东吴老将黄盖去向曹操诈降,然后再用许多船只装满薪草膏油等引火物,披上伪装,向曹操的水军大营进发。船到大江中心张起帆来,大声呼喊:“黄盖来降!”曹军官兵以为黄盖真来投降了,纷纷出来观看。在船行到离曹军水军只有两里地的时候,各船一起点火,随船的东吴士兵从船上退走,让着了火的船只乘着东南风直向曹军的船队猛冲过去。这时,火越烧越烈,风越刮越大。着了火的船只像离了弓弦的箭一样径直插入曹军水营的船队中间,马上烧着了曹军水营的大船,引起熊熊大火。曹军的船队因为首尾相接,一时分解不开,无法自救。



一会儿连岸上的营盘也着了火,火焰冲天,曹营顿时大乱,人马被烧死的、溺水而死的多极了。周瑜和刘备各自指挥自己的人马从火路中拨出通道,勇猛向敌人冲杀过去,呐喊声、擂鼓声,震耳欲聋,曹军全线崩溃。孙刘联军乘机追击,水陆并进。曹

操带领败军仓皇逃窜,走到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道路泥泞不通,天又起大风,狼狈之极。他为了逃命,叫瘦弱的士兵背草填路,前面刚填好了路,后面的骑兵就上来了,背草士兵被人马践踏,死于泥中的很多。

这次战斗,曹操的人马被烧死的、淹死的、战死的、踩死的,加上因疾病、饥饿而死的,共占全军的半数以上。这是他一生战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第三阶段:争夺荆州广大地区的战斗。

火烧赤壁以后,曹操引大军北归,让曹仁、徐晃等大将守江陵、襄阳。孙

刘联军继续乘胜进攻，先后夺取了曹操占领的荆州各地。曹操的势力被驱赶出荆州大部地区，只在襄阳以北保留了一块基地。

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对赤壁之战曹操败，孙、刘胜的结局，历代史学家议论纷纭。站在孙、刘一边的人为之兴奋，站在曹操一边的人为之抱憾。但是在以往历代的史家中，不论兴奋者还是抱憾者，都把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归诸那个时代英雄豪杰，即帝王将相的个人作用。根据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编演的著名古典戏剧《群英会》、《借东风》等，也把战争胜利的原因归诸周郎的神机妙算和诸葛亮的神仙方术。这些传统的偏见，极大地妨碍人们去认识历史的真实。

我们已经看到，英雄豪杰在这场历史性战争中确实是发挥了他们很大的能动作用。他们是双方军事力量的组织者、战争方略的决策者、战斗场面的指挥者。但是他们，甚至再加上他们的将领，都不是战争力量的主体，更不是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力量。

战争力量的主体，是参与这场战争的、双方共达二十八万之多的士兵。这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是这些士兵们在打的。正是他们的力量，他们战斗积极性的高低，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他们的参与（包括运动方向不同的参与），任何一个英雄豪杰的战争方略、战斗方案、战场指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绝对不是旧的戏剧舞台上那种跑龙套的角色。

但是士兵们战斗积极性的高低又是什么力量决定的呢？

士兵战斗积极性的高低问题，是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士兵们战斗积极性的高低，总的来说，不过是人民对战争态度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是由这场战争与各个战争参加方的人民的利益关系确定的。在各种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利益，所以归根结底，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问题，历史命运的最后决定者是经济力量。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形势分析中简单说过，北方地区在长期战争中生产

遭到破坏,经济凋敝衰落。到公元208年,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因为元气大伤,经济情况还是不好。

经过东汉末年的董卓、袁绍、袁术、曹操、陶谦、公孙瓒、吕布、刘备等大小军阀的混战,北方的几个富庶地区都遭到破坏,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关中地区被破坏得最厉害,几十万户人家,流离、死亡殆尽,长安几乎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不见人烟。关东地区洛阳、南阳两大城市也毁坏了。从公元196年到赤壁之战前的公元205年,因为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再度减少。据一个家族的典型统计,这期间他们全族原来有两百多人,后来死亡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七十人。诗人王粲在《七哀》诗里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情况。公元202年,曹操回到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看到家乡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他伤感极了。直到公元265年西晋取代曹魏的时候,按历史统计资料,全国的人口也只有七百六十七万人。当然,这不是精确的数字,因为那时的逃亡户、私荫户很多,但充其量也就是一千多万人口,约比东汉鼎盛时期的五千多万人减少了五分之四。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人民的要求明显是和平生产而不是发动战争。在经济力量疲弱、生产刚在恢复的北方地区,发动十五六万人马,远离本乡故土,去向庞大的荆、吴地区发动进攻,人民负担之沉重是可以想见的。由于这次战争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利益,人民不支持这样的战争,他们不可能有高昂的战斗积极性,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既然北方人民强烈反对曹操发动的南征战争,为什么此前的官渡之战时,曹操统治的颍川等地区的农民,却能“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尽力去支持曹操作战呢?这是因为官渡之战是发生在曹操统治地区——特别是颍川郡家门口的战争,这个战争依然是军阀之间的争斗,人民对它也是反对的,但是当袁绍的十万大军渡河南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把战争逼到人民头上的时候,人民只能在无法避免的军阀混战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曹操在两大军阀之中,对农民态度比较好一些,于是农民就企望由他赢得战争,而及早结束战乱。这就是人民在官渡之战中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曹操的历史原因。赤壁之战呢?它对曹操统治地区的人民来说,是几百里以至千里以外的战争,而不是荆、吴两地的军阀发动的。荆、吴两地的军阀,没有用

战争来威胁他们的生存，相反是曹操集团为实现他们的政治扩张而发动的。人民为什么要去为这场战争支付巨大的代价呢？他们对这样的战争抱强烈的反对态度，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人民对战争的这种态度，使曹操发动的南下战争一开始就包含着失败的因素。向荆州奔袭的急行军，表面上旗开得胜，实际上战争的失败因素也在随着战争的胜利而迅速扩大。赤壁小战的失利，曹操仍不警觉，终致酿成赤壁大战中的全面崩溃。孙刘方面战争指挥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曹操方面的这种迅速扩大的失败因素。

同曹操方面比较，荆州、东吴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要好一些。荆州地区在那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卷入北方军阀混战的漩涡。东吴地区在公元195年孙策渡江以后，爆发过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战争，但是政治局面要比北方稳定得多。此外，这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也比较好，特别在当时中国地理气候转冷的历史时期，比起北方来，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当然，这两个地区当时都是豪族地主统治的，刘表、孙权、周瑜、鲁肃本人也都是新兴的豪族地主，但是那时他们同依附农民的关系还不是很紧张。他们的军队大部分是以私人部曲为骨干组成的，组织得比较严密，战斗能力比较强。农民和地主还是对立的，但是同残破的北方比较，他们还是希望保持他们现有的经济生活。而曹操发动的南下战争，却使他们企图保持的这点不很高的生活水平亦有失去的危险。在连年战争中，从北方逃往南方的那些农民的悲惨景象，尤其使他们对曹操发动的南下战争抱有反感。他们害怕这个战争侵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对反抗曹操的进犯有一定的战斗积极性。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南军在与曹军作战时表现的那种硬拼精神，就是这种积极性的反映。这些就是周瑜、刘备之所以能指挥他们为数不多的部队打败曹操人数众多的人马的基本原因。

曹操形象长期为抑曹扬刘派史学家所丑化，但是，在纠正这种现象的过程中，又有一种观点认为，曹操征伐荆、吴的战争，是重新统一中国战争的一部分，具有进步意义。赤壁之战曹败、孙刘胜的局面，推迟了中国统一的时间表，并不合乎历史进展的要求。

我们否认这种看法。历史上不存在统一进步、分离倒退的抽象法则。总的来说，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广大中国疆域内实行政治、经

济的统一,是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这并不等于在任何一种历史情况下,任何一种有利于统一的战争都是符合这一目的的。

历史上发生过的统一战争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有利于人民经济交往,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这是带有进步性的统一战争。例如秦始皇、刘邦以及西汉初年中央政权所进行的统一战争;第二种是不利于人民经济交往,不利于人民生活安定,不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这是带有落后性的统一战争。例如匈奴族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原地区的侵犯性战争;第三种是情况比较复杂的,在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性质的统一战争。对这种情况的统一战争需要经过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其历史的价值。曹操统一中国的战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尽管曹操发动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同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大多数统一战争一样,不可能是出于为人民谋利益的目的;同时,这种战争也是以人民的沉痛牺牲为代价的。但是,我们并不完全否定他的这种历史活动。我们认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是属于带有进步性质的统一战争。这个战争以曹操集团的政治、军事统治代替了北方长期的军阀混战,尽管在战争中有牺牲,有破坏,但其总的结果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民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在历史上应予肯定。但是,他在公元208年发动的南下荆、吴的战争,却并不属于进步性质。

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说,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超越了历史规定的时间表,除了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苦难以外,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如果他发动的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公元208年,即不发生在南方经济比较稳定,而北方经济却尚处于困难、落后的情况下,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说,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是在赤壁之战的几十年以后,那时北方的经济繁荣、复兴了,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基本改变了,互相交往的要求增多了,那么,至少北方人民是不会过分反对这场不至于增加他们太多负担的战争的。如同官渡之战时那样,他们对战争的积极性也许会大得多。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在南方豪强地主同农民矛盾日益尖锐甚至采取公开对抗的时期,那么,不仅北方人民不至于反对这场战争,甚至南方人民也会欢迎这位在一定程度上能限制豪强掠夺的“对酒当歌”、“志在千里”的天才诗人了。

所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分析,赤壁之战曹操败,孙、刘胜的局面,不仅

没有阻碍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反而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和发展。首先,这个战争只有这样结束才能减少或解除北方人民支撑荆吴战争的沉重负担。如果赤壁之战是曹操胜、孙刘败,根据当时双方经济力量的对比,南方势必采取其他方式激烈反抗曹操的统治,南北战争混乱的局面难以很快结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还会增大;其次,这个战争的结局,给以后鼎足而三的魏、吴、蜀三国的经济平行发展创造了历史的条件。这种经济的平行发展终将导致全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更好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曹操败、孙刘胜的赤壁之战给以一定的肯定评价。

曹操在战争指导上的错误

经济的力量是最后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决定战争胜负的其他力量还有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等。虽然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归根结底也产生于经济,但它们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仍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历史发展中,经济力量一般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由经济力量形成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又反过来对经济发展发生反作用,有时甚至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战争中,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自然的力量都要经过战争指挥者的组织调度和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战争的胜负,除了决定于战争双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各种力量以外,还决定于战争双方指导者的主观指导能力。各种对于自己不利的客观条件,可以经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而尽量减少其消极作用;各种对于自己有利的客观条件,可以经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而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官兵作战积极性的高低问题,也是可以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变的。

这里的关键是不要犯错误,不要把自己的有利条件化为不利,而要努力化不利为有利。与此同时,要争取把错误留给敌人,把他的有利化为不利,把他的不利化为更大的不利。而曹操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做了相反的事

情。他在战争指导上，把错误留给了自己，把正确赐给了敌人。他缺乏战争胜利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但还具备着暂时的军事优势，如果能努力避免犯错误，同时引导敌人犯错误，他或者仍然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个胜利的苦果。就是说，他能勉强依靠某些有利条件打败敌人，但是由于各种不利条件的发挥作用，他要准备在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付必然会发生的各种麻烦。可是由于他屡犯错误，连这样的胜利苦果都没能尝到。

他以疲惫的急行军的代价，在荆州战场轻易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这胜利却使他丧失了原有的冷静头脑。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怀古》的诗句，是一种艺术上的刻画。《三国演义》作者据此而推绎出曹操为了收罗二乔而建筑铜雀台的说法，却是对曹操的人身攻击。他不至于无聊到这样不知轻重的地步，虽然人所共知，他是个非常贪恋美女的将军。而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的“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情景，倒是对他当时境况的真实描绘。

在生死决战的前夕，有多少军事的、政治的问题需要周密地加以思考啊！不要说是重大问题，就是一个关系战争全局的细节问题考虑不周，都会对战争产生不利的影晌。可是我们这位二十三万大军的统帅却在畅饮、沉醉，挥舞着长矛，高唱“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豪迈极了，英雄极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去准确地判断敌情、仔细地规划战斗方案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曹操在荆州战场的战事尚未结束，就给孙权送去挑战性的“会猎”书，是一个不小的错误。所谓不小，是说他的这个错误是战略性的。他实在不应该在荆州的猛虎尚未就擒的时候，再去向东吴的蛟龙挑起决斗。他的错误推动了孙权、刘备政治、军事联盟的形成。正是这个政治、军事联盟的建立，给曹操的二十三万大军敲响了败亡的丧钟。

我们再拿官渡之战时勇敢、谨慎而多思的曹操，同赤壁之战时骄傲、疏漏而大意的曹操作个对比，许多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官渡之战时，每次作战时，敌人来了多少人，距离多远，他都要计算。粮尽兵乏，是进是退，他都要反复考虑。许攸献计，他同他的智囊团连夜紧急会商。最后，方针确定，他又连夜亲自率领部队紧急出发，那真是戎马倥偬，意气风发。

赤壁之战呢？他飞扬跋扈，忘乎所以，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指挥这样大的战争，他都不制定正确的战略计划，也不作认真的战斗部署。最可笑的是自己的大军同敌人隔江相峙，每时每刻都有进入战斗的可能，但是他竟然连个最起码的抗击登陆的准备都没有。结果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水上吃了败仗，陆上也立即陷入混乱。那么多部队非但连个后卫战都打不了，逃命时还互相践踏、互相残杀。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么喜欢用火攻的方法去攻击敌人的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却不知道防范敌人的火攻。他竟然不知道“火”是不讲究门阀、党派、集团性的，它可以做你的朋友，也可以做敌人的朋友。过去那样明智的一个统帅，现在竟变得这样愚钝。这大概也是利令智昏吧。

孙刘的政治、军事联盟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

孙权、刘备两大集团的政治、军事联盟，对于赤壁之战关系极大。

这个联盟，当时对孙、刘双方都是命运攸关的。没有这个联盟，刘备集团孤立无援，无法抵抗曹操大军的攻势，他的命运不是南逃，就是灭亡；没有这个联盟，孙权集团也只能单独地同曹操作战，困难也很大。

首先，从地理位置说，荆吴相依，唇亡齿寒。刘备一旦被曹操打垮，孙权就失去了屏障，他所居处的柴桑马上就会暴露在敌人铁拳打击之下。曹操的水军、步骑随时都可以向他发动联合进攻。

其次，从军事力量来说，孙权要同曹操作战，兵力是不足的。由于曹操的军队来势很猛，孙权仓促应战，准备不及。他费好大力气才组成了三万抗敌部队，这个数字离开周瑜向他提出的五万不算高的要求，还差两万。而刘备那里的两万部队却恰好能够满足这个最低需求。而且，刘备的部队多是荆州的土著，熟悉本地情况，有保卫乡土的积极性。这个情况对于孙权也是至关重要的。

刘备和孙权无论哪一方，在军事力量方面单独同曹操比较都处于绝对劣势。从绝对劣势变成相对劣势，再加上其他条件，就有了战胜敌人的可能。

再者，从政治情况看，刘备以及同他站在一起的刘琦是荆州土族的代表

人物，他在荆州地区的影响很大，他们不仅是现有抗曹部队的领导者，而且还是被曹操占领的荆州地区人们的精神领袖。刘备从樊城向南撤退时，当时随刘备一起撤退的荆州官员和民众，多达十几万人，仅辎重车辆就有几千辆，只要二刘坚决抵抗曹操，新近依附曹操的民众就不会积极帮助曹操作战，甚至在适当时机还会重新反正。东吴原来与刘表有世仇，不联合二刘，孙权很难再在荆州方面找到其他的臂助。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孙刘的政治、军事联盟不仅使孙权、刘备避免了被曹操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使他们通过这个联盟聚合了力量，在战争中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夺取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个弱小的政治、军事集团联合起来可以战胜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历史经验，一直对后世有着启发性的影响。

当然，曹、孙刘的赤壁之战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霸性质的战争。孙、刘的政治、军事联盟不过是这种争霸战争中合纵连横一类的行动。联盟的主观动机，绝不像他们在公开外交场合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什么“讨恶剪暴”啦，“春秋大义”啦，都不过是一些好听的漂亮话，其实际目的还是出于集团和个人的权力争夺。同一切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联合一样，这个联盟也是一种利害之交。利大则交大，利小则交小；利存则交存，利亡则交亡；利恶则交恶，利反则交反。赤壁战后不久，吴、蜀即为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既然承认赤壁之战孙、刘方面的胜利，客观上对减轻人民的战争负担和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利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联盟的建立，以及为这个联盟的建立而积极进行活动的政治家，也就不能不给以一定的肯定评价。

青年统帅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绝不排斥个人对历史的能动作用。我们在说明人民的态度和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也充分估计杰出历史人物在战争指挥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尤其是东吴军队的年轻统帅周瑜，他在战争指挥中所表现的卓越才能，

他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直到今天仍然在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他，剑气冲斗牛。面对气势汹汹、威震宇内的强敌，毫无惧色。在御前会议一片迎降顺敌的议论声中，力排众议，信心百倍地说，敌人是可以打败的。更可贵的是他并不是依靠空洞的豪言壮语来建立自己的战略思想的。他对敌人的藐视，他英勇雄烈的抗敌胆略，是对战争问题认真研究和深刻思索的结果。

他远离荆州战场，但是却肯下功夫详细调查曹操军队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他对曹操用兵所忌的看法，竟然能与刚在抗敌前线做过大量调查研究的青年政治家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这真可以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了。还有，他在深夜同孙权具体研究战争方略时，对曹操军队兵力及其实战能力的估价，直到一千八百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们了解这场历史性大战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要求孙权给他五万精兵，这个数字也不是随便一说，而是基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的。后来的赤壁破曹之战，孙、刘联军的兵力也只不过是五万。

他的对手不仅在当时是才略过人、实战经验丰富的一世之雄，而且在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这个老虎屁股的确是不好摸的，弄不好就会被吃掉，但是他不怕，偏要去摸。

他并不是随随便便、莽莽撞撞地去摸这只老虎的屁股的，而是根据这只老虎特有的脾气去摸。

他确实把他对对手的脾气摸透了。他根据曹操荆州得手以后那种骄纵、粗疏的特点，以黄盖伪降为诱饵，充分调动一切天候的、地理的、人事的积极因素，大胆设计了火烧赤壁的作战方案，一个迅雷闪电般的奇袭，就把曹操烧得焦头烂额。

在远古时代就学会用火的炎黄子孙们，在战争中从来是擅长于火攻的。兵法中有火攻的专篇，“兵燹之灾”成了人们日常习惯的用语。我们认为，绝不是所有战争中的火攻都是必要的，更不要说不义战争中那种烧毁人民财产的残暴行为了。但是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像赤壁之战中组织得那样巧妙、发挥了那样巨大威力的火攻，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由于这个原因，赤壁战役成了历代军事家学习火攻的军事教材。从周瑜后来的接班人陆逊到一千多年以后的朱元璋、太平军都从这次战争的

经验中得到过有益的启示。

赤壁之战以后的第二年，青年统帅周瑜夭折了。赤壁之战使他过度劳累了；后来又又在同魏军大将曹仁的一次战争中受了伤。

对他的夭折表示哀悼的不仅有他美丽的夫人。从东吴的领袖人物孙权、鲁肃、程普到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广大将士，都对这颗明星的陨落表示悲痛。

某些历史演义小说和戏剧，把他描画成一个心胸狭隘的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的心胸并不狭隘。《江表传》里说，周瑜担任东吴统帅以后，程普以年长自居，多次轻视他，但他却能克制自己，宽大为怀，并不斤斤计较，后来程普为他诚挚的态度所感动，钦佩地说，我和公瑾（周瑜字）交往，好像饮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醉了。

他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虽然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从“曲有误，周郎顾”的传说中知道他甚至对音乐都有精湛的研究。

但是，他在赤壁之战中，却用自己的生命之火为祖国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军事指挥艺术的珍贵遗产。

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
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醞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东坡手书《赤壁赋》

“生子当如孙仲谋”

玉座苔衣，拜遗像、紫髯如乍。想当日、周郎陆弟，一时声价。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看寻常、谈笑敌曹刘，分区夏。

（朱彝尊：《满江红·吴大帝庙》）

“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一世之雄”的曹操对孙权的赞词。公元 213 年，曹操率几十万大军南下，在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南）与孙权率领的七万军队遭遇，初战不利，后来两军对峙月余，各无所获。曹操在撤军北还之际，看到江东水陆大军严整的军容，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父子若豚犬耳！”在中原逐鹿中剪灭群雄、目空一切的曹操，独对孙权如此重视，足见孙权是三国时期十分了得的人物。

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对这位与魏、蜀抗衡的吴国皇帝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孙权不过是个守成之主。他们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天时之利；刘备以仁义道德取信于民，占了人和；而孙权只不过借长江天堑固守父兄基业，占的是地利。同曹、刘两人的艰苦创业相比，孙权登上皇帝宝座，似乎是适逢其时、坐享其成罢了。

这种认识其实是很片面的，本文拟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孙权的文韬武略及其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
 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
 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辛弃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
 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
 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
 词一首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黄[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见[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 京口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黄[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见[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 京口怀古 辛弃疾

辛弃疾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黄[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见[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 京口怀古 辛弃疾

内忧·外患——鼎峙江东不易

孙权(公元182~252年),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孙坚,汉末曾任长沙太守,与刘表争夺荆州时战死。兄孙策,领孙坚部众千余人向江东发展,经过数年征战,占领了江东大片土地,从而奠定了东吴的立国基础。到公元200年,孙策遇刺死,孙权继位。当时占领的地区已有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丹阳(治今安徽宣城)、庐江(治今安徽庐江西南)、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庐陵(治今江西吉水东北)六郡,所以孙权的起家的确是依靠了父兄的奋斗。

但是孙权的继位却又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是适逢其时、坐享其成。

他在继位后面临的各种危机,大大超过了他父兄所曾经历的。

首先是国内危机。孙权接管了江东六郡之后,六郡“英豪”和“宾旅寄寓之士”并不服他。他们原来是慕名前来投奔孙策的,现在孙策已死,新主年轻,就纷纷“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特别是“深险之地”中还有不少“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山越人。他们在当地强宗豪族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支武装割据势力,经常兴兵作乱,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还有孙策一些部下,如庐江太守李术等人甚至另树旗帜,招降纳叛,与孙权对抗。总之,孙权继位时国内形势是极为严峻的,稍有不慎,父兄打下的基业就有坍塌的危险,那时父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付之东流。因此,如何克服国内的困难,稳定江东的局势,是孙权继位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孙权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才干。

第一,团结孙策旧部,安抚人心。

在孙策旧部中,张昭、周瑜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昭,彭城人,汉末避乱江东,任孙策长史,他是孙策旧部的文臣领袖;周瑜是孙策的亲密战友,与孙策共创大业,为江东武将之冠。孙权继位以后,继续任张昭为长史,并待之以师礼;又任周瑜为中护军,事之如兄长。张昭有威望,周瑜有实力。他俩在江东诸臣中率先拥戴新主,谓:“权可与成大业。”那些“以安危去就为

意”的流寓之士见状便也安下心来。文武百僚也随之一致拥戴新主，江东的人心趋于稳定。

第二，招揽俊秀，罗致人才。

继周瑜之后的东吴三位大都督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孙权即位以后招揽的新人。鲁肃原是北方大族，避乱庐江，由周瑜推荐给孙权，当时年仅二十多岁。张昭等说他“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见了他，却“与语甚悦”，非常器重。后来此人成为孙权的重要谋士，帮助孙权制定联刘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中打败了曹操；吕蒙本是个下级军官，但勇而有谋，治军有术。孙权“见之大悦”，破格提拔他为横野中郎将，“增其兵”，委以重任，并勉励他“宜学问以自开益”。他不负所望，认真学习，鲁肃与他谈军事，见他“学识渊博”，大吃一惊，赞之为“非复吴下阿蒙”。后来继承鲁肃大都督的重任，在袭取荆州的战役中立下奇功。类似这种“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的例子不胜枚举。甘宁先是“往依刘表，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后来投奔了东吴，很快即得到了孙权的赏识，“同视旧臣”。这些被他招揽的贤士能人，对当时东吴国内局势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收复庐江，平定叛乱。

庐江太守李术，原是孙策起用的属臣，孙策死后，李术不愿听命于孙权，公然“纳其亡叛”，与孙权对抗。孙权要他归还叛逃者，他却以“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为由，拒不从命，周围三郡也有人响应他。李术的公然对抗，是对江东政权稳定的严重挑战。孙权毅然决定出兵平叛，结果这个骄横一时的李术兵败被杀，其部曲三万军人亦归孙权。接着，孙权又乘势派遣部将程普、黄盖等人“周旋三郡，平讨不服”，陆续把各个不从命的叛乱势力依次消灭，从而使江东政权迅速得到了巩固。

第四，平抚山越，初步稳定了混乱局面。

山越也是越族人，因为“依山恃险，不听王命”而被称为山越，以此区别于居住平原接受官府管辖的越族人。孙策死后，山越人更加不受约束，在当地强宗豪族支使下，蜂起反叛，局面很混乱，甚至影响了平原地区的安定。

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孙权在继位后不久就派兵去各地平抚山越，“使吕范平鄱阳（今江西鄱阳），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尽管

山越作为国内一种不安定因素困扰了孙权一生，但是他继位后不久的这一次平抚活动，初步控制了对山越地区蜂起反叛的混乱局面，非常有利于江东政权的稳定。

刚解决了内部的危机，又出现了外部危机。

正当孙权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江东政权的时候，曹操平定了北方，亲自率军南下，企图一举吞并荆州和江东。荆州新主刘琮不战而降，曹操取得荆州之后，指挥大军直下江东。孙权再一次面临能否守住江东的考验。

曹操让人给孙权下了战表：“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孙权将曹操送来的战表示之群臣，引出了一片“迎之”的投降议论，张昭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所谓“迎之”，就是“投降”。孙权如果听从投降派这种议论，和刘琮一样屈首称臣不战自降，那么，三国的历史就没有了。

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孙权和刘琮不同，他不能毫无抵抗地受辱于别人。在这关系东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力排众议，在投降派的一片喧闹声中，采纳了鲁肃和周瑜等少数主战派的意见，决心抗战图存。他对周瑜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结果，孙权和逃至夏口（今湖北武汉）的刘备结成联盟，共破曹军于赤壁。赤壁一役，曹操败北而归，来自北方的威胁解除了。由于孙权的英明果断，孙刘联军同仇敌忾的坚决抗战，东吴没有为曹操所吞并，而是成为三分天下的鼎足之一。

创业难，守成更难。在汉末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群雄角逐中，先有地盘而后失去地盘的岂止一个人？守江山并非易事。它同样需要英雄胆略

和非凡才能。即使有天堑长江,如果不能组织好防卫,也是守不住的。孙权能够保有江东,并使之成为与魏、蜀三分的鼎足之一,说明了他基本上具备了一个政治家所应有的胆略和才干。

开拓·进取——谋求恢弘王业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孙权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他雄心勃勃地全力投入王霸事业的争斗中。

第一,争夺荆州,控制长江。

“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是鲁肃初见孙权,在君臣合榻对饮时,向孙权提出的战略方针。这条方针对于孙权,就像“隆中对”对于刘备一样重要,所以史家又称之为“吴中对”。它是孙权一直在努力以求的战略目标。“吴中对”的核心问题是全据长江。全据长江的第一个目标是“剿除黄祖”,这一目标早在赤壁大战以前就完成了。公元208年,孙权派大将甘宁攻灭黄祖,夺得了江夏(治今湖北鄂州)。

全据长江的第二个目标是“进伐刘表”。刘表早在曹操南下途中死去,其子刘琮统辖的荆州也在赤壁大战之后分而为三:荆州北部的襄阳等地在曹操手中;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江夏为孙权所占;刘备得到江南四郡。因为南郡治所江陵为周瑜占据,刘备既不能越过江陵向北拓展势力,又不能打通江路向西进取益州,于是向孙权借荆州。为了巩固孙刘联盟,也为了多给曹操树立敌人,孙权听从鲁肃的意见,把江陵借给了刘备。因此赤壁战后荆州的大部分不在孙权手中。

全据长江的第三个目标是“竟长江所极”,也就是谋取长江的上游地区益州。还在孙、刘两家和好的时候,孙权就提出共同谋取西蜀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刘备的拒绝。周瑜亲自率兵前往,又被刘备重兵阻挡。益州后来被刘备夺取。

这样,鲁肃当年在“吴中对”中提出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就集中在争夺荆州的问题上。尽管历代都有人批评孙权在争夺荆州问题上,目光短浅、

没有远见，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顾孙刘联盟的破裂等等，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站在孙权集团的立场上看，他实在也有不可不争夺、不能不争夺的理由。他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尽了自己的努力。借给刘备荆州，又“进妹固好”，可是刘备并非“非久屈为人用者”，他“结好孙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谋天下。作为盟国，他背着孙权独自夺取西川，得了益州还是不肯归还荆州。荆州位居江东上流，扼江东之门户，如果等到刘备势力壮大，顺流东下，就要危及东吴的安全。因此孙权为保住江东，也有必要索回荆州。就是力主巩固孙刘联盟的鲁肃，也为荆州的归还问题同刘备进行过多次外交的、军事的斗争。鲁肃病亡以后，新任大都督吕蒙则力主用武力夺取荆州。他的方针得到了孙权的赞同，于是在关羽率领主力北上攻打曹操所属樊城的时候，吕蒙采取“白衣渡江”的策略，袭杀了关羽，一举夺回了荆州。

第二，继续讨伐山越，消除国内隐患。

三国鼎足之势形成以后，山越的豪帅又多次受别国的指使，兴兵作乱。如鄱阳豪帅尤突、丹阳豪帅费栈，都是接受曹操的印绶之后，作为内应起兵暴乱的。陆逊曾指出山越问题对东吴政权的巩固发展的重大影响：“方今英雄棋峙，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可见，山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孙权的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孙权要想立足江东，与曹魏、蜀汉争雄，必须解决山越这一国内隐患。

孙权解决山越问题主要采用镇压和安抚两手。

公元 217 年，丹阳豪帅费栈“煽动山越”，为曹操作内应。孙权派遣陆逊讨伐，陆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这次讨伐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着又乘胜平定了丹阳、会稽、新都（今浙江淳安）三郡的山越。陆逊以“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办法，得到精卒数万人。

公元 234 年，孙权又派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去解决丹阳的山越。虽然前次陆逊率兵讨伐已得数万人，但在山地的深远之处，还有莫能尽擒的山越武装，为了彻底解决这一江东的腹心之患，诸葛恪采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新策略。

诸葛恪一到丹阳，立即移书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令其各保疆

界，凡归附的山民“悉令屯居”。然后“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山越居民“渐出降首”。对此，诸葛恪下令诸将和有关人员“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此令一出，山民出降更多了。

这时江东内部的山越问题大体得到了解决，山越强者为兵，弱者补户，不但加强了东吴军事力量，又增加了江东政权管辖的民户，从而使东吴的国力得到了增强。

第三，开发江南，拓地岭南、夷州。

孙权在“攘外安内”的同时，又致力于开发江南的经济建设。他认为“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没有经济基础作为保障，民心不归宿，政权势必不能长久维持。为此，他鼓励人民开荒屯田。

东吴的屯田分兵屯和民屯。从事兵屯的士兵，既要打仗也要种田，参加民屯的屯田客只要种地交租，政府免除其兵役。在孙权统辖的大部分地区都推行了屯田。仅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地，参加屯田的男女就有数万口之多。

屯田给东吴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一方面保证了军粮供应，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大批避难而来的流民有了土地，从而保证了国内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又带来了交通的开发和商业的交流，东吴因此出现了“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育腴兼信……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左思《吴都赋》）的空前盛况。

王夫之对孙权开发江南的政策作过这样的评价：“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惟江东也独。”（《读通鉴论》卷十）在先秦两汉时期，江南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北方，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史记·货殖列传》）而到孙权时代，已经出现“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繁荣景象，可见孙权时代的江南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东吴凭借国力与强大的曹魏抗衡，是三国中延祚最长的国家，这不能不

说是得益于孙权开发江南的经济政策。

正是由于孙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从而巩固了江东政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岭南和海洋扩展。公元210年，孙权派遣中郎将步骘出任交州刺史，原督领交州七郡的士燮兄弟臣服东吴，“由是南岭始服膺于权”。这时吴国的疆域是东临滨海，西毗巫山，南达越南顺化，北接江淮平原，占有了扬州、荆州、广州和交州共四州之地。公元230年，孙权又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大船队，到夷州（今台湾岛），这是有史记载的大陆和台湾早期联系之一。公元242年，又派将军聂友、陆凯率大船队到琼崖、儋耳（今海南岛）。

可见，孙权并非如同有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只知守业而没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实现其“恢宏王业”打下的坚实基础。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对他没有兴师北伐尤多异议，甚至指责他“划江自守，偏安一隅”，没有勇决进取精神。其实，这种指责也是不对的，他多次用兵与曹操争夺淮南，但结果都不好。他从实践中认识到“自量其国力，不足以毙魏”，因而不愿再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北伐中原徒劳无益的战争中，而是根据现有条件，努力向南方和海洋发展，然后等待机会北上，这个方针基本上也是对的。他为成就自己的王霸事业，竭尽了全力，采取的各项政策基本是审时度势的明智务实之举。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就把孙权看作是曹操、刘备并驾齐驱的“千古英雄”。他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仅十九岁，赤壁大战时也不过二十八岁。少年英雄，“坐断东南”，诗人望江兴叹，思绪万千。孙权的确是一位令人感怀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一次乘飞机飞越京口，吟诵辛弃疾的这首词，亦感慨系之。

人才·谋略——成功奥秘所在

作为与曹、刘并驾齐驱的英雄人物，孙权身上必有其他人不可企及的特点，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必须归功于他的用人。孙权能够虎踞江东、三分天下，绝不是仅靠长江天险，正如东吴将领贺邵说的：“长江之险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孙权的“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三国志·吴书·贺邵传》）。正是有了大批人才的辅佐，孙权才取得了三分天下的霸业。

孙权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也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但孙权能够虚己纳谏，集思广益，以人才的群体智慧弥补自己的不足，以东吴集团中特有的群体人才优势与魏、蜀抗衡争雄。

孙权的一段话很能概括他的用人思想：“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确实，发扬谋臣武将们的群策群力，使谋无遗算、举不失策，这是孙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纵观江东政权五十年，从周瑜到鲁肃、吕蒙、陆逊，东吴四任大都督，一代胜过一代。这就是东吴特有的群体优势。

东吴的人才优势与孙权不拘一格的延揽人才和推诚相待的用人之道大有关系。

孙权的人才主要由推荐而来。如东吴的重要谋臣鲁肃、诸葛瑾等人都是由他人举荐给孙权的。孙权收揽人才表现为不拘一格地使用。他和曹操一样，不管什么门第名望、血统亲疏、资历年龄等，只要是确有治国用兵之能的仁人志士，他都可以重用。除了上面说过的“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之外，江东政权中有许多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也都是破格提拔的。如陆逊在关羽围樊城时，还是个“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人，但孙权却破格提拔他为偏将军右都督，后来他与吕蒙一起打败了关羽，夺回荆州。夷陵大战前，孙权又提升他为大都督，他不负重托，率军打败了老谋深算的刘备。又

如阡泽，出身农夫，“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但孙权见他有才能，先“辟补西曹掾”，后为尚书，还担任过中书令、太子太傅等重要职务。

和曹操在用人之道上常常以权术驭人相比，孙权基本上奉行的是推诚相待的办法。当然，孙权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他的“推诚相待”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但这不排斥他和他亲密的部下相处时，存在着真实的感情和君臣的情谊。

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兄长，有人密告孙权，说他与刘备暗中勾结。孙权不为谗言所间，反而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你想，诸葛瑾听了这些话，能不感激涕零、死心报效吗？

像这样以诚待人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无怪胡三省要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待，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江东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孙盛也说：“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晚年的孙权，虽然有近小人、远君子的昏聩行为，但只要真正明白自己的过失，还是能与臣属推诚相待，不自护其短。

孙权曾派张弥领万人到辽东拜公孙渊为燕王，张昭力谏不听，结果张弥被杀，万人之众只剩下数十人逃回。当事实证明孙权错了以后，他“惭谢昭”，把张昭载进宫内，深刻自责。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帝王身上，其结果就很难预料。如袁绍在官渡之战时不用田丰之言，战败之后又恐为田丰耻笑，而把田丰杀死。两者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正是因为孙权竭力要与臣属之间形成“荣福喜戚，相与共之”的关系，所以他不但能够延揽人才，而且能够把人才团结好，让他们为江东政权的巩固发展竭尽全力。

孙权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本人的文韬武略。虽然这方面他与曹操相比略有逊色，但在当时的群雄中，他还是佼佼者。

三国鼎足之势形成之后，蜀汉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决不与曹操妥协，魏蜀双方始终处于交战状态；东吴要固守江东，既与曹魏有生死存亡的矛盾，又和毗邻的蜀汉有局部利益的冲突。孙权充分利用了魏蜀双方势不两立、绝无联合可能的这一点，在尽可能保持吴蜀联盟的同时，又不拘一

格地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与曹操、曹丕结成暂时的联合，从而使自己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赤壁之战，东吴靠孙刘联盟的力量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

为袭取荆州，孙权又“不惜屈身忍辱”，派人“诣操请降”，以此作为代价，缓和了孙、曹之间的敌对矛盾。孙权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袭取荆州时面临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以保证夺取荆州目标的顺利实现。

孙权虽然袭杀关羽，夺得了荆州，但却不想让吴蜀联盟永远破裂下去，而让曹魏得利。因而当刘备为关羽复仇而率师伐吴时，他立刻“遣使求和，并晓之以利害”。当他明白吴蜀之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的时候，又展开联魏外交，遣使卑辞奉章，向曹魏称藩，并亲领百官出城，接受曹丕的封王称号。当东吴朝野上下反对向曹丕屈辱称臣时，孙权抬出汉高祖刘邦来为自己辩护：“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盖因时也，何故却之？”孙权这样做的目的，连曹丕方面的谋士刘晔也看出来了。他说孙权之称臣只因为：“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寡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则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刘备亲率大军伐吴，如果曹魏再乘机夹攻，东吴的灭亡便指日可待了。孙权见策知变，开展了联魏外交，防止了“蜀攻其外，魏袭其内”的最坏局面的出现，使东吴得以集中全力迎战刘备，从而保证了夷陵大战的胜利。

关于吴蜀矛盾在利益、魏吴矛盾在存亡这一点，孙权还是看得清楚的。当刘备大败逃回白帝城，曹丕诏札孙权，要他“勉建方略，务全独克”时，孙权不仅不乘胜追击，反而决计回师。当蜀汉力量偏处蜀川，不再对东吴构成威胁之后，孙权又再次和蜀汉结成同盟，双方“戮力一心，同讨魏贼”。

对孙权利用曹、刘矛盾从中捞好处，特别是背信弃义，不惜从盟友背后捅刀子，以夺取荆州之举，后人多有贬斥之词。这些贬斥，也都有其道理。但从当时三国的形势来看，刘备的势力发展最为迅猛，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公元214年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同年，关羽又在荆州发动攻势，围攻樊城曹军，生俘曹操大将于禁，威震华夏，确是出现了周瑜生前最担心的“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局面。当时连曹操都惊恐得要“计徙许都以避其锐”。到了平定中原以后，还

会有东吴的存身立足之地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魏亡之后，吴蜀之间必有一场争夺战。孙权为保江东计，必须在设法扩展自己实力的同时，千方百计削弱未来对手的实力。在古代的政治领域内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尤其是三国时期，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纵横捭阖、行权欺诈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在那种失去常态的政治环境里生成的政治家、军事家，既不可能有太史公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品质，也不可能有理学家所主张的诚信大义。就是以帝室之胄自居，打着“攘除奸凶，兴复汉室”旗帜的刘备，不也是一切以自己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为转移！他要兴复的也是自己，而不是那个早已不存在的汉室。他又何尝真的讲什么仁义，不过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比孙权讲究一点“艺术”罢了！可见处在魏、蜀两面夹击中的孙权，如果不讲究策略，不去处心积虑地利用敌人的矛盾，那么非但不能达到扩展自己的地盘、发展自己的实力的目的，而且很快就要被翦除消灭。孙权能屈能伸、忍辱负重的性格，从他自己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来说，这不是懦弱，而是智谋，表现了古代一个成就帝王大业的人必须具备的文韬武略。正是他先向曹魏称藩，后向蜀汉求和，充分利用魏蜀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才有可能创立囊括长江中下游的大帝国，把江东的霸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陈寿对孙权能够“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的原因分析是合乎历史真实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猜忌·杀戮——晚年性格变态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晚年的孙权一改早期推诚相与、同舟共济的贤明之君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个“性多猜忌，果于杀戮”的昏聩之君。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抽象的性格转变，孙权性格的前后变化，也是与维护江东政权和王室利益有关的。

孙权的晚年，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从国外转到了国内，蜀汉偏处蜀川一隅，东吴则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大片土地，凭借长江天堑足以阻挡曹

军南下，江南经济的发展也足以划江自守。加之卓有成效的外交手段，吴蜀、吴魏之间，战事不是很多。但国内的情况则与立国之初大有不同。主要是江东大族的势力有了急剧扩张和发展。

早年，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军事世袭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的土地赏赐给他们。东吴的将领大多出身大族，原来就有世袭的土地和部曲，加上不断赏赐，拥有的土地和部曲越来越多。“僮仆成军，闭门为市”是当时大族势力的真实写照。

孙权晚年，因长子孙登早卒，本人年事已高，担心大族势力的急剧膨胀会危及孙氏王室的权力，为此，他对江东大族的态度从拉拢转为控制。

孙权对东吴重臣陆逊的态度转变，很能反映他思想上的这种状态。

公元244年，陆逊被任命为东吴的第三任丞相。称帝之前的孙权尚能认识到“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到了此时，却对陆逊也产生了疑虑和戒心。陆逊虽为丞相，但“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即依然带兵驻扎武昌，不能回京管理国政。对于忠实于他的陆逊，孙权还这样猜忌，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陆逊死后，孙权又把荆州分为两部，以吕岱为上将军，督守荆州的右部，以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守荆州的左部。原来镇守武昌的陆逊之子陆抗则调离武昌。其实，诸葛恪的军事才能远远比不上陆抗，史书上有一段记载是很能说明两人的军事才能的：“（陆抗）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孙权当然知道诸葛恪的军事才能逊色于陆抗，但仍要把陆抗调离武昌，这显然是出于对陆氏世代为将有所顾忌。

在孙权死前的两年间，吴国宫廷发生了一桩大案。为争立太子一事，大批重臣被贬、被戮。孙权长子孙登死后，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又封孙霸为鲁王，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在臣僚们的支持下进行反击。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卷入太子党争事件中去了。“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三国志·吴书·孙和传》）。以全寄、杨竺为首的大臣们主张废和立霸，以陆逊、朱据、诸葛恪为首的大臣们则支持孙和，主张“明嫡庶之分”。因为太子

和与鲁王霸的争斗夺宠,使群臣分为两大派,孙权对此深感不安。最后他作出了既废太子又赐鲁王死的决定。与此同时,又诛杀进谏大臣十余家,就是陆逊也受到孙权多次谴责,最后忧愤死去。

这一事件引起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陈寿评说道:“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貽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东吴的亡国之主是孙皓,但孙权去世以前,已经出现亡国的征兆。

孙权晚年的性格变态,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有江东政权,借机削弱大族势力来维护王室利益,但与其主观愿望相反,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是朝野震恐,人心惶惑。大臣们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尽言直谏,东吴王朝出现了“旧将已尽,新将未信”的境况。孙权经历了艰难创业后统治吴国长达五十二年,但在他的晚年却亲眼目睹了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然而此时,他已无力阻挡这一历史的进程了。

英雄的末路是悲怆的!

大政治家鲁肃

在《三国演义》里，鲁肃是一个忠厚而略显平庸的人物。他只是诸葛亮和周瑜的陪衬，其实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真实的鲁肃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

智勇双全

鲁肃(公元172~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所引材料说：“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

在东汉末年天下将乱的时候，鲁肃学习击剑、骑马、射箭，又招募一批少年供给衣食，教其练兵习武，把他们训练成为自己的私人部曲。可见鲁肃在年轻时，就很有见地。

“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

在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时候，他选择“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江东作为避难的场所，可见他有政治观察能力。男女三百余人能服膺其权威，追随他远离家乡，又见他具有政治组织能力。

“州追骑至，肃等徐行，勒兵持满，谓之曰：‘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

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贯。骑既嘉肃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还。”

在离家乡南下，遇到追兵时，他毫不畏惧地向他们陈述大义，又弯弓箭射显示其力量，结果追兵退了回去，可见他有胆有识，有处理突然事变的才干。

鲁肃出身豪族，“家富于财”，但他并不热衷于聚敛财富，而是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早年他“大散财货，鬻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他的慷慨作风使他获得了声誉和朋友。当时周瑜任居巢（今安徽桐城南）长，因缺粮而求助于鲁肃，当时鲁肃家中只有两困米，各三千斛，他当即分了一半给周瑜，从此和周瑜成了亲密的朋友。

但鲁肃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还是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鲁肃文武兼才，又有一支私人武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都想拉拢他。袁术就闻其名而任命他为东城长。但鲁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到居巢就瑜”就是去投奔东吴居巢长周瑜。后来又随周瑜去东吴。当时的东吴比袁术的力量小多了，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看，袁术却不及东吴。他宁肯选择力量小但有前途的东吴，而舍弃力量大却无前途的袁术。这表明他在风云变幻的群雄角逐中，对局势有清醒的认识。

鲁肃投奔东吴以前，其政治才干和文韬武略方面已初露头角。投奔东吴以后，他的政治才干和文韬武略得到了充分施展的机会。

吴中献策

鲁肃南下投奔东吴之时，正值孙策刚死，孙权统理江东政事。当时江东的政局很不稳定。孙策的旧部对孙权能否成就大事还持怀疑态度，而寄寓在江东的北方大族则去留未定。孙权要想保住江东，不让父兄打下的江山付之东流，除了笼络孙策旧部、安抚北方大族，还必须广泛收罗治国人才。鲁肃由周瑜推荐给孙权以后，很快就以其远见卓识和治国才能赢得了孙权的信任，成为孙权的重要谋臣和东吴政事的主要决策人。

鲁肃首次拜会孙权，孙权“与语甚悦之”。在众宾罢退以后，与鲁肃合榻

对饮，密议国事。孙权说：“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在回答中对天下的大势和东吴的前景作了精辟的分析：“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鼎足”意味着天下三分，“观天下之衅”意味着更大的奋斗目标，即谋取统一大业。如何谋取统一大业？鲁肃积极为孙权出谋献策：“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这就是被后来史家称颂的“吴中对策”，在对策中鲁肃根据江东的地理位置，指出了凭借长江天险与曹军进行南北抗衡的战略设想。并且提出了逐步翦除长江沿线地方势力、统一长江流域的具体部署。这番话，既有目标远大的战略设想，又有切实可行的具体部署。这对当时思贤若渴的孙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肃对天下三分的预见以及他对东吴前途的分析，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提起三分天下，人们总以为是诸葛亮的发明，其实早在刘备三顾茅庐以前，鲁肃就向孙权谈到了和“隆中对策”相差无几的内容。群雄角逐必然先统一于几个大的军事集团，然后再进一步取得更大的统一局面，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鲁肃和诸葛亮都是三国时期的杰出人才，他们通过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分析对比，同时得到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联刘抗曹

在赤壁之战中，作为大政治家鲁肃的才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公元208年，曹操在消灭袁绍、平定乌丸、统一北方以后，踌躇满志地挥师南下，试图一举统一全国。曹操南下的首要目标是荆州。荆州处于长江中游，和东吴接壤，曹操占据了它便可顺流而下，所以荆州得失直接关系到东吴的安危。在曹操挥师南下的时候，荆州牧刘表刚刚病死，其子刘琮继任。当时的荆州，局面混乱，人心惶惶。在这关键的时刻，鲁肃向孙权提出

了“联刘抗曹”的政治主张。

他先分析荆州的地理环境及其与东吴唇齿相依的关系，继而提出“联刘抗曹”方针在成就王霸大业中的重要作用：“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为了了解荆州的情况，并说服刘备抗击曹军，他建议孙权，让他以吊丧名义去荆州慰问刘表的两个儿子和军中主要将领，并说服刘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孙权非常赞同鲁肃对荆州形势的分析，并派他代表东吴出使荆州。鲁肃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赶到荆州，此时荆州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琮已经投降了曹军，刘备正“惶遽奔走，欲南渡江”。面对新的情况，鲁肃当机立断，急忙赶抄近路，在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刘备相遇，他向刘备转达了孙权联刘抗曹的主张，要求刘备与孙权同心协力，共拒曹军。鲁肃的建议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结好孙权”的战略完全符合。孙刘双方很快达成了组成联合战线的协议。

关于孙刘联盟，人们多归之于诸葛亮的功劳。确实，诸葛亮东吴之行，对孙刘联盟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孙刘联盟过程中，鲁肃所起的作用恐怕更大于诸葛亮。从孙、刘两家的力量对比来看，东吴在面临曹操大军压境之际局面虽然岌岌可危，但至少还占据江东一大片土地，进退尚有回旋余地。而刘备则势单力薄，身后无立锥之地，正准备仓皇南逃。诸葛亮之所以能顺利地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共同抗击曹军，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鲁肃对孙权的影响。鲁肃更大的作用是驳斥了东吴投降派迎降曹操的滥调，坚定了孙权抗战到底的决心。

曹操不战而得荆州之后，又想用武力迫使东吴投降。他给孙权下了战表，把二十余万军队说成八十多万，并扬言要和孙权决一雌雄。孙权拿了曹操的战表与群臣商议，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皆劝权迎之”。他们认为曹操占据荆州，有了水军，可以水陆俱下，而东吴则失去凭借长江天险抗拒曹军的优势，更何况孙、曹双方力量众寡悬殊，所以只有投降才是上策。在朝野

上下一片投降的喧嚣声中，唯有鲁肃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言不发。在孙权起身更衣时，他抓住机会追上孙权，孙权知道他有话说，便握住他的手让他说，鲁肃这才郑重地向孙权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鲁肃从孙权的切身利益出发，指出了投降曹操的不可行，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孙权为鲁肃肺腑之言所感动，叹息道：“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大计决定以后，鲁肃又针对满朝大臣投降派居多的状况，劝说孙权从鄱阳召回周瑜，在鲁肃和周瑜的努力下，东吴积极地进行备战工作，全国上下充满了抗战气氛。

终于，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在刘备的协助下，取得了决战的胜利。不可一世的曹操丢盔弃甲，狼狈逃归。这次战役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曹操胜败的经验时认为，在汉末群雄角逐的过程中，曹操所以能战胜四面的敌人，道理在于群雄的自相诛灭，不能团结。所以，仅剩的孙、刘两家，如果再不合力同心，那么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操所灭。对孙刘联盟，合力抗曹，王夫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肃）、葛（诸葛亮）定交，合力以与操争存亡，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孙刘联盟的发起者是鲁肃和诸葛亮。赤壁之战大败曹军，鲁肃之功不可没。所以，赤壁战后，鲁肃从前线凯旋时，孙权特地“持鞍下马”，向他表示敬意。

化干戈为玉帛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仓皇北归，对东吴来说，来自北方的威胁

暂时解除了。但是，孙、刘两家在荆州归属问题上又产生了利益冲突。对此，东吴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刘备要求借荆州，周瑜不同意。他认为刘备力量壮大后将对东吴构成威胁，他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因此主张“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如果“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就是说，周瑜非但主张不借荆州，还主张施行“美人计”，把刘备软禁在东吴。

孙刘联盟出现了第一次危机。这时鲁肃以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清醒地看到曹操虽然已经北归，但仍然是三国之中力量最强大的，刘备占据了荆州虽然对东吴有不利的一面，但在目前两弱抵一强的形势下，还是应当联合刘备并借予荆州，为曹操树立一个强敌。鲁肃对孙权说的一番话，反映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汉晋春秋》）

借荆州不单单有利于刘备，也有利于东吴。刘备得到荆州，承担了长江中游防务，东吴就可以集中兵力防守长江下游。孙权同意了鲁肃的意见，把荆州借给了刘备。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方作书，落笔于地”。可见鲁肃这一策略对敌人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后来，孙刘联盟破裂，吴蜀交恶，孙权对借荆州一事失悔了，认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但宋代诗人秦少游却高度评价鲁肃，他认为：“借荆州一事，拒之则为仇，杀之则招祸，因而借之，则可以合众并力而拒曹公”，“肃之为吴策者，岂不善乎！”（《淮海集·鲁肃论》）

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永久的友谊。当他们因各自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鲁肃仍能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力量缓和这种矛盾和冲突，以维持两家的联合战线。

在刘备夺得益州以后，按原来的协议应当归还荆州了，但是刘备又把归还的时间推迟至取得凉州以后。对于刘备的不守信用，孙权非常恼火，他调

遣吕蒙的军队袭击刘备的长沙、桂阳和零陵三郡(均在今湖南省)。刘备不肯让步,从益州率军赶到公安(今湖北公安),同关羽等合兵争夺三郡,双方调兵遣将,大战一触即发。在这紧要的关头,鲁肃极力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避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三国演义》描写了双方谈判的场面,大力颂扬关羽“单刀赴会”的勇敢精神。事实上,在这次“单刀赴会”的谈判中真正勇敢的人物应是鲁肃,而不是关羽。

首先组织这次谈判的是鲁肃,是他“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当时东吴的将军担心鲁肃的安全,劝他不要前往。鲁肃说:“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毅然只身前往。

谈判时,关羽说荆州是刘备“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取得的,鲁肃针对此点,痛加驳斥,他回顾刘备仓皇南逃时的窘况说:“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后来是孙权“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接着,鲁肃责备刘备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文不从命。”但没等鲁肃说完,关羽一方就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听了“厉声呵之”,指出刘备背信弃义的行径,“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关羽听了鲁肃“辞色甚切”的讲话,也无言可答。

不久刘备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怕腹背受敌,于是答应双方划湘水为界,割让了大片土地给孙权。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被制止了。鲁肃在单刀会上,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发言,既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应得的利益,又不使孙刘两家联盟破裂。他既是战场上的抗敌英雄,又是谈判桌上的外交能手。

鲁肃作为东吴的重臣,当然希望维护东吴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和孙权、周瑜、吕蒙等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他比他们高明的地方是他看到了什么是东吴更高的利益。他深深懂得面对强大的曹操集团只有维护孙刘两家的联盟,东吴的生存才有保障。所以他在同刘备集团的斗争中始终是有理、有节的,努力不使孙、刘两家的联合战线遭到破坏。相比之下,周瑜、吕

蒙甚至孙权本人，在政治眼光上，都有片面性，他们看不到这个关系吴、蜀两国生死存亡的联盟远比荆州一地的得失重要得多。关于孙刘联盟的重要，曹魏集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曹魏谋士刘晔说过：“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三国志·魏书·刘晔传》）鲁肃死后，孙权让吕蒙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的完全破裂。固然孙刘联盟的破裂也非东吴一方的过错，和孙权、吕蒙同样患有政治片面性的还有刘备、关羽等人，他们看不到两国联盟的长远利益，而是热衷于获取荆州一小块地方的眼前利益。“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读通鉴论》）。古人的这一感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孙刘联盟破裂的后果是，刘备集团从此局处益州一隅，失去了进取中原的基地，终于被魏国灭掉；而孙吴虽然夺回了荆州，赢得了夷陵之战，但是却付出了向曹操、曹丕俯首称臣的沉重代价，而且最终也未能自保。

鲁肃的早期经历，尤其是他在决策国家大事上的表现，以及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思维上的深谋远虑，都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足以同诸葛亮相媲美。但鲁肃的形象长期来都处于被扭曲的状态，其“吴中对策”也远不如“隆中对策”那样受到后人的重视。这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平。

东吴名将吕蒙

三国时期东吴的大将吕蒙，真是历史上罕见的智勇双全的将军，但千多年来名声不好，从士大夫到凡夫走卒都有人骂他。

其原因是他在吴蜀争夺荆州的战役中，白衣渡江，偷袭了关羽的后路，以致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

这场战役的是非已属历史，后人对三国时期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似乎不必投入如此激烈的感情。但是两宋以后形成的蜀汉正统观念，加上长期以来特别是宋元话本和罗贯中《三国演义》小说的影响，仍然使人们对杀害自己心目中英雄关羽的元凶，无法持宽容的态度。首先突破传统观念，给东吴名将以公正历史评价的是熟读史书的现代军事统帅毛泽东。

毛泽东要高级将领读《吕蒙传》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与同行的张治中和罗瑞卿将军谈到古代安徽名将吕蒙时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①

由此，《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成为军事干部必读之书，吕蒙也由一个

^① 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杀害英雄的历史罪人变成勤学苦读、可资借鉴的历史名人。

其实，历史名将吕蒙杰出之处，远不止于读书学习一个方面。

吕蒙是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少年时代即是一个狠于争斗的勇敢士兵，受到东吴开国之君小霸王孙策的器重，后来又以显赫的战功，受到孙权、周瑜的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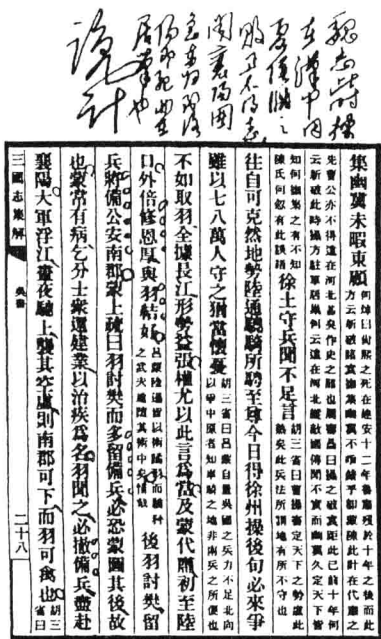
吕蒙年轻时最出色的战绩是跟随孙权征伐黄祖。黄祖是依附荆州刘表的一支军事力量，占据长江上游，是东吴的劲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被黄祖杀害的。征伐黄祖是东吴报世仇、求发展的重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吕蒙亲率所部击杀黄祖的水军都督陈就。陈就的被杀，使黄祖失去了与孙权作战的主力，为东吴军队擒杀黄祖创立了条件。吕蒙由于在征伐黄祖的战役中建立了首功，被封为中郎将。

赤壁之战中，吕蒙积极参加乌林的战斗，又以奇兵解夷陵甘宁之围，接着渡江立寨，配合周瑜夺取了南郡。此次战役之后，吕蒙位列偏将军，成为东吴的高级将领。

孙权非常喜爱这员猛将，企望将他造就为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

一次孙权开导吕蒙说：“独当一面的将军，应当多读点书，以开阔自己的胸怀。”吕蒙说：“军队中的事情多极了，哪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又不是要你们钻研书本当博士，而是要你们读点书，知道点历史经验罢了。你们说事情多，难道能比我更忙吗？我小时候，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以后又读《史记》、《汉书》、《汉纪》和诸家兵书，受了很大的教益。你为人很聪明，读书必定会有收获，为什么不去读呢？最好先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再读《史记》、《汉书》、《汉纪》。当年光武帝指挥千军万马时仍手不释卷，曹操也自称老而好学，你们年轻的为什么不肯发愤读书呢！”

吕蒙听了孙权的话，立志苦学，几年下来，学问大增。孙权非常高兴。



毛泽东评点《吕蒙传》手迹

吕蒙由战将型军事人才 向统帅型军事人才的转变

周瑜死后，孙权委派鲁肃代周瑜统兵镇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路过吕蒙的防区，当时鲁肃认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不大重视他。有知道吕蒙情况的人向他说：“吕将军今非昔比了，你应该去看看他。”鲁肃听从了这个建议，专程去拜访吕蒙。吕蒙设宴招待，酒过数巡，吕蒙问鲁肃：“阁下肩负为国守土重任，与虎视眈眈的关羽为邻，您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以预防不测之变呢？”

鲁肃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吕蒙说：“今日吴蜀虽然表面上联合，但关羽实同熊罴。危险在前，怎么能不早做应变之计呢？”

鲁肃听了吕蒙的话，大吃一惊。随后吕蒙为鲁肃谋划了五项应变的计策，鲁肃感谢吕蒙为他做的策划，并离席走近吕蒙，把手搭在吕蒙的肩上，亲密地说：“子明呀，我过去以为你只懂拼拼杀杀，不想今天你竟成了学识渊博的将军了。阁下的才略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再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

鲁肃对吕蒙“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的评价可视为吕蒙已经由战将型的军事人才转变为统帅型的军事人才。

战将型的军事人才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们的经验还是局部的，他们只是局部性的人才。指导战争全局，决胜于帷幄之中，还需要能提出正确战略战术和能统率全军与敌人进行决战的统帅型的军事人才。后者较之前者是更加重要的人才。

从战将型军事人才向统帅型军事人才的转变，需要理论思维，这就需要刻苦的理论学习。但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能造就合格的统帅型军事人才的。仅仅有书本知识，只能造就纸上谈兵、误国误民的角色。合格的统帅型军事人才需要战争经验与书本知识的结合，有了实际的战争经验，再经过理论学习，就有可能由此及彼，由经验上升到对战争规律的认识。

吕蒙对鲁肃筹划的对付关羽的五项计策，实际上是一份关于战略问题

考试的答卷，鲁肃对这份答卷的肯定和重视，表明吕蒙已经完成了从战将型军事人才向统帅型军事人才的转变。

鲁肃也是一位好学习的军事统帅，《吴书》说他“虽在军阵，手不释卷”。他又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非但不妒忌吕蒙的才干，而且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

吕蒙在完成由战将型军事人才向统帅型军事人才的转变之后，在军事指挥上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这时他的战功已不再限于夺关斩将之类的显赫战绩，而常常是关系全局的重大建树。

公元213年，即鲁、吕会见后的第二年，曹操率军进攻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吕蒙随孙权与曹军作战，屡进奇计，又建议孙权夹水口立坞，使曹操进退失据。次年，又力排众议，与猛将甘宁一起攻克曹军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皖县（今安徽潜山）。此次战役，东吴获得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吕蒙官拜庐江太守。曹操在攻击濡须的战斗中，与孙权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吴书》说，濡须、皖城的战役为孙权大增光辉。这次战役中，无论是在出谋划策还是斩关夺城方面，吕蒙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公元215年，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孙权命令吕蒙西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均在今湖南省），长沙、桂阳都归服，惟零陵不下。这时刘备亲临战场，督促关羽向吴军进攻。孙权“飞书召蒙”，令其舍弃零陵回军抵抗关羽，吕蒙却秘密扣下孙权的书信，封锁蜀军调动的消息，迅速逼迫零陵太守举城归降，然后整师北上作战。这次战役由于吕蒙成功地夺取了三郡，刘备不得不派人请盟，双方和平解决了荆州争端。

机智地使用军事的、政治的智谋，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夺取一个个的胜利，这表明吕蒙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军事统帅了。

先示敌以弱，然后白衣渡江， 一举战胜不可一世的骄傲将军

公元217年鲁肃病逝，孙权把鲁肃率领的一万大军交给吕蒙，吕蒙成为

东吴继周瑜、鲁肃之后的第三任军事统帅。

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展雄图，充分显示自己军事统帅才能的机会。

公元219年，关羽率领大军从荆州南郡出发，北伐曹操。这一仗打得很好，他围困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大地。

在关羽与曹操进行生死攸关的大战时，吕蒙在边境上冷眼旁观，他看出了这位骄傲的将军在直面曹操的时候，不经意地把防务薄弱的屁股暴露在他的眼皮底下。

机不可失。他马上向孙权密陈从后路偷袭荆州的计划。为了示敌以弱，麻痹关羽，让关羽把他那点留守后方的军队尽调襄阳前线，他建议孙权公开召他回建业（今江苏南京）养病。关羽中计，将留守后方的军队陆续调往前方。这时，吕蒙急趋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昼夜兼程，向关羽空虚的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关羽的大本营南郡。关羽闻讯回师救援，又中了吕蒙的埋伏。不可一世的胜利之师，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荆州战役是吕蒙战争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这个战役从决策、布置到具体实施体现了吕蒙超乎寻常的智慧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蒙在荆州战役中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古代军事家提出的重要战略原则。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结合是实现这一战略原则的方法之一。吕蒙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其重要性，并将之用于荆州战役中。他为了争取南郡守军放弃抵抗，再三向南郡的守将士仁、糜芳进行攻心工作，顺利地占领了荆州，入城以后，又对关羽将士家属百般关怀。他甚至矫枉过正，垂泪斩杀了一个随意取用民家斗笠的士兵，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关羽的将士听到了这些传闻，军无斗志，偌大的一支队伍哄然而散。

这次战役之后，吕蒙即患重病；孙权亲自临视，又以重金募良医，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吕蒙以其生命中最后的火花，为荆州战役胜利乐章打上了休止符，享年仅四十二岁。

* * *

当然，对吕蒙的荆州战役，历代都有反对的声音，相当一些人认为吕蒙

挑起的这场战争，破坏了吴蜀联合抗曹的方针，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宋人王千秋的《贺新郎·石城吊古》表达了这种思想：

夕阳细草空凝伫。试追思、当时子敬，用心良误。要约刘郎铜雀醉，底事遽争荆楚？遂但见、吴蜀烽举，致使五官伸脚睡，唤诸儿、昼取长陵土。遗此恨，欲谁语？

所幸的是，吕蒙为之呕心沥血的吴大帝不这样看。他高度评价了这位由士兵而成统帅的爱将的功绩：“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不辞难的意思），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孙权之论，优劣允当”。

夷陵之战中的陆逊

“年轻的无名小辈，战胜了年老的庞然大物。”这是毛泽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时对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的评语。这里说的年轻的无名小辈指的是东吴年轻将军陆逊，年老的庞然大物指的是蜀汉皇帝刘备。陆逊故里华亭，今属上海市松江，所以，毛泽东还特别指出陆逊是上海出的人才。

除此以外，毛泽东在军事专著中又曾对这次战争作过两次论述。1936 年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夷陵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有名战例。1938 年他又在《论持久战》里，举这个战役为例，来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本文拟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对夷陵之战的背景、进程以及陆逊、刘备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优劣，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荆州战役后，吴蜀矛盾的尖锐化

赤壁大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各自占据一方，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并没有能消除已经存在多年的军阀混战。激烈的争夺又在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着。争夺的重点仍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当时的情况是天下三分，荆州是三分中的三分。孙权占领荆州之东部，刘备占领荆州之西部，曹操占领荆州之北部。孙权、刘备两家争夺得最为激烈，曹操则以重兵屯聚襄阳（治今湖北襄樊），企图相机

坐收渔人之利。

夷陵之战以前，孙权、刘备双方为争夺荆州，曾经发生过三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是公元209年。

那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孙、刘双方就为荆州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东吴方面的大政治家鲁肃，从联合抗曹的大局出发，力劝孙权把荆州的一些地区借给刘备，自己仅占领荆州东部的一些地区，这才暂时解决了这个矛盾。据说，正在等待孙、刘双方为争夺胜利果实而大兴干戈的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大为吃惊，“方作书，落笔于地”。

第二次冲突是公元214年。

那时，刘备已经攻占了益州，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刘备那里去要求归还过去借予的荆州地区。刘备不许，于是双方发生了军事对抗。在这次军事对抗中，孙权派将军吕蒙占领了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均在今湖南省）。刘备从益州引兵五万赶到益阳（今属湖南），和驻守荆州的关羽一起同吴军交战。曹操得了这个机会，马上向汉中进军。刘备怕背腹受敌，只好同孙权和乎谈判，双方协议，把荆州一分为二。长沙、桂阳、江夏（治今湖北鄂州）以东属孙权，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零陵、武陵（治今湖南常德西）以西属刘备。

第三次冲突是公元219年。

那时，驻守荆州的关羽，起兵讨伐曹操。孙权派将军吕蒙、陆逊乘机偷袭关羽的后路，擒杀了关羽，占领了原来属于蜀汉的江陵、公安、南郡（均在今湖北省）等地，攫取了襄阳以南的荆州的大部地区。荆州战役以后，吴蜀两国维持了多年的同盟关系完全破裂，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但是，孙权同曹操的关系却有改善。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孙权派人奉贺，被封为吴王。从此，吴蜀联盟变成了魏吴联盟。

刘备为报复孙权，作了一年多的准备。

公元221年七月，他亲自率领蜀汉大军东征孙权。

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刘备这次东征，意见是不一致的。

首先是丞相诸葛亮。他坚持自己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联吴抗曹”方针，劝说刘备改变主张，刘备不听。后来诸葛亮感叹地说，可惜法正死了，要是法正尚在，必定能制止主上，要他放弃东征。

益州名士秦宓也不同意东征，并向刘备陈说伐吴可能遭受失败的道理，刘备说他搅乱人心，把他送进了监狱。

武将中也有人不同意东征。张飞等人对东征倒是积极的。但是，出征之前，他被部下刺杀了。

孙权听说刘备要兴兵伐吴，派人下书要求和平谈判。刘备盛怒不许。当时东吴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过去曾经为荆州的归属问题出使过西蜀，同刘备有一点友谊关系，这时，他也致书刘备，劝说刘备抑制愤怒，考虑大局，不要拒绝孙权的和谈要求。刘备也置之不理。

为什么刘备这样一意孤行，拒绝一切反对东征的意见和东吴和平谈判的要求呢？

旧时的一些历史评论家说，这是因为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的弟兄，是出于为兄弟复仇的情谊。其实，决定刘备东征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争夺荆州。刘、关、张的兄弟情谊，只是促成这次军事行动的一个非主要的因素。

荆州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在三国之争中占据的地位非常重要。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它“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说得不错的。这样一块在争夺天下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好地方，竟然被孙权用背信弃义、阴谋偷袭的手段夺走了，这怎么能叫刘备甘心呢？他怎么能不死命拼争呢？

除此以外，刘备的执意东征，还有几个考虑：

1. 他在荆州生活多年，同当地的士民有广泛的联系，因而在恢复荆州的战役中，不会遭到当地士民的坚决抵抗。

2. 几年前他曾在汉中指挥蜀军大破曹兵夏侯渊。他认为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和蜀汉军队的作战能力，足以同孙权和他的军队相抗衡。

3. 益州经过多年的经营，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有增强，能够承担这次东征的需求。

但是，这些考虑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他只看到了有利的因素，而没有看到不利的因素。更没有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因素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

在发动战争时，客观上存在的不利于蜀汉一方的因素有以下一些：

1. 赤壁之战以后的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方面，东吴

要比蜀汉为快。蜀汉失去富庶的荆州以后，情况更是如此。

2. 汉中战役时，天下三分之中，孙、刘联合，曹操孤立，现在是曹、孙联合，刘备孤立。

3. 对于刘备东征的决策，蜀汉的文武大臣颇有异议，战士的作战积极性不高。而东吴方面，上下仍然为不久前荆州战役的胜利形势所鼓舞，内部的团结情况要比蜀汉方面好一些。

4. 荆州的士民，由于关羽多年严厉的统治，人心并不思蜀。相反，孙权得了荆州以后，优待俘虏，“尽除荆州民租税”，提拔“新还”士人，情况反倒比过去安定。

5. 孙权很注意提拔年轻的军事人才，军队的骨干力量较强，接班人不会缺乏。而刘备方面，能征善战的老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都死了，赵云守江州，魏延在汉中，年轻的力量又上不来，军队中缺乏骨干。

综合起来看，在吴蜀的争斗中，不利于蜀汉方面的因素要多一些，所起的作用也要大一些。

夷陵之战发展的三个阶段

孙权的和平谈判要求被刘备拒绝以后，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督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进行抵抗。

陆逊(公元183~245年)，字伯言，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出身于江东著名的士族家庭。他在青年时代即主角显露，孙权很看重他，把孙策的女儿嫁给了他。他长于军事谋略。荆州战役中，曾经帮助吕蒙筹划过偷袭关羽的计划。吕蒙对他大为赞赏，向孙权推荐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规虑，计谋)，终可大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吕蒙死后，他是吴国军方的主要负责人。

夷陵之战的发展进程，共分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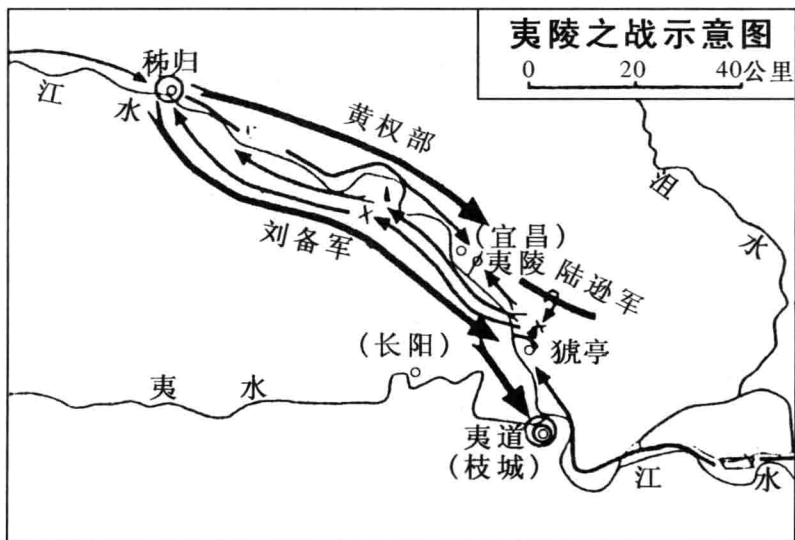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刘备进攻。

时间是公元221年的初秋到初冬，大致是七月到十月。

蜀汉的东征大军，兵分南北两路。南面一路是主力，由刘备亲自统率，

以将军冯习为大督，将军张南为前部，吴班、陈式、辅匡、赵融、廖淳、傅彤为别督。北面一路是偏师，由镇北将军黄权统率，主要任务是防备魏军袭击。此外，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地区用金帛爵赏招纳少数民族出兵协助破吴。

蜀汉东征兵力总数，据《魏书》收录的孙权上曹丕书，说是四万人（见《文帝纪第二》，原文是：“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但是，公元215年，孙权、刘备争夺荆州时，刘备从益州东下支援关羽，带的兵就有五万。那时，关羽手下有大批部队，刘备还带了五万人去，为什么这一次倾国而来，却只带了四万人呢？再据《三国志·吴书·孙桓传》的记载，刘备进入东吴境界时“军众甚盛，弥山盈谷”，带的兵“前后五十余营”。那时，每营兵力一千到数千不等，平均按一千五百人计，五十余营就是八万人。又据裴松之在《三国志·吴书》注中引用的《傅子》一书中所叙，夷陵大战中“权将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再参考《三国志·蜀书·后主禅传》，蜀汉投降曹魏时，尚有甲士十万余人。根据这些材料推测，蜀汉这次东征的兵力至少在八万人以上，在战场上是占优势的。



战争开始以后，蜀汉方面不断取得胜利。刘备的大督将军冯习和将领吴班等人，接连攻破东吴将军李异等人守卫的巫（今重庆巫山）、秭归（今属湖北），前锋进到荆州西境的夷陵县（今湖北宜昌东），深入东吴境内五六百

里。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表示愿意出兵响应，声势很是浩大。这时，刘备的统帅部尚在后头，还没有赶到前线。

第二阶段：吴蜀相持。

时间大致是公元 221 年年末到 222 年的夏天，共七八个月。

这时，刘备的统帅部已经到达夷陵战场的前线。起先驻扎在秭归，后来又率领诸将“缘山截岭”进军到夷陵，在夷陵南部的猓亭（今湖北宜都北）安寨扎营。

黄权所统率的北路诸军也从长江北岸进军到夷陵道，同东吴的军队相持。其他蜀汉军队也先后出巫峡，各自据险屯兵，树栅立营，从巫峡到夷陵前后连营七百里。

与此同时，陆逊所率领的大队人马也陆续到达夷陵战场。陆逊的部将宋谦到达前线以后，攻打了蜀汉的五个屯兵处所，都得到了胜利，蜀汉军队的攻势受到遏制。

于是，刘备使用军事计谋。他一面把大批人马埋伏在山谷中，一面派吴班率领几千人在平地立营，企图诱惑陆逊出战，以便聚而歼之。东吴将领看到吴班的人马不多，纷纷要求出战，陆逊看出了刘备的计谋，拒绝了盲目出战的建议。刘备左等右等，也看不到陆逊有任何战斗的表示，只好撤出了埋伏在山谷中的人马。陆逊就这件事，向诸将说：“我所以不听诸君的意见去攻打吴班，就是揣摩到刘备可能有诡计。”

经过同刘备初步接触，陆逊了解到蜀汉军队的一些特点。认识到刘备是一个“猾虏”；而且，“其军始集”，“思虑精专”，锐气方足。因此，不宜匆匆忙忙地去同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而应当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也就是有意识地把他们在远离本土的战场上拖上一段时间，拖到他们“兵疲惫沮、计不复生”的地步，再狠狠地打。同时，陆逊还看到，刘备不用水军配合陆军顺江而下，反而在沿江的山地到处安营扎寨，前后连营数百里，把兵力分散在不易集中的漫长战线上，实在很愚蠢。这样的敌人是不难对付的，只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捕捉到有利的战机，就一定可以战而胜之。

在作了这些分析以后，他充满信心地上书孙权，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夷陵要害，国之关限（国家的大门），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谐，成功）。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

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考究）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嫌之，担心），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领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陆逊当时年方三十九岁，他所率领的将军，许多人都是战功卓著的老将，有的人还是孙策时期的旧部，资格老、名望大，还有公室的贵戚，以高贵血统自恃，骄傲得不得了。这些人并不都能理解陆逊的作战方针，他们热衷于快打、速战。不断地建议陆逊赶快出击。陆逊坚决不同意他们的主张，耐心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他说道：“（刘）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附文）



诸将听了陆逊的话，仍然不理解，并且认为陆逊胆小畏敌，愤懑不平。有一次，贵公子孙桓在夷道（属夷陵县）被刘备围困，向陆逊求救，诸将都要求出战，陆逊不许可。诸将说：“孙桓是公族，现在被围，怎么能不去救呢？”陆逊说：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诸将听了这话多不服气。孙桓对他也非常抱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不愿听从他的指挥。于是，陆逊召集诸将开会，按剑说道：“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惮，畏惧），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不听从指挥，这是不能允许的）。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相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在这次严厉谈话之后，陆逊把自己军队的纪律整顿了一下，保持了全军

上下步调的一致。

第三阶段：陆逊反攻。

时间是公元222年的夏末到初秋，大致是闰六月至八月。

这时，吴蜀在夷陵战场相持已经七八个月了。陆逊所计划的疲劳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等待已久的有利的决战时机即将来临。于是，他开始谋划和布置进攻。诸将说：“攻打刘备应该在当初，现在让人家深入了五六百里，双方相持了七八个月，要害的地方都被人家派兵固守住了，这样去打，必然不利。”陆逊说：“不然，现在正是敌人兵疲惫沮，计不复生的时候，消灭寇虏，正在今天。”在侦察性的试攻之后，他命令各部军士手持茅草，先用火攻的办法焚烧刘备的军营，然后一齐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蜀汉军队由于长期疲乏和缺乏思想准备，在军营被烧和东吴军队大规模的进攻下，纷纷四散逃命，大督将军冯习、前部将军张南被斩，四十余营土崩瓦解。刘备仓促间登上马鞍山自保，陆逊亲自督促各部四面围攻，守山的军士战死者上万。后来，刘备利用夜色的掩护，烧了盔甲断后，才逃离猇亭，到了秭归以后，收集各部散兵，从陆路返回鱼复，进入白帝城（都在今重庆奉节）。总计这次战役，蜀军死伤惨重，“尸骨漂流，塞江而下”。舟船器械，军用物资，也都损失殆尽。向东吴军队投降的还有数万人。这时候，东吴的将军们才佩服了他们这个年岁不太大的统帅，认为他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调度有方的将军。原来对他非常抱怨的孙桓也称赞起他来了。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以后，感到愧恨。他忿恚地说了两句很能代表他思想情绪的话。

一句是针对陆逊的，原话是：“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一句是针对当时在战场上追他追得最厉害，几乎把他俘虏了的吴国小将孙桓的，原话是：“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儿，而今追孤乃至此也！”（《三国志·吴书·宗室传》）

是的，刘备当年去东吴迎亲娶孙夫人时，陆逊、孙桓都是青少年，当时陆逊二十六岁，孙桓才是个十二岁的小孩。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现在竟给当年的娃娃们打败了，这是多么丢人呀！这种愧恨情绪不断地折磨着他，不久以后，他就病死在白帝城。

其实，在军事史上老年人被年轻人打败的事情是常有的。如果仅这一点，并不用惭愧。古人就说过，“后来居上”、“后生可畏”。

真正应该惭愧的是刘备的那一套老年式的僵化思想。年纪大了，经历了一些风险，积累了一些经验，就自以为了不起，好以长者自居，骄傲自大，故步自封，以为自己什么都比年轻人行，既看不起新生力量，也不注意提拔新生力量。岂不知客观自然的发展规律是辩证的，老年人经验多、见识广，但同时活力减弱，智能也在衰退；年轻人阅历浅、经验少，但同时感觉敏锐，思想活跃。谁人对这种客观自然的发展状况不自觉地，谁就难免要在晚年演出英雄末路的悲剧。

吴蜀两军统帅战争指导能力优劣的比较

吴蜀夷陵之战是封建军阀争夺势力范围和土地统治权力的斗争。它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战争，性质是不义的。两国人民都不愿意从事和支持这种战争。

从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总体力量来看，在荆州归属东吴以后，吴国的力量显然要比蜀国强大。但是仅从夷陵战场来看，刘备统率的蜀汉军队的兵力比陆逊统率的东吴军队要多一些。即使按《魏书》收录的孙权上曹丕书，双方的兵力也是大体相当的。此外，在军队的物资供应和同山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蜀汉方面的条件，要比东吴方面好一些。但是，东吴军队的作战经验要比蜀汉军队多，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要比蜀汉军队强，新生力量在军队中占据领导地位，军队比较有生气。

从这些情况看，参战双方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主动，战争胜负的可能性不是绝对的。关键要看战争双方的军事统帅谁的战争指挥能力优越，谁的战争指挥能力拙劣。

正是在这一点上，东吴军队统帅要明显地优越于蜀汉军队的统帅，所以战争终于以东吴军队的胜利和蜀汉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

吴蜀两军统帅战争指挥能力的优劣，表现于战争的全过程。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情况了解方面，陆逊不仅知道自己军队的情况，而且也大体摸

清了敌人的情况。他知道自己军队的长处，知道某一个部队在被围困以后，能不能顶住敌人，需不需要去援助；他也知道自己军队的短处，知道某一个时候大家的情绪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做思想工作。对于敌人，他也大体能知道他们都有一些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锐气方盛”，什么时候“兵疲意沮”，并由此来确定自己的对策。而刘备呢？他是既不真正了解自己军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最可笑的是直到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的败仗。他和项羽一样，打了败仗就长叹“岂非天邪？”其实，“天命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天管得了夷陵之战吗？

第二，在战役的规划方面，陆逊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又有针对目前要求的具体部署。他对战争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考虑，战斗怎样开始，怎样结尾，一步一步都有安排。因此，他对战斗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善于根据客观实际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而且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正确的作战方针。蜀军初来，连战皆捷，不断深入；攻势被遏止以后，又依山设险，气焰仍然很高。针对这些情况，他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制定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作战方针，一定要等到敌人疲劳沮丧、优势减杀之后，再同敌人决战。他的部下不干，要求快战速决。他说服教育，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别人说他胆小畏敌，他也能忍辱负重，绝不一触即跳。

而刘备呢？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不清楚。仗怎么个打法？时间多长？长远目标是什么？近期目标是什么？具体步骤是什么？怎样规划？怎样安排？怎样调度？怎样部署？他都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主张。

他兵出巫峡以后，占据了水路要津。这是他的一个优势。“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他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长江水运的条件，使用自己充足而便利的舟楫工具，出奇兵，顺流而下。这样就可以越过敌人重兵把守的夷陵防线，把自己的大部队和给养迅速运到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荆州西部地区，以打乱敌人的防守计划。然后调动敌人迂回援返时在其必经之途，给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样必然能使陆逊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陆逊在发兵夷陵时，害怕的也正是刘备“水陆俱进”这一着。哪知刘备计不出此，却按部就班地在崇山峻岭的木石中间依山结营，处处设寨，摆出了一副被动挨打的姿态。本来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主动，给敌人狠命一击，

他却放弃权利，跑到一个狭隘的、无法充分施展自己兵力的猇亭山区呆起来，自己替敌人制造打击自己的机会。当然，在失去荆州根据地以后，采取突破夷陵防线，水陆并进，奇袭敌人后方的策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这种策略仍然要比把自己的兵力放在猇亭山区挨打要安全得多，而且为了避免风险，他还可以按照镇北将军黄权的建议，由黄权担任前线指挥的任务。黄权在军事指挥能力上至少要比刘备高明一点。

刘备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也能够策划一些军事诡计，但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很一般，军事策划水平也不高，很容易被棋高一筹的对手所识破。刘备的擅长是政治组织能力，在军事上，他基本上是一介武夫。离开了徐庶、庞统和诸葛亮，他往往只能打莽撞仗、糊涂仗。陆逊批评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是一针见血的。这样的统帅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幸运地碰上了不高明的对手时，是能够打一些胜仗的。但是，情况一复杂，特别是遇上了深谋远虑的对手，他就会失去自主的能力，一筹莫展。没有办法，他就采取消极应付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最后，丧失掉自己的优势和主动，变成败军之将。

第三，在兵力使用方面，陆逊是集中使用兵力，刘备是分散使用兵力。

军队的主动权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力量，这种具体的物质力量，主要是数量集中的能够服从统一指挥的、富有战斗活力的军队。特别是决战的前夕，能否集中到决战时所必需的兵力，是战斗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陆逊在兵力使用问题上是很注意这个问题的，特别是在决战前夕，他集中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兵力。火攻命令一下，所有的将军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同一时间里向蜀汉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样就在战场上形成了势如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冲击力，很难抵御。

刘备呢？在夷陵战场上他的兵力比陆逊多一点。虽然优势并不是很大，可是就连这么一点优势不大的兵力，他也不会集中使用。

他在部署自己的力量时，违反了最基本的军事常识，竟然把军队从巫峡摆到夷陵，前后连营几百里。这就使自己本来不大的优势四处分散，从而变成了劣势。这一点不仅陆逊看到了，就连远离夷陵战场的魏国皇帝曹丕也看到了。他听说刘备同孙权交战“树栅连营百里”，就同群臣说：“刘备不懂得军事，连营几百里怎么能抵抗敌人呢？兵法说，在草木丛生交通不便的地方驻扎军队的，容易被敌人打败。你们看，孙权胜利的捷报快要来了。”果然

在这个预测的七天以后，曹丕就得到了刘备兵败的消息。

夷陵战后

民间传说，夷陵战后，陆逊追击刘备到鱼复江边，被诸葛亮用石头摆的八卦阵吓退。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刘备退回白帝城时，陆逊就停止了追击作战。当时也确实有一大批老将上书孙权，说刘备可以成擒，要求出兵进攻白帝城。孙权询问陆逊，陆逊不赞成继续追击。他说：“曹丕表面上支持我们讨伐刘备，实际上内藏奸心，他是想乘我们同刘备打得疲劳的时候来消灭我们。”孙权听了陆逊的意见，决计停止追击，大军撤还。果然，夷陵战事结束还不到一个月，曹丕就命令曹仁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出襄阳，向东吴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局势的陡然转折，说明陆逊不愧为一个明智而有远见的军事统帅。他并没有被夷陵之战的巨大胜利冲昏头脑，他胸有全局，看出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会产生，看出了夷陵战后三国之间复杂的斗争形势会出现新的转折。因此，他才能及时地帮助孙权作出停止追击刘备的正确决策。刚从夷陵之战中摆脱出来的东吴政权，马上又要投入抵抗魏国的大规模战争中去，确实是困难很大的。孙权一面调兵遣将，兵分三路去迎击敌人，一面卑躬屈膝地上书曹丕，苦苦乞求和平。曹丕哪里肯放弃这样的大好战机。你越是苦苦乞求，他越是要加紧进攻。孙权没有办法，只好临江死守。这次吴魏之间的大战，一直打到第二年三月才告一段落。在战争中东吴方面遭受的损失很大。

公元229年，吴魏之间又爆发了一次战争，魏军大司马曹休率领军队侵入皖县（今安徽潜山），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人马抵抗曹休。在战争中，陆逊运用计谋大破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歼敌一万多人。曹休是魏国的名将，曹操称他是“吾家的千里驹”。这次被陆逊打败，愤恚不已，不久染病身死。

陆逊后来官至丞相，深受孙权的重用，但是晚年因为参与宫廷内部的斗争，失欢于孙权。公元245年病死，享年六十三岁。

从平民中崛起的皇帝刘备

中国历史上真正能从平民阶层一跃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是不多的，三国蜀汉之主刘备是少数人中的一个。

刘备(公元 161~223 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传说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由于支系疏远，到他这一代已经沦落到“以贩履织席为业”的平民百姓。与鼎足而立的另外两个国主相比，他不像大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有家财可作兴兵立业的资本。也不像破虏将军的后人孙权，可以承袭父兄的大业，自擅江表。刘备既无钱财，又无地盘，他完全是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从公元 184 年兴兵起事，到公元 221 年建立蜀汉政权，从“贩履织席”的一介布衣，到蜀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备传奇般的戎马生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平地崛起的成功奥秘更引起了人们探究的兴趣。

出身、机遇、辅佐之臣不是刘备 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对于刘备的成功有几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有人把他的成功归为诸葛亮的辅佐。如宋人叶适就这样说过：“光武、曹操、刘裕、唐太宗取天下皆身取，刘备其臣助之而已矣。”(《习学记言》)的确，诸葛亮的辅佐是刘备成功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在刘备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制订了“联吴抗曹”的方针，使他屡遭挫折、寄人篱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进而又帮助他先后获得荆、益

两州地盘，从而开创了三国鼎立的新局面。但不能因此就说光武、曹操是“身取”天下，刘备只是“臣助”而取天下。刘备绝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他和光武、曹操一样，用自己全部的心身在开创事业。“三顾茅庐”前，没有诸葛亮时，他是自己事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三顾茅庐”后，有了诸葛亮的辅佐，他依然是自己事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当然他是借助了诸葛亮的才能和智慧，为自己的事业开辟了胜利的坦途。但诸葛亮只是他的助手和参谋，他则是历史行动的主角，而不是相反。诸葛亮成为历史活动的主角是在刘备死后而非生前。

也有人认为刘备的成功得益于“帝室之胄”的政治优势。确实，帝王后裔这块金字招牌是刘备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在东汉末年皇权已经大大削弱，连真皇帝也成了可有可无的政治摆设，但皇权在士族的心目中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刘备以远代皇亲的身分，打出“匡扶汉室”的旗号，在政治策略上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异曲而同工。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像刘备这样既无家业又无钱财更无地盘的平民百姓，如果没有可以收揽人心的旗号，要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但尽管如此，“帝室之胄”依然不是刘备成功的主要因素。试想，中山靖王妻妾成群，仅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余人，儿子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从西汉到东汉，子子孙孙数不清。如此说来，能够凭借出身这一优势号召天下的又岂止刘备一个人？可又有谁取得了成功呢？不要说像刘备这样没有地盘的皇亲后裔，就是如刘表、刘璋这样有地盘的皇族还不是照样垮台！

还有人认为刘备的成功得之于机遇。恰逢孙权为保江东而力主抗曹，也恰好他在逃离荆州的路上遇到了鲁肃，他才有机会成了联合的对象，更为幸运的是他恰好遇到了曹操不习水战，这才有可能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赢得发展的地盘。我们不否认以上这些因素给刘备成功带来的好运。但是，这些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同在荆州的刘琦、刘琮却没有从这些机遇中获得成功，却偏偏让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反客为主，抓住这些机遇成就了帝王之业呢？

可见，无论是出身、机遇，或辅佐之臣都是刘备获得成功的外在因素，决非刘备成功的根本原因。尽管外在因素对事物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偶然性，而不是事

物发展的内在根据,事物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我们探究刘备成功的奥秘,必须从偶然的現象中去寻找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必然因素,这样才能找到刘备成功的真正原因。

奥秘之一：团结人才 任用人才 以诚待人

当我们把探究刘备取得成功原因的视角,从外在因素转向内在因素时,我们发现,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团结人才、任用人才的人。

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去做的,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卓越的人才。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现代领导科学甚至认为,团结和任用人才是领袖人物最重要的素质。谁能团结人才、任用人才,谁就能开辟成功之路。没有人才,也就没有事业的成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具备了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素质。

在团结人才方面,与三国时期割据称雄的各大军阀相比,刘备的客观条件差得多。曹操总揽朝政,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收揽天下的贤士能人,“故天下英雄豪杰趋之若鹜”;袁绍是“四世三公”的后裔,“门生故吏遍天下”,收豪杰、集徒众甚为便利;孙权继承父兄之业,人才是现成的。刘备则既缺乏声望,又没有地盘,可是他竟依靠自己的努力,团结了一大批人才。这真是人才史上的奇迹。刘备团结的人才,武有“万人之敌”、“勇而有义”的关羽、张飞、赵云等,文有“达治知变”、“正而有谋”的能臣诸葛亮、庞统、法正等。刘备在客观条件不如曹操、袁绍、孙权等人的情况下,能团结如此之多的第一流的人才是何等的不易。正是依靠这样一批人才,刘备才开创了蜀汉政权,成就了帝王霸业。

史称刘备有“知人之鉴”。在识别人才方面,刘备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他在这方面的才能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任用庞统、马谡和魏延就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庞统字士元,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为人“朴钝”。刘备领荆州,任庞统为“耒阳从事”,因“在县不治免官”。后来刘备同他见了一面,谈了一次话,知其“非百里之才”,“大器之”。立即委以重任,待之为诸葛亮之下的第一

人。在诸葛亮留守荆州期间，他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随从刘备入蜀。在夺取西蜀的过程中出谋献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而刘备则认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结果在初出祁山时，诸葛亮“违众拔谡”，导致了街亭之役的失败，应验了刘备“不可大用”的话。

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刘备占领汉中以后，“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汉中北临曹魏，是蜀汉的门户。镇守大将是否得人，关系到蜀国的安危。“众议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刘备却破格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刘备对魏延的破格提拔使“一军尽惊”，魏延的才干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施展。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八九年间，魏延很好地完成了镇守蜀汉北大门的重任。反而是在诸葛亮的帐下，魏延没有受到大用，常“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终以叛乱之名蒙冤而死。

三国之中，哪个国家也没有像蜀汉那样大胆任用人才。蜀汉政权中受到破格提拔的绝不止庞统、魏延几个。蒋琬、费祎、杨洪、何祗原来都是地位很低的小官吏，后来都是因为显露才能而被破格提升到显著的地位。杨洪原为从事，何祗原为书佐，因为被发现有才能，没几天工夫就分别被提升为蜀郡太守和广汉太守。

由于刘备知人善任，用人不讲资格年龄，只要有才干就可以后来居上，所以蜀汉的人才对刘备怀有感遇之恩，在国内形成了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刘备死后，诸葛亮几次北伐，就是凭借了刘备生前造就的这一优势。正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殒。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在团结任用人才方面，刘备与他的臣属大都能保持善始善终，没有出现离心离德的状况。他能得人真心，得人“死力”。他一旦同一个人结好，这个人就不大会背离他。无论生前或死后，无论此地或彼处，都会为他尽忠效力。他的得人艺术，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雄杰人物曹操、孙权。

关羽曾被曹操俘获，“曹公壮羽为人”，先“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后又“表封羽为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关羽在曹操那里获得了追随刘备多年而

未有过的官衔和荣誉。可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在斩杀袁绍名将颜良，替曹操解除了“白马之围”之后，即“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回到了刘备身边。

刘备是怎样获取这位以“万人之敌”而著称的虎将的真心呢？

关键在于刘备的以诚待人。刘备与关羽是贫寒时结交的，两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后来刘备称王之后，两人也是“名为君臣，实为兄弟”。这种不因地位的变迁而改变的情谊是最令人感动的。

诸葛亮应刘备三顾之请出山以后，出将入相二十七年，不但在刘备生前“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死命为刘备效力。就是刘备死后，也不改初衷，为辅佐其子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两人如鱼得水的关系后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极力追求的君臣关系的风范。

诸葛亮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尽忠于刘备呢？这也应当归功于刘备的以诚待人。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定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的重托，如此的信任，诸葛亮怎能不尽心效忠，以谢知遇之恩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读史至此，感叹道：“千载之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肯为操用乎！”（《二十二史札记》）或许诸葛亮的《出师表》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然而受到刘备以诚相待，因而忠心效命的又岂止关羽、诸葛亮！刘备大将中的赵云、黄忠，对刘备的赤胆忠心也是著之史册的。刘备能得人真心，得人死力，就在于他能尊重人才，理解人才。这可以从张松初降曹操到最后选择刘备的经过得到说明。

张松原是益州牧刘璋的部属，看到刘璋为人闇弱，胸无大志，“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他欲投奔曹操，但曹操以貌取人，认为张松“为人短小放荡”，“不复存录松”。“主簿杨修诣操辟松，操不纳，松以此怨”。后来张松去见刘备，刘备见了张松，“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张松为刘备的诚挚态度所感动，就把“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又画地图山川处所”，于是刘备“尽知益州虚实也”。

不仅对人才，刘备能够虚心接纳，以诚相待，就是对待“士之下者”，刘备也能善以处之，不摆架子。《魏书》说他初起任平原相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当时豪族刘平，因对刘备不满，派刺客刺之，刘备不知来人为刺客，以平等的态度待之“甚厚”，刺客受到礼遇，不忍心刺他，“以状语之而去”。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刘备对人处事的态度。

奥秘之二：对武装力量 这个基点始终抓得很紧

在群雄并起、军阀混战的三国时期，武装力量是一切的基础。在那个没有民主制度的时代，社会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而战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任何一个想成就王霸事业的人都要有武装力量。无论地盘、官位都要靠手执弓箭刀枪的武装力量去夺取。战争解决一切，有武装就有一切。没有武装就连个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刘备以自己敏锐的政治家眼光看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在他的一生中，对武装力量这个基点始终抓得很紧。

刘备是靠组织私人部曲起家的。他出身平民百姓，没有家财可以招兵买马，但他从小就尚武勇，又爱结交天下豪杰。就在二十四岁那年，他得到了“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的千金资助，和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在涿县乡里纠合徒众成为一支武装队伍。虽然这支队伍在以后的征战中不断受到损耗，但又能不断得到补充而继续发展。如在与黄巾起义军的战争中，刘备的队伍得到了“幽州乌丸杂胡骑”和“饥民数千人”的补充；在援救徐州的战役中，他又得到了陶谦“家丁四千”的补充；在与吕布交战中，得到糜竺“奴客二千”和金银货币的资助；在投奔袁绍、刘表等人的过程中，也不断得到他们军队给养和军队人员的补充和支持。

这支武装队伍的存在是刘备事业成功的基础。尽管从公元184年兴兵起事，到公元201年投奔荆州，多年来一直没有一块立足之地，但因为这支武装，他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军阀的欢迎和重视。

例如，公元196年，刘备失去徐州败走许昌，曹操对刘备仍非常重视。他表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操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番英雄论赞就是此时说的。在此期间，刘备还受到了汉献帝和京师大臣的器重，被视为朝廷要臣，参与了“受帝衣带中密诏”，诛杀曹操的机密要事。

当他败走青州，投奔袁绍时，又受到了袁绍父子的热情接待。史称“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青州袁谭将步骑迎接刘备，袁绍则“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其相见”。

当他投奔荆州刘表时，也受到了刘表的欢迎。“表自郊迎，以上宾待之”，并给刘备补充兵马，让他屯兵新野，“使拒夏侯淳、于禁于博望”。

后来，孙权要与刘备建立联盟共抗曹军，也是因为刘备拥有一支实力可观的武装力量。赤壁之战以后，刘备的武装队伍又有了很大的扩充，并在夺取荆、益，争夺汉中的各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刘备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花大气力去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要想在崇尚武力的三国时期通向成功之路，那是难以想象的。

奥秘之三：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

刘备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正确的发展路线的。他初起事时，虽有成就王霸事业的壮志，又有猛将关羽、张飞的辅助，但因为没有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最初“往奔青州公孙瓒”，其后“从徐州牧陶谦”，之后又归曹操，再归袁绍，最后“败奔荆州依附刘表”。结果是南北奔走二十多年，满头都是白发了，仍然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这种状态同刘备集团人员构成的局限性有关。刘备本人在计谋干略方面“不逮魏武”，结义兄弟关、张则骁勇有余而智谋不足，刘备集团中缺乏如曹、孙集团中的荀彧、郭嘉或周瑜、鲁肃这样运筹帷幄的智谋型人才。这是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军事集团，他们不懂得高级智力活动对事业的决定性意义。他们对天下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也提不出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长时间处在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支配之下。

刘备集团缺乏运筹帷幄的智谋型人才,和刘备早期的市井生活的局限和文化素养的不足有关。刘备开始时对文化人才重视不够。徐州的陈登是一个很有才干和抱负的人,刘备领徐州牧时,陈登还支持过他,可是刘备对他不重视。后来陈登归于吕布。所以后人说:“使陈登尚在,当昭烈复据徐州,必戮力合规,同契王室,或不至失土北奔也。”

所以,刘备“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是在屡经挫败,从失败的反思中作出的决定。他访问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寻求人才,司马德操告诉他:“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伏龙即诸葛亮。不久,他又从徐庶那里得知诸葛亮当时正躬耕于隆中,于是,刘备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终于以真诚的态度,争取到了诸葛亮的合作。

诸葛亮给刘备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也就是后人说的“隆中对”。其主要内容是“跨有荆益”,作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于孙权”,待机进取中原。

对刘备集团来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符合客观情况的发展路线。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处于迷茫之中的刘备指明了方向。从此,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不久之后就摆脱了被动局面。赤壁之战后,刘备又任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他终于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取得荆、益两州,开创了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隆中对

奥秘之四：注意争取民心，获取声誉

在任何一个时代,民心的向背都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决定性的因素。在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三国时期尤为如此。刘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很注意争取民心，获取声誉。

曹操与陶谦争夺徐州时，刘备曾率兵援救陶谦，徐州牧陶谦感刘备之义，临终时，与别驾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下邳陈登、北海相孔融等也都赞成刘备继任徐州牧。当时刘备位卑兵少，实力薄弱，却获得那么多人的拥戴，这与他“爱民”的声誉有关。刘备代领徐州牧后，陈登等“遣使诣袁绍”，说：“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殒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附文）

这就是传说中的“让徐州”的故事。由此可见刘备当时的声誉已经很高了。“让徐州”之外，还有一个“让荆州”的故事。《魏书》说：“（刘）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为我薄，所不忍也。’”《汉魏春秋》说，当刘表之子刘琮举州降魏后，有人劝刘备趁机攻取荆州。刘备却说：“吾不忍也。”有人劝他“劫将刘琮及荆州吏士”到江陵。刘备回答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如果这些记载属实，亦可见刘备风貌之一斑。

当曹操大军压境，刘备率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却回答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在患难中仍能认识“济大事必以人为本”，这就是刘备超越于当时群雄的见识。晋代史学家习凿齿对此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宜亦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附文）

得到荆州四郡后，庞统劝他攻打益州，他却以为“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后来由刘璋相邀征讨张鲁，才发兵进入蜀川。刘备入蜀川在涪（今四川绵阳东）与刘璋相会时，庞统又献策说：“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生收一州也。”刘备不同意说：“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在他初到益州的一年多

时间内，“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然后在找到有利自己的口实的情况下，才攻打益州。

其实，夺取益州本来就是诸葛亮在“隆中对”时制订的战略方针，但如在初入蜀川与刘璋相会时就乘机袭杀，夺取益州，在刘备看来，势必引起当地人民的恐惧和反感，对今后的统治不利。为了夺取一城一地而失去蜀川的民心，在刘备看来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刘备宁肯耐心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肯贸然行事。

夺得益州以后，他又把刘璋的旧部属臣“处以显任，尽其器能”。当时有人要以胜利者的姿态，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围地桑田分赐有功诸将。刘备认为这样做会失去益州原来居民的欢心，不肯采纳。反而命令归还益州居民的旧宅，令其安居复业。所以蜀川易主之后非但没有出现混乱，反而导致了“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局面。

刘备的“广施仁义”是有他的政治目的性的，关于这一点，刘备本人也承认：“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三国志·蜀书·庞统传》附文）

可见刘备的仁爱信义并非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理想，而是为了达到夺取天下目的的政治手段！因而具有虚伪的一面。但是这种虚伪也是历史进步力的歪曲反映。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人们对那些军阀的残暴杀戮的行为深恶痛绝，刘备实行的尽管是虚伪的假仁假义，也比赤裸裸的不仁不义要好些。例如在杀人问题上，少杀人、不杀人，即便是虚伪的，也比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屠城要好。

奥秘之五：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刘备取得成功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他具有性格的优势。

刘备在性格上属于强型，他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无论碰到什么打

击、挫折、失败，他都不灰心。刘备出身贫苦，但是这一性格优势，使他具备了众多富家子弟不可企及的最大财富。有了这一精神财富，他就可以从无到有。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是任何一个从平民中崛起的英雄人物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没有这一点，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就没有获得成功的希望。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从平民中崛起的人，在他前进的道路上都会遇到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只有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希望获得成功。刘备的一生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早年他凭借“讨黄巾”有功，得到县尉的官职，但是他没有后台，督邮来了，想淘汰他。他求见督邮，督邮不理睬他。他气极了，破门而入，把督邮绑在树上，鞭打数百下。督邮哀求，乃自解其印绶“系督邮颈”，而弃官亡命。这是他年轻时代做过的一件痛快事，但也是一件伤心事。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徐州的地盘，又在群雄角逐的兼并战争中失落了。以后又多次失败，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依附何人，他总是壮志不衰，败而不馁。尽管一次次失败，但仍然一次次东山再起。在荆州数年，尽管他曾感慨“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并由此怆然泪下，但他决不自暴自弃，决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处于依附他人的境地，仍然不断地访求人才。他遇到诸葛亮时已年近五十，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可他屡经挫败，历经艰辛之后，依然“志犹未已”。

刘备第一次见到诸葛亮就开诚布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番话充分显示了刘备百折不挠的精神。试想，如果刘备的意志薄弱又缺乏斗志，在遭受失败以后消沉颓废了，放弃了奋斗的目标，那么还会有“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李白）的波澜壮阔的场面吗？这成功者的桂冠还会属于他吗？

欧洲民间流传着一则“蜘蛛结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苏格兰国王在抗击英格兰国王入侵的战斗中，六次都失败了。他被迫逃到荒僻山林，躺在一间茅草屋中，灰心丧气准备认命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茅屋顶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蜘蛛曳着蛛丝荡向房梁，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再来，第二次

失败了，又来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第七次，一根蛛丝才粘住房梁。苏格兰国王看到这种情景一跃而起。他想蜘蛛失败了六次还不甘罢休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再干？他克服了悲观绝望的情绪，重新召集队伍，终于经过第七次奋战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刘备的艰难险阻远远超过了这个苏格兰国王。苏格兰国王只失败了六次，刘备一生的失败岂止六次。如：

安喜尉，弃官亡命，第一次。

高唐尉，打败仗，逃奔公孙瓒，第二次。

代徐州牧，被吕布乘虚袭取，第三次。

在小沛，又被吕布袭击，逃奔曹操，第四次。

在曹操帮助下东击吕布，后又遭失败，第五次。

与曹操战于徐州，败绩，逃奔青州，第六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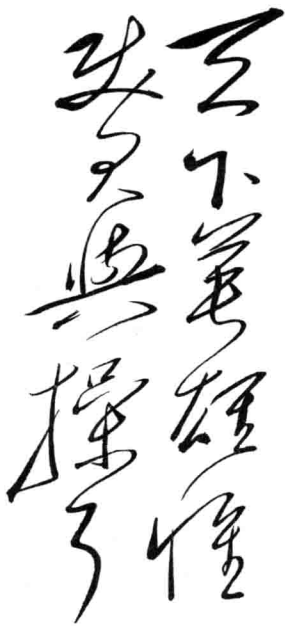
曹操破袁绍，南击刘备，刘备逃奔荆州，第七次。

曹操南征，刘备逃奔夏口，第八次。

这还不包括夷陵之战这一次最大的失败。

夷陵之战中他不听诸葛亮的劝阻，贸然进军与东吴交战。在苞原险中，树栅连营七百里，结果因犯兵家所忌，遭吴将陆逊火攻，兵败而归。刘备的这次失败，与他在益州、汉中胜利后的骄傲情绪有关。但即使遭受如此大败，他依然折而不挠，临终前仍然遗命“讨贼”。他是不会为失败——哪怕是重大的失败所压倒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符合程度。从刘备成功的各种因素来看，正是他所具备的主观条件符合了客观实际的要求，才使他步入了成功者的行列。刘备的成功，不是由几种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有着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统一，主客观的一致，时代风云和他个人才能及性格因素的综合交错，才造就了这样一个成功者。



罗贯中 三国演义
第二十一回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背景

据《三国志》记载：公元196年冬，吕布袭击刘备，把刘备从其下统辖的下邳地区（今江苏睢宁西北）赶了出来，刘备只好投奔曹操。当时，程昱对曹操说：“现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一次，曹操宴请刘备，席间，曹操“从容”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听了大惊，“方食，失匕箸”。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对这一情节补充道：“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曹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明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则将这一情节演绎为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一日，关、张不在，玄德正在后园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警问：“有甚紧事？”许褚曰：“不知。只教我来相请。”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见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吓得玄德面如土色。操执玄德手，直至后园曰：“玄德学圃不易！”玄德方才放心，答曰：“无事消遣耳。”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将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尝。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笑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

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后人

有诗赞曰：

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刘阿斗是低能儿吗

“虎父焉生犬子！”但历史的玩笑常常是虎父偏生犬子。大英雄刘备的儿子刘阿斗(名禅)就被人称做“犬豚”。他是以窝囊著称于史的，千百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低能儿的同义词。“扶不起的刘阿斗”，这句俗谚，就是贬斥一切低能儿的通用词汇。

但是，刘阿斗果真是一个低能儿吗？

有关刘阿斗的身世传说

关于刘阿斗的身世，史籍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鱼豢《魏略》的说法：刘阿斗生于小沛(今江苏沛县)，幼年时在兵荒马乱中丢失，后被人贩卖到汉中，长大后始被刘备找回。《魏略》的原文是：“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

一种是《三国志》的说法：刘阿斗生于荆州，三岁时，曹操进袭荆州，父亲逃亡，刘阿斗为刘备大将赵云所救。不久，母亲甘夫人亡故，他跟随孙夫人。孙夫人回江东时以他为人质带走，被赵云勒兵断江夺回。以后又跟随父亲去成都，章武元年(公元 221 年)立为皇太子(《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史学家裴松之考证：“《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于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阪，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于小沛，禅是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败于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三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据此，关于刘阿斗的身世仍以《蜀书》的记载为是。《魏略》的记载，大概是根据当时的流言传说。在魏蜀两国相隔千里、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发生一点关于刘阿斗的流言和传说是不足为奇的。

但传说也好，流言也好，刘阿斗是刘备的嫡亲儿子，这是不容置疑的。刘阿斗幼年失恃，母亲早死，父亲又戎马倥偬，没有多少时间照看他，这大概也是不容置疑的。由于这种情况，刘阿斗幼儿时期，大概很少获得父母之爱，“胎教”和幼教自然也很缺少，这对他的智力发育可能有些影响。



荆州大逃亡之后，他父亲在赤壁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获得了一块落脚地。公元210年，孙权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她就是前面讲到的孙夫人。从此刘阿斗有了一位继母。当时他已三岁。但是这位继母性情“刚猛”，“侍婢百多人，皆持刀侍立”。连刘备见了她都“心常凛凛”，一个三岁的孩子见了她，大概也不会感到惬意。同时，从孙夫人的婚姻目的和生活习性看，她对刘阿斗大概也不会有多少母爱。由此，刘阿斗也只能在孤独中度过童年。

不久，刘备入蜀，孙夫人返吴。这时，刘阿斗连继母也没有了。

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纳吴氏为后，她就是史册中说的穆皇后。于是刘阿斗又有了一位继母。这时，他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了。穆皇后是蜀汉很有教养的淑女，她对刘阿斗大概不错。在此以前，刘备已把教育

接班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丞相诸葛亮，从此，他有了一位好母亲，一位好老师，又可以经常看到父亲。这几年大概是他生活最安定、最幸福的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厄运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父亲兵败夷陵，病困于白帝城。父亲病危时想念自己的儿子。他给儿子写了一份情深意长、寄托厚望的遗诏：“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按即射援——作者），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遗诏说明了这位从平民百姓中崛起的皇帝，尽管颠沛一生，但是对自己儿子的成长还是十分关注的。他劝说刘阿斗从“去小恶、积小善”入手，修养德性，并努力读书，提高自己的素养。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有些人不承认刘备是英雄，只承认他是“枭雄”，看来“枭雄”也是有父子之情的。

刘备的遗诏透露了刘阿斗智力水平的信息。大智谋家诸葛亮认为刘阿斗“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而刘备也不怀疑这一点。看来，刘阿斗尽管幼年失恃，相当时间内教育条件甚差，但智力并不坏，接受教育的能力甚强，绝非低能儿可比。

白帝城托孤之后

公元223年，刘备在临死前，召见诸葛亮，把刘阿斗托付于他。刘备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流着眼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又对刘阿斗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君可自取”这句话讲得似乎很彻底，其实是要诸葛亮在神人之前誓表忠诚。“事之如父”好像委屈了刘阿斗，其实是把两个人的命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了。两方面，话都讲透了，上下关系也摆平了，这就是大英雄处

事之不平凡处。

刘备死后，一切都按他预先的期望进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阿斗“敬贤任才”、“夙夜匪懈”，国家治理得很有条理。

这期间，蜀汉国内矛盾不少，战争又特别频繁。诸葛亮先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后来又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刘阿斗留守后方，筹备军资，处理政务，做了大量的工作。

公元234年秋天，诸葛亮在国防前线殉职，由他生前选定的付托“后事”的尚书令蒋琬总统国事，刘阿斗一切听从蒋琬的，国家治理得也还不错。但是，刘阿斗毕竟是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欲，也喜爱美人。他想学其他皇帝的样，采择宫女充实后宫。刘备简拔的黄门侍郎（皇帝侍从）董允不肯。董允说：“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嬙已具，不宜增益。”（《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刘阿斗听了非但不敢再提此事，而且对董允另眼看待，很怕他再挑自己的毛病。刘阿斗对善于逢迎自己的宦官黄皓有好感，很想提拔他。但董允“正色匡主”，刘阿斗接受意见，不敢再提拔黄皓。

刘阿斗同一般人一样，也喜欢游玩，不愿意老关在宫墙里。所以诸葛亮一死，他就“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汶水，就是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看了都江堰，还想出去旅游。他还喜欢音乐歌舞，想“增广声乐”。这可不得了，老臣谯周立即上疏劝谏，告诫说：“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建议他省减乐官，节俭后宫。对这样的逆耳之言，刘阿斗也容忍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谯周在这篇奏疏里不客气地批评皇帝，但他也承认刘阿斗是有领导才干的。他表扬刘阿斗“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从这也可以看出，刘阿斗在这个时期，皇帝做得还是满好的，处人处事都合情合理，绝不是一个低能儿所能望其项背的。

昏庸的晚年

公元246年，蜀汉王朝的两大台柱蒋琬、董允相继死去。《魏略》说，这以后，刘阿斗“乃自摄国是”。当时他已年有四十。

从公元247年到263年蜀汉亡国，刘阿斗“自摄国是”十六年。这十六年，蜀汉王朝的历史坐标是一个下延曲线，刘阿斗在走下坡路。

“鞠躬尽瘁”，使刘阿斗敬之若父的诸葛亮死了；“匡正救弊”，使刘阿斗望而生畏的董允也死了。戴在他头上的紧箍圈消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恣肆所欲了。

“便辟佞慧”的宦官黄皓抓住机会投刘阿斗所好，操弄权柄，为非作歹。刘阿斗喜女色、好游乐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

他在尽情享受之余，想起过去受董允等人限制的往事，感到非常懊恼。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走下坡路，却痛恨自己过去太“自轻”。

蜀汉亡国前的五年，刘阿斗已不大管理朝政，黄皓专权一切。尽管大将军姜维位在黄皓之上，但大权仍在黄皓手中。姜维痛恶黄皓恣擅弄权，上书刘阿斗，建议铲除黄皓。刘阿斗急忙出来为黄皓辩护：“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姜维只好“逊辞”，刘阿斗叫黄皓到姜维那里说好话、赔小心。姜维只好求去边境种麦，以避“内逼”。

亡国的大祸，迫在眉睫了。钟会、邓艾“治兵关中”。这时姜维上表，建议派遣张翼、廖化督军守卫阳安关、阴平桥，但黄皓却以鬼巫的瞎话启奏刘阿斗，说敌人“终不自致”，无须担心。昏庸的刘阿斗竟然听信这种荒谬的主张，“不作城守调度”。不到一个月，邓艾的奇兵果然取道阴平自天而降，刘阿斗只好束手待擒。

刘阿斗做了四十年皇帝，前期二十几年做得不错，循规守矩，即使够不上明君，也是个及格的皇帝。后期十六年做得不好，糊涂昏庸，只能称之为昏君。

刘阿斗晚年忘了他父亲刘备去恶积善的遗诏，忘了他老师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教诲，做了亡国皇帝，的确很不成材。但他也不是个坏得不得了、的暴虐君主。他没干过很恶劣的事情，他治理下的蜀汉虽然不像史书说的“家邦和一”那么好，但总的局面还是安定的。

不妨作一个横向比较。

先看看曹操的继承人曹丕。

这个人聪明干练，能文能武，才艺出众，智慧远在刘阿斗之上，但是人品却不够好。

刘阿斗的昏庸不过是要增加几个嫔妃，曹丕则公然抢夺美人(甄后)，还霸占其父的全部美姬歌妓。刘阿斗的享受不过是游玩，曹丕则明珠、大贝、象牙、犀角、翡翠、珍禽……什么都要搜刮，他的太傅钟繇有一块稀世之宝——美玉，他也要利用权力占为己有。连他母亲卞后都骂他“猪狗不如”。

曹丕还是个迫害狂、虐杀狂。他一登上王位，就暗杀了他的同母胞弟曹彰。这位老弟其实是拥护他的，也没犯任何错误，只不过武功卓绝，是他的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已。接着，他还要虐杀另一个同母胞弟曹植。他母亲气昏了，斥责他：“汝既杀我任城(曹彰)，不当复杀我东阿(曹植)。”杀不了曹植，就想尽办法折磨他，迫害他，民间传说的《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是讽刺曹丕的。

不仅迫害曹植，就连曹植的朋友，也要迫害。曹植的好友丁仪、丁廙都因曹植的关系被杀，杀了二丁不算，还要杀他们的全家。像这种疯狂虐杀的嗜好，刘阿斗没有过。

再看看孙权的继承人孙皓。

这人是江东头号“法西斯”。没上台时伪装老实，上台后马上变脸，暴虐骄盈、凶残淫侈，什么坏事都干。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说：“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连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岑昏险谀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苦。”

岂止是剥人皮，凿人眼，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有一次他的爱妾“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被司市中郎将绳之以法。孙皓闻讯大怒，竟用烧红的锯条生生把中郎将的头颅锯断。这些只不过是这个江东头号“法西斯”无数罪恶中的一个片断。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说：“(孙)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这是一个史学家对暴君独夫的正义鞭挞。

孙皓统治下的东吴“上下离心”，敌军一来，“土崩瓦解，靡有御者”。刘阿斗统治下的蜀汉，尽管矛盾甚多，却远不到这种程度。

安乐公的苦衷

敌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这时，刘阿斗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议论纷纷：有人主张背城一战，同死社稷；有人主张东奔东吴，寄国求存；有人主张急趋南中，阻险斗绝。位亚九列的光禄大夫谯周却主张降魏求和。

刘阿斗仍想奔南。谯周上疏，引证《易经》“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话，要刘阿斗效法微子衔璧而归武王的故事，向魏军投降。刘阿斗看了这份奏疏，决计投降，蜀汉亡国。

蜀汉和曹魏都是封建制的国家，两国的民族构成、文化语言、经济生活都基本相同。从中国历史统一发展的观点看，蜀汉降魏，减少了战乱，为西晋王朝的和平统一创造了条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三国争雄中蜀汉的立场看，蜀汉降魏却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王崇认为：“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按道南归，艾为成擒。擒艾已迄，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三国志集解》）

东晋史学家孙盛大体也是这个观点。但从当时魏蜀两国整个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看，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刘阿斗投降以后，被封为安乐公。《汉晋春秋》说：“司马文王（司马昭）与禅（刘阿斗）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故国不堪回首，何等悲怆！刘阿斗却“喜笑自若”。后人对此颇多贬义。所谓“扶不起的刘阿斗”，所谓“低能儿”，大多由此而来。

但是，正如前面讲过的，刘阿斗并不是低能儿，就当时的境遇而言，“乐不思蜀”，其实是最聪明的回答。不然就会触犯“图谋复国”的忌讳，招来杀

身之祸。他父亲刘备在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不也是装熊卖傻，掩饰过场的吗？刘阿斗在这一方面，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传基因，而且有新发挥，先假装哭泣，然后又老实地承认这是郤正教的，最后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新发挥。这出戏太重了，亏他拿得下。

明人于慎行看出了安乐公的苦衷。他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郤正教之，浅矣！思蜀之心，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三国志集解》）

同样的亡国皇帝孙皓，当了俘虏，还要伶牙俐齿地同司马炎争长论短。结果遭司马氏忌恶，不明不白地死去。安乐公则安乐享年，直到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才死去。时年六十六，比他父亲的寿命还长。

小智似黠，大智若愚。个中的差距，是不能以道里计的。

只能如此

如果把大人物的继承人按虎子、犬豚来划分，那么亡国皇帝刘阿斗只能算是犬豚。但即使是犬豚，也不等于就是低能儿。何况他的亡国主要是由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决定的，不能仅仅归咎于他的智力因素。

是的，统观刘阿斗的全部表现，他不是个睿智聪慧的人物，但也绝不是个呆傻迟滞的人。他同我们大家一样，只是个智力平凡的人。

正像陈寿所说的，他这种皇帝，“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惟所染之’”。至于任贤相还是惑阉竖，这里除了某些客观条件，则主要应归咎于个人的选择。

刘阿斗悲怆的表演留给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大家多属智力平凡的人，很少有什么智力超群的天才）的教训是：

一个人的智力有限，但只要谦虚谨慎，多做好事，经常接近正直、贤明的人，听他们的话，少做错事、坏事，就总有希望；如果放纵自己，总同那些流里流气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涉世不深，智力平常的人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绘写最美的图画，也可以被黑暗势力的大染缸染成废品。《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都要自强不息，何况我们一般人呢！

诸葛大名垂宇宙

诸葛亮可以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历史人物了。“诸葛大名垂宇宙”，千百年来，他的名字在人们的语言里几乎变成智慧的代名词。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获得这样大的声誉，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此种情况，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流传有很大关系，但又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因为早在《三国演义》出现以前，他的许多事迹已经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知晓，西晋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诸葛亮死去才四十年，据他说，那时候，“梁益（即今四川、陕西等地）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甘棠》，《诗经》篇名。召公，西周名臣。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颂歌诸葛亮的名句，反映了唐代的人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情感。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名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士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

（李白《书怀》）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他的确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總 部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杜甫 蜀相

承〔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罗隐 筹笔驿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他的早期生活和“隆中对”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他是个孤儿，早年跟叔父诸葛玄移居荆州，诸葛玄去世，他和弟弟诸葛均等耕读于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南)。他身居茅庐，胸怀天下，密切地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对当时天下的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在当地的知识阶层中有很高的威信，被称为“卧龙”。他经常吟唱《梁父吟》(据说是一个关于晏子的歌)，自比于管仲、乐毅。不理解他的人，说他自比太高，但是他的好友崔州平和徐庶认为他确实有管、乐的才能。

公元207年，当时依附于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从徐庶等人的介绍中知道了诸葛亮的才能和威望，大为羡慕。那时刘备正在加强他与荆州士族地主和知识阶层的联系，便以礼贤下士的态度，亲自到隆中寻访诸葛亮，往返三次，方才得见。这就是有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部總軍放解民人國中

寫右龍年妖
 國
 中原逐鹿
 象床
 宝剑[帐]无言语

部總軍放解民人國中

鐵馬雲龍共絕塵
 柳營高壓漢宮春
 天清殺氣屯關右
 夜半妖星照渭濱
 下國卧龍空悟主
 中原逐鹿不由人
 象床
 宝剑[帐]无言语

部總軍放解民人國中

不
 由
 人
 象
 床
 宝剑[帐]无言语

温庭筠 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
 象床宝剑[帐]无言语，从此焦[讷]周是老臣。

刘备这个经历了无数失败,但依然雄心不已的将军当时虽然年近半百,却仍然能放下架子,虚心地向一个年纪才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求教。青少年时代跟着母亲过的那种织席贩履的贫穷生活,影响了这位将军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大动荡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真正的弱点不是没有曹操、孙权那种地位,而是没有他们那种文化素质。他知道怎样团结和任用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勇夫和猛将,却不知道怎样团结和任用那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才华出众的徐庶的到来,使刘备打开了面向知识阶层的眼界。这个昔日的皇族后裔正因为失去了皇族的高贵地位而学会了聪明。他“三顾茅庐”、屈身求教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表现,说明他已经认识了并正在努力弥补自己的缺陷。

他直率地向诸葛亮表露自己“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的情况,虚怀若谷地请求诸葛亮为他指示方向。正是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谦逊精神,他才获得了一个才华冠盖当时的卓越人才。

考察了将军远道来访的诚意,感激他“猥自枉屈”、“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诸葛亮开诚布公地给刘备分析天下的形势,并为他筹划了割据荆益、三分天下,和夷治内、联吴抗曹,兴图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

现在按陈寿的记载,把这次较著名的对话稍加注释,引述如下:“自董卓以来,豪杰四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引为援助),而不可图(谋取)也。荆州北据汉、沔(汉水、沔水),利尽南海(今广东地区),东连吴会(吴郡、会稽,今江浙地区),西通巴、蜀(今重庆、四川等地),此用武之国,而其主(刘表)不能守,此殆(简直是)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有这个打算吗)?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愚昧、软弱),张鲁在北,民殷而国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后裔),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在今陕西省),百姓孰敢不箪食壶

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隆中对”，对于刘备就像黑暗中的一道亮光，照亮了他崎岖不平的前途。这么多年，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涯中，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给他过这样清楚的指示，他高兴极了。他接受了诸葛亮为他筹划的战略方针，并把它作为自己今后政治活动的方向。他诚挚地要求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图谋霸业，诸葛亮这才走出茅庐，做了刘备的西席之宾。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原来同刘备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关羽、张飞觉得诸葛亮夺了他们的兄弟情谊，不高兴了。刘备开导他的兄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后来毛泽东常用这个鱼与水的典故来比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为什么隐居乡间、过着耕读生活的诸葛亮，能为当时亲自参加政治、军事斗争实践的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战略对策呢？这难道不违背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基本观点吗？或者是在重复“天才论”的谬说吗？不，这既不违背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基本观点，也无关于“天才论”。

诸葛亮对于天下形势的认识同样也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他虽然隐居于乡间，但是同外界有广泛的联系。荆州地处中原，是天下交通的中心，四面八方来往的人很多。诸葛亮同四面八方来往的人有许多交往，他身边实际上有一个由知识阶层组合的友谊联络网。此外他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同他有经常的书信往来，这些都是他了解外界情况的渠道。

难道他对情况的了解能比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的刘备还要多吗？有些情况是要多一些。比如荆州，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对它的了解，恐怕就比刘备要多一些。再有东吴的情况、益州的情况，刘备所知道的在许多方面恐怕也不会比他深刻。当然，关于北方斗争的许多情况，刘备知道的比诸葛亮要多。此外，还有一个认识深化问题。认识开始于实践，但有待于深化。经验、见闻、感觉、亲历，这些东西是可贵的，但还不是全面的东西，不是本质，不是物的联系，不是规律。要从局部的经验、见闻、感觉、亲历到全面、本质、联系、规律，还要经过思维的作用，即把实践得来的材料送进头脑加工厂加工、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造成理性的认识。这

样才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更本质、更正确的认识。

诸葛亮优越于刘备的地方，就在于他肯下苦功夫去分析研究他所得来的有关时局发展的客观材料，从而对天下形势得出比刘备更全面、更深刻、更本质、更正确的理性认识。

诸葛亮在天赋上也许比一般人聪明一些，但是主要问题不在于天赋。人在天赋上的差别不是很大。人的智慧发展决定性的条件是后天，这后天的条件中包括环境、学习、思维习惯的培育、思想方法的训练、理论思维的深化等等，而这些条件正是刘备所缺少的。其次，刘备的戎马生活，东奔西跑的颠沛流离，生命经常处于危险中的心惊胆战，这些动荡不安的因素，妨碍了他坐下来好好学习、思索，而在这些方面，处于局外人地位的诸葛亮就比他优越得多了。

这些就是诸葛亮和刘备同处于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襄之国，一个能够看出在当时条件下，荆益可以独成一格、三分天下；一个却扑朔迷离，看不出这一着棋的原因。

既然诸葛亮已经知道曹操力量强大，东吴国险民附，为什么他不去投奔曹、吴，而去与当时实力很小、前途难以预卜的刘备共患难、同命运呢？

诸葛亮的这种抉择，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第一，他不能去曹操那里做官。诸葛亮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他也是社会具体环境的产物。他的叔父是刘表的好友，刘表是汉室正统的维护者，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坚决反曹的。荆州的知识阶层大多也是反曹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诸葛亮自然也倾向于汉室正统派。他怎么能去有篡汉之嫌的曹操那里做官呢？如果说，连曹操都因为受到汉室正统派舆论压力的挟制，至死也未能正式地以魏代汉，那么怎么能设想，从小就在汉室正统派观念熏育之下长大的诸葛亮会去拥曹反汉呢？

第二，他雄才大略，自比管、乐，非但不是一个甘居寂寞的人，而且是一个强烈要求能有一个机会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不愿意去做那种放不开手脚的小官而已。他的性格是，做官就要做那种放开手脚大干的官，不做官就躬耕于草莽。当个婆婆妈妈的小官，窝窝囊囊的，干得了什么管、乐的事业呢？

第三，去东吴吗？他的哥哥在那里干了那么多年，不过混上了一个中司

马。东吴人才济济，能让他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角色担当什么大任吗？已经大权在握的孙权，恐怕连正眼都不会看他一下。去那里毛遂自荐、低声下气地乞求一个二等文官做做吗？那还不如高卧隆中，吟唱《梁父吟》呢。姜太公年高八十还在渭水钓鱼，何况他才二十多岁！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虽然现时势力不大，但却雄姿杰出的左将军刘备三顾他于茅庐之中，这个人正是他三分天下的形势分析中能大有作为的人。隆中对话，使刘备如鱼得水，而诸葛亮也感到自己的管、乐之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施展的机会。特别是刘备那种在时代激流中壮心不已的顽强搏斗精神也不断冲击他出去干一番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应邀出山，难道不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吗？

“隆中对”方针的实施和挫折

公元208年，曹操发动征伐荆、吴的战争，刘备和孙权都到了危亡的关头。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在诸葛亮和东吴政治家鲁肃的倡导下，孙、刘建立了政治军事的联盟。由于这个联盟的建立，孙、刘两大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合力击败了曹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占据了荆州。“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第一步完满地实现了。

公元211年，刘璋派遣法正到荆州，邀请刘备到益州讨伐汉中的张鲁，第二年刘备进入益州以后却挥戈向成都进攻，诸葛亮同张飞、赵云等也率众溯江而上，配合刘备，占据了益州全境。“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第二步也完满地实现了。

公元219年，经过多年准备，诸葛亮协助刘备北击曹操，在定军山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占领汉中，在军事上、政治上获得了重大胜利。同年，荡寇将军关羽又率领荆州的部队向宛洛方向的樊城（今湖北襄樊）进军。“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第三步也在实现之中。

这是诸葛亮一生中精神上最愉快的时期。虽然斗争是紧张的，生活中有惊险、艰辛和波折，但是他的事业在不断前进。青年时代在乡村茅庐中反复筹划了许多夜晚的战略方针，在由计划变成现实。自己多少年的政治抱

负，直可与管、乐相匹敌的事业、理想，在逐步实现着。当他同群臣上表尊刘备为汉中王，回顾这倾注了他不知多少心血的业绩时，就像母牛舐犊一样，心情是激动的。表章中说的“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也是他多年理想的表达。

可是，正当他日夜辛苦构造的大厦日趋完善的时候，突然间晴天霹雳，这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却轰然一声倒塌了，这根支柱的倒塌，摧毁了他经营了多年的巨大工程的一半。

吴蜀联盟破裂了。孙权从后路袭击了正在同曹操作战的关羽，夺取了荆州（蜀汉所属部分），斩杀了关羽。

惨痛的打击是突如其来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是必然的。

1. 东吴在赤壁之战以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迫切要求按照其实际地位扩大土地占有和统治权力。但是它的发展在东、南两面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北面受到强大的曹魏势力的限制，唯一有利的发展方向是西面的荆州。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土地辽阔、形势险要，地处东吴的上游，对东吴的安全和发展关系重大。赤壁之战以后，它一直是吴蜀争夺的焦点。

2. 孙、刘联盟本身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间的一种利害联盟，是在曹操战争威胁下产生的。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这个联盟就开始失去了原来那种紧迫性，特别是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早就有许多人不满意孙、刘联盟。他们认为这个联盟妨碍了他们向荆州的扩张。公元217年，坚决主张孙刘联盟、共同抗击曹操的政治家鲁肃去世。鲁肃的去世，使东吴内部反对孙、刘联盟的一派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3. 在赤壁、汉中、樊城战争中连续遭受失败的曹操由愚蠢变得聪明起来。他接受了司马懿、蒋济等人的意见，积极地进行拆散孙、刘联盟的活动。他答应分割江南以封孙权，并以荆州为香饵诱使孙权去攻打关羽的后路。孙权当然不难看出曹操的香饵后面还有鱼钩，只是荆州这块肥肉太鲜美了，他宁可吞下鱼钩也要去获得这块肥肉。他的打算是先吞下香饵，再吐出鱼钩。等荆州夺到了手，再相机摆脱曹操。

4. 但是对刘备这方面来说，不管客观条件发生什么不利的变化，只要荆州内部巩固，防守严密，孙权也是难以下手的。不幸的是镇守荆州的将军

关羽，因为他的骄傲无知，飞扬跋扈，已经把荆州弄得上下离心离德，而在防务上，对东吴又没有应有的戒备。以致在北伐曹操时，孙权策反了驻守江陵、公安（均在今湖北省南部）等地的官员，里外配合，轻而易举地袭取了荆州。

造成这一失败的责任，首先是刘备、诸葛亮他们自己。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着力经营这个天下“用武之国”的荆州，然后夺取益州，再以荆、益两州为根据地相机向秦川、宛洛发展，进而与曹操逐鹿中原。刘备不仅接受了“隆中对”的基本思想，而且把它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指导方针。可是，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形势发展得太快了，接连不断的政治、军事胜利冲击了一切，仅仅两三年时间，这个原来力量不大的小军阀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他们不仅获得了大江南北的江陵、南郡、零陵、桂阳、长沙等广大地区，而且获得了民殷国富、沃野千里的巴蜀、广汉、南中等地区，以后，又夺取了汉中，打开了从西方通向中原地区的大门。这个暴发的封建政治、军事集团为了消化这个广大的地区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刘备或诸葛亮都把他们原来借以安身，后来又借以发家的天下形胜之地荆州忘却了。不是完全的忘却，而是忘却了这个地区在他们全部事业中所占的特殊重要地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偏离了自己在“隆中对”中所制订的战略方针。

赤壁之战以后的一个短时期里，他们为经营这个地区花了许多力量，但是从进入益州以后的八年来，他们没有再认真关心过这个地区。他们把这么一个位置重要、疆土辽阔的地区，委托给了一个既没有政治头脑，又骄傲自负的一介武夫关羽。诸葛亮就那么不了解关羽吗？不，他对关羽还是了解的。只是因为关羽同刘备的特殊关系，他常常以妥协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矛盾。这就更加助长了关羽自视特殊的骄傲作风。关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公民、特殊将军。

就以关羽粗暴地处理孙权求结婚亲的事件来说，傲慢无礼、拒人千里不用说，还谩骂别人、侮辱人家的人格，这是严重破坏东联孙吴方针的重大错误，要是换了任何其他他人，早就受到了斥责；但它是关羽干的，没有事。再以关羽问马超“谁与比类”的事件来说，这也是一件影响很坏的唐突行为，换了其他人，诸葛亮也早就给予批评了；但它是关羽干的，也没事，非但没事，还

获得了美髯公“绝伦逸群”的称誉，这就太过分了。一切都要顺着关羽的脾气来，一味地迁就、退让，不讲任何原则，甚至在牵涉整个政治集团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上，也可以马虎了事。特殊到了这般地步，其最后结果是不仅丢失了荆州，而且也毁灭了这个特殊将军。

是没有更好的人来替代关羽吗？不，以文官来说，不仅益州，就是荆州的人才也很多。武将呢，不仅黄忠、赵云比关羽的本事大，就是莽撞的张飞也比他有政治头脑。但是刘备、诸葛亮就是迷信他们这个好兄弟。在惊人事件发生之后，刘备捶胸顿足，痛哭流涕，诸葛亮也茫然无措，悲伤不已。他们似乎有了悔悟，但是为时已经太晚。是的，世界上许多宝贵的东西常常是在失去的时候，人们才痛切地感到它的存在，它存在的时候，人们却不去珍惜它。

但是，无论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如何惨苦、严重，领导者都要保持沉着和冷静，尤其要保持自己应付恶劣境遇的自主能力。这时候，最忌讳的事情是：冲动，丧失理智，不顾一切。那样，就要继续犯更大的错误。

在“隆中对”规定的联吴抗曹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曹、孙联合，共反刘备”时，应该怎么办呢？

是抛弃已经遭到破坏的“隆中对”方针，改行反孙、反曹的方针呢？还是在新的情况下惨淡经营，努力恢复“隆中对”规定的联吴抗曹的方针呢？这是刘备、诸葛亮和他们的集团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

刘备决定抛弃“隆中对”所规定的联吴抗曹的方针。他认为情况已经变了，孙权已经打上门来了，不可能再有孙、刘联合的局面了，他决心积蓄力量，同孙权决一雌雄。

诸葛亮则不同意刘备的决策。这倒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从感情上说，联吴抗曹的方针是他青年时代在隆中茅庐中多次分析天下形势而得的结果。赤壁之战中他以刘备特使的身分，亲自去东吴为这个方针的实现奠定了基石。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代，柴桑宫阙的纵横议论，将军孙权的盛情款待，挚友鲁肃的热情支持，这些都是他难以忘怀的。但是这一切都烟消云灭了，残酷的现实是孙权背信弃义，袭占了他原来要倚以兴国立业的基地。他的联吴抗曹的方针实际已经不存在了。不仅刘备，就是刘备集团的其他人多数也不再相信这个方针了。

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间的联合和分裂,本来是以各自的利害为基础的。这一点诸葛亮不会比别人了解得更少。口头上的信义、漂亮的言词都是不可相信的,这一点他也能懂得。他们同刘璋就没讲什么信义,口头上讲的是共同抵御张鲁,实际上行的是回军攻打成都,为什么孙权一定要同他们讲信义呢?他的失策之处是他竟没有想到荆州已经被关羽弄得一团糟了,孙权只用了一个轻快的跳跃,就摘走了这颗熟透了的果实。事情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从此就抛弃“隆中对”的基本思想,依着刘备的主张,去同孙权决战一场吗?诸葛亮不赞成这个主张。

其原因是:

1. 荆州的易手,破裂了孙、刘双方的联合,但是并未解决孙、刘双方各自同曹操对抗的基本形势。天下依然是三分,曹操依然是威胁孙、刘政权生存的共同敌人,孙、刘两方除了荆州的矛盾以外,依然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在新条件下依然存在着再联合的可能性。

2. 刘备要想打败孙权是困难的。东吴经过孙权、鲁肃等人十多年的经营,他们的统治比过去更为稳固了;袭击荆州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力量的增长。刚在荆州遭到惨败的刘备集团,想依靠仅有的益州,去向已经把荆吴连成一片,并且得到了曹操支持的孙权集团进攻,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它甚至不比进攻中原更为容易。

3. 更重要的是,同孙权决战,势必逼迫孙权进一步去同曹操加强联合,如果孙、曹一起向刘备进攻,刘备的政权就有全部失败的危险。但是这一次诸葛亮未能说服刘备和他的集团。刘备、张飞等人狂热地要求复仇,要求挥师东征。

诸葛亮出茅庐以来,第一次同刘备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他无法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只好观望等待。

公元222年,刘备在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之后,亲率蜀军讨伐孙权。果然在夷陵之战中被东吴年轻的统帅陆逊打得大败。这次惨痛的打击,把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翁弄得气急败坏,从此一病不起。

他恢复了一点理智,反复考虑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觉得还是诸葛亮比他有远见。他一生的事业处在困难之中。同他亲如手足的结义兄弟都先他而逝了,剩下的是一个尚未成材的儿子阿斗,他希望诸葛亮辅佐他的儿子继

续他的事业。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召见诸葛亮遗命托孤。他的遗命中虽然没有明白检讨自己轻率决定讨伐孙权的错误，但是却已不再重提攻打孙吴，而是把继曹操而立的曹丕列为首要敌人。他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定国家，完成大业。这就是说，他终于在临死时，表示要重新回到“隆中对”时所预定的方针。他要他的儿子把诸葛亮当作父亲一样对待，并对诸葛亮说，如果他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成材，你就取而代之。以刘备的智力，他完全能了解诸葛亮的为人，他所以这样说，也不完全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是为了让诸葛亮不受任何阻挠地实现他已经决心返回的方针。

诸葛亮为他终生知遇者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他哭了。他向刘备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忠贞持节，努力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南征北伐及其政治、军事意义

诸葛亮接受遗命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联吴抗曹的方针。这是当时关系战略全局的重大措施。他采取这项措施的历史根据是夷陵之战以后，荆州归属问题已经确定，吴蜀矛盾向和缓方向转化，而两国同曹魏的矛盾却逐日上升。特别是吴、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吴国在战争中损失五万多人，全国上下愤懑之极。

公元223年夏天，诸葛亮派邓芝出使东吴，表示愿意在承认吴、蜀两国疆土现状的基础上重新结盟。邓芝才华很高，能言善辩。他以吴蜀唇齿相依，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分立的道理，说服孙权绝魏和蜀。孙权大为高兴。孙权在夷陵之战以后，本来已经愿意同蜀汉重归和好，也有过一些和解的表示，这次邓芝的到来，使双方的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潮。他极力称赞这个给他带来和平友谊的大使，说“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吴蜀联盟恢复之后，诸葛亮着手解决南方叛乱问题。

夷陵之战失败以后，益州南部西南夷聚居的几个郡县相继叛乱。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军南征。马谡建言：“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个建议完全符合诸葛亮“隆中对”中南抚夷越的思想，受到重视。五月，诸葛亮渡泸水

(今雅砻江下游),与西南夷族首领孟获等作战。据裴松之引《汉晋春秋》所记,诸葛亮在战争中用“七擒七纵”的办法收服了孟获,平定了南中各地的叛乱。孟获后来在蜀国为仕,官至御史中丞。

诸葛亮收服孟获,平定南方以后,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关系。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即使在古老的年代,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可以用比较和缓的方法解决的。那种对少数民族残酷镇压的办法,完全是野蛮的、不道德的,应当受到历史的谴责。

吴蜀联盟恢复了,南方动乱解决了,诸葛亮开始组织北伐。

他把国内的政治事务委托给郭攸之、费祋等人,自己的精力则主要转入军队。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他于公元227年率大军进驻汉中沔阳(今陕西勉县东),作攻魏的准备。临行前,他给皇帝上书,说明了起兵的原因: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前出师表》)

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从沔阳向魏国进攻,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这次进攻,他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扬言要兵出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古交通道),攻取郿县(今陕西眉县),并叫赵云、邓芝据兵箕谷(在今陕西勉县)迷惑敌人。魏国大将曹真信以为真,率领军队往箕谷方向作防御部署。诸葛亮看到曹真上当,遂即率领主力部队,兵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蜀军阵容整肃,号令严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今甘肃天水、陇西等地)纷纷背魏归汉,关中大为震动。继曹丕而立的魏明帝曹叡吃惊之余,亲赴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镇守,并派曹魏五良将之一的张

郃率领五万大军急赴前线抵抗。张郃在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同蜀汉前锋将领马谡遭遇,这次蜀军数量并不比张郃的少,但是前锋将领马谡缺乏实战经验,不问实际情况,就生搬硬套兵法,把军队驻扎在南山上,裨将王平不同意这种“舍水上山”的部署,屡次规劝,马谡不听。结果被张郃团团围住。蜀军断水之后,军心混乱,被魏军打得大败。后来靠了王平部的援救,余部才得以撤回。由于街亭战役的失败,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计划落空。

马谡是一个熟读兵法、才华毕露的人。他善于高谈阔论,诸葛亮很看重他,常常和他谈说到深夜,刘备看出了马谡的弱点,临死前嘱咐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是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马谡果然打了败仗,应了刘备死前的预言。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执行法度,只好按照军法处死了马谡,并引愆责己,自请贬职三等,撤去丞相职务。这就是后世小说、戏剧中常说的“挥泪斩马谡”。

总之,这次北伐一开始,奇兵袭击成功,形势很好,但结尾街亭兵败,得不偿失。在街亭之役的处置上,诸葛亮秉公执法,自责甚严。他不像某些人那样文过饰非,或者用寻找替罪羊的办法,把兵败责任全推给马谡了事,这是难能可贵的。

公元 228 年冬,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在曹叡全力对付诸葛亮的时候,东吴将军陆逊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大破魏国扬州都督曹休。为了连续打击曹魏,诸葛亮又在这年的冬天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魏国名将郝昭率领一千多人凭借坚固的城堡死守,曹真又派兵赴援,最后诸葛亮军粮用尽,只好撤退。但他在撤退途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后卫战,斩杀了追击蜀军的魏国将军王双。

公元 229 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

这次北伐成绩最大,攻占了武都、阴平两郡(今甘肃成县、文县一带),打退了魏国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刺史郭淮。由于这次战争的胜利,皇帝决定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公元 230 年秋天,魏明帝曹叡为了制服蜀汉,派司马懿、张郃、曹真兵分三路,向汉中进攻。诸葛亮把大军布置在城固、赤阪(均在今陕西洋县东)等地严阵以待,后来天下大雨,伊、洛、河、汉横溢成灾,道路都被冲毁,魏军无

法前进，只好撤退。诸葛亮乘机派大将魏延西入羌中，向魏国的雍州刺史郭淮等进攻，大败郭淮等于阳谿（羌中、阳谿均在今甘肃境内）。这是诸葛亮对魏国的第四次讨伐。

公元 231 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这次仍是兵出祁山，用他创制的木牛流马车运粮。曹叡派司马懿率领张郃、郭淮、费曜等部前去抵抗，诸葛亮打败了郭淮、费曜，并向司马懿进攻。司马懿依险据守，不肯贸然出战。司马懿的部下不满意，说他“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司马懿只好叫张郃出战。诸葛亮在战斗中用诱敌计射杀了张郃，大败魏军。一雪初次北伐时兵败街亭之耻。张郃死后，司马懿退保大营，诸葛亮也因为粮尽撤军。

公元 234 年春，诸葛亮第六次北伐。

这次北伐的行军路线是兵出斜谷，用他创制的木牛流马车运粮，同时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屯兵，与司马懿对垒。鉴于以往作战军粮不继的教训，诸葛亮决计在渭水之滨分兵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司马懿因为在上次战争中吃了亏，这次作战更加谨慎。诸葛亮屡次求战不得。于是他派遣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巾幗服饰，弄得司马懿在诸将面前下不了台。为解决脸面问题，司马懿想了个办法，即向魏明帝上表，请求皇帝决定是否出战。魏明帝派出宫廷使者辛毗送来诏书说：“但坚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司马懿向部下宣示了这个命令，继续坚守不出。于是魏蜀双方在五丈原战场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诸葛亮患病，死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遗命葬定军山。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领兵去追，姜维反旗鸣鼓，司马懿不知虚实，只好退回。由此老百姓传说：“死诸葛吓走了生仲达（司马懿）。”后来，司马懿巡查诸葛亮的行军营垒，看见一切井井有条，叹服地说，“这人真是天下的奇才！”

总计诸葛亮六次北伐，前后时间约八年，费力甚大，但收效甚微。《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分析其原因说：“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真是由于他缺乏“将略”，没有军事才能吗？不能这样说。我们从赤壁、成都、南中、汉中各次战役中，都看到了诸葛亮卓越的“将略”。他是有军事

才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八年北伐却打不出一个名堂来呢？这原因是：军事统帅的个人才能虽然对战争胜负关系很大，但它毕竟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种因素，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军力的、自然条件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在战争中表现为客观条件，它们比起战争中的主观条件，包括军事统帅的个人指挥能力，是更为基本、更为主要的因素。任何一个指挥战争的将军都无法超越战争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去夺取战争的胜利。诸葛亮八年北伐战争打不出个名堂来，其根本原因是他所具有的战争客观条件太差。以人力来说，直到三国的后期，蜀国的人口只有九十四万。能动员的兵力是多少呢？十万多人。而魏国的人口是五百三十七万，能动员的兵力有五十多万人。人口的统计数字或许是不精确的，因为那时的隐匿人口很多，但是人力、军力资源的大体比例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蜀汉在战争中将领的缺乏，不过是军力薄弱的表现。俗话说所说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这廖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只是关羽部下的一个主簿，管管文书，参与机要而已。

蜀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起魏国要好一些。农业地区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也要比魏国小得多。这些都是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却为其地理环境抹杀了。巴蜀是一个巨大的盆地，四面都是山，同中原地区相比交通很不方便。地理环境看起来好像只是个自然条件问题，但是由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交通条件同经济条件结合就变成了经济条件，同军事条件结合就变成了军事条件。交通条件不好，经济条件、军事条件就相应地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北伐战争中，这个不利的交通条件，就像一把铁钳，紧紧束缚住了诸葛亮的手脚。蜀汉本来就有限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受到这个不利条件的限制，更加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首先是粮草运不去。诸葛亮尽管亲自创制了较好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但仍不能解决大量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历次北伐，打到最后，常常都是因为军粮告竭，只好撤军。诸葛亮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分兵屯田的办法，但是未能贯彻到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没有办法，再好的作战计划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其次是军事行动问题。不利的交通条件在防御作战中有时是很有利的军事条件。但是在进攻作战中，它却妨碍大部队的迅速行动。军队大踏步

地前进或后退都受它的限制。

在巴蜀与中原交往中,这个不利的交通条件问题,已经存在几千年了,直到近现代,也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这个经济富庶的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能够在中原逐鹿中捷足先登呢?为什么在历次的中国统一战争中,巴蜀总是不能起到主要作用呢?为什么历史上常常出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后平”的怪现象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要命的交通条件。诸葛亮说,刘邦是依靠关中建成帝业的,巴蜀只是他的偏师一角。

还有政治条件。蜀国的人民对这场诸葛亮为之日夜忧叹、鞠躬尽瘁的事业,是不感兴趣的。什么“光复汉室”,什么“还于旧都”,它本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务,同人民关系甚少。在这场战争中,人民非但得不到好处,还要增加负担。甚至蜀国的地主阶级对这场代价很大,但是胜利希望很小的战争也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只是保住自己的地盘。这些情况反映在军队中,就是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不高。

这种种不利的条件,诸葛亮看到了没有呢?看到了。不仅他看到了,蜀国其他许多政治家也看到了,朝廷中强大的要求停战的舆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看到了这些不利条件,诸葛亮仍然要坚持北伐战争呢?难道他真是一个“光复汉室”的正统迷?也许是。但是仅仅这么一个思想情结问题,还不能说明他进行这样庞大的历史活动的原因。

他之所以要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这场胜利无望的战争,其战略意图有两个:

1. 以进攻的形式,进行战略防御,以确保蜀国的安全;
2. 争取较好的战略地位,以伺机击破魏国。

总的来说,北伐战争在军事上的意义是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如果《后出师表》尚不能断定为他人伪托之作,那么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白地说明了他进行北伐战争的意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如果这篇文章确系他人伪托,那么它也能说明至少在南北朝裴松之的时代,已经有人根据当时的史料,分析了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军事意义。

在积极战略防御的意义上，诸葛亮以及他忠实的接班人姜维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刘备死后，以蜀汉这么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在三国时那种激烈纷争的形势下，能够保持四十年的独立局面，这就是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做到的一切。

积极的战略防御和消极的战略防御大不相同。它是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一方，面对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一方并吞的威胁下，防御抗敌，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方法。积极的战略防御不仅能使自己的力量在敌人威胁下，处于戒备、动员和兴奋的状态，而且还能以自己向敌人不意的进攻，分散和减杀敌人的优势和主动。

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一种攻势防御，敌人在进攻的同时也要防止挨打，这样敌人就得处处设防，分散了敌人的进攻力量，有利于防御一方确保自己安全。而消极的战略防御则是在优势和主动的敌人面前等着挨打，这是一种被动应付的单纯防御，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蜀汉政权的晚期，放弃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以后，迅即遭到灭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他受到人们的怀念

史书上说他是一个治国的能臣，萧曹之“亚匹”，“立法施度”，“科教严明”，励精图治，“吏不容奸”。说蜀国在他的治理之下，“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邦城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些话大部分都是溢美之词。他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他领导的政权，同样也是压迫农民、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发展生产，法纪比较严明，吏治比较好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情可能少一些，这些措施的某些方面可能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某种好处；但从根本方面来说，他的法纪也好，吏治也好，都是属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行动，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是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安定。

他的拥护者主要是蜀汉的官吏、士大夫、知识阶层。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社会舆论的中心。诸葛亮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影响，人们对他的怀念，主要是由这些人的舆论造成的。

广大的官吏、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他的爱戴是非常真诚的。甚至受了他严厉处分的人也不抱怨他。马谡因为打败仗被处极刑，死时对他也没有怨言。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 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他任职丞相，地位至高无上了，却仍能谦虚谨慎，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他鼓励丞相幕府里的群僚大胆地给他提意见。他说设立参谋等，就是为了“集众思，广忠益”，假如人们的顾虑太多，明知不对，少说为佳，那就对工作太不负责任了。他鼓励大家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徐庶学习，鼓励大家向能反复十次地给他提出不同意见的董和学习。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少犯错误。

2. 他严以责己，自我批评精神较好。

3. 他公正持平，赏罚必信。“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4. 他比较廉洁。他所属的政治集团把全国的财权交给了他，但他从不利用这个权力谋图个人私利。他为了解决家庭的衣食问题，在成都郊区置桑八百株、土地十五顷。除此以外，不另外再搞其他私人财产。他死的时候，“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封建时代这样清廉自守的首辅大臣，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的。

他同老百姓即农民、城市平民的关系怎么样呢？他是封建时代的官吏，从阶级本质上看，他也是人民的统治者，但是同刘璋时期那些贪官污吏比较，老百姓还是比较拥护他的。他和刘备都属于曹操类型的政治家。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农村耕读生活，使他较多地懂得了一些老百姓的事务。他在“隆中对”中说过，对老百姓要知“存恤”，这“存恤”是慰问周济的意思，其对象当然是比较穷困的人。这说明他不主张用穷凶极恶的方法去对付人民。这当然也是从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总比那些豪强的恶霸作风为好。史书里说他在渭水之滨分兵屯田，与老百姓友好相处，如果这个记载属实，说明他不是随意侵占老百姓利益的人。这些都是他容易得到人民好感的原因。陈寿说的“梁益之民”追思诸葛亮的情景是否完全属实，我们无法证明，但是从当时人民对诸葛亮儿子“爱屋及乌”的态度看，也许陈寿的描述是有所依据的。据说那时蜀国人民因为怀念诸葛亮，而推爱到他儿子诸葛瞻身上。每当朝廷里办了一件好事，人民就传说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建议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蜀人追思亮，咸爱其

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他还是个发明家，懂得力学、机械学，工于巧思。他革新过“连弩”，可以一连发十支箭。还创制过便于在山地行走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因此人民才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小考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三国时期的文章名篇，受到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的赞赏。

《前出师表》写于公元227年，是诸葛亮兴兵北伐曹魏之前写给蜀汉后主刘禅的。表中陈述他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志，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又叮嘱后主励精图治，“亲贤臣，远小人”，依靠忠纯良实之臣下，把国家治理好。《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文评价很高，将其收入诸葛亮传和他的文集中。

《后出师表》写于公元228年，是诸葛亮第二次兴兵北伐曹魏之前写给蜀汉后主刘禅的。当时曹魏的大将曹休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被东吴名将陆逊打败，魏军东下救援，关中空虚。诸葛亮欲乘此机会再伐中原，但由于第一次北伐的失败，群臣对此举多有疑虑，诸葛亮乃在《后出师表》中分析当前形势，伸张“讨贼之义”，表明自己“鞠躬尽瘁”，以死报国的决心。此表收在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中，原出东吴官员张俨的《默记》，但陈寿编写的诸葛亮传和诸葛亮文集均未收录。所以后来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感情真挚，文笔朴实，与曹魏时代的华丽文风大异其趣，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予高度的赞扬：“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术其靡丽，则未是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前后《出师表》大加赞美之词：“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真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下以事君为说者所能至。”

桐城派大家方苞则说：诸葛亮的《出师表》“其言语气象”，“高朗切至”，“绝非两汉文士之所能近似”。

诸葛亮的《出师表》尤为历代爱国者所喜爱。传说宋代名将岳飞过南阳，谒武侯祠，深夜秉烛读诸葛亮的石刻出师二表，感动得“泪如雨下”，是夜，竟不能成眠，惟“坐以待旦”。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气贯长河的爱国诗篇《正气歌》里对《出师表》亦有极高的评价：“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尽管陈寿《三国志》未收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但在宋元明时期很少有人对此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时，认为《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表达了诸葛亮忠贞为国的精神，所以全文录入。宋元之际的学者胡三省长为《资治通鉴》作注解、考据，他也认为此文为诸葛亮作品。

明代作家罗贯中编写《三国演义》，亦不怀疑《后出师表》的作者有问题，并将其全文录入书中。

对《后出师表》的真实性提出否定意见的首先是清代的一些学者。

清代学者黄式三在《傲季居集》中说：“世传诸葛亮武侯有前后出师之表……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缠。岂街亭一败，遂足以褫其魄而夺其气乎！以是知后表之为贗也……独不思《赵云传》乎！《云传》曰：‘建兴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明年，亮出军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七年，卒。’而后表作于六年之十一月，已言赵云之丧，其谬著矣！”

黄式三在这段话里，对《后出师表》提出了两个疑点：

一个是文气问题，即“前表悲壮，后表衰飒”等等。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这一点不能证实《后出师表》是贗品。因为文章的“悲壮”或“衰飒”是由写文章时的环境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说一个人只能写文气一样的文章，也不能说两篇文气有差异的文章就一定是两个人写的。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在两种情况下写就的，《前出师表》是在第一次北伐前写的，当时的蜀国“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虽然魏国的兵力在整体上比蜀国强大，但诸葛亮兵出祁山，与魏国争衡凉州，还是有把握的。所以他对这次用兵，信心比较足。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表章，文气自然也比较足。《后出师表》是在第二次北伐前写的，当时的蜀国，刚经历了祁山兵败、失街亭、斩马谡的打击，诸葛亮自贬三等，虽经近一年的恢复，但军力已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表章，能不能“悲壮”之余有一点“衰飒”之气吗？

这一点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倒很理解，他在《后出师表》的末尾注云：“自祁山之败，亮益知魏人情，故其所言如此。”

而且《后出师表》除了“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这几句，有点“衰飒”之气外，其他如力驳各种反对北伐之议，指明“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文情慷慨，壮怀激烈，并非都是“衰飒”之气。

就文气而论，除了差异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两篇中数引“先帝”，恳恳恻恻，情切意深；又如两篇中自谦屡屡，“庶竭弩钝”（前），“臣弩下”（后），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再如两篇中写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前），“寝不安席”（后），忠款之意，溢于言表。这些共同的东西不很能说明前后《出师表》系出一人之手吗？

黄式三对《后出师表》的第二个疑点是赵云的卒年问题。他认为《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说赵云死于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后出师表》写于建兴六年十一月（公元228年），其中却说赵云已死。如果《后出师表》真是诸葛亮写的，怎么他连赵云的卒年都不清楚呢？

这个问题清代学者何焯做过分析。何焯说：假若赵云在诸葛亮第二次兴兵北伐时还健在，那么诸葛亮“必（让其）别统万众，使其复所负”，但第二次北伐时，赵云的名字不再出现，因此，赵云很可能死于《后出师表》之前（即建兴六年十一月或十一月之前），《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记载的死亡日期，比实际死亡日期拖后了几十天。因为建兴六年十一月与建兴七年一月相差只有几十天。死亡日期，多写或少写了几十天，在现代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能以此证明《后出师表》就是伪作。

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后出师表》中的李服、阳群、马玉、阎芝等均不见于《三国志》，以此反证《后出师表》之伪。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二年注中已考证李服即王服，“与董承谋杀（曹）操，被诛”，又阳群是蜀将，总任巴西太守。马玉、阎芝等虽然在《三国志》上查不到名字，但三国人物数以千计，有传者仅占少数，也不能据此以否定《后出师表》的真实性。

还有《后出师表》中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屡为后人引述。现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文学家鲁迅、郭沫若等也曾引用诸葛亮的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和革命群众。

处于大变动时代的诸葛亮胸怀大志，才华杰出。他为三顾茅庐的先帝刘备所感动，企望扶助刘备的继承人刘禅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只有这等胸怀、这等激情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历史名句。

总之，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不应贸然否定诸葛亮对《后出师表》的著作权。即使是现代法庭，对取消一个人的著作权也要以事实为依据吧！

[原文]

前出师表

诸葛亮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①，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祋、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②，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

① 引喻失义：指引述、比喻失去大义，意思是说话不恰当。

② 裨补阙漏：即弥补缺漏。阙通缺。

不以臣卑鄙^①，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祗、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后出师表

诸葛亮

臣亮言：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

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②一也。

刘繇、王朗^③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① 卑鄙：即地位低下，见识浅陋。

② 未解：胡三省注曰：“解读日懈，言未敢懈怠也。”据此未解意思为不敢松懈怠慢，并不是“不懂”的意思。

③ 刘繇、王朗：刘繇为东汉末扬州刺史，王朗为东汉末会稽郡太守，两人都是书呆子，后来被孙权之兄孙策打败。这一段，清代学者何焯认为有删脱之文，所删脱的当是在“遂并江东”句后“指斥孙权之语，吴臣（指张俨）讳而削之”。“遂并江东”句似不完整，所以何焯的看法可能有些道理。近年有人认为《后出师表》为吴国大臣诸葛恪伪托之作。诸葛恪伪托此文，攻击吴国开国之君，似不大可能。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①，险于乌巢^②，危于祁连^③，逼于黎阳^④，几败北山^⑤，殆死潼关^⑥，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⑦不下，四越巢湖^⑧不成，任用李服^⑨而李服图之，委用夏侯^⑩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⑪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賁叟、青羌、散骑、武骑^⑫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⑬，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① 困于南阳：指曹操在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与张绣作战时为流矢所中，长子曹昂战死。

② 险于乌巢：指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将军淳于琼作战时的惊险情况。

③ 危于祁连：指曹操与袁尚在邺下祁山（今河北磁县东）作战时几被袁尚的伏兵射中。祁连疑为祁山之误。

④ 逼于黎阳：指曹操与袁谭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作战受挫事。

⑤ 几败北山：指曹操与张鲁在阳平北山作战受挫事。

⑥ 殆死潼关：指曹操与马超在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作战时失败，后被马超军万余人追赶，几乎被射死。

⑦ 五攻昌霸：昌霸原系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北）太守，叛曹操，曹操派军队五次进攻，都攻不下来。

⑧ 四越巢湖：巢湖在今安徽合肥东南，曹操四次从巢湖进攻孙权，都未得逞。

⑨ 李服：据胡三省考证应是王服，原系曹操部下，后参与董承杀害曹操的密谋，事败被曹操杀害。

⑩ 夏侯：即夏侯渊，曹操的征西将军，驻守汉中，在汉中之役中被刘备部将黄忠杀死。

⑪ 曲长、屯将：曲和屯都是军队编制单位，此单位的长官称曲长、屯将。

⑫ 突将、无前、賁叟、青羌、散骑、武骑：突将、无前，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将士的两种名称；贾叟、青羌是两种少数民族将士的名称；散骑、武骑是两种骑兵的名称。

⑬ 秭归蹉跌：秭归在今湖北西部，秭归蹉跌，指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吴将陆逊打败，逃至秭归。

关羽散论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即许多才能卓越的军事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三国时期一个才能平凡的武将关羽（字云长，公元160~220年），却成了超越时代的伟大英雄。中国的名将关、岳（飞）、戚（继光），以他为首；武圣人关云长，妇孺皆知；协天大帝关帝庙，全国皆是。

为什么一个才能平凡的武将， 成了超越时代的伟大英雄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神化宣传的结果。关羽以一个桀骜不驯的武夫而能忠于封建君主，讲究《春秋》大义，这一点很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他们出于自己阶级统治的利益，当然要对这样的道德典范进行神化宣传。这样做，对于巩固他们难以控制的军队尤为重要。

第二，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传说，很适合中国各时代人数众多的流氓无产者的精神需求。讲究哥们

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关羽，成了他们最崇拜的英雄，广大的中国下层社会，以他为团结自己队伍的旗帜。

第三，从南北朝到元明清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常处于民族战争的大震荡中，许多人在民族压迫的严酷环境里，过着茫然无措的生活，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哲学，成了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精神解脱的方法。文人们为了维护汉族统治的正统，以反抗其他民族的统治，就在文学、戏曲中把他塑造为超人的英雄。

关羽这个人，就是在这些历史因素的集合下，成了各方面都需要的神明。

但是，神化毕竟是不能持久的。一旦造成神化的社会条件丧失了，神化就会结束。人民革命时代开始以后，这个昔日被人们奉为神明的武圣人，终于因为与人民的利益关系甚少，而受到了人民应有的冷遇。关帝庙的泥塑神像坍塌落尘埃。关羽在今天，只有关于他哥们义气的传说，尚在一部分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中，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他是一员勇猛的战将， 却不是一位明智的统帅

关羽在军事上的建树的确是不多的。旧时代军事史中，关、岳、戚并提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他不论在军事活动或军事论著方面，都不能和岳飞、戚继光相比。

他是一员勇猛的战将，但却不是一个明智的统帅。以往关于他的许多英雄事迹的宣传，除了少数事情还有一点根据以外，多数事情都是小说家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什么“温酒斩华雄”，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等等，有的根本没有，有的则是艺术夸张。

他的真实历史很简单。

他是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青年



关 羽

时代杀了人，逃到涿郡(治今河北涿州)，同刘备、张飞结识，情同兄弟，后来跟从刘备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和争夺地盘的活动。

公元200年，他为刘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被曹操俘虏。曹操为了争取他彻底归顺，对他至为优待，他为了报答曹操，随曹操的大将张辽去同袁绍的大将颜良作战，由于马快、刀重，一下子把颜良斩杀于万军丛中。曹操对他重加赏赐，封他为汉寿亭侯。但他都不要，报答完了曹操，就找他的结义兄长刘备去了。

对于他这一段历史，史学家们褒的也有，贬的也有，还有人在这里寻求气节是非问题。但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无论关羽从曹、从刘，都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纷争，谈不上气节是非问题。

他在军事上最突出的战绩，是公元219年督守荆州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时，举兵北伐曹操的襄樊之战。在这次战役中，他围曹仁、杀庞德，水淹七军，招降于禁，军威震动华夏，把曹操弄得很紧张，一度想迁移首都，以避其锋锐。但是，好景不长，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孙权派吕蒙率领大军袭击他的后路，夺取了南郡等地，他自己也兵败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被吴军的几个骑兵擒获斩首。

关羽同曹仁、于禁等人的战斗，是他整个北伐战役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战役不论在进行过程中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只要是最后失败了，那么这个战役就不能说是一个胜利的战役。我们不主张以成败论英雄。无论对农民起义中的英雄，还是对统治阶级中的英雄，都不能简单地以他们在历史上的成功或失败作为评价他们的唯一标准。但是，在军事上，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两者是不容混淆的。尽管在某种情况下，有些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失败还是失败。

关羽在北伐战役前一阶段所取得的胜利，确实是重大的，其军事上的经验也是应当给予总结的；但是，这个胜利仍然是局部性的，掩盖不了他在战役全局中的错误，也否定不了他决定性的失败。在整个战役中，全军覆灭了，主帅身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以前的胜利再大，同这样的失败比较起来，也只能是无关紧要的。在军事学上，关于这次战役，应当得到的是分析和批判，而不是盲目的赞扬。以往某些史书在评述这次战役时，总是把它作为关羽的莫大历史功绩大书特书，这是一种误导。

关羽的惨痛经历,对于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是一面镜子

但是,关羽在军事史上仍然是一个应当给予注意的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意义,是他犯错误的教训,失败的教训。

他是一个能在万军丛中,轻取上将之首如囊中取物的骁将;一个破臂刮骨、血流如注而谈笑自若的勇士^①;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最后却被几个无名小辈割了首级。英雄末路竟如此之惨烈。

什么原因呢?

骄傲。

他是一个因骄傲而失败的将军。

他的惨痛经历,对于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是一面镜子。

教训之一:不执行正确的政治方针, 必然两面受敌,孤立自己

情同兄长的刘备把督守荆州的任務交给了他。在三国纷争的当时,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任务,需要何等的谨慎、努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呵!可是他却大大咧咧,满不在乎。

荆州,地处中国的中南部,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这个地区更是三国之间军事、政治斗争的热点。公元208年曹操同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是为了争夺荆州,公元215年孙权同刘备的益阳对峙也是为了争夺荆州。经过这两次交锋,荆州地区被一分为三:曹操占据了它的北部;孙权占据了它的东南部;刘备占据了它的西南部。全国是三分天下,荆州是

^① 《三国演义》有神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一回,所述与史书记载有出入。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确曾请医生“刮骨疗毒”,但手术者不是华佗,而是另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因为华佗早在襄樊战役前的公元208年即被曹操杀害。

三分中的三分。关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任以督守荆州重任的。他军屯南郡，他的前方有军屯襄、樊（今湖北襄樊市）的曹仁大军；他的后方有军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的吕蒙大军。三方面都剑拔弩张，形势是严峻的。唯一能支援他的力量是他兄长刘备占据的益州，但是两地之间隔有三峡，路途遥远。

他要在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军事小三角里图生存、求发展，重要的一条是要继续执行联吴抗曹的方针。这是他兄长刘备和军师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共同确定的政治方针。赤壁之战时，正是由于采取这条方针，刘备才能同周瑜一起击败曹操；益阳对峙时，也正是由于坚持这条方针，孙、刘双方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当然，孙刘联盟是一种利害之交。这是一个内部矛盾甚多的暂时联盟。联盟的每一方对于对方，都不是可靠的，大家都是同床而异梦。情况尽管如此，作为刘备在荆州地区的最高政治代表，也应该从斗争全局的利益出发，努力创造条件去维持和发展这个联盟关系。原因很简单，他的力量不允许他两面作战。他不能举起左手打曹操，又举起右手打孙权。否则，他就会把自己放入两盘磨石之间，被压成齏粉。这是一个比军事斗争更困难的任务。他需要极度小心、极度谨慎地处理同孙权的关系，但是自命不凡的关羽，却根本不去认真体会这一点。

他把自己看作是天生的英雄，以为凭着他个人的骁勇，就可以睥睨天下。他从来是要人家对他小心谨慎的，他怎么能去对人家小心谨慎呢？孙权有什么了不起，去向孙权寻求友谊，岂不是有失他的身分吗？

他不肯去向孙权寻求友谊，孙权却找上门来寻求他了。孙权想同关羽建立姻亲关系，派出使者来聘求关羽的女儿同他的儿子结亲。这样的婚姻问题，在封建社会里本来就是一种政治问题，何况它又牵涉到联吴抗曹的政治方针呢。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重要问题，他本应请示刘备来作决定的，即使不愿意，也可以婉言辞谢。但是，关羽对这样重要的问题，却掉以轻心，随意处置。他既不请示刘备，也不讲究起码的礼节，就把人家的使者辱骂了一顿，顶回去了。使者只好回去向孙权如实汇报，孙权闻讯，大为震怒。也许孙权的姻亲聘求含有可疑动机。即使这样，这也是一个需要请示上级并应当予以妥善处理的问题，他无权也不应当用那样的粗暴态度去侮辱人家。

孙权、刘备联盟关系的发展和破裂，根源于土地和权力之争，它不是一个儿女婚姻问题可以左右的。但是，在关羽举兵北伐的时候，孙权突然派兵去攻打他的后路，这同他对孙权关系上的处置不当，恐怕也是有联系的。司马懿、蒋济和曹操讨论关羽同孙权关系问题时，就说过：“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教训之二：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 丧失起码的军事戒备

这个人牵动大局的同孙权的关系问题，处理得是那样的鲁莽，不留余地；但他却幻想别人要对他敦厚有礼，以德报怨。

孙权、刘备的联盟，本来就不是一种巩固的联盟，你既然无视这种联盟，粗暴无礼地辱骂了人家，就得准备人家的报复。这就意味着在荆州这个军事小三角里，要时刻准备出现面对曹操、背对孙权的两面作战局面。但是关羽对孙权可能的报复，却没有应有的警惕，对于最坏局面的出现，也没有认真的准备。

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应有的警惕。

他也懂一点事，知道向人家扔了手套，自己就得拔出剑来。所以他在举兵北伐的时候，为了防备孙权从背后袭击他，倒也在后方留下了必要的守卫部队。但这只是北伐战役开始时的情景，不久之后，他就认为不必要再对孙权保持应有的警惕了，也不需要再在军事上持有必要的戒备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把后方的大批守卫部队调往北方前线。

为什么他丧失了原有的警惕，不再对孙权持必要的戒备了呢？

原因还是骄傲。他被自己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的克星吕蒙，一直在江岸对面悄悄地观察着他，而且早在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时候，就摸准了他的脾气。

关羽举兵北伐的时候，吕蒙秘密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不仅老奸巨猾的吕蒙摸准了关羽的脾气，年轻的小将陆逊也把关羽琢磨透了。

陆逊在吕蒙返京前夕，对吕蒙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孙权果然批准了吕蒙的计划。他发布公告说：吕蒙“病笃”，特准他离开陆口到都城治病。吕蒙的职务由陆逊代理。

陆逊才能杰出，但是名气不大，又是个书生出身，关羽对他没有顾忌。任命陆逊代理吕蒙的职务，也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

陆逊到职以后，给关羽写去了一封甜言蜜语的书信。

他迎合关羽骄傲自大的心理，对关羽在襄樊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大加赞扬。说他作为关羽的“同盟”者，对于关羽的“巍巍”功业，钦佩极了。特别是水淹七军，擒获于禁，这样的功勋足可以垂世永久，就连古代晋文公的城濮之战、韩信的破赵之战都比不上呢。

在刀、枪、剑、戟的搏杀中所向披靡，因而获得了赫赫声誉的“万人敌”（程昱语），竟被虚假同盟者几声虚假的捧场，搞昏了头脑。

他飘飘然了、忘乎所以了。他想，吕蒙病重离职了，代理他的人是个不懂事的书生，此人对自己又那么谦恭、崇拜，还有什么顾虑呢？

他不再对孙权采取戒备态度了，放心大胆地把大批守卫后方的部队陆续北调。

于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关羽因为骄傲而对孙权丧失警惕的情况，还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说明：

孙权在偷袭关羽后方的时候，曾经秘密派人同曹操进行联络。那时，曹操的大将曹仁被关羽围困于樊城（今湖北襄樊），曹操为解救自己的困难，想利用这个情报赶紧引导关羽去同孙权相斗。他叫人把这个情报传给了关羽，但是关羽得到了这个情报，仍然不觉悟，他犹犹豫豫，不能迅速果敢地下决心回师反击。他的理智早已被别人居心叵测的歌功颂德夺走了。等到他终于决定回师南下时，吕蒙白衣渡江的作战计划已经完成，失败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

教训之三：搞不好上下团结， 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他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当然不可能懂得历史发展的深厚伟力存在于人民之中。但是他能够而且应当懂得一个集团、一个军队的力量，在于这个集团和军队的上下团结。他作为刘属荆州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应当努力做好团结部下的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官兵的积极性。这也是他能否完成督守荆州任务的根本保证。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斗争成败的问题，他是怎样处理的呢？他非但没有同所属荆州的文武官员搞好团结，反而同他们搞得关系非常紧张。

谁的责任？完全是他的责任。

谁人不知你关羽是最高首长刘备情同手足的兄弟，只要你稍微讲一点道理，别人是没有不想同你搞好关系的，但是他却毫不自觉，总是倚仗自己的权势，欺凌别人。连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士仁都无法忍受他的侮辱。

他上前线，糜芳、士仁留在后方，负责供应军需。工作中出了一点问题，他就声言要回去整治他们。威风凛凛的关羽要整治人了，谁人听了不怕。糜芳、士仁心怀恐惧，整天忐忑不安，吕蒙兵临城下，派人来说降，一拍即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结果荆州很快陷落，北线部队将士的家属都做了吕蒙的俘虏。消息传到军中，大家无心作战，逃的逃、散的散，偌大的一支北伐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个自以为无负于天下的英雄，就这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失败者的血，鉴照着后人的路。

骄傲的将军关羽的悲惨遭遇，从反面意义上教育着后人，不要再去蹈袭他的



覆辙。

就在种种关羽的神话广泛流行的时候，广大的人民就已经在用“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的话语，来告诫人们防止骄傲。关羽是中国人民戒骄防满的好教员，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最大价值，也在这里。

关羽骄傲思想的发展 过程与领导者的责任

关羽一生事业发展的顶峰在水淹曹军，威震华夏的时候。按古代纪年，这是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 219 年）秋七月。他的兵败麦城是这一年的冬十二月（已是公元 220 年）。即仅仅半年功夫，他就从向上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辩证法的运动速度，也真是迅速。但是，关羽骄傲思想的发展过程却比这个时间为长，他并不是从来就骄傲的。

公元 198 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跟从曹操去征讨吕布，关羽几次向曹操索求一个绝色的女俘虏杜夫人，曹操答应了，但是后来曹操又自食其言，把这个绝色女俘虏占为己有。这要按关羽后来的脾气非得同曹操干架不可，可是那时他却能相忍无事。你看，他非但不骄傲，还颇有一点“克己复礼”的涵养功夫哩。

公元 200 年，他跟随刘备反对曹操，兵败下邳，做了曹操的俘虏。这时，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骄傲。相反，他与曹操的部将张辽、徐晃等人关系搞得都很好，并不盛气凌人。甚至赤壁之战时，他的骄傲思想发展得也不很严重。

什么时候他的骄傲思想发展得严重了呢？从赤壁之战后刘备封拜元勋，以他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的时候起。从这以后，他的官爵一天天升高、权力一天天加大，骄傲思想也一天天膨胀。到公元 214 年，刘备、诸葛亮相继西进益州，把督守荆州的大事交给他的时候，他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这年的夏天，凉州的名将马超归附刘备。这是当时刘备要着力团结的一个重要人物。关羽听说了，千里驰书来询问诸葛亮，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人？诸葛亮知道他的骄傲劲上来了，连忙回信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

人，一世之杰”，但是，只能同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长了一副美须髯，所以诸葛亮尊称他为“髯”。关羽看了诸葛亮的回信，洋洋自得，把回信传给宾客们看。好了，有了诸葛亮如此高度的评价，这位“绝伦逸群”的美髯公，就再也难以从骄傲自大的道路上回首自省了。

诸葛亮确实是一个智慧过人的政治家，但是他一生中也有不少失误。众所周知的街亭之役是其一，这次回信称颂关羽为美髯公也是其一。其实，他那时应当做的，不是无原则地去给关羽捧场，而是严肃诚挚的批评。以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是不难找到恰当的批评方式的。

过了五年，即公元219年襄樊战役的前夕，关羽的骄傲思想发展到了恶性阶段。

这一年刘备由部下推举为汉中王。他再次封拜元勋，以关羽为前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张飞为右将军。老将黄忠在定军山之战中，一战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建立了大功，所以被封为后将军。

洞悉关羽心理的诸葛亮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刘备说：“吾自当解之。”（《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当刘备派费诗为特使，到荆州给关羽授勋的时候，关羽竟然当着费诗的面大发脾气。他恼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不接受前将军的封号。

这件事表明，关羽此时的骄傲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极端荒谬的地步。他已经骄傲得不讲任何逻辑，不顾任何法纪了。他不但自己要当冠军，还不准别人当殿军。否则就以拒不接受封号来要挟。天下竟有这样蛮横无理的将军。

费诗是个厉害之人，他并不害怕这个庞然大物。他以雄辩家的姿态，义正辞严地把关羽斥责了一顿。他说：“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这一顿批评，真是畅快淋漓。唯我独尊的关羽，有生以来，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严厉的批评。他放弃了自己的顽固立场，接受了前将军的封号。

是的，他太需要这样的当头棒喝了，可惜它来得太晚了。就在他荣获汉中王授予的最高军衔的时候，襄樊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了。灾祸的阴影已经随着他思想上的不治之症而同他纠结在一起了。

三国斗将中的两个高手： 张飞与赵云

这是三国时期两员著名的战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上是战争双方士兵、战将间手持武器面对面地搏斗厮杀，谁在搏斗厮杀中伤亡众多坚持不住了，谁就是失败者。在集团性的搏斗厮杀之前，常常先有双方将领间的搏斗厮杀，这就是斗将。斗将的参加者，可以是统帅全军的主将，但大多数是统率一部分军队的战将，或者是不统率军队但武艺高强的武打能手。

纯粹的斗将，双方有不成文的约定，即不得有人助战。如果一方违约，蜂拥而上，另一方也可以照此办理，这时斗将即变成集团性的混战。

一般来说，一场搏斗厮杀的结局是由双方参战士兵的数量、士气、训练、素质等因素决定的，他们是战争的主体。少数战将的力量决定不了一场集团性战斗的胜负，但是战将对集团性战斗仍有很大影响。在斗将中一方的战将打赢了，即可以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气，变成集团战斗胜利的信号。输的一方，则发生相反的连锁反应。

张飞和赵云就是三国时期斗将中的高手。

粗中有细论张飞

张飞(公元? ~221年)，字益德，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是刘备的同乡。他少年时代即同关羽一起跟随刘备打天下，三人情同手足。刘备初起，



张 飞

主要靠关、张组织的私人部曲。

张飞雄壮威猛，在同吕布的战斗中杀出威风。曹魏的谋臣程昱等都称他为“万人敌”。《三国演义》写刘表的继承人刘琮投降曹操后，刘备仓皇南逃，曹操精选五千铁骑，星夜追袭，刘备危难之际，幸得张飞扼守长阪桥，掩护撤退。

小说以极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一情节：“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阪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

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郃、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面，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圆睁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旁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逃奔。正是：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后人诗赞曰：

长阪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

这些当然是文学夸张之辞，但张飞在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英勇抗击曹兵的事情，也是有史实根据的。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

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但张飞不仅仅是一员雄壮威猛的骁将，他其实是很有点头脑的。民间俗谚说，“猛张飞粗中有细”。张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这种粗中之“细”。有些大大咧咧、作风粗疏的人，往往喜欢拿张飞来自我解嘲。他们倒霉时常常“唉”一声说：“看我这张飞脾气，粗惯了。”其实这话委屈了张飞，张飞粗犷、豪放，的确不是老成持重的人，但他对待军国大事，态度却是审慎的，并不轻率儿戏。

这里仅据史书略举两例：

战巴郡

公元212年，刘备与益州牧刘璋闹翻，举兵攻打成都，命张飞率兵溯江而上攻打巴郡（治今重庆市）。刘璋的巴郡太守严颜率兵抵抗，城破后，严颜被俘。

张飞呵责严颜说：“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

严颜回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严颜当了俘虏还敢顶撞，张飞大怒，吩咐刀斧手：“牵去斫头！”

严颜面色不变，冷冷地说：“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

一句话使张飞的心灵发生了震动，是的，砍头便砍头，发什么火呢！这是失败者在精神上给胜利者的一击！如果张飞是个一触即跳，只知道舞弄丈八蛇矛的粗人，那岂不是恼羞成怒，亲自向前捅了严颜。但他不，他从严颜的反击中，看到了一种伟大人格力量的存在。这是个刚直不屈、值得敬佩的铁汉子。他没有计较严颜对自己的冒犯，相反，却回嗔作喜，义而释之。后来又虚心下怀地引用严颜为上宾，从此他“所过战克”，很快与刘备会师成都。

战巴西

巴西在巴郡以北，是通向汉中的要地。曹操击破张鲁得到汉中以后，派夏侯渊、张郃率兵驻守。张郃督军进入巴西，占领岩渠、蒙头、荡石等地（均在今四川东北部）。此时，巴西成为曹、刘两军争夺的要点。曹军得到巴西，便可以进而得益州，刘军保住巴西，亦可以进而得汉中，当时刘备命张飞率

军与张郃对阵。双方相拒五十余日，不分胜负。

如果张飞只是个雄壮威猛勇于斗将的武夫，那么，他大概只会同张郃硬拼硬打了。但是我们在史书上却看到了张飞在巴西之战中运用智谋取胜的记载。

张郃是曹军中骁勇善战的名将，他率领的人马比张飞多得多，但是他不熟悉巴西的地理环境，张飞就利用张郃的这一弱点把张郃的军队引诱到一个山道窄狭的地区，然后率领精兵万余人向张郃发起猛烈进攻，张郃的军队虽多，但因通道太小，无法前后相救，遂被张飞各个击破。最后张郃只好“弃马缘山”，带领了十几个人，仓皇逃回汉中，巴西各地从此安定。这次战役是张飞戎马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他曾在战地八蒙山勒石自题云：“汉将张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此石至今尚存。

公元219年，刘备亲率大军，乘胜进攻汉中，在定军山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自长安举众来救，张飞协助刘备敛众拒险，曹操久攻不克，只好引军退还，刘备遂得汉中。

清人林畅园评论巴西之役说：“巴土不安则汉中不可得，汉中不得则蜀中不固。巴土安，桓侯（张飞）破郃之功也。”（《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这是对张飞战巴西功绩之评。

猛张飞也是有弱点的，这弱点就是粗中之暴。粗中之细可以使他如虎添翼，战胜强敌；粗中之暴则能让他招灾惹祸，丧身亡命。他同关羽两人在作风上各走了一个极端。《三国志》说：“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结果是关羽因骄而败，张飞也因暴而亡。

他自恃有勇力，动不动就发脾气，鞭打士卒。刘备告诫他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但是张飞不听。

公元221年，刘备决定起兵伐吴，命令张飞率领万人出发。张飞大概因为关羽之死，心情不好，粗暴地对待部下。大人物可以依仗权力加害小人物，小人物也可以利用时机报复大人物。就在军队临发之际，张飞被其帐下谋杀了。叱咤风云、万人莫敌的猛将，最后竟丧命于自己帐下的几个小人物之手，个中教训也是有意义的。

智勇双全话赵云

赵云(公元? ~228年),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他也是在刘备初起时跟随刘备的,刘备在徐州被曹操击败以后,先后投奔袁绍、刘表,赵云组织私人部曲跟从护卫,当时刘备与他同床眠睡,情同手足。

赵云的骁勇绝不亚于关羽、张飞。《三国演义》描写他在长坂坡怀抱刘阿斗,突破重重包围,所到之处,枪刺剑砍,威不可当,无人敢与争锋。曹操惊讶地叫人飞马奔去询问姓名。这一段描写虽不见于正史,但也有其历史的真实。



赵 云

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引《云别传》,有汉中之战时赵云几次突破敌人重围的记载,其战斗激烈之情状,几乎与小说描写的长坂之战相同:“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陈,且斗且却。公军败,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

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但是,同观察张飞一样。如果我们仅仅从斗将的观点来看待赵云,那就不会对历史上的赵云有真正的了解。

在国三的历史上,赵云不仅是个斗将的高手,他其实是个富有智慧、器

度不凡，很懂得政治的将军。他忠实于刘备集团，但不像关羽、张飞那样什么都盲目听命于刘备，他经常能从全局利益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并敢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

刘备打下益州以后，准备把成都城中的屋舍以至城外的园地、桑田分赐给众将，这是当时群雄混战中胜利一方常有的做法。没有人反对，几乎要定案了。这时，赵云起来，提出驳议，他说：

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裴松之引《云别传》）

刘备听从了赵云的驳议，否定了分赐众将房屋、土地的打算。应当说，赵云的这一条意见，是关系蜀汉政权能否稳定的重大问题。

孙权袭击荆州，杀害关羽。刘备大怒，要起兵报仇，武将们一哄而起，全都头脑发昏，诸葛亮劝不住，感叹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时，又是赵云起来进谏道：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裴松之引《云别传》）

这是何等的胆识！

但这一次，刘备非但不肯听从，而且也不肯让这个持不同意见的老将军上前线，只叫他率兵督守江州（今重庆市）。后来刘备兵败夷陵，赵云发兵救援，吴军退走。

赵云还是刘阿斗的保护神。刘备荆州南逃时，丢弃妻子不管，是赵云从敌军的包围中救出了刘阿斗。孙夫人渡江返国时，带走了刘阿斗，又是赵云勒兵截江救回刘阿斗。像赵云这样的虎将，为什么老是围着一个孩子转呢？原因是这孩子是刘备集团的法定继承人。在当时，法定继承人的安危与一

个政治军事集团的稳定关系甚大。在兵荒马乱中大家顾及的多是眼前，唯有赵云看到了将来，可以说没有赵云的保护，就没有刘阿斗后来四十多年的统治。

没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同关羽、张飞一样，赵云也打过败仗。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马谡兵败街亭，赵云在箕谷也因“兵弱敌强”，军事失利。但他是一个能打胜仗，也善于处理败仗的将军。打了败仗，他能组织军队有秩序地撤退。当时街亭兵败，军队溃散，“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兵败，军队不散，“兵将无缘相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而且在敌军追击时，仍能敛众固守，不至全军覆没。

这实在是一个智勇双全、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如果当时替刘备督守荆州的不是关羽而是赵云，如果诸葛亮初出祁山时先锋将军不是马谡而是赵云，也许三国的历史会有另外的局面。

老将黄忠

蜀国老将黄忠，在中国可谓大名鼎鼎。几百年来歌颂他老当益壮、勇敢战斗的小说遍布全国，戏剧《定军山》长演不衰。就是现今的社会主义年代，城市、农村，甚至穷乡僻壤，亦常有人把老黄忠的名号挂在口头。

他是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字汉升，生年不详，卒年为公元 220 年。《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说，刘备得汉中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封黄忠为后将军。关羽不满意，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刘备封将时间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七月，当时关羽五十九岁，他把黄忠称为“老兵”，那么黄忠当时的年龄大概已有六七十岁了。

黄忠原是刘表所属长沙郡的一个中下层军官。建安十三年冬(公元 208 年)刘备占据长沙郡得黄忠。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刘备调黄忠随军入川。次年，刘备率军攻益州牧刘璋，黄忠为先锋，“常先陷阵，勇毅冠三军”(《三国志·蜀书·黄忠传》，下引未注者，同此)。刘备得益州后，论功行赏，拜他为讨虏将军。

黄忠治军有方，武艺超群，却一生不得志。跟随刘备后，才获得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因作战有功，受到刘备的特别赏识，第一次获得了将军称号。他对刘备很感恩。

老黄忠军旅生涯中最后也是最得意之笔为定军山之战。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九月，曹操亲率大军进军长安，指挥夏侯渊进军汉中抵御刘备对汉中的进攻。这是赤壁大战之后，曹、刘两大阵营又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

曹操大军的主要战将为夏侯渊，这个人是西汉名将滕公夏侯婴之后，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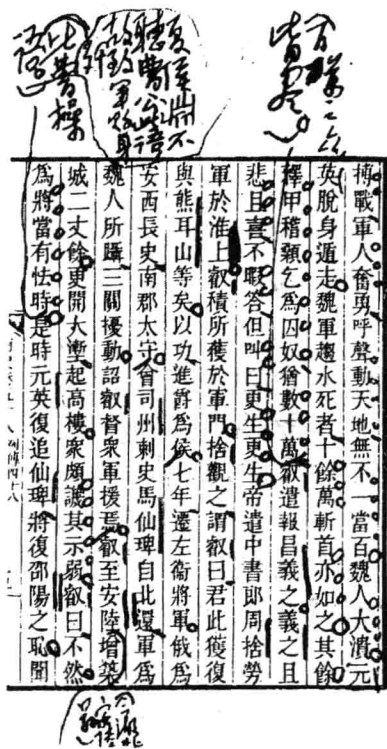
曹操是自家。曹操本出夏侯氏，其父就是過繼給中常侍曹騰為養子的曹嵩，曹嵩與夏侯淵之父是從父兄弟。所以夏侯淵與曹操自幼即為生死兄弟。曹操起兵時，夏侯淵緊緊跟隨。這個人作戰時勇猛直前，屢建奇功。官渡大戰時，因為戰爭消耗太大，曹操的軍隊都支持不下去了，後來依賴他的傳饋軍糧，補充人員，曹軍才能重振軍威。赤壁之戰，曹軍破敗，亦依賴他的軍隊安定了淮南線。後來曹操與韓遂、馬超爭戰關中、涼州時，夏侯淵率軍破敵，所向無前。曹操引孔子話贊他說“吾與爾不如也”。

曹操平定漢中後，拜夏侯淵為征西將軍，率精兵督張郃、徐晃諸將與劉備爭奪巴西（治今四川閬中）。

夏侯淵是劉備在漢中的勁敵。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劉備與夏侯淵對峙於漢中陽平關（在今陝西勉縣西）。當時，劉備的大將關羽在荊州，張飛在巴西。與曹軍主將夏侯淵對陣的是剛剛獲得討虜將軍稱號的老將黃忠。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黃忠自陽平關以南渡沔水，緣山前進，於定軍山（在陽平關東南，陝西勉縣東南）因山勢結營，尋找機會與夏侯淵作戰。夏侯淵的軍隊兵員多、又能打。黃忠不怕，他認真對待每一次戰鬥，“推鋒必進”。夏侯淵也是一位久經征戰、無所畏懼的將軍，他親率所部在定軍山與黃忠一塊一塊地爭奪地盤。在一次決定性戰鬥中，黃忠利用自



毛澤東評點《夏侯淵傳》手迹
“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

己阵地山势较高的有利条件，“乘高鼓噪”，亲自“劝率士卒”，向夏侯渊的军营发动攻击，当时战场上“金鼓振天，欢声动谷”，黄忠的队伍迅速地冲到夏侯渊的军帐，“大破渊军”，“一战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夏侯渊一死，曹军大乱纷纷，溃败逃散。在后方的曹操闻讯大怒，亲自率领大军来战黄忠。黄忠敛众拒险，以逸待劳。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交锋机会。此时蜀军新胜之后，士气高、军粮足，曹军则人瘦马乏，“亡者日多”。刘备分析形势，说：“曹公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果然，不久曹操即下了一道“鸡肋”口令。传出后，众人不解，曹军主簿杨修自作聪明为之解密说：“鸡肋，弃之为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三国志·蜀书·杨修传》）曹操闻说，大为不快，以动摇军心罪杀了杨修，但不几天即引军从汉中撤退。刘备“遂有汉中”。

定军山战后，刘备以夏侯渊的征西将军的称号封给黄忠。黄忠当之无愧地接受了这个称号。晋代史学家陈寿评论黄忠，说他“强挚壮猛”，是西汉名将夏侯婴之徒。可叹的是这智勇双全的西汉名将夏侯婴恰恰是被黄忠斩杀的夏侯渊的先祖。可见，生物遗传基因还不能决定一切。

《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记：“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赫赫有名、所向披靡的曹魏大将，却死在一个不久前刚从下面提拔起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之手，这下场是悲哀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曹操说得对，勇敢的将军，也应当有冷静思考的时候，不要以为只要勇敢就能打胜仗。勇敢，还要有智谋。自己没有，就要向别人学习。有勇有谋，英雄豪杰。有勇无谋，莽汉匹夫。当然，有谋无勇也不行。银样镗枪头，再光亮，也没有用。

定军山战役对于蜀汉的立国是极关紧要的一战，如果这次战役失败，曹军即可长驱直下巴西，成都危在旦夕。荆州关羽来援，亦鞭长莫及。到时候，天下棋局大变，刘备、诸葛不是退回荆州，就是流亡南方。所以刘备自立汉中王后，封将授勋，把缺乏声望的黄忠同关（羽）、马（超）、张（飞）同列。但关羽不了解黄忠，他不干了，说了“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混账话。雄辩家费诗给了他一顿畅快淋漓的批评，关羽这才放弃了自己蛮横无理的立场。

黄忠受封后一年，即因病去世，追谥刚侯。

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人生的最后，以自己老当益壮、奋斗不息的精神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光彩的休止符。

由于定军山战役胜利的影响，蜀国民间早就有老黄忠身老宝刀不老，定军山杀夏侯声如虎吼等传说。宋元明时又有人将黄忠的故事编为平话和戏剧，特别是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把黄忠塑造成为一位年高勇壮、智谋善战、艺术形象饱满的英雄人物。

且看《三国演义》中对黄忠鏖战定军山的描写：

红旗招展，鼓角齐鸣，喊声大震。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犹如天崩地塌之势。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雷吼。渊未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断。后人诗赞黄忠曰：

“苍头临大敌，皓首逞神威；
力趁雕弓发，风迎雪刃挥。”

（《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

由此，几百年来，老黄忠成了一位令人敬重的老英雄。也成为一切年事已高，但雄心不已的老年人的学习榜样。各个时代、各个战线的老者，都以老黄忠为例，战天斗地，争驰前驱。在这种精神的感悟下，也的确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老黄忠宝刀不老的精神变成了我们民族超越时代的珍贵财富。

清道光年间，四川成都金牛镇黄忠村曾发掘出三国时期的黄忠墓。墓砖上有“黄刚侯”字样，又发现“黄刚侯公字汉升之墓”的石碑及殉葬品。地下的砖石虽然默默无言，但它以自己的存在，证实了一位古代老英雄的不朽。

马谡与王平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个很使人感兴趣的人物。

他们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将军。公元 228 年，同时在诸葛亮的指挥下参加北伐魏国的战争，同时在街亭（在今甘肃庄浪东南）和魏国名将张郃作战，结果一个打了败仗，后来被诸葛亮正了军法；一个在失败的情况下力挽危局，后来受到诸葛亮的提拔。这件事太富于文学典型性了，小说、戏剧家描写了它，于是这两个人成了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

两个出身、教养、性格、 作风迥然不同的人物

这是两个出身、教养、性格、作风都迥然不同的人物。

马谡，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出身贵族，念书很多，文化素养很高，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从小就受到乡里的称誉。他在荆州时即依附刘备，给刘备当过秘书，后来随刘备进军益州（含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当过绵竹、成都令和越巂太守。为人好发议论，尤其善于谈论军计大事，深受诸葛亮的器重，常常找他研究各种问题，“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王平，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人，出身贫寒，小时候寄养在别人家里，没念过书，缺乏文化素养，不会写字，也不会看书，直到当了将军，识的字也不超过十几个。他原来在曹操那里当小军官，公元 219 年汉中战役时归

降刘备。在蜀军中当过牙门将、裨将军。他这个人作风挺严肃，“言不戏谑”，不善于讲话，但是办事谨慎小心，很守纪律。

街亭战役以前，马谡一帆风顺，是参与蜀汉领导集团核心机密，并得到这个集团尊重和信用的高级人物，名誉、地位什么都有；王平那时不过是一个土包子，既参与不了蜀汉集团的核心机密，也很难接近刘备、诸葛亮，根本不能和马谡同日而语。

颇有知人之明的刘备，倒是看出了马谡的弱点，他临终时告诉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是诸葛亮对他的遗言并未重视。刘备死后，诸葛亮要马谡担任参军，对他依然像以前一样信任和重用。

马谡倒也没有完全辜负诸葛亮的信赖。公元223年，蜀国南方益州、越雋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郡（在今四川、云南省）叛乱，225年诸葛亮亲自率领军队南征，马谡送行，诸葛亮向马谡问计，马谡在南方的越雋当过太守，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根据南方地理人情的特点，建议诸葛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他认为要恢复南方的安定局面，必须采取同少数民族友好相处的政策，让人家心服，不可以一味依靠军事进攻，否则即使一时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后仍然会有反复。他这个建议同诸葛亮的想法不谋而合。诸葛亮采取他的建议，对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动了孟获，后来南方果然不再反叛。

马谡实在不应该在形势如此 险要的有利阵地打败仗

南征以后，诸葛亮对马谡更为重视。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曹魏时，破格提拔马谡为全军先锋，要他统率张休、李盛、黄袭等将军打头阵。当时许多人认为全军先锋，事关大局，应该派遣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魏延、吴壹等人担任，诸葛亮不听。王平当时领军一千人，也归属马谡领导。

这是诸葛亮准备已久的首次北伐。为了夺取这次战争的胜利，他在军事上作了精心的部署。他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要兵出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并派大将赵云、邓芝率领偏师向箕谷（在今陕西勉县）方向进军，

曹魏边防大将曹真信以为真，率领军队前往箕谷作防御部署。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却指挥蜀军主力部队兵出祁山（在今甘肃礼县祁山堡），突然袭击曹魏西北边防线上的软弱部位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在今甘肃省），在诸葛亮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三郡纷纷背魏归汉，关中大为震动。为了打破诸葛亮的进攻，魏明帝曹叡一面亲赴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镇守，一面派大将张郃率领五万军队急赴陇西（治今甘肃陇西南），前去抵御诸葛亮。

到这时为止，魏蜀双方在军事态势上，蜀方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军事主动权在蜀军手中。魏国的救援部队只有五万，而且是匆忙赶来，既不占地利，又缺乏供应，人心不安定，军队很疲劳；而蜀军的兵力比魏军多，又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是“以逸待劳”的姿态，只要军事指挥得当，胜利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大好的、胜利在望的局面，却被先锋指挥官马谡给破坏了。

张郃大军来到时，马谡已占据了街亭。街亭是一个形势险要的地方，有山林，有城堡，是一个可攻、可守的地方。街亭之役以后的一千七百年，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长征部队经过这里，他们观察了这个古代的军事要地，也都感叹马谡实在不应该在这么一个有利的阵地上打败仗。

马谡是怎么打的败仗呢？原来这个人虽然善于谈论兵法，却从来没有实际指挥部队打过仗，他不是缺乏而是根本没有实战的经验。空谈兵法，他

很在行；具体打仗，则连怎样行军、怎样扎营、怎样布阵都不懂，更不用说用真刀真枪地打了。他是个书呆子习气严重的人。而他的对手张郃，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三国志·魏书·张郃传》），是曹操麾下有名的五良将之一。他仅在汉中战场就打过好几次胜仗，连刘备都畏惧他三分。

马谡在战斗中，本来应该占据街亭的城堡，并选择有利阵地，把大军埋伏在张郃进军必经的险要之处，用弓箭、火器伏击张郃，然后乘胜冲杀。即使在伏击作战中打不破



张郃,还可以依城据守,以待变化。但是他计不出此,竟违反诸葛亮行军驻营的规定,生搬硬套兵法,把自己的大军安扎在既缺乏水源又远离街亭城堡的南山上。当时地位不高的王平看出了这种军事部署的致命弱点。他虽然不善于谈论兵法,却能从自己的实战经验中,看出这种“舍水上山”、“下不据城”的军事部署,是一种致自己于死地的错误。他坚持原则,接连几次向马谡提出异议,马谡骄傲自大,不采纳王平的意见。结果张郃的大军一到,就切断了蜀军的水源,把南山团团围住。蜀军既没有水喝,又不能突围,军心混乱,最后被张郃杀得大败。王平因为事先预计到危险局面,思想上有所准备,率领部下转移到有利阵地,鸣鼓坚守,张郃弄清情况,以为王平那里有伏兵,不敢相逼。于是王平才得以收拢各营残兵,回师同诸葛亮汇合。诸葛亮失去了前进基地,只好退兵汉中。张郃乘胜向天水、南安、安定三郡进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检讨

街亭之役,使诸葛亮精心布局的首次北伐从胜利转向失败。真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他的恼怒和悔恨是可以想见的。

王平把失败的军队带回来以后,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执行法度,把马谡和另外两个将军张休、李盛处死,将军黄袭等人也被撤职。但是他没有采取统治阶级中常用的“文过饰非”、“寻找替罪羊”的老办法,把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马谡等人。他自己“自责甚严”,并向皇帝上书,引咎责帅,自请贬职三等,撤去丞相职务。这就是后来小说、戏剧中“失街亭”、“斩马谡”等故事所本。

诸葛亮的这次失策,不在军事策略上,而在用人问题上。魏蜀间的战争,由于魏



强蜀弱，双方实力悬殊，诸葛亮很难在战争中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从首次北伐的形势看，由于诸葛亮的军事部署得当，在秦陇一带以至关中取得一些胜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几乎到手的胜利果实，却由于在关键岗位上错用了一个人而全部丧失。

街亭之役是首次北伐的序战，这是关系全局的一次战役。战役指挥官军事指挥的正确与否，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诸葛亮恰恰在这个关键性的岗位上，错用了一个不懂军事的书呆子，终于导致了首次北伐的全部失败。

这个关键岗位用人的错误，诸葛亮是很难推卸其责任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才人物也常常犯错误，但是他不应该在这个关键岗位用人的问题上犯错误。何况关于马谡这个人，不仅刘备有遗言在先，而且在任用他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他提出过不同意见呢！

当然，马谡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他好发议论，言过其实，缺乏谦虚精神，军事教条主义，片面性……这些都是确实的，但是，他毕竟读了不少书，在政治策略问题上，有时也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如果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例如让他当个政治参谋，也未尝不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可惜的是诸葛亮偏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放着老将赵云、魏延等人不用，却一定要让一个连行军布阵都不懂的书呆子去对付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张郃，真是咄咄怪事。这大概就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后世小说、戏剧中说诸葛亮是“挥泪斩马谡”，正式的史书中也说马谡“下狱死”的时候，诸葛亮“为之流涕”（《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襄阳记》还说，诸葛亮与马谡情同父子，马谡处死后，他亲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从这些情况看，诸葛亮之所以过分地任用马谡，其中还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是对一个干部爱之过深，实际上等于戕害他。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马谡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于缺乏自知之明

书呆子习气严重的马谡，担负了超乎他实有能力的重任，终致演成兵败

身死的悲剧。但是真正可悲哀的事情还不在这里，真正可悲哀的事情，是他明明没有实际能力却又骄傲自满，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解剖自己。他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生来就具备处理各种问题的经验，在一生中都可能碰到无力解决自己所承担任务的困难。尤其在社会动荡、历史飞跃发展的年代，一个人所承担的任务超过自己能力的情况是常有的。但是这并不必然导向任务承担者的失败。相反，倒是有许多初出茅庐的角色，常常能在力不胜任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什么原因呢？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虚心体察情况，并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不足。要明了客观的形势，要有自知之明，要对自己的能力和客观的需要作一个衡量，要正确地分析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困难、什么短处，并且能想出切实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特别重要的是，要虚心地向胜过自己的人学习，要善于集中大众的智慧来充实自己，这样才能在力不胜任的斗争中立于不败的地位。但是马谡在担负了自己力不胜任的重任以后，非但没有做到虚心地体察情况、正确地对付自己的不足，反而更加盛气凌人。他自以为才力过人、见多识广，又深得诸葛亮的信任，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尾巴翘得老高。他在街亭的那个蹩脚的军事部署，王平曾几次劝他修改，他都不肯听从。他是高贵者，怎么能听从一个裨将的意见呢？这种无知而骄傲的态度，终于把他自己引上了绝路。马谡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对于他和几个将军因为兵败被处决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意见。蜀国的大臣蒋琬到汉中的时候就向诸葛亮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回答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襄阳记》）但是从现代观点来看，严明的法纪，不一定要杀那么多人。马谡的兵败，固然是因为骄傲自满，违反节度，但没有实战经验，书呆子习气也是重要的原因。有了这一次沉痛的失败教训，他未必就不能改过自新。没有天生的常胜将军，打了败仗的将军只要肯于总结经验，重新学习，就可能再打胜仗。败军之将是应当给予严厉处分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杀头呢？

不识几个大字的王平是怎样成为名将的

街亭之役以后，力挽危局的王平受到了诸葛亮的重视，他被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并加拜参军，统领五部人马。公元231年，他随诸葛亮再出祁山，独当一面，防守南围，张郃自来打，他坚守不动，张郃拿他没办法。诸葛亮死后，魏延作乱，他一战而败魏延。后来，他又担任镇北大将军，统领汉中。公元243年，魏国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万余人马攻打汉中，当时汉中兵不满三万，诸将惊慌，主张撤退，王平力排众议，调度人马，据险固守，终于在大将军费祎的援助下，打破了曹爽的进攻。从此，他成了同邓芝、马忠齐名的名将。

马谡文化素养高，读书多，结果是兵败身亡；王平不能看书，不会写字，后来却成为名将。这样说，读书岂不是有害无益了吗？

不，读书还是有用的，问题是要善于读，要把书本的知识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书籍本身是人类传授知识的工具，知识的直接来源是经验，但是人不可能事事有经验，大量的知识要依靠读书来获得，所以读书也是获取知识、增加工作能力的重要方法，只是不能把书本当做灵丹妙药，以为有了几句书本知识就可以无所不能罢了。特别是许多书籍，由于著者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常常是谬说与真理共存，甚至还有完全错误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分析、批判，善于用实际的经验来检验它，同时在运用书本知识的时候，还应当把它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不能泥古不化，生搬硬套。

王平虽然是一个不能看书、不会写字的人，但是他却并不忽视书本知识。据史书记载，他因为不认字，不能自己看书，就常常叫别人把书念给他听。听了以后，他用自己的头脑给以加工。同时，还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予评论。所以，尽管他不认字，不能亲自看书，但他却又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由于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肯想办法间接地认真读书，所以他的军事指挥水平与日俱增，终于在晚年成为才干卓越的名将。王平成为名将的事实，说明了有实际经验但缺乏理论修养的人也应该认真读书，以补救自己的不足。

魏延的悲剧命运

魏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智勇双全，身经百战，为蜀汉政权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可到头来，他不是死于敌手，而是在内部斗争中丧生。死了之后还被安上了反叛的罪名。千百年来，“魏延脑后有反骨”的说法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说明由于《三国演义》的渲染，魏延已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叛逆的典型。

要为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反叛角色翻案，是有困难的。第一，在民间，人们已把小说中的魏延当成了历史上的真人，想到魏延，就会有一个“脑后有反骨”的具体形象。要恢复魏延的本来面目，首先必须把历史和文学作一个严格的区分。第二，从史料考察，诸葛亮死后，魏延不听遗命，也不受杨仪调遣，擅自率军南下。根据这种行为，给他安上一个反叛的罪名似乎也事出有因。第三，要为魏延翻案，势必要影响对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就涉及当时的杰出人物诸葛亮。无论是从魏延、杨仪两人的矛盾冲突，还是从魏延本人的思想变化看，诸葛亮对事态的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要正确评价魏延，必须把握好三个关系：一是小说与历史；二是魏延与杨仪；三是魏延与诸葛亮。只有弄清了这三个问题，才有可能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小说与历史

“魏延脑后有反骨”，故而“魏延反，马岱斩”。《三国演义》的描述是这样

的：“魏延、马岱耀武扬威，蜂拥而来。（姜）维急令拽起吊桥。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维令人请杨仪商议曰：‘魏延勇猛，更兼马岱相助，虽然军少，何计退之？’仪曰：‘丞相临终，遗一锦囊，嘱曰若魏延造反，临城对敌之时，方可开拆，便有斩魏延计。今当取出一看。’遂出锦囊拆开看时……仪大喜，轻骑而出，立马阵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后必反，教我提备，今果应其言。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献汉中城池与汝。’延大笑曰：‘杨仪匹夫听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惧他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谁敢敌我？休道连叫三声，便叫三万声，亦有何难？’遂提刀按辔，于马上大叫曰：‘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吾敢杀你！’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众皆骇然：斩魏延者，乃马岱也。原来孔明临终之时，授马岱以密计，只待魏延喊叫时，便出其不意斩之；当日杨仪读罢锦囊，已知伏下马岱在彼，故依计而行，果然杀了魏延。”（《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五回）

以上是三国演义中的“魏延反、马岱斩”的情节，为了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小说作者对史料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和加工。为了说明小说的虚构成分，特把陈寿的《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的有关史事引述如下：“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歿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表，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给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觐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揜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政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

以上引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点，“马岱斩”是实。但小说中的“魏延反”与史实有出入。小说中所谓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知其日后必反，故早定妙计加以铲除等等全是虚构的。史料表明，诸葛亮没有直接发布让杨仪诛杀魏延的命令，诸葛亮生前布置的任务只有两个：一是让杨仪节督全军，让魏延断后；二是预见到魏延有可能不从命，故命军可“自发”。

第二点，魏延之反不是举兵降魏或反叛朝廷，而是不听从诸葛亮遗命，不服从杨仪的调度。当时魏延是率军南归，而非北附曹魏。如果真的是举兵投魏则应北行。这一点连陈寿也看出来，他说：“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魏延与杨仪

要搞清魏延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考察魏延与杨仪的关系。

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北）人。他原是刘备在荆州时的私人部曲，后来跟随刘备进川。在西取蜀川、北定汉中的战役中屡建战功，深得刘备的赞赏，被破格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这是个很高的荣誉。因为汉中毗邻魏界，是蜀汉的北大门。镇守汉中，关系到蜀汉政权的稳定，必须由刘备极为信任的人担当。当时人们都以为当此重任的必是张飞，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所以当公布魏延的任命之后，全军震惊。由此可见魏延的才能以及刘备对他赏识和信任的程度。

魏延是有治军治国才能的。刘备曾问他：“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此语慷慨激昂，铿锵有声。但魏延决非言过其实的马谡，在他担任汉中太守、坐镇汉中八九年之中，“界连强魏而敌不敢犯”，确实能独当一面，使刘备与诸葛亮在东征南讨之时免去了北顾之忧。

魏延有武勇、有韬略，最能说明其军事才能的是他提出的智取长安的策略。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召集诸将会议，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出

子午谷直袭长安。当时镇守长安的是魏国安西将军夏侯楙。魏延说：“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魏略》）

这一奇谋良策后来为“一生惟谨慎”的诸葛亮否定。诸葛亮以为这样太冒险，不如按自己预定的计划“安从坦道”，西出祁山。但历代许多军事家从当时敌对双方的军事实力分析，认为魏延的策略是可行的。因为蜀汉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均不及曹魏，倘不用奇谋良策实行奇袭，而“安从坦道”，依法进兵，势必旷日持久，师老淹留。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就是因为不懂应变将略，出奇制胜。

很显然，魏延是蜀汉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在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名将相继谢世后，可用的名将只剩了魏延，所以诸葛亮病危之时，众将私下都以为魏延必当以代亮。可见魏延当时在才能方面，被公认为是可以成为接替诸葛亮的人物。

有才能的人遭受妒忌是很普遍的历史现象。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个性，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就有丞相长史杨仪。两人的关系“有如水火”。

杨仪原是荆州刺史主簿，他投奔刘备以后，积极为刘备出谋献策，得到刘备的信任。在刘备为汉中王时，被提拔为尚书。但这人生性狷狭，喜欢公报私仇。他借口魏延不听诸葛亮之遗令，杀了魏延。以后，又“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没有达到目的便“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甚至因此萌生了反叛蜀汉的思想，他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其结果，他因此而废为庶民，最后畏罪自杀。

虽然，杨魏之争时，魏延并不知道杨仪的结局，但当时无论从资历、威望或武功、谋略而言，魏延都胜过杨仪一筹，所以当费祎传达诸葛亮之遗命，让杨仪节督全军而要他听命于杨仪时，魏延不服了：“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他自恃有才不服杨仪，这是他

的个性决定的，也是他俩矛盾冲突激化的产物。由此而导致的魏延率军南归，烧绝阁道，充其量也只是与杨仪之间的内讧，而非率军投敌的反叛。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而杨仪则把它混淆起来，把不服杨仪指挥说成是反叛朝廷。但公道自在人心，魏延死后，蜀国丞相蒋琬建议将魏延礼葬在汉中右马堰，并为之建墓。据《南郑县志》载：墓志有“蒋琬原其本意，但欲杀杨仪，不便背叛”之语。可惜年代久远，石马之遗迹已不复存在了。

魏延与诸葛亮

为什么《三国演义》要把杨、魏之间的矛盾冲突演变成杨仪奉诸葛亮之遗命智杀魏延？难道是小说作者凭空想象的吗？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在熟读《三国志》的基础上撰写小说的。他笔下的人物，尽管有些情节是虚构的，有些细节是增添的，但大多仍能在史料来源上或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上，找到根据。他写曹操、刘备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奸雄、枭雄的总体构思，那么他写魏延时为什么要让诸葛亮参与杨、魏之争呢？其原因是诸葛亮确实参与了杨、魏之争，尽管他没有布置过追杀魏延的命令。这只要对下面几个问题作些思考就可以明白了：

第一，杨、魏的矛盾不始于一朝一夕，作为主帅属下的两位文武大臣有了矛盾，诸葛亮该怎样对待？史书虽然有“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蜀书·杨仪传》），但事实上他没有解决好他们之间的矛盾。

第二，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对于相处十数载的部下的性格不会不了解。从他对后事的安排中也可以看到，他是知道魏延不会听从杨仪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作出这一决定呢？要知道在当时蜀汉阵营中，无论是资历、威望或武功、谋略方面，魏延都高于杨仪。他把各方面都不如魏延的杨仪放在魏延之上，不是激化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吗？这样做的后果他难道没想到吗？

第三，诸葛亮在临终嘱托后事时，为什么要把魏延排除在外呢？要知道魏延是当时蜀军中才能最大的将军，却在临终嘱托后事的关键时刻被摒弃，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诸葛亮并不信任魏延，他信任的是杨仪。在杨、魏的权力之争中，他偏向杨仪。

论治国治军才能，杨仪有，魏延也有，诸葛亮何以厚此薄彼？史料记载虽属片言只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正是因为初出祁山时魏延献策未遂，口出怨言因而得罪了主帅，从此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因此提拔重用、嘱托后事都没有他的份了。

在封建社会，因忤逆圣上而惨遭杀害的臣下并不少见。“龙逢斩，比干剖，苾弘脔，子胥靡”，但这些都是无道昏君所做的事情。而诸葛亮是一代良臣，他辅佐治理的蜀汉被公认为政治开明，他的高风亮节也为历代人们所景仰，在这样一位贤人身上出现了排斥异己的不宽容行为，不是让人难以接受吗？

但是，诸葛亮是人而非神，他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属正常。古人曾评论诸葛亮：“明察则有短而必不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读通鉴论》）诸葛亮会用人，但也有缺点。这缺点就是过于严格、求全责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至少在魏延的问题上，诸葛亮因为某种偏见而作了欠妥当的处理。诸葛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自己尸骨未寒便祸起萧墙，内部的自相残杀，毁灭了蜀中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

魏延悲剧命运的性格因素

魏延悲剧的命运，也是由他自己性格的缺陷造成的。他遭杨仪忌恨又不被诸葛亮信任的原因就是他恃才傲物的性格所致。从魏延悲剧性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在性格方面有了缺陷，也是难以正常发展的。纵观中国历史，具备这种性格的人没几个能得到善始善终的。其中的历史教训，常令人怆然涕下。

话说姜维

三国后期人物中，姜维的命运是令人感叹的。姜维（公元 202～264 年），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他原是魏国将领，在诸葛亮初出祁山时归附蜀汉，为诸葛亮所信任，屡委重职。诸葛亮死后，代领蜀军。为了挽救蜀汉政权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坐以待毙的命运，屡次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进行以攻为守的伐魏战争。当后主刘禅（阿斗）“舆榘自缚”，向魏国大将邓艾请降，并遣人向姜维发出降魏的诏令时，他仍不忘复国大计。他一面“投戈放甲”，向魏国伐蜀的主将钟会投降，一面加紧策反钟会拥兵反叛魏国，企图乘机恢复故国。但终因回天无术，不但自己惨遭杀害，而且累及妻子宗族，皆被乱兵杀死。

对姜维的北伐战争和复国图谋，史书多有贬斥。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姜维“玩众黷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晋阳春秋》作者孙盛则称姜维是“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

胡三省则把蜀国的灭亡与姜维的北伐联系在一起，他在《资治通鉴》评注中说姜维北伐“屡败不止，为亡蜀张本”。

姜维究竟是不是“玩众黷旅”？蜀汉灭亡，究竟是不是由于姜维的北伐？这是评价姜维时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怎样看待姜维北伐

从公元 247 年到 262 年，姜维在十五年中进行了九次讨伐魏国的战争，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九伐中原”。陈寿等抨击姜维的北伐，就是指这九伐中原。根据《蜀书》记载，这九次北伐，进程如下：

第一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47年。

姜维率军“出陇西、南安、金城（均在今甘肃东部）界，与魏国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今甘肃东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这次战争中“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今四川新都）”（《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第二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49年。

姜维遣部将廖化进取洮城（今甘肃岷县），结果是魏将邓艾“先自据城，得以不败”（《资治通鉴》卷七十五），姜维等不克而还。

第三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50年。

姜维“复出西平”（今青海西宁），诱羌胡以为羽翼，又与郭淮战于洮西，结果是“不克而还”。

第四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53年。

这年费祎已死，姜维获得了更大的兵权，他亲率蜀军“数万人出石营（今甘肃西和），经董亭（今甘肃天水），围南安”。最后是“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第五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54年。

姜维复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结果是魏“守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第六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55年。

姜维出狄道，结果是“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维却住钟题（今甘肃临洮西南）”（《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第七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56年。

姜维与魏将邓艾战于段谷（今甘肃天水东南），由于蜀镇西大将军胡济失期不至，结果姜维大败，蜀军“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姜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第八次北伐。时间是公元257年。

姜维乘魏将诸葛诞反于淮南，亲率数万蜀军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魏将邓艾、司马望合兵相拒，结果是“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后诸葛诞兵败，姜维引兵还成都（《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第九次北伐。时间在公元262年。

姜维率兵“出侯和”与邓艾相拒。后“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以上是九伐中原的经过，具体战绩是胜三次，败二次，不克而还四次。总的说来还是胜多败少，并不是“屡败不止”。

固然，战绩并不理想，增加了国家的消耗和人民的负担，却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是不进行征伐魏国的战争，后果又会怎样呢？

从蜀汉内部情况看，自蒋琬和费祎相继谢世以后，政权实际上被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把持。如果说，蒋、费两人虽然在政绩上无所建树，但基本上还是承续“诸葛之成规”，内修政治，发展经济，那么到了黄皓专擅时期，内部斗争日益加剧，政治经济局面已逐渐呈现混乱状态，最明显的一例就是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勾结，“阴欲废维树宇”（即废除姜维，树立阎宇）。在这种局面下，军事上如再不奋力自强，就只好坐以待毙了。

从蜀国的军事实力来看，到蜀汉后期，不要说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就是训练有素的士卒为数也是不足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是当时军事实力的真实描绘。在军事实力减弱和军事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即专守防御，是防不胜防的，而且也无法抵挡魏军在漫长战线上的大举进犯，只有采取现代军事家所说的“攻势防御”方针，即在总的防御态势下，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点，组织以攻代守的进攻战，才能较好地与强大的魏国抗衡。

所以姜维在国力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勉乎其力，屡次组织北伐，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其实是在寻求挽救蜀汉灭亡的自救之道。这也不是姜维的发明，它是诸葛亮生前一直在执行的既定方针。

诸葛亮生前曾多次北伐。虽然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描绘过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蓝图。但由于关羽丢失荆州，刘备兵败夷陵，蜀汉的元气大伤，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与其说是为北定中原，实现“兴复汉室”，不如说是面对强大的魏国，以攻代守，奋力挣扎，以此改变蜀汉的困境。诸葛亮的《后出师

表》阐明了连年征战的良苦用心：“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汉晋春秋》）

面对强大的魏国，诸葛亮不是消极避战偏安一隅，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以攻为守，主动北伐，这样才保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姜维九伐中原是六出祁山的继续，它分散了魏国的军事力量，把强魏的兵力钳制在秦岭一线，从而保住了蜀国边境的稳定，延长了蜀汉政权。公元263年，魏国兴兵伐蜀，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蜀所恃惟赖维而已”（《三国志·魏书·少帝纪》）。

所以从蜀汉的立场看，九伐中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面临强魏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仍不失为一条符合攻势防御方针的自救之策。既然人们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尚有一掬同情之泪，那么对于继承诸葛亮遗志的九伐中原又怎能全部否定呢？

怎样评价姜维

早在公元228年，姜维归附蜀汉时，诸葛亮就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到了公元263年，姜维归附钟会，钟会对杜预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诸葛亮）、太初（夏侯玄）不能胜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姜维死后，郤正论道：“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褻，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纵观姜维的一生，这些评价是不为过的。

就姜维的军事才干来说，他属于三国后期第一流的军事统帅，丝毫不比魏、吴两国的将帅逊色。虽然北伐战争的战绩并不理想，但却不能因此而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几倍于他。而且他的军事对手邓艾也是当时第一流的统兵将领。更为困难的是姜维历年征战都是在克服重重内部阻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伐初期，他受制于蒋琬、费祎。费祎认为：“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汉晋春秋》）给姜维的军队不过万人，到了姜维“加督中外军事”，大举伐魏时，又遭到了大臣谯周的抨击，他和尚书令陈祗撰写《仇国论》，讥讽北伐是不度时势，“极武黷征”。到后期黄皓又与阎宇勾结，阴谋“废维树宇”，破坏北伐。姜维能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战绩，已属不易了。

当然，姜维不是一个全才。他是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却没有诸葛亮经邦治国的才干。他在政治上的建树，既不能与诸葛亮相比，也不及蒋琬、费祎。费祎死后，他位至大将军，却斗不过一个恣意妄为的宦官黄皓。有一次，他向后主启奏，建议除掉黄皓，后主说了一句：“皓趋走小臣耳……君何足介意！”他马上就“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来后主叫黄皓来向他赔罪，他竟要求去沓中种麦，“以避内逼”。结果更助长了黄皓之流恶势力的发展。一个在军事上“胆如斗大”，天不怕、地不怕的烈士硬汉，在政治上却如此软弱，这是令人失望的。

蜀汉灭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姜维的九伐中原虽然战果不大，但对延长蜀汉政权的存在，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姜维的北伐绝不是“亡蜀张本”。那么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客观上是因为魏国的强大。首先在经济上魏国的国力大大超过了蜀汉。魏国在经济上控制了黄河、淮河流域，农田建设和水田灌溉搞得比较好。《晋书·食货志》追述当时魏国淮南屯田的情景时说：“北临淮水，自钟

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里，五里置一营……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北方经济的发展为曹魏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是魏国在政治上也比蜀汉稳定。公元249年司马氏通过宫廷政变战胜了曹爽集团以后，政治局面日趋稳定，可以集中力量完成统一大业。再次，魏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有邓艾、钟会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在这种形势下，军事、政治、经济远远落后于魏国的蜀汉要取得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魏国的强大只是蜀汉灭亡的外在因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蜀汉的早期，同样面临着实力强过自己几倍的曹魏集团，却能保持鼎足之势屹立于不败之地，而到后期为什么却不行了呢？所以蜀汉的灭亡，还要从这个政权的主观方面寻求原因。

以刘备的成功奥秘作为参照系来对照蜀国后期的政权，其失败的原因则昭然若揭。

我们不妨把蜀汉后主刘禅与其父亲刘备作个对照。刘备本人并非骁勇善战的斗将，也不是巧谋善断的谋士，但他既能识



邓艾

别人才，又能使用人才。史书对刘备的成功有如下的分析：“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他的儿子刘禅则没有一点父亲的遗传，他既不会识别人，也不懂用人。诸葛亮之后的两任丞相蒋琬和费祋，都是诸葛亮临终时安排的。到了蒋、费相继谢世以后，他便束手无策了，居然重用了宦官黄皓，当权者的昏庸无能，是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人才严重匮乏。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就已提到军事人才缺乏的问题：“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



钟会

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賁臾、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到蜀亡之际，人才匮乏问题非但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姜维手下部将廖化、张翼、傅金等人的才识和勇略远逊于早期蜀汉的将领，也低于同时代魏国的邓艾、钟会，吴国的陆抗等人。更重要的是在诸葛亮死后，缺乏统筹全局的全才。这是蜀亡的又一原因。

蜀汉后期的政权已为投降派所把持。抨击姜维北伐，撰写《仇国论》的譙周在这期间已“位亚九列”，成为蜀汉最高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魏军兵临城下时一再劝说后主投降。而在这以前，成都的土著大地主张裕、杜琼等则公开叫嚷：“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蜀书·杜琼传》）“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蜀书·周群传》）公然为投降派大造舆论。

所以蜀汉的灭亡实是大势所趋。即使姜维策反钟会，图谋复国大业取得了成功，在朝野上下一大批投降派的鼓噪下，蜀汉政权也不会存在多久。

司马懿的事业与性格

京剧《逍遥津》，演曹操带剑逼宫，篡夺皇权，乱棒打死伏皇后，凄凄惨惨。其实，真实的历史比戏剧还要凄惨。

一世之雄栽倒在小秘书手里

公元 214 年(建安十九年)，汉献帝的皇后伏氏写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密谋废除曹操。其父死后，密谋泄露，曹操派人带兵入宫逮捕伏后。伏后“散发赤足”地被带走，她边走边求汉献帝救她。汉献帝悲伤地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这次逼宫，伏后及所生二皇子皆被处死，伏后兄弟及宗族死百余人。此后，曹操的女儿被立为皇后。贵为皇帝，不仅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儿，而且连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没有了，无怪乎汉献帝当时要对着曹操派来的人喊：“天下宁有是耶！”

三十年风水轮一转，历史走回了原处。公元 249 年(嘉平元年)，洛阳皇宫里又发生了一幕篡夺皇权的历史剧。但是这次舞台上换了角色，不是曹家篡夺汉家，而是曹家被司马氏篡夺了。这次宫廷政变的结果是，曹家的宗室曹爽、曹羲以及他们的同党何晏、桓范、丁谧、邓飏、毕轨、李胜等被杀，并夷三族。十八岁的皇帝曹芳只好步汉献帝的后尘，当傀儡。

这篡夺曹家天下的司马氏，就是当时位居太傅的司马懿。

司马懿(公元 179~251 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世家大族(官僚大地主)，历事曹操、曹丕、曹叡，由曹操的小秘书直做到魏

国的太尉、太傅，受到曹家祖孙三代的特别器重。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号称一世奸雄的曹操竟栽倒在自己小秘书的手里。这件事倒也深有历史意味。

如果说曹操对司马懿就没有一点认识和防备，那也不是事实。

司马懿少年时代就很聪明，被当时的一些名人视为“非常之器”。公元201年（建安六年），曹操网罗人才，听说司马懿挺有才干，即派人要他出来做官。当时官渡之战尚未开始，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负未见分晓，司马懿不肯贸然应召，他辞以风痹，不能就任。曹操不相信，叫人夜往密刺，他坚卧不动，硬是闯过了难关。但装病总不能持久，有一年夏天，他叫人晒书，忽来暴雨，他怕书册受淋，急忙爬起来收拾。此事被他的婢女看到，他的夫人马上捕杀婢女灭口。但消息大概还是传出去了。因此，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再次派人去请他时，就传话：“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帝纪第一》）这时北方大局已定，司马懿计算利害，出来做了丞相府的文学掾，当时他才三十岁。

丞相府的文学掾，大概相当现时中央机关的小秘书。但是不久，他就以自己的才能连升黄门侍郎、丞相东曹属、主簿，进入曹氏智囊团。

他确实为曹操出了些好主意。他建议曹操务农积谷、经国运筹，曹操采纳了；他建议曹操离间吴蜀两国联盟，以解关羽樊、襄之围，曹操也采纳了。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仗打得不好，司马懿建议曹操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这次曹操却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没有听。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司马懿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高出于曹操，他比曹操有远见。

曹操是一个猜忌成性的人，对这么一个富有雄豪远略的人自然是有警惕的。这时，嫉妒司马懿的人，又向曹操说他有“狼顾相”，“狼顾相”说的是一人行走反顾，形状似狼。相书说，这是一种异相，“主心性凶狠，心机难测”。曹操要检验一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晋书·帝纪第一》），确实有点像狼。这种心理的阴影，构成了曹操的一场噩梦。他在梦中见到三马同食一槽，槽、曹音同，它似乎表明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心里感到不安，但是他毕竟不能因为一种相和一个梦而杀人。只好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根据。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不给司马懿实权，更不让他掌握军权，而只让他当个文

职参谋。后来考虑他有学问，又让他做太子中庶子，帮助曹丕提高文化素养。

司马懿很乖巧，他知道自己已与曹操处在智斗的无形战场上，处境很危险。

为了“延安于将危之命”，他给自己涂上了虚伪的保护色，努力讨好曹操父子。

就像他当年装病一样，他也能装忠。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遣使乞降，并表示拥戴曹操当皇帝。曹操认为孙权不怀好意，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乘机拍马屁，大表忠心，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晋书·帝纪第一》)

他还会装勤。“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晋书·帝纪第一》)

他又装善。处处关心曹丕，对曹丕友好得不得了。

由此，“魏武意遂安”，太子也“每相全佑”(《晋书·帝纪第一》)。不久，曹操病死，司马懿终于以和光同尘、戢鳞潜翼的手法，平安地越过了他人生航程上的险滩。

司马懿春风得意

如果说，在智力上，曹操与司马懿尚可以互争雄长的话，那么曹操的子孙曹丕、曹叡在司马懿面前就只能是矮子了。固然，他们两人在帝王群体中都可以称得上是“天姿秀出”、“才艺兼该”的。

连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都懂得“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是曹家的这两个皇帝却拱手把军事大权托付给他们父祖最不放心的司马懿。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任命司马懿为督军。公元224年(黄初五年)，曹丕南巡，又封司马懿为抚军，假节，领兵五千镇守后方。这是司马懿第一次获得军事指挥实权。第二年他又以司马懿为萧何，命令道：“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此时的司马懿，俨然可以与皇帝平分秋色了！

又过了一年，曹丕病死，司马懿是顾命大臣，与陈群、曹真并受遗诏，辅助二十二岁的青年皇帝曹叡。

这是司马懿春风得意、大展雄图的时期。

曹丕刚死，孙权即发兵围攻江夏（治今湖北云梦西南），遣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司马懿督领诸军讨伐孙权。这是司马懿第一次亲率大军，挂帅出征。这次出征旗开得胜，败诸葛、斩张霸，大显威风。班师后，封骠骑大将军，并加督荆、豫二州军事。

荆襄之役，不过是小试牛刀。接着是平定孟达。孟达原是蜀国的将军，投降魏国，任新城太守，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这时，他又想联络吴、蜀，发展自己的势力。诸葛亮使用离间计，将这一消息泄漏给魏国。孟达听说自己的密谋被泄，打算举兵起事。司马懿急忙写信稳定孟达，他假装不相信孟达会反叛魏国，说这都是诸葛亮的挑拨。孟达得信有喜色，对举兵起事犹疑不决。司马懿却乘机急速发兵，大军倍道兼行，八日急行八百里，到达上庸城下，然后八道进攻。孟达惊呼：“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这次战役，因为孟达来不及准备守城工事，所以上庸很快即被攻破，孟达被斩。上庸之战，充分显露了司马懿的性格特征。你看他一面假意安抚，以诚相待；一面调兵遣将，直赴城下。简直是个老狐狸。

司马懿东线打胜仗的时候，诸葛亮正在倾注全国兵力进军汉中。此后又不断兵出祁山，魏国西线处于紧张状态。于是，曹叡给司马懿加大都督，假黄钺，要他讨伐蜀国。从此，司马懿成为统领诸军、反击诸葛亮进攻的西线主将。

诸葛亮劳军远征，军需困难，利在速战。司马懿看准诸葛亮的弱点，以逸待劳，持重应变。诸葛亮几次挑战，他都坚垒不出。诸葛亮送他巾幅服装讥讽他，众将士群情激愤，他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克制自己和部下的情绪，不为诸葛亮的激将法所动摇。诸葛亮拿他没办法，最后积劳成疾，忧愤而死。

司马懿因西拒诸葛的功绩，由大将军迁升太尉。

但西拒诸葛并非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华彩乐章，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东征辽东。

公元237年（景初元年），辽东太守公孙渊举兵造反，曹叡急召司马懿进京，要他领兵出征。

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计？”

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

天子曰：“其计将安出？”

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据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

天子曰：“往还几时？”

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晋书·帝纪第一》）

“上兵伐谋”。洛阳宫殿中，曹叡和司马懿这场战略对话是中国古代战史上精彩的谋攻篇。你看这司马懿，三军未动而已胸有成竹。他连敌军如何行动，我军如何进击，往几日，攻几日，还几日，一切的一切都运筹好了。大军事家孙子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兵法·地形篇》）京师、辽东远隔千里，司马懿既能料敌虚实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险厄远近之形。真是“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仗还没有打，胜利就在握了。

事情的发展，果如司马懿所料。当司马懿的四万大军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时，公孙渊果然如同司马懿预料的，先出“中计”，以步骑数万阻辽水，“坚壁而守”。司马懿甩开公孙渊的守军，以“攻其所必救”的态势，指挥大军直指敌人的巢穴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公孙渊看见司马懿去攻打襄平，只好从后面赶来救援，于是司马懿“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这时，公孙渊又只好按司马懿的预料，再出“下计”，退守襄平。司马懿进军围城，合围后，昼夜进攻。公孙渊乞降不许，最后兵败被杀。

对这次战役，历来兵家评价都很高。孙权说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唐太宗说司马懿“雄略内断，英猷外决”。这些评语都是不错的。司马懿的确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军事家，其才智足可以与曹操、诸葛亮、周瑜相颉颃。

但是在处理战俘的问题上，比起曹操和诸葛亮，司马懿简直是个低能儿。曹操在战徐州时，出于报复，杀过战俘，但一般情况下，他不这样做。他用改编的办法处理青州黄巾军就是好例。所以毛泽东表扬他：“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诸葛亮执法严峻，但也不杀战俘，他用宽释的办法对待西南

少数民族的战俘，获得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拥戴，千百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唯独这司马懿是个穷凶极恶的杀俘专家，他不仅杀战俘，而且杀平民百姓、杀小孩、杀女人、杀无辜。辽东战役，他入城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诛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这些做法充分显露了他性格中残忍、猜忌、“情深阻而莫测”的一面。甚至他的后代子孙，也为此感到羞愧。东晋明帝时，王导向皇帝讲起司马懿“猜忌”的往事，明帝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襄平大捷时，曹叡已病入膏肓，他急诏司马懿进京，“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昼夜兼行，及至御床，天子已奄奄一息。他拉着司马懿的手，哀求司马懿照顾他的少子。由此，他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成为小皇帝曹芳的顾命大臣。

当时曹芳才八岁，无法行使皇帝职权，司马懿和曹爽实际上变成了摄政王。曹叡就这样拱手把曹魏的半个王朝交付给了司马懿。他名为明帝，其实是明帝不明，糊涂得可以。

司马取代曹魏

两个摄政王发生了冲突。

司马懿有兵权，曹爽也有兵权。但曹爽是曹魏宗室，在宫廷里有特殊的势力。他与弟弟曹羲并典禁兵，树立亲党，并任用何晏、桓范等人，专擅朝政。在曹爽的进逼下，司马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为麻痹对方，他又装起病来，但暗地里却积极进行决斗的准备。曹爽对司马懿是否有病颇有怀疑。于是，派自己的心腹李胜去试探。李胜以去荆州赴任的名义来向司马懿辞行。

京城的太傅府，演出了一幕精彩的闹剧：

“帝(司马懿)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

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晋书·帝纪第一》）

曹爽放心了，不再把司马懿当回事。但就在猎物丧失警惕的时候，老狐狸猛扑过来。

司马懿抓住曹爽兄弟陪伴小皇帝出宫谒陵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调兵遣将，在京城发动了军事政变。他派司马师率兵把守宫门，派老将军高柔、王观持节接管了曹爽、曹羲的军队，他自己则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洛水出迎天子。这时曹爽的谋士桓范突出重围，出赴曹爽。蒋济说：“智囊往矣！”司马懿说：“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果然在桓范建议曹爽奉天子幸许昌，然后移檄征天下兵讨伐司马懿时，曹爽竟然拒绝采用。他抛弃了自救的方针，派人去同司马懿谈判。司马懿指洛水为誓，答应：只要他交出权力，就可以让他保持爵位，做富家翁。曹爽相信了。桓范谏说司马懿不会让你做富家翁，只会灭你的族。曹爽还是不听。结果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惨案。

这次军事政变以后，司马氏全部控制了魏国军政大权，后来他的子孙又按曹丕篡汉的故事，以晋代魏。

这次政变的是非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曹爽集团腐败、黑暗，司马氏政变以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可见这次政变有利于历史进步；有人认为：曹爽集团是改制者，他们对有利于世家大族的传统制度有所改变，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司马氏的政变带有历史倒退性质。

从现有的材料看，无论曹魏集团还是司马集团都是世家大族即官僚大地主的代表，他们都是执行维护官僚大地主的政策。如曹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寒人不得参与荐绅之选。这条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方针，在司马氏政变前后都在推行。其他政策亦多如此。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司马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权力争夺中，为了迎合民心，确实也做了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也是应当肯定

的。例如曹叡“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司马懿从辽东还京时“役者犹有万余人”。后来司马懿“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又，司马懿很重视农事。他掌权以后，“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晋书·帝纪第一》）。这种节省民力，发展生产的方针，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晋国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石。

鲁迅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起码是个英雄。对司马懿也可以作如是观。他们两个人有相同的性格、相同的命运，而且都为中国的统一事业作过贡献。但是他们都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他们谁也不是人民的英雄，他们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前进的要求。肯定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们的历史活动去认识他们阴暗、卑劣的阶级本性。就像我们揭露曹操，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汉献帝一样，我们揭露司马懿也不意味我们赞同曹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魏代汉、晋代魏，都是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我们唯一要坚持的是，对于这种符合历史前进的合理性，也要给以辩证思维。

三国时期的几位巾帼英豪

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女性，虽然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她们的事迹大多被湮没了，但从零星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人才辈出的三国时期，亦有巾帼英豪。我们这里选择的，仅是她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

其一是曹操夫人卞后。选择她的原因绝非考虑到她的母仪天下，地位显赫，而是探索她之所以能在一个生性多疑的大人物身边取得成功的奥秘。其二是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史书上说她“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其实她是许多军国大计的决定者，对吴国的创建，功绩甚大。其三是孙夫人，是刘备的夫人。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传奇色彩的女人。“出嫁从夫”，孙夫人可不受这传统道德古训的约束。她不沉溺于儿女私情，把吴国的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其四是两个“丑小鸭”。她们容貌丑陋，但却才智卓绝，她们的智慧甚至让占据古代社会中心的男人们汗颜。其五是辛宪英，也是个聪明的女子，见识超群。

曹操的影子卞后

曹操有十五位夫人，卞后是其中的一位。论其出身，她“本倡家”，很低微；论容貌，或许早年挺漂亮，但跟随曹操多年后，也已年老色衰。但就是这么一位女性，在曹操的私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曹操在废弃了原配夫人丁氏以后，立即把她从侍妾提升为第一夫人；曹操晋位魏王时她又被拜为王后。在日常生活中每有要事，曹操都要与她商议。在曹操众多的妻妾

中，她虽然不是最受宠爱的一位，但却是最受信任的。

以猜忌、多疑为其性格特征的“一世之雄”，居然对一个出身倡家的女人如此信任，这个女人不是很不简单、很值得推究吗？

她究竟是怎样取得曹操信任的呢？

首先是由于她对曹操坚定不移的忠诚。曹操初起时，因为反对董卓作乱，离开京城，出外避难，留下家属部曲在洛阳观望等待。当传来曹操遇难的凶讯时，其部曲不辨真伪，皆欲离开洛阳回归故里。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这些人一旦离散，再重新聚拢就很困难。在这关键时刻，卞夫人挺身而出，劝止了那些意欲散伙归家的人。她对那些人恳切地说：“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一番深明大义的话，说得曹操属下心悦诚服，从而避免了散伙。曹操回来知道此事，对夫人处惊不乱的胆略和生死与共的忠诚极为感动。为感佩其相知、报答其忠诚，在正室丁夫人废弃之后，立即扶她为正夫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卞夫人虽出身低微，但为人处世很有大家风范。这大概是曹操看重她的第二个原因。

曹丕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当曹操立曹丕为世子，左右侍从都来贺喜，要她“倾府藏赏赐”。尽管她深知亲生儿子被立世子，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是一大喜事，但她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从另一角度看问题：“王自以为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这些话传到曹操那里，曹操大为赞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所以对她恩宠有加，信任日增。

曹操作为一代雄杰，对卞夫人敬重之心不变，实属不易，而卞夫人也没有辜负曹操的信任。她是曹操的影子，在家庭生活中，她尽力按照曹操的要求办事。这大概是曹操看重和信任她的又一个原因。

曹操是非常崇尚俭朴的。史书上有曹植的妻妾为一件绣衣被逼自杀的故事，可见其对俭朴生活的要求。卞后跟随曹操四五十年，生活中一贯节俭、朴素，她不但自己“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就是亲戚来往，招待的饭菜也“无异膳”。不像有的贵夫人，一旦得宠，便穷奢极侈。

曹操为了实现其王霸之大业，很懂得笼络人心。卞后也是如此。当然

她活动的范围要小得多。她在曹操众多的妻妾中颇得人心。丁夫人当初对卞夫人并不好，但丁夫人被废弃以后，卞后不念旧恶，常常派人送东西或去看她，还常常派人接她来，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夫人为此很感动：“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丁夫人死后，卞后又要求曹操礼葬。帝王家庭生活各种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卞后能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成为曹操的贤内助。

在曹操的有生之年，卞后一直伴随着她，他们患难与共、以沫相濡，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如果说生性猜忌多疑的曹操在世界上还有他真心信赖的人，那么这人就非卞后莫属了。

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夫人

吴夫人早年以才貌闻名于世，破虏将军孙坚一定要娶她，族中人“嫌坚轻狡”表示反对。孙坚“惭恨”，眼看即将发生一场祸事。这时，吴夫人却毅然许嫁，后来生下被士民称为“孙郎”的孙策和吴国开国皇帝孙权等。

孙坚是兵家鼻祖孙武的后裔，剽悍善战，所向无敌。东汉末，他已是一支数万大军的领袖。吴夫人支持自己丈夫的事业，要弟弟吴景跟随孙坚南北征伐，创立了吴国的基业。

孙坚死后，吴夫人帮助儿子孙策与吴景一起平定江东。孙策当时很年轻，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但老百姓害怕他，听说他来了，“皆失魂魄”，“窜伏山草”。为改变这种情况，孙策下令，不准掳掠。“鸡犬果茹，一无所犯”，“百姓欢悦，遂次第平江东”。但孙策骄傲跋扈的毛病，一直改不了，动不动就杀人。一次他的功曹魏腾因为公事同孙策发生争执，孙策大怒，竟要收杀魏腾。“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吴夫人为了使孙策警惕错误，乃身倚大井向孙策说：“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孙策见状大惊，马上释放魏腾，再也不敢乱杀人。

孙策死后，吴夫人又协助孙权抚军治国。当时，曹操新破袁绍，兵威日

益。公元202年下书要孙权送任子为质。送任子为质，就是表示今后一切要听命于曹操。孙权召集群臣会议，张昭等犹豫不能决，孙权同周瑜一起去请示吴夫人，吴夫人不肯让孙权“受制于人”，果断地决定不送质。吴夫人的这一决定，为吴国的独立自主奠定了思想基础。

常使刘备惴惴不安的孙夫人

孙夫人，孙权之妹、刘备之妻。尽管她从吴国嫁到了蜀国，由孙姓改为刘姓，但她始终保持了她的独立人格。她是三国女性中最具个性特征和传奇色彩的女人。

史书中关于孙夫人的记载不少，但大都散见于各人传记之中，为叙述方便起见，把主要的几条记载辑录如下：

“孙讨虏(孙坚)吴夫人，吴主权母也。……生四男一女。”(《三国志·吴书·妃嫔传》)

“……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云：‘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以上史料对孙夫人及孙刘联姻过程都交代得很清楚：

1. 孙夫人是孙权的亲妹妹，吴国的公主。但和其他深锁后宫娇弱无力的女人不同，她是女中英雄，有诸兄之风，才捷刚猛，喜欢舞刀弄枪，这是她的形象特点。

2. 孙刘联姻是政治结合。赤壁战后，曹军虽已北归，但强敌的威慑力

量并未随之消除，两个力量较小的国家要获得生存，必须结成联盟。孙刘联盟的建立有明确的目的，即两国交好共拒强敌。但是作为两个独立国家，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又必然存在着矛盾。这桩婚姻是孙权采取主动的。孙权既怕曹操报赤壁之仇，又唯恐刘备势力壮大，对吴国构成威胁，于是“进妹固好”，拉拢刘备。周瑜的建议，“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虽未被采纳，但可以反映吴国在这桩婚姻上的基本态度。从刘备集团利益来看，根据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基本方针，建立孙刘联盟，与吴国交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外交内容，所以孙刘联盟理所当然受到了刘备集团的欢迎。

既然婚姻只是两个政治集团有目的的联合，那么婚姻本身也就失去了男欢女悦、两情相慕的温情，而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色彩。当孙刘联盟巩固时，孙夫人和刘备便“绸缪恩纪”，相安无事，一旦孙刘矛盾加深，孙夫人便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孙权的立场上维护吴国的利益。

刘备偕夫人回到荆州以后，孙权派使者同刘备商量，共同夺取益州。刘备当然不会答应，因为夺取益州是刘备成就帝业的重要步骤，是不能与吴国分享的成果。孙权、刘备两家的矛盾因此而尖锐化。处于丈夫和兄长之间的孙夫人，立即面临着一种抉择。

孙夫人坚定地站在吴国立场上，不听刘备摆布，并“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刘备为了防止她惹是生非，不得不派大将赵云“特任掌内事”去防范看管她。但是这个离家千里远嫁他国的女子，居然对此全无畏惧，并且依然威风十足，声势夺人。到了其兄“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时，她“内欲将后主还吴”。虽然赵云、张飞“勒兵截江”夺回了阿斗，但她临回吴国时还想把刘阿斗作为人质带走，其政治头脑和良苦用心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古代，世子是一个王朝的后继，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孙夫人返国时要带走阿斗，意图以此作为要挟刘备的筹码，这真是一个厉害的女人！

从某些方面看，孙夫人和中国历史上远嫁少数民族的公主的处境没有两样。但是由于她具有的才智和勇敢，才把一幕悲剧表演得轰轰烈烈。她不但进退自如，声势显赫，而且由于她的到来，使刘备惴惴不安，最后竟动员大将赵云等人对她严加防范。孙夫人没有辱没自己，也没有辱没自己的国家。

两个“丑小鸭”

孔明之妻黄女和许允之妻阮女是三国时期两个以才智闻名的丑女。在中国封建社会，普通女性是没有资格在属于男人的传记的史册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她们的才智被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然而，当我们翻阅史册，在论及她们丈夫的生平事迹时顺便提到她们的零星材料中，还是能够发现她们闪光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华。

关于黄女，在裴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引《襄阳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邻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这是有关诸葛夫人的唯一记载。尽管记载的目的是为表现孔明的志向和为人，但在这段史料中，诸葛夫人的形象和才智跃然纸上。

她的外表形象不佳，黄头发、黑皮肤，虽然古代社会时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并不见面，但如此长相传扬出去，总让人闻而却步。无怪她的婚事要让父亲操心了。但其父黄承彦能亲口向孔明提亲，也足以说明其女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女儿的才能和智慧是父亲的骄傲。他了解孔明的为人，也清楚他的择妇要求，所以他提亲时胸有成竹，稳操胜券：貌虽不美，“才堪相配”。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高超智慧的种种传说中，可以想象诸葛夫人的聪明才智肯定是非常出色的。

婚后诸葛夫人的各种表现，史书没有记载。但以下这段关于诸葛亮的史料，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诸葛亮一心操劳国事，家务琐事肯定是一概不管的，那么是谁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必是夫人无疑。可见诸葛夫人持家理财的能力是不错的。

史书又记载，诸葛亮的儿子品学兼优，后来又为国尽忠殉职。如此出色的儿子又是谁教育的呢？诸葛亮虽然常有书信勉励，但日常的教育工作是由夫人负责的。由此可见，诸葛夫人有教育子女的能力。

诸葛夫人在持家理财、相夫教子方面发挥了她的才干，使诸葛亮免除了

家庭之累、后顾之忧，一心为国效劳。她不愧为诸葛亮的贤内助。当我们论及诸葛亮的历史功绩时，贤内助功亦不可没，诸葛亮的功劳也有她的一半。

不过，一个才堪与孔明相匹配的才女，其才智仅仅体现在家务琐事上面，未免让人感到某种遗憾。其实人的才能的发挥和智慧的表现还取决于某种机遇。一个聪明绝伦的女人如果没有让她施展才干的机会，她一辈子也只能自生自灭，与草木同朽。诸葛夫人所处的地位和她遇到的机会，决定了她只是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扮演好一个贤内助的角色。

而许允之妻阮女的遭遇就不同了。她也是一个丑女，长得丑陋，但非常聪明。新婚之夜，她的丈夫许允就充分领略了她的聪明才智。裴注《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引《魏氏春秋》有这么一段记载：“允妻阮氏贤明而丑，允始见愕然，交礼毕，无复入意。妻遣婢规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范，将劝使入也。’既而范果劝之。允入，须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顾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知其非凡，遂雅相亲重。”

多么聪明的女子！她不因为容貌丑陋而自惭形秽。容貌是天生的而非人力可为，她又何必为此自怨自艾，徒生悲伤？丈夫以容颜责难她，她以智慧战胜了他。“士有百行，君有其几？”男人可以对女人提要求，女人何尝不能对男人提要求，君子应当以德取人，好色不好德算是什么君子？她有理有节，据理力争，以聪明才智赢得了丈夫的敬重。在那个时代，女人被玩弄遭遗弃是屡见不鲜的，男人往往可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抛弃女人。“三从四德”、“七出之条”等，都是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而男人是不受约束的。女人除了自救别无他法，阮女就是以聪明和智慧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放在当时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背景中考察，足以说明阮女是一位卓有见识的非凡女性。

婚后她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诸葛夫人不同，她的丈夫在宦海中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命运多蹇。于是她不仅要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还要帮助丈夫排忧解难，担负起一个替丈夫出谋划策的好参谋角色。史书记载：“允为吏部郎，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将加罪。允妻阮氏跳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领之而入。”（《魏氏春秋》）

于是许允面对明帝的责问据理力争。明帝诘问他为什么用人不按照次序，他回答说：“某郡太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后，某守虽后，日限在前。”明帝一查，果然如此。又见许允衣裳破旧，知其为政清廉，不仅无罪开释，还特下诏给予赏赐。许允因祸得福，转危为安，这难道不应当归功于他的妻子的明智吗？

阮女不但料事有先见之明，而且临危不惧。在司马氏与曹魏争夺天下时，许允因与曹魏集团关系密切遭到司马氏的杀害。阮女沉着地应付了这场突然事变，并设计保护了她的两个儿子免遭杀害：“允后为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生欲藏其子，妇曰：‘无预诸儿事。’后移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艺德及父，当收。儿以语母，母答：‘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会语，便自无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多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命，具以状对，卒免其祸。”（《魏氏春秋》）阮女虽为女子，足不出户，然而对官场内幕、官吏心态的了解可谓至深至察。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护两个儿子免遭杀害。无怪史书赞赏她：“（其子）卒免其祸，皆母之教也。虽会之识鉴，而输贤妇之智也。”由此可见她是一位多么不平凡的女子！

辛宪英未卜先知

除了两个丑小鸭，三国时期还有一些见识超群的奇女子。魏国大臣辛毗的女儿辛宪英就是其中之一。

曹丕与曹植争立魏王太子，暗斗多年。后来曹操决计立曹丕为太子，曹丕高兴得不得了，抱住辛毗的头颈说道：“辛君知我喜否？”辛毗把这个情状告诉了辛宪英。辛宪英一下子从曹丕的表现中看出了他的浅薄。她说：“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三国志·魏书·辛毗传》，下同）

钟会是当时魏国的名将，官拜镇西将军。但辛宪英却从他的举止中，看到了钟会反叛及其毁灭的前途。

钟会率兵伐蜀，辛宪英对她的侄子羊祜说：“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

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后来钟会请辛宪英的儿子羊琇为参军。辛宪英忧愁地说：“他日见钟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羊琇向司马文王固辞，不听。辛宪英只好向羊琇说：“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后来，钟会果然反叛，羊琇谨守母亲的嘱托，以忠诚自守，并正言谏说钟会，钟会不听。后来钟会失败，羊琇非但无罪，还被赐爵关内侯。

三国时期的“智斗”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阶级和集团间政治、军事、文化斗争频度最高的时代。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智斗”，但哪一个时代的“智斗”也没有三国时期那样丰富多彩。这里再从《三国志》中辑录了二十二则“智斗”故事，以飨读者。为阅读方便，在不失原意的原则下，尽可能将史书中的古汉语改译成为现代汉语。

漫谈“连环计”

“连环计”大概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一个反间计的故事。这个故事说，东汉末年，大军阀董卓拥兵进入首都，把持朝政，残害人民。司徒王允忧心忡忡，夜不成眠。王允忧心国事的表现，感动了他家中美丽的歌妓貂蝉，貂蝉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帮助王允为国分忧。

于是王允就决定用貂蝉作诱饵，在董卓及其义子吕布之间巧设连环计，进行离间策反活动，以利用吕布铲除董卓。

王允先把貂蝉作为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吕布，貂蝉的美貌和艺术才能，一下子就把吕布吸引住了。王允看到吕布非常喜爱貂蝉，就答应把貂蝉嫁给吕布，吕布喜出望外，表示今后一定矢忠于王允。但是，不几天，王允却又把貂蝉献给董卓为妾。吕布前来质问，王允说是董卓恃势强迫，硬把貂蝉弄走的。这样就引起了吕布对董卓的不满。

吕布不能忘情于貂蝉，就利用自己同董卓的亲密关系，到董卓府中去同

貂蝉私会。貂蝉向吕布表白爱情，为董卓发觉，两人产生不和。

为了夺回貂蝉，吕布决计反叛董卓，他参加了王允秘密策划的反董活动，同王允合谋发动兵变，将董卓诛杀。

“连环计”的故事，起源很早，宋元的话本、戏曲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叙述。到明人写的传奇中，又有更多的演绎，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又集中加以描写，人物、场景都刻画得很细致。从此这个故事变成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几百年来在各社会阶层中广泛流传。

王允与董卓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连环计同封建统治阶级争夺权力时使用的各种阴谋诡诈手段一样，谈不上光明正大。但是几百年来人民群众听了这个故事后却寄同情于王允。他们希望吕布、貂蝉成功，愿意董卓失败。直到今天，人们在看表现“连环计”故事的戏曲《凤仪亭》时，还常常给吕布、貂蝉以掌声，给董卓以笑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就是王允反董卓的斗争尽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它同人民的利益仍有关系。根据史书记载，董卓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独夫民贼。他可以把无辜的老百姓指为盗贼，纵兵烧杀，然后把人头挂在车辕上炫耀。他还任意抢夺年轻妇女交给将士糟蹋。各地起兵反对他的时候，他挟持皇帝从洛阳迁都关中，走的时候用大火把洛阳焚毁，弄得洛阳周围几百里没有人烟。西汉以来的许多文物，都毁坏在这个野蛮军阀的手中。这是个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巨奸大慝。所以尽管杀死他的人是一个曾经“认贼作父”，而且在历史上名声不好的人，群众也可以接受。

史书记载，董卓长得很肥，肚子很大。他被吕布杀死后，暴尸于市。人们在他肚脐上放上火炷，把他的尸首当灯点着烧，人民对他的痛恨，由此可见。

特别是当董卓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所代表的就不仅是历史上的董卓，而是旧时代一切董卓式的官僚、军阀和恶霸。而旧时代董卓式的官僚、军阀和恶霸又是何其多啊！人们多么希望看到他们恶贯满盈的应有下场！即使是出一些像吕布式的人物把他们杀了也是好的。这就是历代人们对“连环计”出场的各种人物，有着不同好恶的原因。但是认真考查起史实来，尽管董卓为恶，王允除奸，以及王允策反吕布，后来终于杀死董卓等等都有史实为据，可是“连环计”、“凤仪亭”等等场面，却在史书中寻

找不到。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王允策反吕布诛杀董卓的经过，记载如下：

吕布，善于弓马，“膂力过人”，号称“飞将”。因为帮助董卓诱杀了首都的警卫司令丁原，受到董卓的信任，两人关系密切，“誓为父子”。董卓因为平时对人无礼，害怕别人谋害他，常常叫吕布保护他。但是董卓“性刚而褊”，好发脾气，有一次，为一点小事，拔出手戟来掷击吕布，吕布敏捷地躲开了，但心中对董卓很是抱怨。

司徒王允看见董卓为恶，一直想办法铲除他。于是，王允就积极结交吕布。后来吕布到王允那里去，把董卓那次用手戟击杀他的情况告诉了王允，王允当时正在同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杀董卓，听到吕布诉苦，就对吕布进行策反工作，要他作内应。吕布说：“他同我有义父义子的关系怎么办？”王允说：“你姓吕，他姓董，本来就不是骨肉，现在连你自己的命都顾不了啦，还谈什么父子关系！”

于是吕布答应了王允的要求。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王允同吕布等密谋，乘皇帝在未央殿会见大臣的机会，发动士兵诛杀董卓。当时，吕布怀里揣着王允弄来的诏书，布置同郡骑都尉李肃，带领亲兵在掖门袭击董卓。董卓喊叫吕布来保护他，吕布一面说皇帝有命令杀你，一面用刀刺杀了董卓。

这是《董卓传》、《吕布传》中关于这场事变的全部记叙，什么连环计、戏貂蝉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在《吕布传》中，确有一条关于吕布同董卓的侍婢爱情风波的记叙。原文如下：“（董）卓常使（吕）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这件事也许就是连环计故事中关于貂蝉一事的来源吧。

李孚的“以假乱真”和“金蝉脱壳”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以后，继续向袁绍的后方冀州进军，当时袁绍已死，占据冀州的是袁绍的儿子袁尚。曹操指挥大军包围了冀州的重要都市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当时袁尚已经率领军队去平原（治今山东平原西

南),守卫邺城的是袁尚的冀州别驾审配。袁尚听说邺城被围,即回兵救援,行军途中要人去邺城传递情报,并了解战守情况。袁尚的主簿李孚说:“现在邺城被围得很紧,进出非常困难。这个任务下面的人恐怕完不成。况且,他们也不了解全面情况,不如让我亲自去吧。”袁尚问他要多少随从,李孚说:“人多了容易被敌人察觉,三个人就行了。”袁尚让他挑选了三个人,出发了。

李孚一行来到邺城时,天色已晚。他们采取了“以假乱真”的办法,把自己打扮成曹军,假说自己是检查军纪的都督,在曹操的围城大军中行走起来。一面行走,一面抓住围城将士的违反纪律现象进行呵责、处罚。后来大摇大摆地通过曹操的军营,向邺城的章门行走。到了章门又借口违反军纪,把围守章门的将士捆绑起来,并由章门突破敌人重围进入了邺城。审配等人见李孚来到,悲喜交集,守城的军士鼓噪起来,高呼万岁。曹操的部下向曹操汇报了上述情况,曹操笑着说:“这家伙非但能进去,他还能出来呢!”

果然,李孚进城向审配交换了情况以后,就要赶紧返回复命。但是用什么办法出城呢?冒险杀出重围是不可能的,再用老办法也不成了。他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建议审配用驱出城中老弱妇女的办法,掩护他们突围出城。于是,审配在夜间打开城门,让城中几千老弱妇女手持白幡、火把出城求食。李孚一行就乘这个机会,跟在老弱妇女后面混出了重围。第二天,曹操得到李孚出城的消息抚掌大笑,说:“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李孚完成任务回来后,受到了袁尚的欢迎和表扬。



张辽

张辽镇定应变

曹操在北征乌丸之后,又着手准备南征荆州。他先派荡寇将军张辽进兵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一些士兵不堪疲劳,意图谋反。他们在军队临发的夜间点起大火,发动叛乱,一时间,全军乱了套,沸沸扬扬,不知所以。张辽分析了动乱情况,认为谋反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不会是全军都反，各种骚扰都是为了扰乱人心。因此要镇定应变。他下令全军：凡是不谋反的人都就地安坐，不许乱动。他自己也率领亲兵环立于阵中。果然，这样一来，全军很快镇静下来，谋反的人也暴露出来了。张辽处治了谋反的人，迅速平息了叛乱。

蒋干的策反活动和黄盖的诈降计

公元208年末至209年初的赤壁之战，是决定魏、吴、蜀三国鼎立局面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弱军战胜强军，非常具有特色的战役。

对于东吴来说，赤壁之战的胜利结局，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情势和参战将士的战斗士气决定的。但是战争指导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他们精心组织的情报斗争，对于战争的胜利也起了重大作用。

历史小说和古典戏曲里，有关赤壁之战情报斗争的故事甚多。描写“蒋干盗书”的《群英会》，描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几乎妇孺皆知。这些故事的文学夸张和虚构成分很多。但是在赤壁大战以前，曹操确实派遣蒋干到东吴去会见周瑜，企图策反他；周瑜也确实指令战将黄盖用诈降计欺骗曹操，最后火烧了曹操的战船。赤壁之战中，曹、吴双方情报战线上的斗争，确实是激烈的。

下面根据史书的记载，把赤壁之战中蒋干的策反活动和黄盖的诈降计，分述于后：

关于蒋干其人和他策反活动的失败

在历史小说和古典戏曲中，蒋干是一个白鼻子的小丑。其实不对。蒋干此人是一个仪容秀美的年轻文人。他是九江（治今安徽寿县）人，才辩卓越。《江表传》说他“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可见他还颇有一点名望。

曹操的水陆大军抵达长江北岸时，周瑜统率东吴的军队前来抵御。曹操听说周瑜年轻英俊，很有才华，就想派人说服他归降。他秘密叫人到扬州请来了蒋干，要他利用同周瑜交往的关系，去对周瑜进行策反工作。

蒋干接受任务以后，穿戴着布衣葛巾，以私人名义过江来拜访周瑜。周

瑜分析了蒋干来访的目的，判断他是来为曹操作说客的，于是就在出门迎接的时候，采取主动进攻姿态，一语道破了他这次来访的意图。

周瑜说：“你老兄不辞辛苦，远涉江湖来到此地，莫不是为曹操当说客吧？”

蒋干一听此话就着了慌，急忙表白说：“不，不是。我与足下同州里，多年不见了，这次想到你这里来参观参观，叙叙旧，足下怎么把我当说客呢？”

周瑜说：“我虽然不及古代的大音乐家夔和旷聪明，但是闻弦赏音，也能知道足下弹的是什么曲呀！”

就这样，一阵嘻嘻哈哈的开场白，即把个能言善辩的蒋干弄得再也无法开口为曹操说项。

周瑜把蒋干请进帐内，招待了他一番，完了，说：“我有点机密的事情要处理，你先住下，等我完了事，再来相请。”

隔了几天，周瑜来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这在周瑜当然是一种向敌人使者显示军威的行动。参观完了军营，又请他去看仓库和军用物资。回来，就大摆宴席，请蒋干饮宴，这就是小说、戏曲里描写的“群英会”了。

在饮宴过程中，周瑜向蒋干展示了各种华贵的服饰和珍奇玩物，并且意气昂然地对蒋干说：“大丈夫处天地间，碰到知己的主公，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情，言听计从，祸福同当，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呢？今天就是苏秦、张仪、酈食其再生，也难以离间我和主公之间的关系，足下这么一个年轻人，又怎么能说动我呢？”蒋干只好笑笑，不再说话。

群英会以后，蒋干辞别周瑜，返回江北向曹操复命。他说：“周瑜这个人坚定得很，不是用言辞可以策动的。”

蒋干其人及其策反活动失败的经过，在史书记载中就是这些。但是在历史小说和古典戏曲里，蒋干一案，并不是这样简单了结的。在那里，还有一段“蒋干盗书”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蒋干在群英会以后，乘周瑜醉酒昏睡的时机，窃看周瑜军帐中的机密文书，发现了新降曹操的荆州水军将领张允、蔡瑁私通周瑜，蒋干偷盗了张允、蔡瑁写给周瑜的信，逃回曹营。曹操看了蒋干盗回的书信，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允、蔡瑁杀了。哪知这件事是周瑜利用蒋干搞的反间计，张允、蔡瑁并没有私通周瑜，那书信是周瑜假造的，周瑜的醉酒昏睡也是假装的。后来曹操觉悟到自己上了当，但是为时已晚。

他黜退了蒋干，再没有用他。“蒋干盗书”的故事，虽然同史书的记叙不合，但是流传久远，直到今天，在人们的心目中，蒋干依然是个笨头笨脑、专门帮倒忙的典型人物。连蒋干的名字也变成了愚蠢上当、帮倒忙的同义语，这是很冤枉的。

黄盖用诈降计火烧曹操战船的经过

赤壁大战以前，曹操的军队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已经十分疲惫。千里奔袭的急行军，表面上旗开得胜，实际在胜利的同时，失败的因素已在迅速扩大。特别是北方人初到南方，不服水土，军中疾疫流行，士兵的战斗情绪低落。但是，同周瑜相比，在军队的数量上，曹操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当时，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军队有十五六万人，新归附他的荆州军队有七八万人，两下总计，共有二十三万多人；而周瑜的军队只有三万多人，加上刘备两万同盟军，也只有五万多人。两者的实力近于五比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打败曹操的进攻，也是相当困难的。

正当周瑜冥思苦索，寻求克敌制胜良策的时候，他的部将黄盖发挥了自己的战斗积极性，提出了一个关系战争全局的合理化建议。

黄盖是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地方的一个没落士族子弟，从小在贫苦中长大，靠打柴为生。打柴之余，自学兵法。后来参加孙权父亲孙坚的军队，在频繁的战斗中，学会了军事。他来到赤壁战场以后，调查了敌我两军的优劣点和对峙态势，向周瑜提出了火攻的方略。

他说：“现在敌众我寡，长时间地对峙对我们不利。我观察曹军的舰船首尾相接，行动不便，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火攻的办法，烧他的舰船，向他们发起猛烈的袭击。”

火攻的建议，确实是战胜曹操军队的一个好办法。困难是怎样接近敌人的舰船，不解决这个问题，火烧、袭击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接近敌人舰船的问题，周瑜决定先同曹操搞一个情报战。他和黄盖秘密策划了一个用诈降策略诱骗曹操的计谋。

周瑜叫黄盖派亲信过江，给曹操送去了一封密信。信上说：“我黄盖在孙氏这里身为将帅，他们对我的恩情不薄。但是天下的事情有个大势所趋，以江东六郡的人，挡中原百万之众，敌寡不众，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势，我们东吴的将士，不论智者、愚者，都看到了，就是周瑜、鲁肃偏执顽固，不识

大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行归顺你们,并帮助你们一起打败周瑜。我现在担任的是军队的先锋,在两军交锋的时候,我决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你们效力。”曹操看了黄盖的密信,半信半疑,他找来黄盖的送信人,盘问了一阵,说:“只怕黄盖的归顺是假的,要是真的,我一定大大封赏他。”

在黄盖同曹操建立了联系以后,周瑜选择了一个风向东南的有利时机,同曹操开战。战前,他又叫黄盖派人同曹操联系。然后,由黄盖亲自率领数十艘艨艟斗舰向曹军舰船集中的地方开发。这些艨艟斗舰里装的都是灌了膏油的薪草,外面蒙上帷幕,舰上打着黄盖的牙旗。

黄盖的艨艟斗舰航行到大江中流时,挂起了风帆。与此同时,黄盖要舰中的士兵大声喊叫:“黄盖来归降!”曹操军队的官兵听到喊声,以为是黄盖真的来投降了,纷纷出来观看。

当这批满载引火物的艨艟斗舰继续航行到离曹军舰船集中区二里地的时候,黄盖命令各舰一起点火。随后,吴军舰上的士兵登上预先准备的小船退去,让着了火的艨艟斗舰在东南风的吹送下,向曹操军队的舰船猛冲过去。

这时,风越刮越猛,火也越烧越猛烈,一条条着了火的艨艟斗舰,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径直插入曹操军队的大批舰船中间,引起了熊熊大火。由于曹操军队的舰船首尾连接在一起,一时分解不开,无法自救。不久,江岸上的军队营盘也被大火烧着了。一时间,火焰冲天,曹操的军队大乱,人马被烧死的、淹死的,不计其数。这时,周瑜和刘备又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向曹操的军队发起猛攻,曹操的军队在漫天大火和孙、刘联军的袭击下全线崩溃。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曹操只好带领残部仓皇北撤。赤壁之战终于以曹操的失败而告结束。

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诱敌的过程很是曲折、有趣,因而成了历史小说和古典戏曲着意描写的好题目。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黄盖诈降诱敌一事,被夸张渲染,并添加了新内容,最后演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苦肉计”故事。这个故事说,周瑜为了替黄盖诈降曹操寻找借口,故意制造事端,用军棍痛打黄盖,曹操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探明了黄盖被周瑜痛打的经过,遂对黄盖的归降深信不疑,因而被黄盖烧了战船。后来,人们就把自己整治自己,以取得敌人信任的情报战术,或者与此相仿的一些做法,都称之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蒋济的“虚张声势”战术

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中，周瑜和刘备在荆州同曹操作战，孙权则率领人马直趋淮南，围攻合肥。合肥守将一面据城坚守，一面派人向曹操告急。当时，曹操已经在赤壁打了败仗，军中士兵又多感染疾疫，抽不出很多兵马去解救合肥，只派了一个名叫张喜的将军率领一千骑兵前去应急。曹操告诉张喜，要他路过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舆北）时，在汝南征调部队。张喜的骑兵在奔赴合肥途中又有不少人感染疾疫，兵力越发少了。扬州别驾蒋济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秘密建议刺史利用张喜骑兵东来的机会，搞一点“虚张声势”战术，以促使孙权退兵。他们宣扬说：“张喜率领了四万步骑来救合肥，大军已经到达雩娄（今河南固始东南）了。他们派人送信来啦，本州的主簿已经去迎接啦！”然后，派出三路信使，向合肥城传送这个消息，并故意让信使在路上为吴军俘获。孙权虽然包围了合肥，但是久攻不克，得到了这个假情报，又信以为真，就烧了围城的工事撤退了，合肥城由此得以保全。

周瑜的“美人计”

《三国演义》和戏剧《甘露寺》，描写周瑜要孙权用妹妹孙尚香诱惑刘备，企图把刘备软禁在吴国。后来，诸葛亮用三条“锦囊妙计”把刘备、孙尚香救出吴国。流传至今的一句话“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就是讽喻这件事的。

但这件事的历史记载与演义小说有很大不同。据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周瑜确实有过用美人计羁绊刘备的建议，但是孙权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占领了荆州的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屯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西北）；刘备占领了南郡以南地区，屯兵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原属刘表的吏民听说刘备在公安，纷纷跑来归附。刘备占领

的地区小,无法安置这些吏民,就向孙权借用南郡。当时曹操占领着荆州的襄阳、江夏(今河南西南部和湖北北部),以及长江北岸的扬州地区(今江苏北部),威胁着吴国的安全。孙权为了联络刘备共同抗曹,表示愿意考虑刘备的要求,并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为此邀请刘备到吴国的京城(今江苏镇江)来。刘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京城的。这是公元209年的事情。

周瑜听说孙权要把妹妹嫁给刘备,而且还要把南郡借给刘备,就上书孙权申述自己的意见。他说:“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作为辅助,绝不肯久屈人下,为人所用。为了国家利益,我建议乘这个机会,把刘备安置在吴中(今江苏苏州),并在那里给他修建个富丽的宫室,多安置一些美女,让他沉溺在声色之乐中,而不思其他。这样,就可以把他和关羽、张飞分开,进一步还可以把他的人马弄过来,为我们所用。若不这样做,反而把南郡借给他,让他和关羽、张飞聚合在一起,驰骋于疆场,那他们就会像蛟龙得云雨,不是池中物了。”这就是周瑜美人计的来由。孙权的部下吕范等人,也都赞成周瑜的主张,劝说孙权羁留刘备。



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梦],一尊还酹江月。

当时在吴国掌握最高军事参谋大权的是鲁肃。当孙权把周瑜等人的建议，拿来同鲁肃商议时，鲁肃坚决不同意。他说：“曹操的势力还很大，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多为曹操树立敌人，才能制服他。现在我们初到荆州，士民不了解我们，对我们不信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借助刘备在荆州的声望，进一步联合他，以便共同对付曹操，怎么能羁留他呢？”孙权利想到曹操对吴国的威胁，觉得鲁肃的话很有道理。又考虑到用周瑜的美人计也不一定能制服刘备，弄不好，还会产生不良后果。所以，仍然按照原来嫁妹借郡的计划行事，没有采纳周瑜等人的意见。

孙、刘的进一步联合，果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据说曹操听说孙权把南郡借给了刘备，竟吃惊得把正在写字的笔掉落了。

刘备大概在京城的迎娶活动中听到周瑜对他不怀好意的传闻，就在离开京城时，利用同孙权叙别的机会，把周瑜射向他的暗箭射了回去。他在同孙权叙别时，悄悄地向孙权说：“周瑜这个人能文能武，是一个万人丛中的英雄，他志气远大，恐怕不会久为人臣。”

后来，曾经在周瑜身边做过功曹的庞统归属刘备。刘备问他：“我到东吴的时候，听说周瑜曾经秘密建议把我软禁在吴中，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庞统给了肯定的答复。刘备叹息道：“那时我势孤力单，对孙权有所求，不得不冒险到京城去，差一点落到周瑜的手中。当时诸葛亮很怕他们搞这一手，极力劝我不要去。真是‘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那时，我唯一的依恃是曹操在北，孙权还要联合我抗曹，因而不至于加害于我，可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回想起来，真是危险啊！”

另据史书记载，孙权虽然没有按周瑜的美人计羁留刘备，但是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却也是有特殊用意的。

孙权的妹妹不是一般的女性，她“才捷刚猛”，骄纵豪爽，作风同乃兄孙策、孙权很相近。她喜爱武装，婢女百余人，个个都会武艺。在荆州时，经常要这些武装婢女持刀侍立左右。弄得刘备“心常凛凛”，老是担心肘腋之下，生出什么事变。总之，这位孙夫人并不是一位温情脉脉的贤内助，倒像是孙权派来执行监督任务的特派员。因为她骄纵不驯，刘备乃派了一位作风严肃的老将赵云来执管内事，这才把这位贵夫人制住。后来孙、刘因为争夺荆州互相交恶，孙权派大船接回妹妹。孙夫人乘机把刘备的儿子阿斗作为人

质带走。赵云闻讯，立即和张飞一起勒兵封江，截住了她乘坐的大船，把阿斗抢了回来。

刘备智取益州

刘备在荆州站住脚以后，就打算向西扩张，占据地势险要、资源丰富的益州地区。这是早在他初次和诸葛亮见面时，就确定的方针。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向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些话刘备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当时，占据益州的地方军阀是同刘备有宗室之亲的刘璋。他们都是汉景帝一系的子孙，可习性却大不相同。刘备性格坚毅、奋发自强，刘璋却性格懦弱、缺少主见。他是靠他父亲原益州牧刘焉的威望，在公元194年执掌益州大权的。

公元210年孙权也想涉足这个地区，他向刘备建议共同出兵夺取益州，刘备要独占益州，不愿孙权的军队插足，孙权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为了达到独占益州的目的，刘备一直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着各种准备。

要占领益州，首先要了解益州的人情地理，还要在益州培植和安排亲附自己的力量以作内应。为了完成这些必不可少的准备，刘备亲自出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曹操南征荆州的时候，刘璋曾经派遣益州别驾张松去晋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附。当时正是曹操称雄中原、饮马长江的得意时刻，他踌躇满志，趾高气扬，根本没有把这个从偏僻地方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在接待张松的时候，他态度傲慢，也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给张松赐官加职。

张松憋了一肚子气走了。在返回益州途中，见到了刘备。这个被曹操视若敝屣的外交使者，在刘备那里却变成了稀世奇珍。

刘备见了，高兴得不得了。捧星星、捧月亮般地围着他转，甜情蜜意，殷勤关怀。张松为刘备的热忱所感动，就给刘备当了义务情报员。他把益州的人情地理、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军事要塞的防务部署统统告诉了刘

备,还为刘备画了益州地图,地图上标明了益州的山川处所、道路远近,刘备就这样从张松那里得知了益州的各種情况。

张松回到益州的时候,曹操已经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就乘这个机会,向刘璋诉说曹操这个人如何如何恶劣,刘备这个人如何如何贤德,劝刘璋同曹操断绝来往,同刘备建立关系。

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决定派人同刘备联络,张松推荐他的好朋友法正去。法正接受刘璋的委任,到达荆州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西北),见到刘备。刘备又极力拉拢。于是法正也和张松一样,变成了刘备的义务情报员,把益州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备。法正回来以后,即同张松订立了拥戴刘备的秘密协议。至此,刘备在益州培植和安排亲附自己的力量以作内应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公元211年,曹操要派军队讨伐占据汉中的张鲁。汉中是益州的北大门,曹操得了汉中,益州就将不保。刘璋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害怕。张松就利用这个机会,建议刘璋派人去迎接刘备进入益州。张松向刘璋说:“刘备是使君的宗室、曹操的仇敌,他很善于用兵,如果把他接来益州,叫他去攻打张鲁,一定能打破张鲁,把汉中夺到我们手中。汉中夺到手,曹操来了,也无能为力了。这样,益州的安全就有保障了。”刘璋不知道张松已经投靠了刘备。他听了张松陈说利害的话,以为张松的建议是保障益州安全的好办法。与此同时,张松还造谣说,益州的将领庞义、李异等人都恃功跋扈,想同曹操的人联系,如果不请刘备来,则敌人攻其外,庞、李攻其内,事情就不好办了。刘璋一听更加着急,于是,决定派遣法正携带厚礼去邀请刘备入境抗曹。

刘璋部下也有人看出张松的建议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不可采纳。益州主管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请来刘备,益州就危如累卵了。”益州从事王累甚至把自己吊在城门上来谏说刘璋。但是刘璋一概不听。法正到达荆州,把张松向刘璋提建议、刘璋请刘备进益州的经过告诉了刘备。随后,又秘密向刘备献策,要刘备乘刘璋求援的好时机,进兵夺取益州,然后,依靠益州殷富的资源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建立大业。刘备高兴地采纳了法正的意见,率领数万人马,进入了益州。

刘备进入益州以后,并没有按照刘璋的要求去攻打张鲁,却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进行收买人心的工作和进攻成都的准备。公元212年,刘备从益州

的北部向成都进军,同时又命令诸葛亮率领张飞、赵云等人溯江而上,占领益州的其他地区。

公元214年,刘备的军队包围了成都。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坚壁清野,抗战到底。刘璋犹豫不决。这时,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长信,分析当前的形势,比较战守的利害,劝说刘璋向刘备投降。刘璋自己引狼入室,后悔莫及,只好开城出降。

贾诩的“离”字计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曹操同当时西北地区的两大军阀马超、韩遂,为争夺关中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一年的上半年,马超、韩遂率领他们的军队并联合一些依附他们的地方武装进军到潼关。曹操派大将曹仁前去抵挡,并告诉他们,马、韩的军队非常精悍,要他们坚守壁垒,不要出战。

秋天,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来到潼关,要同马超、韩遂进行决战。

曹军在潼关北渡黄河,前队刚渡过河,马超即率领骑兵奔驰而来,曹操在马超骑兵的突然袭击下,不知所措,他的猛将张郃看到情势危急,连忙把曹操护送到一艘船上逃命,船刚起航,马超的骑兵就追到了岸边,向船上射箭,矢如雨下。曹操的部下不知曹操的下落,都很恐惧,后来看到曹操脱险,才转悲为喜,曹操笑着对大家说:“今天险些遭到小毛贼的困辱。”

曹操脱险以后,整顿军队,同马超、韩遂的军队在渭水一带多次战斗,虽然有些小的胜利,但是一时间仍然打不破马、韩的联军。这时,马超、韩遂向曹操提出以黄河为界,双方划定势力范围,停止战斗。曹操不干。他的谋士贾诩说:“不妨假装答应他们。”曹操问:“答应了以后,怎么办?”贾诩说:“离之而已。”曹操一听这话,就说:“懂了。”

于是,曹操按照贾诩的“离”字计,在马超、韩遂之间搞起“智斗”来。

曹操先是假装答应马、韩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并约定在两军阵前谈判条件。他的企图是利用这次阵前谈判执行一项离间马超、韩遂的计划。原来曹操同韩遂的父亲是老朋友,两个人是同岁孝廉,他同韩遂也认识。他

就利用这个关系，在两军阵前谈判条件时，同韩遂套近乎，两个人在一起谈了一会儿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只是叙旧，并不涉及军政大事，但在谈话过程中，曹操抚掌欢笑，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其目的是用这种套近乎的方式，引起马超对韩遂的怀疑。曹操的这个离间办法果然奏效。马超对曹操同韩遂抚掌欢笑的谈话产生了怀疑，回来就问韩遂：“你们谈了些什么话？”韩遂说：“没谈什么大事。”这个回答没有能解除马超对韩遂的怀疑。

第三天，双方又在阵前谈判，曹操又同韩遂套近乎，韩遂的部下也争着来观看曹操，并同曹操打招呼。曹操说：“你们想看我吗？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并没有长四个眼睛、两张嘴，只是多一点智谋罢了。”这次会见，又增加了马超对韩遂的怀疑。

接着，曹操又给韩遂写来一封信，信上点点画画的，看起来就像是曹操同韩遂背着马超在商改什么条件似的。马超知道了这件事，越发对韩遂猜忌起来。从此，对韩遂离心离德。

曹操得知马超同韩遂已经发生了不和，就抓住时机集中兵力向马超、韩遂发动进攻。马超、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互不配合；他们的军队又为曹操和平谈判的伪装所欺骗，战斗准备很差，不多时，就被曹操打得大败。马超、韩遂只好各自率领残部撤离关中，返回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关中地区转为安定。

吕蒙的“瞒天过海”计

公元215年，孙权同刘备因为争夺荆州打了起来。孙权命令吕蒙发兵攻打当时属于刘备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均在今湖南省）。长沙、桂阳的太守在吕蒙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相继举城归降，唯有零陵太守郝普据城固守，不肯投降。

刘备听说孙权发兵攻打荆州，急忙率领五万人马从益州来到荆州的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他命令关羽向驻守益阳（今湖南益阳）的吴军主将鲁肃进攻，并同吕蒙争夺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孙权看到关羽要打益阳，当即派人给吕蒙送去了紧急命令，要吕蒙放弃零陵，立刻回师北上，协助鲁肃并

力对付关羽。吕蒙舍不得即将到手的零陵城，就采取“瞒天过海”的办法，压住孙权的命令不发，紧急布置部队攻城。与此同时，还利用郝普的故交邓玄之进入零陵去搞策反工作。

由于郝普困守孤城，不了解外界情况，吕蒙就要邓玄之进城向郝普说：“刘备现在被曹操的军队围困在汉中，关羽又被阻隔在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零陵已经成为孤城，全城已经危在旦夕，只有赶快投降，才能保住全城百姓和你百岁老母的性命。”郝普听了邓玄之的话，以为零陵真的没救了，就出城投降了。吕蒙派人接管了零陵以后，即率领全军回师北上。这时，他把孙权的紧急命令拿出来给郝普看，并抚掌大笑。郝普从孙权的紧急命令中了解到刘备已经率领大军东进公安，关羽正在攻打益阳，后悔莫及。

吕蒙的“白衣渡江”计

这是三国时期情报战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经过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和公元215年吴蜀的荆州之争，荆州的七个郡被魏、吴、蜀三国分割为三个部分。即：第一，南阳郡和南郡、江夏郡的北部（今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北部等地区），属曹操。镇守这个地区的是曹操的大将曹仁。军屯襄樊；第二，长沙、桂阳两郡和江夏郡的南部（今湖南省东部和湖北省南部等地区），属孙权。镇守这个地区的是孙权的大将吕蒙。军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第三，零陵、武陵两郡和南郡的南部（今湖南省西部和湖北省西南部等地区），属刘备。镇守这个地区的是刘备的大将关羽。军屯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地盘虽然划分了，但是四战之地的荆州并没有因此而安定，它依然是三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热点。

公元219年夏，关羽大军指向襄樊，围困曹仁于樊城。樊城是襄樊地区的重镇，隔汉江与襄阳城对峙，是古代的军事要冲。曹操当然不肯把这样重要的地方丢下不管，于是派于禁、庞德率领七军来救。关羽利用汉江水淹七军，降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由于襄樊地区逼近曹操统治地区的京辅中心，曹操担心首都安全，打算迁都北上。他的部下司马懿、蒋济说：“孙权、刘备表面上很好，实际上矛盾很大，关羽得志，孙权必然不高兴。我们可以用

割让江南土地为诱饵，派人去游说孙权，拆散他们的联盟，让孙权派兵去攻打关羽的后路。这样，樊城之围就可以自行解除了。”

司马懿和蒋济对孙、刘联盟现状的分析是正确的。正当曹操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拆散孙刘联盟活动的时候，孙权也在为夺取刘备所属的荆州地区，积极地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

东吴方面，力主孙刘联盟的政治家是鲁肃，但是早在鲁肃督军陆口、镇守吴属荆州的时候，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就已经向鲁肃说：“现在东西虽为一家，但是关羽实在是熊虎，要有个对付他的计划。”为此，他们两个人秘密商量了五条方针。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了督军陆口、镇守吴属荆州的任。他表面上同关羽修恩结好，实际上却在加紧进行袭击关羽的军事准备工作。此时，他秘密上书孙权，建议寻找时机出兵袭击关羽，夺取刘备所属的荆州，以控制长江流域。孙权看了吕蒙的建议，亲自找吕蒙谈话，对吕蒙的建议表示支持。

开始时，关羽对孙权和吕蒙也是有警惕的。他举兵北伐曹操的时候，为了防备吕蒙的突然袭击，在南郡、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布置了相当大的后卫部队。吕蒙很想利用关羽挥师北上的机会，发兵袭击关羽的后路。但是关羽的后卫部队妨碍了他的用兵计划。为了军事突袭的胜利，必须设法把关羽的后卫部队引走。

情报战的老手吕蒙，同关羽玩弄起阴谋诡计来了。他打算用伪装沉痾不起的办法来麻痹关羽。他又秘密上书孙权说：“关羽北上襄樊，却在后方留下了大批守卫部队，必定是防备我们攻打他的后路。我常常有病，现在打算以治病为名，返回首都建业。关羽听说我返回首都治病，一定会放心地把后卫部队调往襄樊前线。等他把后卫部队调走，我们就指挥大军过江，昼夜奔驰，去袭击他空虚的后方。这样，很快就能够把南郡等地打下来，并且擒获关羽。”

孙权批准了吕蒙的秘密计划，并发布公告说吕蒙病笃，特准他离职返回首都治病。

吕蒙回京治病的消息，在年轻将领陆逊的头脑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他跑去见吕蒙，说道：“现在正是同关羽斗争的紧张时刻，你为什么要去首都呢？你走了以后荆州的事情怎么办呢？”

吕蒙说：“现在的情况正像你所说的，但是我的病确实厉害了，需要回去

治疗一下。”

陆逊说：“关羽自恃骁勇，盛气凌人。现在打了胜仗，骄傲得不得了，只想北进，不会认真防备我们。如今他听说将军病重了，必定更加丧失警惕。我们要是能乘这个机会出其不意地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就可以打垮他。希望你回首都见了最高领导，同他认真研究一下。”吕蒙当时不能把秘密计划告诉陆逊，只好嘻嘻哈哈地应付了他一番。但是他到了孙权那里，马上就建议由陆逊来接替他督军荆州的职务。他说：“陆逊这个人思想深刻，知道怎样对付关羽，可以担当大任。他又年轻，名气不大，关羽对他没有顾忌，这样就能够实现我们原定的计划。”于是，孙权召见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都督，要他代行吕蒙的职务。孙权向他交代了他和吕蒙制定的秘密计划，要他回到前方继续采取措施麻痹关羽，并密切观察形势，以便选择时机，给关羽以歼灭性打击。

陆逊返回陆口以后，以通报代理吕蒙督军职务为由，给关羽写去了一封态度谦恭、语言甜蜜的书信。他迎合关羽骄傲自大的心理，用狐狸夸奖乌鸦的伎俩，对关羽在北伐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大唱赞歌，说他作为关羽的盟友，对于关羽的巍巍业绩羡慕极了。特别是擒获曹操的名将于禁，简直是垂世不朽的功勋，连晋文公的城濮之战、韩信的破赵之战都比不上这次战役的战果辉煌。

为了导引关羽尽量把后卫部队北调，陆逊还在书信中假惺惺地对关羽说，曹操是个狡猾的敌人，要关羽再接再厉，克获全胜，切不要大意轻敌。末了还说，他是一介书生，不大懂事，因为关心共同的事业，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关羽看了陆逊的来信，非常得意。他想，吕蒙病重离职了，代理他的人是那个不懂事的书生，此人对自己又那么谦卑、崇拜，还有什么顾虑呢？他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把大批后卫部队陆续北调。

陆逊观察了关羽的部队调动，知道关羽后方已经空虚了，当即向孙权作了报告。孙权得到陆逊的报告，命令吕蒙、陆逊立即率领所部作为前队渡江作战。

为了保证这次军事突击的成功，吕蒙要吴军的先头部队进行偷渡。他把精兵隐伏在船舱中，让摇橹的士兵穿着白色的衣服，打扮成商贩模样，把船开向对岸。

吴军的先头部队登岸以后，首先逮捕了关羽在江边布置的少数警戒哨，

封锁了吴军过江的消息。接着吕蒙指挥各部队陆续过江,并以急行军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向南郡、公安等地奔袭。直到这时,关羽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吕蒙已经率部过江,正在袭击他的后方。

这期间,孙权早已同曹操挂上了钩。决定渡江作战时,他又派人给曹操送去了一封信,说他已经派军队西进袭击关羽的南郡、公安等地,以帮助曹仁解除樊城之围,他还要求曹操为这一军事行动保密,以免关羽得到消息预做准备。

曹操把孙权的报告发给部下观看,询问大家要不要为孙权的军事行动保密,大家都说应该为孙权保密。唯有司空军祭酒董昭说:“我们非但没有必要去为孙权保密,而且还要设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关羽,让关羽率领军队南下去同孙权作战。这样,既可以早日解除樊城之围,又可以引使两贼相斗,坐收渔人之利。”

曹操采纳了董昭的意见,叫前线的士兵把孙权给他的信用箭射给了关羽。关羽这才从曹操那里得到了孙权袭击他后路的消息。是进还是退呢?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犹豫起来。

其实这时关羽已经没有可以犹豫的时间了。吕蒙率领的部队旋风般地开到南郡、公安城下。孙权统率的后续部队也在跟进。

在南郡、公安的围攻战中,吕蒙采取了军事进攻和心理作战相结合的策略。这是他在攻战中经常使用的老办法。

为关羽驻守南郡和公安的官员,是太守糜芳和将军士仁。关羽平日作风粗暴,对他们很不好,双方关系处得很紧张。关羽举兵北上,糜芳、士仁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做得不好,关羽发了火,扬言说,要回去整治他们。糜芳、士仁听了这话,心中忐忑不安。孙权、吕蒙调查了这些情况,就利用这个隙缝向糜芳、士仁进行策反工作。

公安在南郡西南,先被吕蒙包围,士仁据城守卫。吕蒙要士仁的朋友麴翻给士仁写信,分析形势,陈说利害,劝士仁归降。士仁投降以后,吕蒙又叫士仁随军到南郡,说降了糜芳。

为了分化瓦解关羽的军队,吕蒙在进入了南郡、公安以后,对关羽军队的官兵家属进行了抚恤和慰问,并制定了不许侵犯居民利益的政策,传令全军严格执行。吕蒙部下的一个亲兵拿了居民的一个斗笠,吕蒙说他犯了军令,马上斩首示众。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存恤耆老、救济贫苦的措施,以收拢

人心。

关羽得知吕蒙攻打南郡、公安的确信，才率领军队从襄樊前线南下。回师途中，他几次派出使者到南郡探听消息，吕蒙把关羽派回的人请入城中，厚礼招待，并让他到关羽官兵的家中问讯。使者返回军中，私下告诉众人，吕蒙来了以后，各人的家属都平安无事，所受的待遇比过去还好。关羽军队的官兵听了这些消息都失去了斗志，走的走、散的散，很快就瓦解了。

这时，陆逊也率领所部攻占了宜都、夷陵等地（今湖北省西部），孙权则率领后续部队进驻公安。关羽势孤力穷，向麦城（在今湖北当阳东南）撤退，同孙权的部将潘璋、朱然相遇，最后为潘璋部下的几个骑兵擒获斩首。

诸葛亮计斩孟达

现今湖北、陕西、四川三省交界的竹山、平利、安康、房县等地，三国时属于上庸、魏兴郡，这个地区背靠大巴山，面对汉水，是魏、蜀边界上一个形势险要的地带，为了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魏、蜀两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情报斗争。

刘备进据益州的时候，这个地区为刘备所占领，镇守这个地区的是刘备信任的将军孟达和养子刘封。关羽在荆州吃紧的时候，曾派人要孟达、刘封前去援救，孟、刘没有发兵。荆州丢失以后，刘备对于孟、刘不去救援关羽很是不满，孟达感到情况不妙，再加上经常同刘封闹矛盾，就带上自己的部曲投降了曹魏。

孟达是一个有名望的人，魏国执政者曹丕听说孟达前来归顺，非常高兴。他一面给孟达封官赏爵，一面派徐晃等人率兵帮助孟达攻打刘封所据守的西城，从而占领了上述边界的整个地区。

在攻打西城的时候，孟达写信向刘封策反，他说：“势力所加，亲可以变成仇，何况你和刘备并不是亲生骨肉，他刘备现在已经怀疑你了，你还是归降魏国吧！”刘封不肯听孟达的话，带领残兵返回成都，刘备对他丧师失地非常不满，就逼他自杀了。刘封死的时候，想起孟达要他归降魏国的话，说：“我真后悔不听孟达的话。”

孟达原来是刘备很信任的人，同诸葛亮关系也不错，可是他竟带了人去投降魏国，又同魏国的军队一起侵占蜀国的边境，还写信向刘封搞策反。他的这些表现，引起蜀国人的不满，蜀国名士费诗称他是反复小人。诸葛亮也在寻找机会铲除他。可是那时曹丕对孟达很宠信，曹丕把所占领的上庸、房陵、西城合并为新城郡，封孟达为新城太守。还把他叫到京城，牵着他的手同他说话，进出的时候同他坐一个车子，亲密得不得了。要铲除他，也不容易。

公元221年曹丕死了，魏明帝继承皇位，孟达对新皇帝的态度不摸底，心里感到不踏实。诸葛亮利用这个机会，给孟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最近从北方来的人那里得知足下的消息，过去实在是刘封这个小子不好，老是欺侮你，弄得你离开了我们，追忆我们以往的友谊，很感到怀念。”孟达得到诸葛亮的信，也想替自己留一个左右逢源的机会，就给诸葛亮写了回信。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把孟达与诸葛亮书信往来的信息，秘密向魏明帝作了报告，魏明帝叫人去调查，情况属实，于是派司马懿率兵前去讨伐。司马懿用离间计的手段策反了孟达的外甥邓贤等人，邓贤等人与司马懿里应外合，攻下了孟达据守的新城，孟达兵败被杀。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

中国有一部专门讲述计谋的古书，名叫《三十六计》，其中的第十六计叫“欲擒故纵”，阐明这一计策的典型事例就是诸葛亮对西南夷首领孟获的“七擒七纵”。

西南夷，是三国时生活在南中地区（今四川省南部和贵州、云南省大部地区）少数民族的统称。南中地区分三个郡，即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牂牁郡（治今贵州都匀东北）、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三国时益州和益州郡是两个交叉的地理概念，益州指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广大地区，益州郡则仅指云南省一部分地区。公元225年诸葛亮在“七擒七纵”平定南中后，益州郡被改称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南中地区原来属蜀国管辖，都督是李恢。公元223年，刘备兵败夷陵，病困白帝城，不久死去。蜀国政局

动荡不安，统治力量削弱，南中三郡相继叛乱。当时刘阿斗新上台，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需要集中力量整顿内部，无力出兵平叛。

公元225年（蜀建兴三年）春，经过诸葛亮一年多的整顿，内部粗安，诸葛亮即亲自统率大军，直指南中，以解决南方的叛乱问题。

诸葛亮的南征大军兵分三路。东路马忠，征讨牂牁郡；中路李恢，征讨益州郡；他自己则率领西路，征讨越嶲郡。马忠与诸葛亮两路均马到成功，唯有李恢一路被西南夷首领孟获击败。这年的五月，诸葛亮指挥西路大军渡过泸水（今雅砻江），会合马忠、李恢的军队，共同与孟获作战。首战告捷，孟获被蜀军生擒。

由于孟获在西南夷中威望较高，诸葛亮想折服他，所以擒获孟获之后，即带着他参观军营，向他显示军威。孟获不服气，说：“过去我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现在你们让我参观了军营，知道你们的军队也不过如此，如果有机会再战，一定可以战胜你们。”诸葛亮笑着说：“好，现在我就放了你，咱们再战！”结果第二次作战，孟获又被蜀军生擒。孟获仍然不服，诸葛亮又再放，再捉。就这样“七擒七纵，而亮犹遣获”。孟获感动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南中地区由此平定。

这就是《三国志》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全部记叙。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根据这些记叙，又加渲染，编写了很多具体而生动的情节，遂使这一故事成为脍炙人口、老幼皆知的事情。

我们从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诸葛亮平定南中主要采取的是“攻心战术”，军事进攻不过是这一战术的力量保证。这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南抚夷越”这一政策的实践化。因为诸葛亮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北方的曹魏集团，要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曹魏，就要东连孙吴，南抚夷越，否则自己的后院经常起火，就无法对付虎视眈眈的曹魏集团。而要南抚夷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夷越的军民上下从心里服气你，为此就要采取“攻心战术”。

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马谡传》引《襄阳记》说：“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在安排人事时，“皆即其渠帅用之”。他的部下见他老是起用少数民族的人来管事，劝他改变这种做法。这时，诸葛亮又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原文如下：“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由此而见，诸葛亮“不留外人，不留兵，不运粮”，起用少数民族的人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攻心战术”的继续和发展。诸葛亮的这一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从南征到蜀汉灭亡，孟获不仅长时间与蜀国保持和平关系，而且还从所在地区调出过大量人力、物力来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孟获后来官至蜀国御史中丞。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即使在遥远的古代，民族间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达到和平相处的目的。

诸葛亮的“空城计”和文聘的卧床却敌

《三国演义》和京剧“失、空、斩”里，都说诸葛亮在马谡丢失军事要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以后，被司马懿的大军围困于西城。当时诸葛亮手中已无兵马，但仍然沉着镇定。他叫人打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抚琴迎敌。司马懿看了这种情势，怀疑诸葛亮设有埋伏，非但不敢攻城，反而退兵回走。但是这件事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马谡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有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蜀记》中郭冲说的一条材料，有点同空城计的故事相类似。郭冲说的一条材料，原文如下：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察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

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但是，从历史事实考证，诸葛亮初次北伐屯兵阳平（在今陕西勉县西）时，司马懿尚在荆州宛城（今河南南阳）督军。两年后，他才首次率领军队从宛城经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讨伐蜀汉。就是这一次，他同诸葛亮也没有在阳平交过锋。郭冲所叙显然缺乏依据。

从这些情况看，诸葛亮的“空城计”大致是一种传说。不过，三国时期，魏国的名将文聘卧床却敌的故事，倒是有点类似“空城计”。

公元226年秋，魏文帝曹丕死了，孙权得到这个消息，亲自率领五万人马，攻打魏国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西南），把魏国的江夏太守文聘包围于石阳（今湖北武汉西北）。当时，石阳的城栅刚被雨水淋坏，因为农忙，还没来得及修补，孙权大军的突然到来，使文聘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一面布置城守，一面考虑对策。他思索了一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条是向敌人表示自己沉着有方，让敌人摸不着底细，不敢全力进攻。于是，他告诉手下人，孙权要是派使者来，只说“太守在卧床睡觉，不见人”。孙权听说文聘在城池被围的情况下仍然安心卧床睡觉，果然对攻城战斗产生了顾虑。他向部下说：“文聘这个人北方名将，一向忠于职守，现在大军压境，他还卧床睡觉，这不是有埋伏，就是有外援，我们可得小心点。”

在孙权攻打江夏以前，魏明帝曹叡曾经派遣治书侍御史荀禹到江夏慰军，荀禹到达时，听说孙权正在围攻石阳，就从所经各县征集了一千多人马，前去支援。这支援军临近石阳时，为了壮大声势，利用山势举火示威，孙权弄不清虚实，以为文聘内有埋伏，外有援军，就从石阳撤退了。

吴、魏石亭之战中“智斗”

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用黄盖的诈降计，烧了曹操的战船，从此，情报战的

手段,引起了东吴政权上下的高度重视。就是孙权本人也经常过问情报战,有时还亲自设计和布置这方面的斗争。

公元228年,诸葛亮在西线向魏国展开进攻,孙权也想利用这个时机从东线打击魏国。

当时魏国镇守东线的军事统帅是征东大将军曹休。这个人是曹操的族子,曾被曹操称为“此吾家千里驹也”。他是当时魏国军队中资格很老的将军,魏明帝即位以后,以他为国家的栋梁,任命他为大司马,要他都督扬州,监视吴国。

这年的五月,孙权密令鄱阳郡(治今江西鄱阳)太守周鲂在所属地区寻找一个既有名望又非常可靠的山民土帅,要这个土帅秘密地去同曹休联系归降事宜,引诱曹休率领军队深入长江北岸的险要地带,以便聚而歼之。周鲂认为,这样的大事,一个山民土帅很难完成,事情万一泄露,就会弄巧成拙,只有由他自己出面去办,事情才有成功的可能。他按这个意思给孙权写了一封机密表章,他在表章里说:“能搞情报斗争的山民土帅很难找到,就是找到了,曹休也不一定相信。他建议由自己来担当这个特殊任务,并表示一定按照孙权的要求,努力想办法让曹休带上自己的军队进入我军埋伏重地,使其军队被我军囊括无遗。”在表章中,周鲂还提出了进行这次情报斗争的方案,并附上了写给曹休的伪降文书的草稿,请求审查。

孙权看了周鲂的机密表章和附件,批准了他的情报斗争方案。

于是,周鲂就按照预定计划,派自己的亲信董岑、邵南给曹休送去了伪降文书。

周鲂在伪降文书中说,他在东吴当鄱阳太守,本来是打算尽忠于孙权的,不料后来孙权听信别人的挑拨,对他日见猜忌,现在他的情况很危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了,因而决心向魏国投诚。他又说,为他送信的董岑、邵南,同他情如父子,一切事情都可以同他们商量,如果魏国一时不能深信他,可以在董、邵两人中留下一个作为人质。就这样,周鲂同曹休建立了秘密联系。这中间,孙权又按照预定计划,派出使者到鄱阳郡去谴责周鲂不忠诚职守,周鲂装出一副恐惧的样子,自己剃了头发,来向孙权表示服罪。剃头发古代叫“髡剔发肤”,是一种类似黥刑的刑罚,一个郡守剃了头发,这对他是很大的耻辱。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曹休耳中,曹休以为孙权确实不信任周

鲂了，因此对周鲂请求归降的举动，深信不疑。

周鲂向曹休报告，说孙权准备乘诸葛亮用兵关西的机会，图谋北犯，多路大军已经悄悄向北方移动，从皖城（今安徽潜山）到长江边，已经没有大部队，留守武昌的军队也只有三千。他建议曹休率领人马从皖城南下，直达长江北岸，他则发兵到历口（今江西长江南岸）接应，这样一来就可以一举攻克长江南北各郡。除此以外，他还向曹休要求给予他和他的部下以封号和印绶。

周鲂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按照孙权的要求把曹休的军队引入现今江边的险要地带，以便孙权在那里埋伏人马聚歼魏军。要求封号、印绶是为了坚定曹休对他的信任。

曹休接到周鲂的假情报，真的以为孙权的江防空虚了，就在八月间昏头昏脑地率领十万步骑向皖城以南进发。孙权得知曹休上了圈套，心中大喜，迅即指派陆逊为大都督，全琮、朱桓为左右督，率领六万人马到曹休军队必经的险厄地区石亭一带布设埋伏，准备同曹休大战。孙权本人也亲自到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坐镇指挥。

在这场“智斗”中，魏国也有战略眼光比较高的人。这人就是豫州刺史、前将军满宠。曹休率领大军向皖城进发时，曾经叫满宠率领所部向夏口（今湖北武汉）方向配合。满宠不同意这一行动，他上书魏明帝说：“曹休这个人虽然很果断但不善于用兵，他选择的进军方向背湖傍江，易进难退，这是兵家忌讳的洼地。敌若从无疆口（在石亭地区）打我军后路，尤其危险，应当做准备。”其实，曹休也不是一个很愚笨的人，他率领大军进入皖城地区以后，即从一些迹象上觉察到自己上了周鲂的当。既然知道了上当，就应当立即挥师北返。但是骄傲自负的思想又害了他，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又依仗自己有十万步骑，就错误地决定，干脆在这里同吴国的军队打个硬仗，以决雌雄。

九月，吴魏两国军队在石亭地区决战。

当曹休的军队进入无疆口到夹石的险厄地带时，陆逊指挥全军凭借有利地势，对魏军发起猛烈进攻。周鲂也率领所部跟随陆逊横截曹休。曹休的军队，在吴军的猛烈袭击下，辐裂瓦解，纷纷败退，陆逊又指挥各部追亡逐北。这次战役，吴军斩获魏军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一万多

辆，军资器械无数。后来曹休得到友军贾逵、朱灵的救援，才得以脱离险境。

曹休打了这样大的败仗，只好上书向魏明帝请罪。魏明帝派人来安慰他。但是他悲愤不已，不久就病死了。曹家的“千里驹”就这样做了孙权情报战的牺牲品。

这场战役之后，陆逊受到孙权御盖覆身的奖赏，周鲂也得到了孙权的表扬。在一次欢庆胜利的宴会上，孙权对周鲂说：“为了成就孤家的大事，你不惜髡剔发肤，蒙受耻辱，你的功绩，是应当垂之青史的。”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写了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但是“苦肉计”的情节，在史书上不见记述。周鲂的髡剔发肤，倒的确是三国时期吴、魏石亭之战时“智斗”中的一次真有其事的“苦肉计”。

孙权和曹叡的情报与反情报斗争

孙权在石亭之战中打败了曹休以后，自立为吴国的皇帝，接着，又同蜀国订立了共分魏国疆土的计划。由此，吴、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军事斗争不断，情报与反情报的斗争在继续。

魏国有一个都督黄河北部地区的老将吴质，这个人就是魏文帝曹丕的亲信，官至振威将军。他平日依仗曹丕的宠信，作风骄横，同魏国的大臣曹真、曹洪等人搞得不好。曹丕死后，他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继承曹丕皇位的魏明帝曹叡，对他也不很信任。

孙权从魏国投降过来的人那里了解到上述情况，就布置人抓这个题目搞一次情报斗争，以进一步离间曹叡和吴质的关系。

吴国有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叫胡综，这个人是孙权的亲信，孙权叫他模仿吴质的口气，伪造了一封《吴质致孙权书》。这份假造的文书大意是：他（吴质）无罪而横遭“潜毁”，现因“构谗见疑”，已经身命不保，因此愿意学习古人伊尹、陈平的榜样，弃邪归正，投靠孙权。希望孙权举兵北上，他则在河北举兵向南，共同夹击曹叡。

由于胡综在伪造文书里模仿吴质的口气很逼真，文书里说的情况又比

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再加上文章有点文采，所以很能迷惑人。时间不久，这件伪造文书就流传到魏国宫廷。吴质也被曹叡召回京城。

在孙权积极开展对魏国情报斗争的同时，曹叡也积极开展对吴国的情报斗争。公元230年，曹叡秘密派遣青州的一个有才干的分子隐蕃到吴国去执行间谍任务，他要隐蕃到了吴国设法往司法部门里钻，以便利用职权制造冤假错案，离间吴国的大臣。隐蕃以诈降的办法到达吴国，然后上书孙权，要求引见。孙权接见了，向他询问各种问题，隐蕃对答得很合时宜，尤其是对答刑狱方面的问题时，隐蕃谈得更为详细、得体。接见的时候，孙权的亲信胡综在座，接见完了，孙权问胡综：“你对隐蕃的印象如何？”胡综回答说：“从他给皇帝写的书信看，这个人有点像东方朔，从他回答皇帝的问话看，这个人像祢衡，只是才能赶不上他们。”孙权问：“可以让他当个什么官？”胡综回答：“在京城里给他个小官试试看。”孙权从隐蕃的谈话中感觉他对刑狱方面的事情很在行，就要他到司法部门工作。隐蕃到职以后，同孙权的驸马、左将军朱据和廷尉郝普关系搞得非常好，郝普还到处为他吹嘘，说他有“王佐之才”。别人看他同朱据、郝普关系亲密，也都跑来同他拉关系。他的门上常常是“车马云集，宾客盈堂”。后来，隐蕃在情报工作中不慎失着，间谍身分暴露，他企图逃亡，却又在逃亡途中被捕。被捕后，孙权叫人拷问他，要他交出同党名单，隐蕃不招。孙权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你拿自己的皮肉替别人受刑，这何苦呢？”隐蕃说：“孙君，我办这样的大事能没有同党吗，但是烈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视死如归，不能牵连别人。”孙权没办法，只好处死了他。

曹叡不仅派遣间谍钻到吴国来搞离间工作，他还利用情报战手段，在吴、蜀两国之间制造矛盾，让其互相猜忌。

曹叡身边有一个机要秘书刘放，这个人善于模仿别人的书信，制造假文件。公元233年，魏国巡逻边境的军队缴获了一件孙权的书信。当时，吴蜀两国正在计划联合出兵进攻魏国，曹叡就叫刘放模仿孙权的书法，伪造了一件孙权秘密同魏国联络的文件，然后把这份伪造的文件转到诸葛亮手中。诸葛亮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吴国边境大将步骖，步骖拿了文件来见孙权。孙权看到了曹叡伪造的文件，大吃一惊，他怕诸葛亮因此而对吴国产生疑心，急忙派人去向诸葛亮解释。

孙权在“智斗”中遇到劲敌

石亭战役中，曹休中了周鲂的伪降计，引军南下，魏国的豫州刺史满宠上书魏明帝曹叡表示反对。后来，曹休打了败仗，病困而死，曹叡即要满宠代替曹休都督扬州军事。

满宠上任第二年(公元230年)，孙权出动军队，说是要打合肥(今安徽合肥)，满宠上表，从兖、豫两州调来了人马组织防御。可是等满宠把人马调齐，孙权又指挥军队退回去了。曹叡听说孙权退兵了，就要满宠“罢兵”。满宠上书皇帝说：“孙权先要大举进攻，现在又突然退回去了，这里面必然有诈。他这是用假退兵的办法来麻痹我们，等我们罢兵，他就会乘虚掩袭。因此，现在我们不能罢兵。”果然，十几天后，孙权听说曹叡有“罢兵”的命令，又指挥军队再次向合肥进攻。哪知满宠早做好了战斗准备，孙权打了一阵，捞不到便宜，只好撤退。

孙权在合肥战场上碰了钉子，不甘心。又想用石亭战役的老办法搞情报战，把魏国的人马引诱到险厄地带来打。哪知这一次老办法不灵了，满宠不是曹休，这一次孙权在智斗中遇到了劲敌。

公元231年，孙权密令中郎将孙布派遣亲信去向扬州刺史王凌联系伪降事宜。王凌是汉末司徒王允的侄子，石亭之战中，他跟从曹休南下，在夹石被吴军包围，他率部力战，表现勇敢，战后被曹叡任命为扬州刺史。孙布给王凌的密信中说，他愿意带领部下归顺魏国，但是因为道路遥远，行动困难，要求王凌派兵接应。刚在石亭战役中受了周鲂欺骗的王凌，未能从曹休的失败经验中汲取教训，竟然又一次相信孙布伪降的谎言。但是满宠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轻信孙布的话。王凌要求满宠调动人马去接应孙布，满宠不肯调动人马，却用王凌的名义给孙布写了一封复信。复信说：“你们知道改邪归正、去暴归道，这很好。我们本来想派兵去接应你们，但是考虑到兵去少了，不能自卫，兵去多了，保不了密，所以不能去接应你们了。希望你们自己设法秘密前来。”

王凌对满宠不满，向皇帝上书说：“满宠年老糊涂，又好饮酒，不堪

重任。”曹叡看了王凌的报告，要满宠回京述职。满宠临走时，嘱咐手下的人说：“我走后，要是王凌决定发兵前去接应孙布，你们不要给他调动人马。”

不出满宠所料，满宠一走，王凌就要发兵前去接应孙布。满宠手下的人按满宠临走时的嘱咐，不肯给王凌调动人马。王凌没办法，只好叫一个将领率领自己部下的少数人马去接应。孙权听说王凌发兵来接应孙布，马上部署大批军队在阜陵地区（在今安徽全椒东南）设下埋伏。王凌的人马来到阜陵地区，看到吴军的阵势，知道上了当，急忙退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吴军的袭击下，王凌的接应人马死伤过半。只是因为满宠所控制的魏军主力没有上钩，所以孙权在这次战斗中未能获取重大战果。

满宠到达京城以后，晋见曹叡，曹叡看他身体健壮，饮酒一石，神智不乱，根本不像王凌说的那样，就又要他回去督军。满宠复职以后，多次率领军队同孙权作战，屡次挫败吴军的进攻，成为魏国东线抗击吴军的主将。

陆逊的“将计就计”

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兵出斜谷（今陕西省南部），讨伐魏国。魏明帝曹叡派司马懿率领军队前去抵御。五月，孙权看到魏国的大批部队西去，就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魏国的合肥（今安徽合肥）。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孙韶、张承率领军队攻打淮阳（在今江苏省北部），命令陆逊、诸葛瑾率领军队攻打襄阳（今湖北襄樊）。魏、吴、蜀三国分东西两线展开了全面战争。

当时，魏国东线的兵力较少，形势紧迫。曹叡一面命令满宠、张颖等人拒守军事要地，一面亲自率领后援部队东征。孙权兵围合肥，久攻不克，又得知曹叡亲自率领援军东下，就在七月从合肥撤退了。

孙权在决定撤退时，派出密使韩扁给陆逊和诸葛瑾送去情况通报和相应的军事指示。不料韩扁在路上被魏国的巡逻兵抓走，孙权给陆逊、诸葛瑾的情况通报和军事指示全部丢失。

诸葛瑾得知这个情况，很是恐惧。他立即派人把这一情况通知陆逊，并

说孙权已经撤退，敌人又抓走了韩扁，知道了我们的底细，因此建议陆逊赶紧撤军。哪知道陆逊得到诸葛瑾的通知，却一点也不慌张，更不下令撤军。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同部下弈棋射戏。还催促下面抓紧季节，播种菽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诸葛瑾的人回来向他述说了以上情况，诸葛瑾说：“陆逊这个人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好办法了。”就亲自来会见陆逊。这时陆逊才对诸葛瑾说：“敌人得知主上的大军撤退，没有顾忌了，一定会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我们现在首先要守好军事要地，安定军心。然后将计就计，相机撤退。切不可仓皇出走。那样敌人就会认为我们恐惧了，一定派大部队追击我们，那时，我们就难办了。”

诸葛瑾对陆逊将计就计，沉着应变的方针非常赞赏，两个人秘密地商议了一个以进攻掩护撤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由陆逊率领步骑，诸葛瑾率领舟船，共同向襄阳发动佯攻。等敌人回城据守时，再抓紧时机用舟船帮助步骑撤退。

由于陆逊经常打胜仗，在敌军中威信很高。这次驻守襄阳的魏军虽然截获了孙权撤退的情报，但是看到陆逊率领军队向襄阳发动进攻，还是很害怕。陆逊的军队一到，他们就收缩部队，回城据守了。于是陆逊、诸葛瑾就按原定计划，抓紧敌人回城据守的机会，有组织地把自己的军队从襄阳前线撤走了。

陆逊在撤军的过程中，还派出一部分军队袭击了敌人防守空虚的新市、安陆、石阳等地（在今湖北省京山、安陆等地）。这次袭击既威慑了襄阳的守敌，又得到了一批战果。

陆逊用“反间计”赶跑了魏国的江夏太守

三国时，魏国的江夏（治今湖北云梦西南）太守逮式是一个很有本事的边将，常常率领人马袭击吴国的边境，给吴国带来了很大麻烦。陆逊为对付逮式，就派人打听他的情况，终于探听到他与魏国大将文聘的儿子文休不和睦，于是，就利用这个矛盾施行反间计。

逯式同陆逊并没有书信往来，可是陆逊却假装收到逯式密信的样子，像煞有介事地给逯式写了一封回信，陆逊在这封弄虚作假的回信里说：“得到你的密信，知道你与文休结嫌很久，势不两存，因而愿意归顺我们，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你确定来归的日期，以便派人接应。”这封信由逯式的士兵得到，并把它送给逯式，逯式看到了陆逊的信，大为吃惊，急忙向曹叡作了报告，并把妻子送回京城，以表示他对魏国忠贞不贰。但是他的部下却不信任他了。不久，曹叡就免了他的职。这个给吴国边境带来麻烦的魏国太守，就这样被陆逊的反间计赶跑了。

司马昭用奇计瓦解寿春守敌

魏明帝曹叡死后，魏国的统治集团分化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以曹爽为首的皇室派，一派是以司马懿为首的篡权派。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害了曹爽。这以后，两派斗争尖锐化。执掌东南地区军政大权的征东将军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先后在公元251年、255年起兵反抗司马懿父子，但都遭到司马懿父子的镇压，王凌、毌丘俭等人全被杀害，只有文钦兵败后逃往吴国，被吴国任命为征北大将军。

公元257年五月，魏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又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基地，反叛司马氏。他从寿春发兵进攻扬州，杀死了扬州刺史乐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合了十万人众，席卷了淮南北。当时执掌魏国军政大权的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闻讯后，亲自率领二十六万人马来讨伐诸葛诞。诸葛诞一面退兵寿春自守，一面派长史吴纲和儿子诸葛靓到吴国请求归顺，并要求吴国派兵支援。

吴国接受了诸葛诞的请求，封他为左都护、骠骑将军、寿春侯，并派前年归降的文钦和吴将全怿、全端、唐咨等人率领三万人马到寿春帮助诸葛诞守城。

六月，司马昭的讨伐大军来到寿春城，把寿春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结实。但是由于城中守军甚多，一时也无法攻克。

这时吴国的皇帝孙亮年纪尚小，执掌军政大权的是大将军孙琳。这个

人粗暴专横，不得人心。就在司马昭围攻寿春的时候，他却为了排斥异己，把吴国的主力部队派往江夏（治今湖北鄂州），去攻打吴国的宗室、镇东将军孙壹，结果驱使孙壹投降了魏国。打完了孙壹，他又匆匆把吴军从江夏调回寿春同司马昭作战。司马昭早做好了迎战准备，吴军来到寿春外围，在都渊、黎浆、都陆、安城等地都打了败仗。九月，率领吴军的大都督朱异认为部队太疲劳了，不能再打，要求休整。孙琳不听，要他继续率领军队死战，朱异不肯进军，孙琳大怒，把朱异杀了。朱异的被杀使吴军上下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司马昭得知上述情况，就一面加紧军事进攻，一面采取情报战手段，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司马昭的策动下，果然陆续有人从寿春城里跑出来向魏军投降。这年的十一月，吴国的内部又出了乱子，皇室姻亲重臣全综的族人全辉、全仪因为吴国领导人闹矛盾，携带部曲、家人渡江向司马昭投降。全辉、全仪同帮助诸葛亮坚守寿春的吴军将领全怿、全端是一家人，司马昭的随军参谋钟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向司马昭密上奇计，他建议利用全辉、全仪同全怿、全端的关系来搞一个反间计，以争取全怿、全端率领所部归顺魏国。司马昭很赞赏钟会的计谋，就叫钟会替全辉、全仪写了一封信。钟会在这封信里假造了一些情况，说吴国的领导人对全怿、全端等人的战斗表现非常不满，要诛杀诸将的亲属，所以他们逃到魏国来了，要全怿、全端见了他们的信赶快过来。信写好后，由全辉、全仪的亲信带进寿春城送给了全怿、全端。全怿、全端等看了全辉、全仪的来信，以为吴国真的要惩罚他们了，害怕得不得了，就率领部下几千人，开了寿春城东门向魏军投降，司马昭热忱地接待了全怿、全端，并给了他们将军或列侯的封号。全怿、全端投降司马昭并被封赏的消息在寿春城传开以后，寿春守军情绪更加波动，诸葛亮陷于孤立。

公元258年一月，诸葛亮和文钦、唐咨等人组织守城军队突围，魏军用石车、火箭狙击，弩矢和石头像雨点般地打下来，诸葛亮、文钦的军队死伤蔽地，最后只好放弃突围打算，重新守城。这时城内粮食已经不多。文钦主张把城内的北方人都放出去，只留下吴国的军队守城，诸葛亮不同意，两个人越争越激烈，互相猜忌起来。诸葛亮害怕文钦背叛他，就先下手把文钦杀了。文钦的儿子文鸯、文虎听说父亲被杀，逾城逃奔魏军。由于文钦是魏国叛逆，文鸯、文虎在作战中又杀伤过魏军很多人，所以魏军中的军吏请求诛

杀文鸯、文虎。司马昭非但不同意军吏的请求，而且给文鸯、文虎以优待。司马昭说：“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依法也应当斩首，但是现在他们肯归降我们，就应当宽大。而且寿春尚未攻克，杀了他们，谁还肯再投降呢，这不等于帮助敌人坚守城池吗？”于是司马昭封文鸯、文虎为将军，赐爵关内侯，然后叫他们带着几百骑兵，沿着寿春城四周的城墙呼喊：“文钦的儿子都不杀，你们还怕什么呢？赶快投降吧！”寿春城的守军，听了文鸯、文虎的呼喊，觉得有了出路，非常高兴，都不愿再为诸葛诞守城。

司马昭用情报战的手段瓦解了寿春城的守军以后，在这年的二月亲自布置攻城部队向寿春城发起总攻。魏军在司马昭的指挥下鼓噪登城，诸葛诞的守城军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登城，不作抵抗。诸葛诞没办法，只好率领自己的少数亲信逃跑，被司马昭的亲兵追杀。坚守了九个月的寿春城，终于被司马昭用军事进攻与情报斗争相结合的手段攻陷了。这一役，司马昭前后歼灭敌军总数有十万之多，缴获的军器堆积如山。

孙权和王基怎样应付敌人的伪降

伪降诱敌，是三国时敌对集团之间在“智斗”时经常使用的策略。因此，怎样识别和应付敌人的伪降策略，自然成为当时敌对集团间“智斗”的重要课题。

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因为伪降诱敌策略的设计者，常常是敌方统帅部里最有头脑的人，决策者常常是敌方统帅部里的主将甚至是他们的最高统帅。而它的执行者，又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人。它的精巧、细致和现实可能性，足以诱人丧失分析的头脑，而它的机密、诱诈和不可捉摸性，又使人难以判断其真伪。不相信它吧，它似乎包含着巨大的利益，机不可失。相信它吧，又没有充分的把握，万一失着，就要吃亏上当。它常常使人面对两难，不好抉择。

当然，蹩脚的、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阴谋诡计也是有的，那常常是一些智力低下或者初出茅庐的小角色粗制滥造的东西。而对战役胜负有重大关系的伪降策略，一般都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这就需要情报战的领导者用尽

心思去认真对付。孙权是一个善于运用伪降策略的人，他用周鲂引诱曹休，用孙布引诱王凌，都获得了成功。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应付敌人伪降策略的人。

公元250年，魏国庐江（今安徽省潜山）太守文钦企图用伪降策略，引诱孙权。他派人给吴国扬武将军朱异送来了请降密信，要求朱异率领军队去接迎他。朱异把文钦的密信送给了孙权，并附上自己的意见说文钦的请降不可靠，建议不要派兵去接应。

当时文钦在魏国同司马懿一派关系不好，他的请降是真是伪一时难以弄清。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孙权准备了两手，即一方面准备文钦的请降是真，派一支军队去预定地区接应；另一方面又准备文钦的请降是假，派另外的军队去预定地区布设网罗，防止突然袭击。他按这个意思给朱异写了一封信，同时派遣越骑校尉吕据率领两万大军前去帮助朱异布设网罗。朱异、吕据按照孙权的指令做好了布置，文钦看到吴军的布置，知道自己的诱敌计划已经难以奏效，只好作罢。

魏国方面也有善于应付敌人伪降策略的人。都督扬州军事的老将满宠识别孙布的伪降是一例；都督荆州军事的老将王基识别邓由的伪降又是一例。

公元261年，吴国荆州地区的邓由、李光等人派手下的将领张吴、邓生给魏国襄阳太守胡烈送来请降密信和人质，说他们要起兵反叛东吴，归顺魏国，要求胡烈派兵到江边去支援他们。胡烈把邓由等的密信转报司马昭，司马昭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当即命令都督荆州军事的征南将军王基调派军队协同胡烈赴宜城（今湖北宜城市）支援邓由等人，并要他乘此机会，向吴军发动进攻，以“震荡江表”。王基接到司马昭的命令，分析了邓由等人的请降活动，认为邓由等人要魏军去的地方都是“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无法施展兵力的“险狭”地区，因此判断邓由等人的请降很可能是伪降诱兵计。做出了这个判断以后，王基立刻派人把邓由等人请降活动的可疑情状驰马飞报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王基的报告，觉得邓由等人的请降确实有问题，就撤销了进军的命令。后来查明邓由等人的请降活动果然不是真的。只是因为王基的善于分析，不肯上当，魏军才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姜维复国密谋的失败

公元262年，执掌魏国大权的司马昭，作了发兵并吞蜀国的决策。他以伐吴为名，动员全国兵力进行伐蜀的准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即兵分三路，向蜀国大举进攻。发兵的时间是公元263年五月。

司马昭的三路大军，主力是征西将军钟会统率的十万人马，进军的方向是从汉中经阳安关（今陕西宁强西北），进入蜀国内地。其他两路是征西将军邓艾和雍州刺史诸葛绪统率的六万人马，进军的方向是经蜀国西部边界祁山和狄道（在今甘肃省南部），进入蜀国内地。

蜀国大将姜维听说钟会兵抵阳安关，急忙率领五万人马，至剑阁栈道（今四川剑阁东北）进行阻击。姜维的大军东去剑阁，蜀国西部边界的防务空虚，邓艾乘机从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道，经江油（今四川平武东南）、涪县（今四川绵阳东），直入蜀国首都成都。蜀国后主刘禅出城投降。

后主投降以后，向姜维发出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姜维率领全军向钟会投降。

蜀国平定以后，钟会、邓艾之间爆发了冲突，司马昭听信钟会的诬告，传令逮捕邓艾，钟会领兵进入成都。姜维从钟、邓的冲突中，看到了钟会的个人野心和敌人阵线的内部矛盾。他想利用这种情势，开展策反活动，以恢复故国。他的计划是先鼓励和帮助钟会反叛司马昭，再寻找机会搞掉钟会，然后重新扶持后主上台。当时，钟会为了扩大自己的私人势力，极力拉拢姜维，两个人“出则同车，入则同席”，好得不得了。姜维利用这种方便时机，积极向钟会进行策反。

一次，姜维找钟会谈心，他说：“从淮南寿春战役以来，阁下随军从征，算无遗策，晋道的昌盛，都是阁下的力量。现在又平复了蜀国，威望高极了，功劳大极了，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上面的忌畏，你准备怎么办呢？”他继续说：“韩信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不肯背叛刘邦，结果天下平定时，却被见疑。大夫文种在打败吴国以后，不肯跟随范蠡归隐江湖，后来终于被勾践杀掉。刘邦、勾践不是昏君，韩信、文种也不是糊涂的臣子，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些

事情呢？这就是利害关系决定一切啊！如今阁下大功已立，大德已著，为什么不效法范蠡归隐江湖，以保全自己呢？或者效法赤松子，登峨眉山岭，归隐于山林呢！”

这段话的中心当然是用韩信、文种功成身死的历史故事，挑唆钟会反叛司马昭，所谓范蠡、赤松子的归隐，不过是一种掩饰性的话语。不料，钟会听了这话，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按你说的办法归隐江湖山林，况且现在天下的大势，也未必这样就完了。”姜维听了这话，一切都明白了，就说：“其他事情，以阁下的明智，都能懂得，就不必老夫说了。”从此，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这期间，姜维还秘密同后主刘禅通了情报，说他正在进行复国斗争，要后主再忍耐一些时候。

公元264年一月，钟会公开举兵反叛司马昭，并扣押了魏军的许多将领。姜维建议把扣押的魏军将领统统杀掉，钟会犹豫不决。被扣押的魏军将领中有一个官居护军的胡烈，他同钟会的亲信丘建是熟人。通过这个熟人关系，胡烈同自己的亲兵见了面。他要这个亲兵出去宣传，说钟会已经挖了大坑，要坑杀全部北方官兵。魏军的官兵听了这个传言，群情激昂。胡烈的儿子擂鼓集合大批士兵去救援被扣押的将领，并围攻钟会、姜维，钟、姜率领亲兵进行镇压，双方混战了一场，最后钟、姜失败，两人均被乱军杀死。姜维的复国密谋也随着钟会反叛活动的失败而失败了。

陆抗的“移花接木”计

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也很会用兵。有一次在战斗中，他遇到了部将临阵叛逃的严重情况，他同他父亲陆逊一样，不慌不忙地沉着应变，最后还在不利情势下，反过来打了个很漂亮的胜仗。

公元272年（凤凰元年），吴国守卫西陵（在今湖北宜昌东）的大将步阐背吴降晋，陆抗率兵前去征讨。晋国派荆州刺史杨肇等人率兵前去支援步阐。在双方对阵的关键时刻，陆抗方面的大将俞赞、朱乔投奔了杨肇。陆抗考虑俞赞、朱乔都是吴军中的老将，熟悉吴军的虚实。他们投奔杨肇以后，

必然会向杨肇提供吴军的各种情报。吴军最薄弱的一环是那一支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平常缺乏训练，作战能力很差。因此俞赞、朱乔一定会建议杨肇向这支部队守卫的阵地进攻。

根据以上考虑，陆抗采取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妙计，他连夜把这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从原来的阵地上调走，换上了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第二天，杨肇果然指挥晋军向这个刚换防的阵地猛烈进攻。陆抗率领士兵勇敢奋战，箭石像雨点般射向敌人。晋军死伤累累。最后晋军终于坚持不住，败逃而走。陆抗打败了杨肇等人的援军以后，又集中力量攻克了西陵，处斩了步阐。

三国大事记

《三国大事记》主要根据《资治通鉴》，并参考《后汉书》、《三国志集解》、《晋书》及历年出版之各种历史年表编制。大事记中月份系古历。公元年月的换算有阴阳之差，并不准确。如大事记中的十二月，在公历已是次年的1~2月。

● 公元 184 年，甲子，汉灵帝光和七年，中平元年

二月，太平道首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全国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参加者有农民三十余万人。

三月，东汉王朝以何进为大将军，派卢植、皇甫嵩、朱儁领兵，到各地镇压起义。

释放“党锢之祸”中被监禁的清流派人士。

四月，黄巾起义军在汝南、南阳、广阳、幽州等地取得胜利。

五~八月，皇甫嵩、朱儁分别击破黄巾军；卢植击败张角；张修以五斗米道领导农民起义，攻据巴郡城邑。

十~十一月，皇甫嵩击败黄巾军。张角病死，张梁与其弟张宝被害。

曹操、刘备与孙权之父孙坚均参加镇压黄巾活动。战后，曹操因军功任济南相；刘备任安喜县尉；孙坚任别部司马。

十二月，改元中平。

● 公元 185 年，乙丑，中平二年

● 公元 186 年，丙寅，中平三年

黄巾主力被镇压后，各地农民起义仍时起时伏。青、徐黄巾余部，常山、黑山军等聚众在数十万以上。

● 公元 187 年，丁卯，中平四年

三月，韩遂、马腾、王国，攻掠三辅。

十月，长沙人区星起义，汉以孙坚为长沙太守，镇压之。

● 公元 188 年，戊辰，中平五年

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大等在河西起义，攻打太原、河东。

四月，汝南黄巾葛坡攻打郡县。

十月，青、徐黄巾军再起义。

十一月，王国攻打陈仓，皇甫嵩、董卓合兵征讨。

● 公元 189 年，己巳，中平六年，汉少帝刘辩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汉献帝刘协永汉元年。

二月，皇甫嵩大破王国。

四月，灵帝死，皇太子刘辩嗣位，是为少帝。何太后听政，改元光熹元年。大将军何进起用名士，杀大宦官蹇硕，夺得部分兵权。

八月，中常侍张让等杀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率部杀宦官二千余人。张让等劫少帝出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杀张让。少帝还宫，改元昭宁。

九月，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改元永汉。董卓杀何太后，任用名士，为党锢事件平反。

十一月，董卓自任相国。其独断朝政，残暴杀人，掠劫洛阳等暴政，激起人们反抗。袁绍、曹操等被逼出走，谋划声讨董卓。

● 公元 190 年，庚午，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

一月，关东州郡组成讨伐董卓联盟，袁绍被推为盟主。盟军从北、东、西三面进围洛阳。董卓逼迫献帝迁都长安，又滥杀京师富室，掠夺财物，焚烧宫殿，挖掘陵墓。

三月，黄巾起义军进攻青州。刘表任荆州刺史。

● 公元 191 年，辛未，初平二年

二月，董卓自任太师，孙坚破董卓军，攻入洛阳。

四月，董卓至长安，仍肆意杀人。

七月，曹操破农民起义军黑山部于东郡。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得冀州，自领冀州牧。

十月，青州黄巾攻渤海；公孙瓒破之，杀三万余人，俘七万余人。公孙瓒

攻冀州，以刘备为平原相。张鲁攻占汉中。

● 公元 192 年，壬申，初平三年

一月，袁术派孙坚进攻刘表，被刘表部下黄祖杀死（注：孙坚死年，记载各有不同，此按《后汉书》）。袁绍破公孙瓒。

四月，董卓被王允、吕布设计诱杀。名士蔡邕被王允杀害。

六月，董卓余部为董卓复仇。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杀王允，劫持献帝。青州黄巾杀兖州刺史刘岱，曹操挫败黄巾，领兖州刺史。

十二月，曹操占兖州，发兵聚歼青州黄巾，俘三十余万人，选其精锐，组建青州兵。

● 公元 193 年，癸酉，初平四年

一月，袁术占淮南。

六月，袁术破黑山军于毒等部。袁绍破刘石、青牛角等部。

八月，曹操以徐州兵杀害其父曹嵩，发兵进攻徐州牧陶谦，杀城中男女数万。

十月，公孙瓒攻杀刘虞。

● 公元 194 年，甲戌，兴平元年

二月，刘备救援陶谦，吕布攻兖州，曹操退兵；马腾、韩遂与李傕等争夺关中，败退凉州。

四月，曹操攻占琅琊、东海。陈留太守张邈与曹操部下陈宫联合吕布，叛曹操。

七月，关中大旱，长安人相食。

八月，曹操与吕布战于濮阳。

十二月，益州牧刘焉死，其子刘璋嗣。徐州牧陶谦病死，刘备代领徐州牧。

● 公元 195 年，乙亥，兴平二年

一月，曹操在定陶打败吕布。

二月，李傕、郭汜内讧。李傕抢夺献帝至其营，并焚烧宫殿，掠取官人。

五月，李傕自任大司马。曹操再破吕布，吕布投奔刘备。

六月，李傕、郭汜讲和。杨奉、董承迎献帝东归。

十一～十二月，李傕、郭汜等要追回献帝，杨奉等引白波及南匈奴军打

破李、郭。李等复追，百官死者甚多。献帝夜渡黄河，驻安邑。孙坚之子孙策攻打扬州，占领江东大片地区。

● 公元 196 年，丙子，建安元年

一月，汝南、颍州黄巾被曹操击破。

六月，袁术攻刘备，吕布占徐州。

七月，献帝至洛阳。

八月，曹操收复兖州，率兵迎献帝入许都。孙策占会稽。

十一月，曹操任司空、大将军，百官听命。袁绍占青州。曹操采枣祗、任峻建议，募民屯田许下以恢复农业生产。吕布攻刘备，刘备投奔曹操。

● 公元 197 年，丁丑，建安二年

一月，曹操率军至宛，攻张绣，张绣降。后因曹操私通其婶，复反，曹操大败，长子曹昂、大将典韦战死。曹操引兵还。又曹操招降韩遂、马腾。袁术称帝于寿春。孙策与袁术决裂，曹操任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三月，袁绍据冀、青、并三州。

五月，袁术攻吕布。孙策统领吴郡。

九月，曹操攻袁术，袁术败退淮南。江淮灾荒，人相食。

● 公元 198 年，戊寅，建安三年

四月，关中兵击杀李傕，郭汜亦被其部所杀。董卓余党衰败。

五月，攻张绣，大破之。

十一~十二月，曹操围攻吕布。吕布投降，曹操杀之，并占徐州。

诸葛亮隐居隆中，结交徐庶、崔州平等，并拜庞德公、司马徽为师。

刘表占据荆州八郡。

● 公元 199 年，己卯，建安四年

三月，袁绍攻杀公孙瓒，占幽州。

六月，袁术死。

八月，袁绍率十万大军进攻曹操，曹操迎之于黎阳。刘备攻占徐州后弃曹自立，东海昌豨附刘备。

九月，曹操分军守官渡，与袁绍对垒。

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

是年，孙策与孙权破庐江太守华歆，进讨黄祖，并秘密计划袭击曹操后

方许都，迎献帝。

● 公元 200 年，庚辰，建安五年

一月，董承、刘备等谋害曹操的计划暴露，董承被杀。曹操率兵攻打刘备，夺回徐州，刘备投奔袁绍。关羽降曹操。

四月，曹操派兵解白马之围，关羽斩袁绍大将颜良。孙策被人刺杀，弟孙权继位。

七月～九月，汝南黄巾刘辟附袁绍，袁绍命刘备去汝南助之，被曹操打败。关羽回归刘备。

十月，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曹操采袁绍谋士许攸议，率精兵袭击袁军粮仓乌巢，杀袁绍大将淳于琼。烧粮万余车。袁绍派出大将张郃，攻打曹操后方。张郃反戈降曹，袁军崩溃。袁绍携八百骑逃遁。袁绍降卒七万多遭曹操坑杀。

● 公元 201 年，辛巳，建安六年

九月，曹操派兵攻打东海昌豨。昌豨降曹操。刘备投奔刘表。

● 公元 202 年，壬午，建安七年

五月，袁绍病死，子袁谭与袁尚争权。

九月，曹操攻打袁谭、袁尚，胜之。又击破南单于，收降之。

● 公元 203 年，癸未，建安八年

二月，曹操与袁谭、袁尚战于黎阳，胜之。袁谭、袁尚内哄。

八月，袁尚打败袁谭，袁谭求援于曹操。

是年，孙权又伐黄祖，破其舟师。

● 公元 204 年，甲申，建安九年

二月，曹操攻打邺城，占邯郸。

八月，曹操攻取邺城、破袁尚军，占冀州。

十月，并州刺史高干降曹操。袁谭攻打袁尚，袁尚败走幽州。

十二月，曹操破袁谭。

● 公元 205 年，乙酉，建安十年

一月，曹操杀袁谭，袁尚奔乌丸。

四月，黑山军张飞燕率十万众降曹操。

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干反曹。

● 公元 206 年，丙戌，建安十一年

一月，曹操率军攻打高干。

三月，高干败亡，并州归曹操。至此，曹操又占冀、青、幽、并四州，基本上统一北方。

八月，袁尚与乌丸单于扰乱边塞，曹操作反击准备。

● 公元 207 年，丁亥，建安十二年

八月，曹操于白狼山大破乌丸，斩单于蹋顿，降俘二十余万。袁尚逃归辽东太守公孙康。

十月，公孙康杀袁尚，函首送曹操。

是年，刘备亲赴南阳隆中，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向刘备陈述夺取荆、益三分天下，然后北伐中原的“隆中策”。从此诸葛亮成为刘备的最大谋臣。

● 公元 208 年，戊子，建安十三年

春，孙权复征黄祖，吕蒙、甘宁攻杀黄祖。

六月，曹操自任丞相。

八月，荆州牧刘表死。其子刘琮代。曹操杀孔融。

九月，曹操率大军进攻荆州，刘琮降。刘备逃至夏口，派诸葛亮去东吴，结好孙权，共抗曹操。东吴大臣张昭等人劝说孙权降曹；周瑜、鲁肃力主抗战，孙权采周瑜、鲁肃主张，决定联合刘备共抗曹操。

十月，曹操以舟师进攻孙权，孙权命周瑜为主帅率军迎击。周瑜用黄盖伪降计，火烧曹船，大破曹军于赤壁。曹操败退南郡，遣兵守江陵。周瑜进围南郡。

十二月，刘备攻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诸郡。驻屯公安。任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孙权以妹嫁刘备。

● 公元 209 年，己丑，建安十四年

七月，曹操在芍陂屯田。

十二月，周瑜大破曹操江陵兵，占领江陵，不久病死。

● 公元 210 年，庚寅，建安十五年

春，曹操发布惟才是举令。

冬，曹操建铜雀台。孙权平定岭南。

● 公元 211 年，辛卯，建安十六年

一月，曹操以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三月，曹操进军至关中，韩遂、马超联兵抗曹。

七月，曹操率军袭击韩遂、马超。

九月，曹操先用离间计破坏韩马联盟。继用兵大破韩遂、马超。韩遂、马超奔凉州。

益州太守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共击张鲁。刘备以庞统为谋臣，率兵西进。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

● 公元 212 年，壬辰，建安十七年

五月，曹操杀马腾。

七月，曹操使夏侯渊破马超部将梁兴。

九月，孙权建石头城于秣陵，改为建业，移居之。

十月，曹操率兵攻打孙权。

十二月，刘璋从张松案中得知刘备夺取益州计划，乃与刘备断绝关系。刘备即占据涪城，向刘璋进攻。

● 公元 213 年，癸巳，建安十八年

一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破孙权江西营。孙权率兵七万拒之，相守月余，曹操见其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撤军。

五月，曹操自任魏公，以冀州为魏国。刘备进攻雒城，庞统战死。刘备调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留关羽镇荆州。

八月，马超杀凉州刺史韦康，督凉州军事。凉州氏人响应马超。

九月，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合谋击败马超，马超投奔张鲁。

● 公元 214 年，甲午，建安十九年

五月，诸葛亮与刘备会合。

夏，雒城破，刘备进围成都，归依刘备的马超军亦到，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

七月，曹操又征孙权，无功而还。

十一月，曹操杀献帝皇后伏氏及两皇子。

● 公元 215 年，乙未，建安二十年

三月，曹操率兵攻打汉中张鲁。张鲁投降，北方统一于曹操。

五~七月，刘备、孙权关系恶化，双方兵戎相见，后经谈判，重新划分荆州，以湘水为界，东归吴、西归蜀。曹操攻占汉中，张鲁奔巴中。

八月，孙权围合肥，曹将张辽、李典坚守，孙权无功而返；撤兵时，又遭张辽袭击，吕蒙、凌统以死捍卫。

十一月，张鲁向曹操投降，曹操遣将进攻三巴，被张飞击败。

● 公元 216 年，丙申，建安二十一年

四月，曹操进位魏王。

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曹操命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 公元 217 年，丁酉，建安二十二年

春，曹操与孙权战于濡须口。吕蒙大破曹军前锋，曹操引退。鲁肃病死。吕蒙继其职，屯陆口。

十月，曹操立曹丕为魏太子。

● 公元 218 年，戊戌，建安二十三年

春，刘备与法正率军进入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

四月，代郡、上谷乌丸叛乱，曹操派曹彰出击。

九月，曹彰击破乌丸。鲜卑大帅轲比能降。

曹操率兵至长安。

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叛曹操，曹操派曹仁围宛。次年一月，侯音败死。

冬，刘备与夏侯渊对峙于汉中阴平关。

● 公元 219 年，己亥，建安二十四年

一月，刘备率黄忠与曹操争夺汉中，黄忠斩曹操大将夏侯渊于定军山。

三月，曹操亲率大军至汉中，与刘备相持。

五月，曹操退兵，刘备占有汉中，并遣将孟达、刘封攻占房陵、上庸。

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

八月，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大破曹操大将曹仁，又水淹曹军。杀曹操大将庞德，擒曹操大将于禁。俘曹军数万人。

十月，陆浑平民孙狼起兵响应关羽，许都以南人心震恐。

十一月，孙权派将军吕蒙、陆逊袭取荆州。

十二月，关羽败死。孙权向曹操称臣。曹操任孙权为荆州牧。

● 公元 220 年，庚子，延康元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

一月，曹操死，曹丕袭魏王爵，改元延康。

二月，陈群制九品官人法，州郡皆设中正官，考评士人。

七月，上庸守将孟达投降曹丕。法正病死。

十月，曹丕废汉称帝，以献帝为山阳公。建魏国。东汉亡。

十二月，曹丕迁都洛阳。

● 公元 221 年，辛丑，魏黄初二年，蜀汉昭烈帝刘备章武元年

四月，刘备于成都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国号汉。是为汉昭烈皇帝，史称“蜀汉”。以刘禅为太子，诸葛亮为丞相。孙权迁都武昌。

六月，张飞遇害身亡。

七月，刘备率兵伐吴，进军至秭归，孙权遣大都督陆逊拒之。

八月，孙权向魏称臣。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 公元 222 年，壬寅，魏黄初三年，蜀汉章武二年，吴王孙权黄武元年

二月，刘备军驻夷道、猇亭。鄩善、龟兹、于闾各派遣使臣朝魏。

六月，吴将陆逊大破刘备于猇亭。火烧蜀军兵营四十余，刘备退白帝城。

十月，孙权抗拒曹丕送质子之请，自立为吴王，改元黄武，魏大举攻吴，孙权临江拒守。

● 公元 223 年，癸卯，魏黄初四年，蜀汉章武三年，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元年，吴黄武二年

二月，魏张郃攻吴江陵，曹仁攻濡须，皆不利。魏军引退。

四月，刘备病死，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改元建兴。益州郡耆帅雍闿叛蜀归吴，南中夷人首领孟获反蜀。

十月，蜀派邓芝使吴，蜀吴再次联合。

● 公元 224 年，甲辰，魏黄初五年，蜀汉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

八年，曹丕至寿春、广陵，临江观兵。

● 公元 225 年，乙巳，魏黄初六年，蜀汉建兴三年，吴黄武四年

二月，曹丕派使者问民间疾苦，并开仓赈贷。

三月，诸葛亮率兵讨伐雍闿。

五月，曹丕以舟师攻吴。

七月，诸葛亮杀雍闿，远征南中。七擒夷首领孟获，又七纵之。孟获心服。南中四郡皆定。

曹丕又东巡广陵，临江观兵。

十二月，诸葛亮班师回成都。

● 公元 226 年，丙午，魏黄初七年，蜀汉建兴四年，吴黄武五年

一月，曹丕死。太子曹叡嗣位，为明帝，司马懿、曹真为辅臣。

八月，孙权攻魏江夏郡，不克；诸葛瑾攻魏襄阳，为司马懿击退。

是年，孙权接见罗马帝国商人秦伦。

● 公元 227 年，丁未，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吴黄武六年

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并进军汉中，训练兵马，为攻魏作准备。

● 公元 228 年，戊申，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吴黄武七年

一月，孟达归汉，司马懿出兵杀之。诸葛亮首出祁山攻魏，天水、南安、安定皆响应。姜维归蜀。魏派大将张郃赴汉中，张郃于街亭大败蜀将马谡，诸葛亮退兵汉中，斩马谡，并自贬三等。

五月，魏分兵三路攻吴。

九月，吴将陆逊于石亭大败魏将曹休，斩获万人。

十一月，诸葛亮再次上《出师表》，要求北伐。

十二月，诸葛亮兵出散关，围魏陈仓。粮尽还兵，退军中斩魏将王双。

公孙渊自领辽东太守。

● 公元 229 年，己酉，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吴大帝孙权黄龙元年

春，诸葛亮三次北伐，攻取魏武都、阴平二郡，后主复诸葛亮丞相位。

四月，孙权自立为皇帝，国号吴，改元黄龙，迁都建业，是为吴大帝。

六月，蜀遣使贺孙权即帝位，约中分天下。

九月，孙权迁都建业。

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调遣使献于魏，魏命之为“亲魏大月氏王”。

● 公元 230 年，庚戌，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吴黄龙二年

一月，魏筑合肥新城。

二月，吴派将军卫温等出海经营夷洲（今台湾岛）、亶洲。

七月，魏派曹真、司马懿、张郃率兵攻蜀，诸葛亮阻之于城固、赤阪。

九月，魏兵引退。

● 公元 231 年，辛亥，魏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吴黄龙三年

二月，诸葛亮复兵出祁山攻魏，以木牛运粮。魏命司马懿率兵抵御，五月，司马懿败，丧甲首三千。

六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谷，与诸葛亮交战，被射死。

十月，吴败魏将王凌于阜陵。

● 公元 232 年，壬子，魏太和六年，蜀汉建兴十年，吴嘉禾元年

一月，吴改元嘉禾。

九月，辽东太守公孙渊因与吴通好，魏派兵讨之，屡攻不克，退兵。

十月，公孙渊遣使称藩于吴。

十一月，曹植死。

● 公元 233 年，癸丑，魏太和七年，青龙元年，蜀汉建兴十一年，吴嘉禾二年

二月，魏改元青龙。

三月，吴遣使将兵万人，册公孙渊为燕王。

六月，鲜卑骑兵万人，侵扰魏并州，为魏将击退。

十二月，公孙渊杀吴使，送其首于魏。魏封之为乐浪公。吴使者从吏，逃至高句丽，高句丽遣送还吴，并奉表称臣。诸葛亮使诸军运粮，集于斜谷口，准备再次北伐。

● 公元 234 年，甲寅，魏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吴嘉禾三年

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由斜谷攻魏。

四月，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五丈原，司马懿坚壁不战。

五~七月，吴三路发兵攻魏，孙权亲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曹叡亲率水军拒吴。吴军引退。

八月，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兵退。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在退兵中双方举兵相攻，杨仪斩魏延，整军还成都。蜀以蒋琬为尚书令，统国事。遣吴壹守汉中。

● 公元 235 年，乙卯，魏青龙三年，蜀汉建兴十三年，吴嘉禾四年

魏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一月，蜀杨仪居功有怨言，被黜，后被杀。

四月，蜀以蒋琬为大司马录尚书事，费祎为尚书令。

七月，魏大治洛阳宫，力役不已，百姓失农时。

八月，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改革织绫机。

● 公元 236 年，丙辰，魏青龙四年，蜀汉建兴十四年，吴嘉禾五年

四月，武都氏帅苻健归于蜀。

五月，肃慎氏献楛矢于魏。

七月，高句丽王斩送孙权使者结好于魏。

● 公元 237 年，丁巳，魏青龙五年，景初元年，蜀汉建兴十五年，吴嘉禾六年

三月，魏改元景初。

七月，吴孙权遣将朱然攻魏江夏；魏派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兵讨伐公孙渊，公孙渊迎战，毌丘俭失利。公孙渊自立燕王。

十月，吴诸葛恪平定山越，山越归顺者十万，得甲士四万。

● 公元 238 年，戊午，魏景初二年，蜀汉延熙元年，吴嘉禾七年，赤乌元年

一月，蜀改元延熙，魏明帝诏司马懿率兵征讨公孙渊。

八月，司马懿大破公孙渊，斩公孙渊及其部下官吏家属。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并入魏。

九月，吴改元赤乌。

是岁，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者向魏献礼，明帝封之为“亲魏倭王”。

● 公元 239 年，己未，魏景初三年，蜀汉延熙二年，吴赤乌二年

一月，魏明帝死，太子曹芳嗣位，曹爽、司马懿辅政。

二月，西域遣使来魏，献火浣布。

四月，吴派遣将军从海道击魏辽东。

十二月，吴将廖式杀临贺太守，自称平南将军，攻零陵、桂阳。吕岱等率兵平之。

● 公元 240 年，庚申，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蜀汉延熙三年，吴赤乌三年

春，蜀越嵩蛮夷叛，以张嶷为越嵩太守，平定越嵩郡。

● 公元 241 年，辛酉，魏正始二年，蜀汉延熙四年，吴赤乌四年

四月，吴兵分四路攻魏淮南等地。

五月，司马懿率兵拒吴。

闰五月，吴大将军诸葛瑾病亡。

六月，吴攻魏兵退。

● 公元 242 年，壬戌，魏正始三年，蜀汉延熙五年，吴赤乌五年
一月，吴立孙和为太子。

七月，吴派遣将军聂友等攻珠崖、儋耳。

● 公元 243 年，癸亥，魏正始四年，蜀汉延熙六年，吴赤乌六年
一月，吴诸葛恪领兵袭魏六安，破魏将谢顺。

十一月，蜀蒋琬病笃，以王平督汉中，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十二月，倭国女王卑弥呼复遣使者向魏贡献。扶南王遣使向吴贡献。

是岁，魏在淮南北大规模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桑。

● 公元 244 年，甲子，魏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吴赤乌七年
一月，吴以陆逊为丞相。

二月，魏派大将军曹爽攻蜀，蜀将王平率兵阻击，费祎督诸军支援，曹爽失利，退兵。

九月，鲜卑归附于魏，魏置辽东属国，设昌黎县处之。

● 公元 245 年，乙丑，魏正始六年，蜀汉延熙八年，吴赤乌八年
二月，吴陆逊病亡。

七月，吴将军马茂等阴谋叛吴降魏，事泄被杀。

● 公元 246 年，丙寅，魏正始七年，蜀汉延熙九年，吴赤乌九年
二月，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攻高句丽。

五月，魏遣将追高句丽王，过沃沮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破涉貊，降韩那奚等数十国。

八月，魏释放七十以上之官奴婢。

十一月，蜀蒋琬病亡。费祎与姜维并录尚书事，宦官黄皓为中常侍。

● 公元 247 年，丁卯，魏正始八年，蜀汉延熙十年，吴赤乌十年
雍、凉、羌胡附蜀反魏；蜀姜维出陇右迎抚，与魏军战于洮西；胡王白虎

文等率部从姜维入蜀。

● 公元 248 年，戊辰，魏正始九年，蜀汉延熙十一年，吴赤乌十一年
九月，蜀涪陵属国民夷起事，邓芝平复。

● 公元 249 年，己巳，魏正始十年，嘉平元年，蜀汉延熙十二年，吴赤乌十二年

一月，魏司马懿发动宫廷政变，杀曹爽、丁谧、邓颺、何晏等，司马懿出任丞相，独揽大权。何晏好周易与老庄之书，注《论语》，开清谈之风，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四月，魏改元嘉平。

秋，蜀姜维引兵攻魏雍州，不克而还。

● 公元 250 年，庚午，魏嘉平二年，蜀汉延熙十三年，吴赤乌十三年

八月，吴废太子孙和。

十月，魏庐江太守文钦伪降以诱吴军。吴军持重，文钦不敢进。

十一月，孙权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十二月，魏王昶、王基分兵两路攻吴，吴遣将军施绩、陆凯往拒之。蜀姜维攻魏西平，无功而返。

● 公元 251 年，辛未，魏嘉平三年，蜀汉延熙十四年，吴赤乌十四年，太元元年

一月，魏王基等击破吴兵，降者数千人。

四月，魏太尉王凌谋废帝立楚王曹彪，司马懿讨之。王凌自杀。

五月，吴改元太元。

八月，司马懿病亡。以卫将军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十二月，吴命诸葛恪主持军国大政。

● 公元 252 年，壬申，魏嘉平四年，蜀汉延熙十五年，吴太元二年，神凤元年，吴嗣主孙亮建兴元年

一月，魏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二月，吴改元神凤。

四月，孙权病亡，太子孙亮嗣；改元建兴，以诸葛恪等五大臣为辅臣。

十二月，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分兵三路攻吴。诸葛恪以大兵赴敌，大破魏军，杀魏将韩综等。

● 公元 253 年，癸酉，魏嘉平五年，蜀汉延熙十六年，吴建兴二年

一月，蜀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刺杀。

三月，诸葛恪率军伐魏。

四月，姜维率兵围魏南安，不克而退。

五月，诸葛恪围魏合肥新城，魏遣司马孚督军拒之。大疫，吴军死者大半。

八月，诸葛恪兵疲而退。

十月，吴孙峻伏兵刺杀诸葛恪，篡取丞相位。

● 公元 254 年，甲戌，魏嘉平六年，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蜀汉延熙十七年，吴五凤元年

一月，吴改元五凤。

二月，魏司马师杀中书令李韦、太常夏侯玄等。

六月，姜维率兵复出陇西攻魏，拔河关、临洮，徙其民于绵竹、繁县。

九月，魏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改为齐王。

十月，司马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 公元 255 年，乙亥，魏正元二年，蜀汉延熙十八年，吴五凤二年

一月，魏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兵败。文钦奔吴。毌丘俭死。司马师病亡。

二月，司马昭代司马师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吴孙峻率兵十万，攻魏寿春，为魏将诸葛诞击破。

八月，姜维率兵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

● 公元 256 年，丙子，魏正元三年，甘露元年，蜀汉延熙十九年，吴五凤三年，太平元年

春，蜀进姜维为大将军。

六月，魏改元甘露。

七月，姜维出祁山，赴上邽，为魏将军邓艾击破。

八月，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吴孙峻遣文钦、吕据等自江都攻魏。

九月，孙峻死，弟孙琳领中外军事，召还吕据等。

十月，吴内訌，孙琳杀政敌滕胤等。改元太平。

十一月，吴孙琳为大将军，又杀大臣王惇等。

● 公元 257 年，丁丑，魏甘露二年，蜀汉延熙二十年，吴太平二年

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叛魏，并向吴称臣求援；司马昭发兵征讨。吴使文钦等率兵三万救援。

六月，吴夏口督孙壹降魏。蜀姜维率兵出骆谷攻魏。

七月，魏围诸葛诞于寿春，吴孙琳遣朱异、丁奉率兵五万救援。

八月，吴会稽南部大乱，鄱阳、新都民众起义。

● 公元 258 年，戊寅，魏甘露三年，蜀汉景耀元年，吴太平三年，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

一月，蜀改元景耀。宦官黄皓擅权，姜维兵还成都。

二月，魏司马昭亲率大军攻陷寿春，斩诸葛诞。

吴援救诸葛诞军亦受重创，被俘及死者以万计。

八月，吴帝孙亮以孙琳专恣，与太常全尚等谋诛之。后事泄，全尚等被杀。

九月，孙琳废吴帝孙亮。

十月，孙琳立琅琊王孙休为景帝，改元永安，孙琳晋位丞相。

十二月，吴景帝孙休用左将军丁奉计，诛杀孙琳。

● 公元 259 年，己卯，魏甘露四年，蜀汉景耀二年，吴永安二年

三月，吴帝以租税过重，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令诸卿、尚书议兴农桑。

● 公元 260 年，庚辰，魏甘露五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六年，蜀汉景耀三年，吴永安三年

五月，魏帝曹髦率童仆自讨司马昭，被杀。

六月，魏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璜为元帝，更名曹奂，改元景元。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

● 公元 261 年，辛巳，魏景元二年，蜀汉景耀四年，吴永安四年

七月，乐浪韩、涉貂朝贡于魏。

● 公元 262 年，壬午，魏景元三年，蜀汉景耀五年，吴永安五年

四月，肃慎使魏贡楛矢、弓、石弩、貂皮。

十月，蜀姜维率兵攻魏洮阳，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吴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魏以钟会都督关中军事。准备攻蜀。

是年，司马昭杀竹林七贤之嵇康，死时弹“广陵散”一曲。

● 公元 263 年，癸未，魏景元四年，蜀汉景耀六年，炎兴元年，吴永安六年

五月，魏使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镇西将军钟会分兵几路伐

蜀。蜀遣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领兵拒之。吴交阯民众起事，郡吏吕兴杀太守孙翊，九真、日南皆响应。

八月，钟会进占汉中，姜维等阻之于剑阁。蜀改元炎兴。

十月，吴以蜀告急，遣将军丁奉等攻魏救蜀。邓艾率部绕阴平，出奇兵直趋蜀中，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进军成都。

十一月，后主刘禅出降，又令姜维降钟会，蜀汉亡。魏以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

魏得蜀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兵十万二千，吏四万，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绢等二十万匹。

● 公元 264 年，甲申，魏景元五年，咸熙元年，吴永安七年，吴末帝孙皓元兴元年

一月，魏钟会密告邓艾谋反，诏槛车征邓艾。钟会又矫帝命起兵反司马昭，众不听命，乱兵杀钟会及姜维。监军卫瓘恐邓艾困乱有变，使人杀邓艾于途。钟会死后，乱兵抢掠百姓，死丧狼藉，数日始安。

三月，司马昭称晋王，迁蜀帝刘禅于洛阳，封为安乐公。

五月，魏改元咸熙。

七月，吴景帝孙休死。吴丞相濮阳兴等迎立乌程侯孙皓，改元元兴。

吴郡盐民暴乱，聚众万人，为陆抗镇压。

八月，魏命司马炎副贰相国事。

十一月，吴帝孙皓骄奢淫逸，凶残暴戾。丞相濮阳兴大失所望，屡有怨言。孙皓执而杀之。

● 公元 265 年，乙酉，魏咸熙二年，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吴元兴二年，甘露元年

四月，吴改元甘露。

八月，晋王司马昭死，子司马炎袭位，总摄国政。

九月，吴迁都武昌。

十二月，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位，易魏为晋。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

● 公元 266 年，丙戌，晋泰始二年，吴甘露二年，宝鼎元年

八月，吴改元宝鼎，以陆凯为相。

十月，吴永安平民施但等起事，拥孙皓庶弟永安侯孙谦为王，众万余人，

为吴将击败。孙谦自杀。

十一月，倭国女王遣使者奉献于晋。

十二月，吴孙皓还都建业，令将吏女岁岁上名，供选阅，选阅不中，方得出嫁。

● 公元 267 年，丁亥，晋泰始三年，吴宝鼎二年

六月，吴建造昭明宫，大兴土木，穷极技巧，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

七月，晋大兴土木，营太庙。

● 公元 268 年，戊子，晋泰始四年，吴宝鼎三年

十月，吴派兵攻晋江夏、襄阳，为晋将所破。吴派兵与晋争夺交阯。

十一月，吴将丁奉攻芍陂，为晋将击退。

● 公元 269 年，己丑，晋泰始五年，吴宝鼎四年，建衡元年

二月，晋以羊祜都督荆州军事。羊祜在襄阳屯田，有十年之积，甚得民心。

十月，吴改元建衡。

十一月，丞相陆凯病亡。吴再派兵与晋争夺交阯。

● 公元 270 年，庚寅，晋泰始六年，吴建衡二年

一月，吴攻晋涡口，为晋兵击退。

四月，吴以陆抗都督四方诸军。以防晋侵袭。

九月，大宛、焉耆各遣使贡献于晋。

十二月，吴夏口督孙秀奔晋。

● 公元 271 年，辛卯，晋泰始七年，吴建衡三年

一月，孙皓亲率大军攻晋，晋遣司马望拒之，吴师中道遇大雪，乃罢。

四月，吴将陶璜以十万兵攻取交阯，擒杀晋军将，交阯重归吴。

● 公元 272 年，壬辰，晋泰始八年，吴凤凰元年

一月，吴改元凤凰。晋将讨伐匈奴右贤王刘猛。匈奴左部帅李恪杀刘猛，降晋。

六月，晋益州牙门将张弘叛乱，广汉太守王濬斩张弘，王濬为益州刺史。

九月，吴西陵督步阐降晋。

十二月，吴都督陆抗杀步阐。

● 公元 273 年，癸巳，晋泰始九年，吴凤凰二年

三月，吴以陆抗为大司马。孙皓爱妾使人至市劫夺百姓。中郎将陈声绳之以法。孙皓竟斩陈声。

七月，吴兵围晋戈阳，败还。

● 公元 274 年，甲午，晋泰始十年，吴凤凰三年

三月，晋帝荒淫，诏取良家女五千人入宫，母女号哭，声闻四野。

七月，吴大司马陆抗病亡。江南疾疫流行。

九月，晋攻占吴枳里城。吴攻晋江夏，败还。

● 公元 275 年，乙未，晋咸宁元年，吴天册元年

一月，晋改元咸宁，吴改元天册。

六月，鲜卑拓跋力微，遣子沙漠汗奉献于晋。吴攻晋江夏。

十二月，洛阳大疫，死者万数。

● 公元 276 年，丙申，晋咸宁二年，吴天册二年，天玺元年

二月，并州鲜卑侵扰边境。为晋将胡奋击败。

五月，晋将司马骏攻击北胡，杀其帅吐敦。

七月，吴改元天玺。鲜卑阿罗多等侵扰边境，西域校尉马循击破之，阿罗多等请降。

八月，吴京下督孙楷降晋。

十月，晋以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羊祜上表，力主攻吴。

● 公元 277 年，丁酉，晋咸宁三年，吴天纪元年

一月，吴改元天纪。

三月，吴将邵颀七千余人降晋。

十二月，吴攻晋江夏、汝南。

● 公元 278 年，戊戌，晋咸宁四年，吴天纪二年

七月，晋司、冀、豫、兖、荆、扬大水。

十月，晋派兵攻吴皖城，杀五千人，焚积谷百八十余万斗，民困甚。

十一月，晋羊祜病笃，举杜预代督荆州。

● 公元 279 年，己亥，晋咸宁五年，吴天纪三年

一月，鲜卑树机能破凉州，晋遣武威太守马隆讨之。匈奴左部帅刘豹死，子刘渊嗣。

四月，吴桂林部将郭马等叛乱，攻杀广州督，吴发大兵击之。

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率部附晋。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古书十余万言。

十一月，晋大举伐吴，遣将军王浑、司马伷、王濬、王戎、杜预、周浚、胡奋、唐彬等率领水陆大军六路并进。

十二月，晋马隆破鲜卑，杀树机能，鲜卑大人率众降晋。

● 公元 280 年，庚子，晋咸宁六年，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

春，吴军在晋军打击下，土崩瓦解。杜预斩吴江陵督伍延，王浑斩吴丹阳太守沈莹，所在战克。

三月，王濬率军破夏口、武昌，顺流下建业。孙皓自缚请降，吴亡。

晋得吴四州四十三郡，户五十二万三千，人口二百三十万，兵二十三万，吏三万三千。金银财宝无数。

四月，晋武帝封孙皓为归命侯。改元太康。杜预还镇，引濬、清清水灌田万余顷，又开漕扬口，以通零陵、桂阳。

是年，以司隶所统郡置司州。共有州十九，郡国一百七十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六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诏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颁占田、课田、户调法。

后记

本书在书稿校审和资料查询等方面得到李景琦、朱家玮、钟婴、钱宝瑾、周秋芳、杨惠玲、方婉婉、孟葛平等人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的同事陈宁宁是本书的一些篇章的合作者。她曾按照作者口述的中心议题，执笔完成了本书的部分撰稿。但2006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她担任责任编辑，坚决不愿参加署名。此次修订版，改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责任编辑由历史学者褚赣生先生担任，乃征得陈女士同意，恢复共同署名。特此说明，并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

作者

2013年春